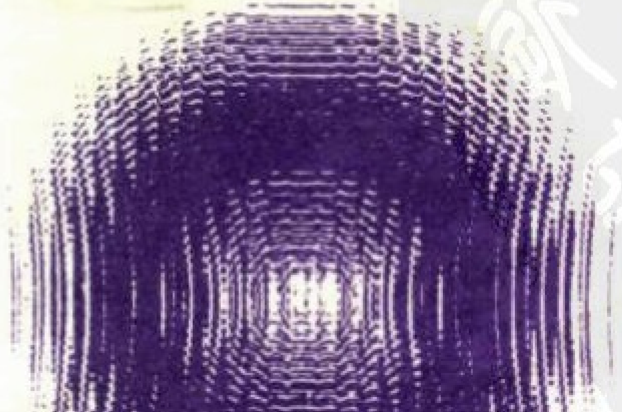
本书系统论述了女人一生的生理、心理（自然也包括性心理）的发展过程，对女性特点，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现代文化学术丛书

XIAN DAI WEN HUA
XUE SHU CONG SHU

女人是什么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PDG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女人是什么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王友琴　邱希淳等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Le Deuxième Sexe
by Simone de Beauvoir
Penguin Modern Classics, 1983.

(据“企鹅”现代经典丛书1983年版译出)

现代文化学术丛书
女人是什么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王友琴　邱希淳 等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插页 264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5059-0407-8/I·261 定价：3.65元

丛书弁言

我们热忱地迎接一个新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学术。对文化学术演进而言，历史沿袭及异质文化融合二个因素，不可或缺。但是没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特质，则就没有这一时代的文化学术。

现代文化学术，是全面的文化探索。需要向天——自然，向地——社会，向人索取时代的诗意和哲理。这项建设工程，在人类文化发展长河中，不过是涓滴的积累，但却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数代人的不懈努力。

编辑出版《现代文化学术丛书》，意愿为此做点些微工作。

这套丛书，主要集辑中外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或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观对人类思想文化的研讨。凡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建设，丛书揖纳百家之言，不拒任何学术流派。丛书深望社会学术各界，鼎力相助。

在文化上，能否再次出现“诸子百家”式的繁荣，给现代

文化学术建设以一个加速度，责不在天，在于人，在于自己。在崎岖的学术研究道路上，后顾无愧，瞻前无畏，通过智慧劳动，同步于新时代——这种学术品格，本丛书愿秉之与著者、读者共勉。

《现代文化学术丛书》 编者

1987.5

EN26/20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童年时代 ……………………………………（24）

第二章　少女时代 ……………………………………（106）

第三章　性的引入 ……………………………………（166）

第四章　结婚以后 ……………………………………（209）

第五章　母　亲 ………………………………………（271）

第六章　社交生活 ……………………………………（329）

第七章　由成年到老年 ………………………………（365）

第八章　妇女的处境和特性 …………………………（393）

中外人名对照 …………………………………………（436）

译后记 …………………………………………………（440）

序　言

很久以来，我一直犹豫不决是否要写一本关于妇女的书。这个题目是令人不快的，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而且，这个题目也并不新了。关于女权主义的争论，已经耗尽了无数笔墨，以致关于这个题目我们也许已经说不出更多的东西了。然而，由于一个世纪以来的大量昏话丝毫无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依然被讨论着。究其根本，妇女问题能否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能，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真的有所谓真正女性气质的女人吗？那种认为有“永恒的女性气质”的理论，肯定依然有人附和，他们咕咕哝哝地说：“即使在俄国，女人也仍然是女人。”

另一些大学问家，有时持有相同的看法，有时则叹息道：“女性正在失去她们的特性，女性正在消亡。”人们不知道：女人是否还存在？是否还将永远存在下去？她们是否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她们实际所占的地位？什么是她们应该占的地位？在最近已经停刊的一家杂志上提出过

一个问题："女人已经变成了什么？"

我们首先必须要问：女人是什么？有人说：女人是生孩子的。但是说到某些女人的时候，有些行家说，虽然她们也象别的女人一样有一个子宫，但她们不是女人。大家一致认为，妇女存在于人类之中，现在和过去她们都构成了人类的一半左右。我们还被告知，女人正处在危险中。有人教诲我们，要做一个女人，象一个女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于是，似乎并非每一个女人都一定是个女人；如此说来，她似乎必须具有那种神秘而可怕的称之为女性气质的东西。这种女性气质起因于卵巢的分泌物吗？或是柏拉图所说的精神本质——一种出自哲学家想象的产物？或是体现于沙沙作响的拖地长裙之中？虽然有一些妇女热烈希望把这种精神本质具体化，但这种东西是很难说清楚的。这种女性气质，曾经被一些比未卜先知的预言者的词汇还要夸张的、含糊不清而又令人目眩的语言形容过，而且，在圣托马斯时代，这种女性气质，就被认为是象鸦片烟那样能使人产生梦幻效力的东西。

但是概念论已失去了基础。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已不再承认那种固定不变的本性，那种决定了某些被认为属于妇女、犹太人或黑人的天赋特征的本性。科学认为任何特性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看作对于环境的反应。如果今天女性气质已不存在，那么它们过去也并不存在。但是，"妇女"一词，是否不再具有特殊的涵义呢？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和唯名论都坚决肯定这一点；他们认为女人仅仅是一个被称为"女人"的

人而已。特别是很多美国妇女认为，女人不复具有这种地位。在美国，如果一个女人依然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她会被认为是思想落伍者，她的朋友会劝她去找心理医生，以摆脱这种念头的萦绕。有一本«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在其他方面言辞颇为激烈。多萝西·帕克提到这本书时说：“对那些只把女人当作女人看待的书，我认为是不公平的。我的看法是，所有的人，女人和男人一样，应该都被当作人来对待。”但是唯名论是一门不够严密的学说，而反女权主义者很容易证明女人根本不是男人。女人肯定和男人一样，都是人，但这种说法过于抽象。事实上，每一个具体存在的人总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拒绝接受诸如女性气质永恒、黑人有黑色的灵魂、犹太人有犹太人本性这些观念，并不等于否认犹太人、黑人和妇女的现实存在。即使否认犹太人、黑人和妇女的现实存在，也不表明从有关问题中解脱出来了，而只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几年以前，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拒绝让她的照片出现在一本女作家的影集中，她希望能列入男作家影集之中。她利用丈夫的影响获得了这种特权。这种要求把她们当作人的女人，仍然要求得到男人的体谅和尊重。我也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托洛斯基主义者站在喧闹的会议讲台上准备挥舞她的拳头，尽管她的身体显然是脆弱的，缺乏力量。妇女否认女性的弱点，但这是为了得到她希望与之平等的那些态度强硬的男人的爱。很多美国妇女的挑战态度证明她们被她们的女性意识所困扰。事实上，一个睁眼走路的人便足以了

解人类分成男女两大个体类别，他们的服装、面容、身体、微笑、姿态、兴趣和职业会有多种区别。也许，这种区别是表面的，而且注定要消失，但这种区别的显著存在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女性的功能不足以定义女人，如果我们也拒绝以“永恒的女性气质”来解释女人是什么，如果我们姑且还承认女人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女人是什么？

可以猜到，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已经预先制定了它的答案。由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一个男人从不设想要写一本关于男人特有情况的书。但是如果我希望给自己作个定义，我必定首先会说：“我是一个女人”，然后，基于这一事实，才能作进一步的讨论。但是一个男人从不先说他是一个男人，他们从来不会一开始就表明他是某一特定性别的个人。男性和女性，这两个专用名词，只在形式上被对称使用，比如在法律文件中。事实上，两性之间的关系并不象电的阴阳极。因为“男人”既代表阳性的，也代表中性的，就象在英文中一般就用“男人”来代表全人类；然而“女人”却只限于代表阴性，不能象“男人”一样也代表中性。常常在理论的探讨中，会听到男人们说：“你之所以这样想，因为你是一个女人。”他们这种话，听来使人感到恼怒。但是，我知道我唯一的防护性回答是：“我之所以这样想，因为这是对的。”借此我使自己在争论中摆脱了主观性。另一种回答，“你之所以不这样想，因为

你是一个男人”，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人们都不认为做个男人有什么特别。古代用一根绝对的垂直线为参照，以说明其他斜线，而现在把男性确立为一个绝对的人的标准。身为男人，总是对的，因为他是男人；身为女人，则总是错的。女人有卵巢、子宫，这种生理的特点束缚了她的主体性，使她囿限于她自己天然特性的范围内。她们经常被说成是通过腺体而不是通过头脑来思维的。男人怀着优越感无视他身体里也有腺体这一种解剖学上的事实，比如睾丸，也分泌荷尔蒙。男人把他的身体看作是与世界的直接而标准的联结，他相信他能客观地观察了解，然而他认为女人的身体则受到每一样她特有的东西的阻碍、束缚和削弱。亚里斯多德说过，“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就因为她们缺乏某些素质，女人由于天然的缺陷而遭受痛苦。”圣托马斯声称，在他看来妇女是一个“不完善的男人”，一个“附属”的存在。这是根据《创世纪》中关于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多余的肋骨”造成的传说而来的象征性说法。

人类就是男性，男人不是由妇女自身而是根据和他的相对关系来解释女人。女人不被当作一种自主的人。密什莱写道：“女人，一种相对的人……”。贝达在他的书里说：“男人的身体的意义是和妇女不同的，后者似乎缺乏重要性。……男人没有妇女还不要紧，女人没有男人便无所依傍。”男人判定女人是简单的，她被称作“性”，意味着她对于男人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性感的动物出现的。她是为他而存在的

059207

性，如此而已，别无他哉。她是被参照他而定义的，而不是他被参照她而定义；她是附属的，是相对于本质来说的非本质的。他是主体的，他是绝对的，而她只是“另一种”。

“另一种”的说法由来已久。在最为原始的社会中，在最为古老的神话中，就可发现关于阴阳两性的表达方法，即“我”和“另一种”。最初这种说法和性别并不相干，也不取决于任何经验过的事实。它出现于格拉涅特关于中国思想的著作和杜美济尔关于东印度和罗马的著作中。最初女性元素未被引入如来-僧侣、天神-宙斯、太阳-月亮、白天-黑夜这类成对的事物中，也未被引入好和坏，幸运和凶兆，左和右，上帝和恶魔的对比之中。“另一种”，这是人类思想中基本的分类方法。

如果不确立一个别的与之相对的种类，也就确立不了任何种类。如果三个旅行者正巧在同一包厢中，那么火车上的其余乘客就含含糊糊地成为一些相对立的“另一种”人们了。在小镇人看来，所有不属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令人生疑的“陌生的外乡人”；对于某个国家的人来说居住在其他国家的人都是“外国人”；对于反犹太主义者来说，犹太人是“不同的人”；对美国种族主义者来说，黑人是“低贱的”；对殖民主义者来说，当地人是“土著”；对特权阶级来说，无产阶级是“低等阶级”。

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一本关于原始社会的各种形态的深奥著作的末尾，作出如下结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有文化

的状态，是以人类在一系列对比中观察生物关系的能力为标志的。二重性、交变性、相反和对称，在明确或模糊的形式下，与其说是要解释的现象，不如说是一种基础的、直接的社会现实的论据。如果事实上人类社会只是简单地建立于团结友爱基础上的一种伙伴关系，那么这些现象就无法理解了。反过来，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如果我们在意识中发现了指向其他各种意识的根本性对立，事物就变清楚了；主体只有在对立中才可能形成——他把自己树立为本质性的，对立于另一种非本质的客体。

但是，另一种意识，另一种自我，提出了互补的要求。到国外旅行的人惊讶地发现他被邻近国家的当地人看作奇怪的陌生人。事实上，战争，节日，贸易，协商，以及部落、国家、阶级之间的争夺竞赛都趋向于剥夺“另一种”的绝对意义，并表明其相对性。不管愿意不愿意，个人或团体都不得不承认他们之间关系的这种互补。然而，那种男女两性之间的互补一直未被承认，其中一方被当作唯一的本质，否认了关联物的相对关系并且把后者解释为纯粹的附属物。这对吗？为什么妇女不能对男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提出疑问？没有哪个主体会自觉自愿地变成客体，变成非本质的东西。不是“另一种”人确立了“人”，而是把自己定义为“人”的人确立了“另一种”人。但是，如果“另一种”人不能重新回到“人”的状态，他必然会屈服顺从并接受这种与自己不相容的观点。这就是妇女的屈从状态的发生根源吗？

可以肯定，在其他情况中，某种类别可以一度完全支配另一种类别。这种特权常常是由双方数量的很大差别造成的。多数人把法则强加于少数人并迫害他们。但是，妇女并不象犹太人或美国的黑人，妇女不是少数人。地球上男女数目相当，这两个群体一开始就是各自独立的；他们以前可能一直处于对各自存在状况的无意识之中，可能他们承认了彼此的自主性。但是，历史事实总是呈现出强者对弱者的征服，犹太人的流散，奴隶制进入美国，帝国主义的征服，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者只能沉缅在旧日的记忆中，他们迷恋共同的过去或某个传统，有时是宗教或文化。

倍倍尔把妇女类比于无产阶级是有道理的，二者都从未处于少数状态，也都不是或隔绝的人类群体。无论解释阶级的状况，还是说明这个阶级中的一些特殊人物或全体成员，都要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考察，而不是用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来说明。但是，无产阶级并不永远存在，妇女却总是存在的。她们是解剖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妇女。从古到今，她们一直从属于男人，因此，她们的依附性并不是某一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所致，当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发生时，她们的依附性却一如既往。为什么相对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成为绝对？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历史的偶然性和意外性。某一时代产生的情况在另一时代可能消失，正如海地的黑人不同于其他黑人的情况所证明的。但是自然形成的情况并不象历史事实那样：一旦给

定，便永远不变。如果妇女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从未改变为重要的，那是因为她不去改变。无产阶级说："我们"，黑人也这样说，把他们自己当作主体，把资产阶级、白人当成"对方"。但是妇女不说"我们"，除了在某些女权主义者的会议或类似的正式示威中。男人说"女人"，妇女们提到她们自己时也使用同一词汇。她们并没有真正采取主体性态度。在俄国无产阶级完成了革命以后，海地的黑人，印度支那地区的人们正在战斗；但是除了象征性的骚乱，妇女没有作出其它努力。她们仅仅得到了男人愿意给予的东西；她们仅仅只是接受，她们并未主动去得到什么。

原因在于妇女缺乏具体的打算来把她们自身组织成一个集团，以对抗相关的集团。她们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她们自己的宗教，而且她们也没有无产阶级具有的那种由于工作和利益形成的团结性。她们甚至也不象美国的黑人、犹太居住区的犹太人、塞纳-丹尼斯的工人和雷诺的工人那样，随意聚集在一起后产生了共同感。她们分散生活在男性之中，居住、家务劳动、经济条件、社会声望等依赖于某个男人——父亲，或者丈夫——远远超过和其他妇女的关系。如果她们属于资产阶级，她们和这个阶级的男人保持一致，而不是和无产阶级的妇女保持一致；如果她们是白人，她们效忠于白人男性，而不是效忠于黑人妇女。无产阶级可能建议杀掉统治阶级，极度狂热的犹太人或黑人可能梦想得到唯一的原子弹所有权，使人类统统犹太化或黑人化。但是

妇女不会想根除和灭绝男人。她和她的压迫者的联结是无法用别的东西相比的。性别的划分是生理上的事实，而不是人类历史的事实。男人和女人对立于一种原始的合作中，妇女不能打破它。由两个一半铆接在一起而形成的配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沿着性别的分界线劈裂成两半是不可能的。由此，发现了妇女的基本品性：她是一个由两个互不可缺的部分组成的整体之中的次要部分。

有人可能推想这种互补互惠关系有利于妇女解放。在神话中，当赫丘利坐在翁法勒脚边帮她纺纱时，他的情欲使他成为她的俘虏。但是，为什么她不能持久地获得这种力量？为了向伊阿宋报仇，美狄亚杀死了他们俩的孩子。这个冷酷残忍的传说似乎暗示她只有通过他对他的后代的爱来使他恐怖及痛苦。在《里西特拉》一书中，阿里斯多非尼斯颇为滑稽地描写一帮妇女联合起来，企图利用男人们的性需要而实现她们的社会目标。但这仅仅是戏剧而已。在萨比尼的传奇中，妇女们很快放弃了她们以不生孩子来惩罚男人的计划。事实上，妇女从来没有由于男人的情欲、男人的后代欲等必须依靠妇女才能满足的需要，而获得社会性的解放。

主人和奴隶也可能由于经济上的互惠需要而联合起来，但这并不能使奴隶得到解放。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中，主人从不考虑奴隶的需要。主人握有通过行动满足自己需要的权力。然而，处于依附状况中的奴隶，处于希望和恐惧中的奴隶，却充分意识到主人的需要。即使这种互惠需要在根本上

对双方来说都是同样迫切的，它也总是对压迫者有利而对被压迫者不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的解放一直进行缓慢的原因之一。

现在，妇女们总是依附于男人，虽然不是他的奴隶。两种性别从未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甚至在今天，妇女的处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她们仍被严重束缚着。在法律上女人的地位和男人相差很远，常常对她们非常不利。即使她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抽象的承认之后，长期持续的习俗也阻碍这些权利得到更多的实现。在经济领域，男人和女人几乎形成两种地位悬殊的等级。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男人能得到较好的职业，较高的工资，并且比他们的女性竞争者们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在工商业界和政界，男人占据了大量的职位，并几乎垄断了大多数重要的位置。除此之外，因为现在把过去奉为神圣，而在过去，所有的历史都是由男人创造的，所以他们享有一种传统的威望，这种威望是从童年教育起就从各个方面予以支持的。在当代，当妇女们已开始参与世界事务时，世界依然属于男人；对于这一点，男人们认为理所当然，妇女们也几乎深信不疑。如果拒绝成为“另一种”，拒绝成为交易中的一方，妇女就要放弃和男人进行联合中的全部利益。拥有君主般至高无上权力的男人，情愿提供给臣服的女人以物质的保护，并且情愿对她的存在提供道德上合理的辩护。于是，她可以同时躲避因解放而带来的经济方面的风险和形而上的风险，而这种解放的目标又必须由她们孤立无援

地自行设计。确实，由于每个人都有一种证实自身主体存在的强烈的伦理方面的欲求，于是产生了一种放弃自由而把自己变成一种物品的诱惑。这是一条不祥的道路，走上这条道路的人，被动，迷失，毁灭，从此以后变得受人主宰，挫灭了超越性，被剥夺了各种价值。但这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们可以避免负担实际生存的紧张。男人把女人变为“另一种”，同时他可能期望显示出这是两厢情愿的发自内心的意图。因此，妇女可能不去争取主体性地位，因为她们缺乏明确的资本，因为她们感到不惜代价和男人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必要，因为她们常常乐于扮演“另一种”角色。

但是，立刻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男女两性的二元性，就象其他任何二元关系一样，会引起冲突，这是容易理解的。毫无疑问，赢者将摆出他拥有绝对地位的样子来。但是为什么男人从一开始就赢呢？女人赢得胜利，或者冲突长期不分胜负，也是可能的。为什么世界总是属于男人，并且只是到了最近事情才有所变化呢？这种变化是好事吗？这会带来一种男女平等分享这个世界的局面吗？

这些问题不是新的，而且，已经有人作出解答。但是，妇女是“另一种”的事实，由于男人们不断为其提供合理的证据，逐渐不再被怀疑了。这些全都听命于男人的利益。一个少有人知的十七世纪的女权主义者，保兰·德·拉·贝利，曾经这样说：“男人所写的关于妇女的一切，都是可疑的。因

为男人的身份，如象在诉讼案中，既是诉讼的一方，又是法官。”每时每地，男人都不掩饰他们那种主宰一切人的得意劲儿。“感谢上帝，他没有使我成为女人”，犹太人在他们的早祷中说。然而他们的妻子驯服地祷告：“感谢按照他的意愿创造了我的主。”在柏拉图感谢造物主所赐的福祐之中，第一条是他生下来是自由的，不是奴隶；第二条是他身为男人，而非妇女。但是，除非男人相信他们的特权是建立在绝对和永恒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便不能充分享受这种特权；他们试图把他们事实上的优越性当成一种应有的权利。“作为男人，他们制定了对男性有利的法律，法学家又把这种法律提高为原则”，这也是保兰·德·拉·贝利说的话。

立法者、传教士、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曾努力证明妇女的从属地位是天经地义的。男人发明的宗教反映了他们充当主宰的愿望。在关于夏娃和潘多拉的传说中，男人曾拿起武器反对妇女。他们也曾利用哲学和神学，如同前面引用的亚里斯多德和圣托马斯的话所表明的。自古以来，讽刺作家和道德学家们都热衷于揭露妇女的弱点。我们都熟悉整个法国文学中运用粗暴的指控辱骂妇女的情况，举例来说，蒙德兰特追随金·德·缪的传统，虽然在狂热方面略逊一筹。这种不时可以发现的敌意，常常是毫无根由的。事实上，这种敌意或多或少有效地隐瞒了他们为自己辩护、使自己的想法合理化的愿望。正如蒙田所说，“谴责一个性别比谴责别的容易。”有时候，发生的事情是很清楚的。比如，就在家庭纽带削弱

而威胁到男性的血亲继承人的利益时，罗马法律引证“女性愚笨低能并水性杨花”来限制妇女的权利。当单身妇女被认为有管理她自己的财产的能力时，圣奥古斯丁曾经宣称：“女人既无决断力也无恒性。”在十六世纪，还有人凭借奥古斯丁的权威，呼吁让已婚妇女继续处在丈夫的监护之下。蒙田清楚地知道，妇女的命运象拈阄一样被决定，是多么武断、多么随意、多么不公正。他说：“当妇女们拒绝接受规定的法则时，她们没有错，因为男人们未跟她们商议便制订了那些法则。于是，发生种种阴谋和争吵，也就不足为怪。”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支持她们的事业。

直到十八世纪，那些名副其实的民主主义的男人，才开始客观地看到这些情况。其中，狄德罗努力说明女人是和男人一样的人。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热情地为妇女辩护。这些哲学家们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公正无私，不怀偏见。在十九世纪，女权主义的争论再次成为党派性的争论。工业革命的结果之一是妇女们进入了生产性的劳动，也就在这里，女权主义者对权利的要求，从理论王国中浮现出来，并取得了经济基础，同时，她们的反对者也变得更具侵犯性。虽然土地产权已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威力，但资产阶级却依然墨守那种保护私有财产、有利于家庭稳定的旧道德。当妇女解放运动变得具有威胁性时，要她们回到家庭中去的命令也变得更加严厉了。甚至在工人阶级中，男人也竭力压制妇女的解放，因为他们开始看出妇女是危险的职业竞争者，因为她们习惯

于做相同的工作而领取低薪。

为了证明女人是低等的，反女权主义者们开始象从前那样，不仅抬出了宗教、哲学、神学，而且还抬出了生物学、实验心理学等等。他们至多同意对另一性别实行一种“有区别的平等”。这一对男人有利可图的口号中大有文章，它和吉姆·克劳法针对北美黑人提出的“平等但是隔离”的口号如出一辙。众所周知，这种所谓的平等的隔离，实际上来自一种极端的种族歧视。刚才注意到的这种类似并非出于偶然巧合。由于民族、种姓、阶级或性别的不同，都会迫使人一部分处于低等地位，而证明其正当性的方法是相同的。“永恒的女性气质”的说法相当于“黑色的灵魂”和“犹太人性格”这类论调。实际上，犹太人问题与其他两个问题是很不相同的。对于反犹太主义者来说，与其说他们把犹太人看作低等的，不如说他们把犹太人当作敌人，因为他们认为：地球上没有可给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命该灭绝。但是，妇女的处境和黑人深为类似。今天二者都好象是从一种家长式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从前的主子希望“让他们继续在他们的地方”，也就是，在指定给他们的地方。对两种情况，昔日的主人会多多少少给予一些真诚的赞扬：一种是麻木、幼稚、忙忙碌碌的“好黑人”的美德；另一种是具有“真正女性气质”的驯服的妇女的“优点”——琐碎，孩子气，不负责任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中，占支配地位的集团都把争论的基点设立于他们一手造成的实际状态上。乔治·肖伯纳的话一针见血，他说：

“美国的白人只许黑人做擦皮鞋那一类的工作，然后，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黑人除了擦皮鞋，什么都做不好。”这种逻辑上有问题的循环论证，在类似的环境中常会遇见；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一直生活在低等的处境中，就认定事实上他也就是低等的。但是，这个动词“是”的意义，在这里必须作出正确的理解。当它确实具有黑格尔式的“成为”的动态性的涵义时，给予它一个静态的意思，这是一种欺骗。是的，今天的妇女总的来说是不如男人、低于男人的；那也就是说，她们的处境很少给予她们提高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吗？

很多男人希望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并非所有的男人都认输了。保守的资产阶级依然把妇女解放视为对他们的道德观念和利益的一种威胁。有些男人害怕女性的竞争。最近，一个男学生在一家杂志上写道：“每一个进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女学生，都抢走一个我们的职业。”他大概从来没有对他在这世界上的这些权利有所疑问。经济利益不是被考虑的唯一因素。压迫别人给予压迫者的好处之一是：他们中最卑微的人也可能感到自己高人一等。这样，美国南方的“穷白人”可以凭借他不是一个“脏黑鬼”来安慰自己，富裕的白人则更加聪明地利用这种骄傲。

同样，连最为平庸的男人，也自以为若和妇女相比，自己便成了半人半神该被崇拜的人物。对蒙德兰特来说，当他面对妇女（并且这些妇女是为他的目的挑选出来的），比他在

男人群中不得不做出一副男人样子的时候，他更容易感到自己是个大英雄。在这方面来说，很多妇女已经做得比他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发表于《费加罗文学》的一篇文章中，因其独创性而备受钦佩的克劳德·莫里亚克，论及妇女时写道：“我们以一种冷漠而有礼貌的样子（原文如此！）……听着她们之中最有才华者的发言，我知道她的智慧多多少少反映了来自我们的光辉思想。”显然，这里提到的女性发言者不会反映莫里亚克本人的思想，因为人们不知道他有什么思想。她可能反映了某些男人原创的思想，但是，即使在男人中，也有盗用并非他们自己的思想的人；而且，人们可以问问，是否莫里亚克未曾感到反映笛卡尔、马克思或纪德思想的谈话，比他自己的思想更使人感兴趣。引人注意的是，由于使用了这个成问题的“我们”，他和圣保罗、黑格尔、尼采认同，居高临下，轻蔑俯视着那些竟敢擅自要以平等地位与他对话的妇女们。事实上，据我所知，不止一个妇女会拒绝容忍这种莫里亚克的“冷漠而有礼貌的样子”。

我之所以举出这个例子，因为在这里男人的态度是以某种不设防的坦率表现出来的。但是男人以很多更为微妙的方式从妇女和他们的相对社会关系中获取利益。那些担心自己生育能力的男人，对妇女总是特别傲慢不逊，冷嘲热讽，或者侵犯欺凌；这对那种被病态的自卑心理所折磨的人来说是一帖万灵妙药。那些在男性伙伴面前不会惊慌不安的男人，则更加倾向于承认妇女是对等的人；但是即使对这些男人来说，

妇女是“另一种”人的神话出于很多原因依然是可爱的。不必责备他们不甘心放弃从这种神话中取得的种种好处，因为他们知道，按照他们的想象，妇女解放将使他们失去什么，而同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将从明天的妇女得到什么。拒绝把自己当作唯一的、绝对的主体，需要伟大的自我否定精神。进一步说，绝大多数男人并没有什么明确清晰的主张。他们不再认定妇女是低等的，只是因为他们现在浸泡在民主理想的汪洋大海中，不得不承认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在家庭内部，妇女在孩子和青年的眼中似乎和成年男人有相同的社会尊严。后来，充满欲望和爱意的青年男人，体验到他所爱的女人的抵抗力和独立性；结婚后，他尊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妇女，在夫妻生活的具体事务中她作为一个自由的人站在他面前。所以，他感到两性之间的从属关系已不复存在，就总体而言，尽管区别依然还有，但男女是平等了。当他看到一些妇女的弱点，其中最多的是职业方面的不太胜任，他把这些归咎于自然的原因。当他和妇女处在合作的、友善的关系中时，他的理论是一种抽象的平等的原则，并且他的态度也并不以可能存在的不平等为根据。但是，当他和她发生冲突时，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他的理论变成了承认当前存在的不平等，他甚至以此论证否定抽象的平等是合理的。

因此，很多男人以一副真诚的样子断言，妇女已经和男人平等了，她们没什么可抗议吵闹的了，与此同时，他们又

会说，妇女永远不可能和男人平等，她们的种种要求都是徒劳的。事实说明，要让男人认识到这种社会歧视的严重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种社会歧视，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但是在妇女的道德和智力方面产生的后果如此深重，以致这些后果看起来象是出自妇女的天然本性一样。最富于同情心的男人也从未充分理解过妇女的具体处境。当男人们急于保卫他们大概还未充分估算过的特权时，是没有理由信任他们的。我们不能允许自己被那些大量的、激烈的对妇女的攻击所吓倒，也不要被那些给予"真正的女人"的颂词诱入陷阱，也不会从那些不想承担责任的男人对妇女命运表示的热情之中获益。

然而，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怀疑来考虑女权主义者们的那些争论，因为常常正是这些争论的目标使这些争论的真正价值丧失殆尽。如果"妇女问题"似乎显得肤浅琐屑，那是因为男性傲慢地把它当作一种"吵闹"；既然是"吵闹"，那就谁也没有多少道理了。人们不知厌倦地试图证明女人是高于、低于或平等于男人的。有些人说，夏娃造于亚当之后，她显然是次要的人；另一些人说，恰恰相反，亚当只是粗糙的毛坯，当上帝创造了夏娃的时候，上帝才成功地创造出了完美的人。有人说，妇女的脑子小些；另一些人说，是的，妇女的脑子虽然小些，但相对身体来说却比例较大。有人说，基督被造为男人；另一些人说，是的，基督被造为男人，但这也许是出于他伟大的谦卑。各种争论表明，对立的双方都

很荒唐。如果我们打算获得理解，我们必须离开这些旧的车辙，我们必须抛弃这些含糊不清的“低等”、“高等”、“平等”的说法；迄今为止，这些含糊不清的说法破坏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每一次讨论。我们必须重新开始。

那么，我们将如何提出问题呢？首先，我们将向谁提交问题呢？男人既是裁判员又是辩论的参加者；但是女人也一样。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天使，一个既非男人也非女人的人，但是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而且，天使大概也无法发言，因为天使对牵涉到这一问题的基本事实一无所知。找个两性人来也不会更好，因为这情况太特别了；两性人并非真是一整个男人和一整个女人的联合，而是由各自的一些部分组成的这样一种非男非女。在我看来，归根到底，最有资格阐明妇女处境的，似乎必定还是妇女。不要让我们被这种诡辩引人歧途：有一个人说，克里特岛上的人都是说谎的人，他自己也是克里特岛上的人，于是，他必定也是说谎的人，于是，他说的这句话也必定是谎话……于是，就无法弄清他的这句话是真是假。并不是神秘的本性迫使男人和女人或真诚地或欺诈地行动，是他们的处境推动他们或多或少地寻求真理。很多有幸恢复了人的权利的当代妇女，必然也就能担负得起这种神圣的职责。我们不再象我们那些坚定而偏激的前辈们；大体上我们已经赢了这场比赛。在最近关于妇女地位的辩论中，联合国坚持维护了正在逐渐实现的男女平等，并且，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不再感到身为女性是一种烦扰或

障碍。对我们来说，很多问题显得比那些和我们有特殊关系的问题更为紧迫，并且，超然事外将使我们的态度变得客观。但我们比男人更了解女性世界，因为我们的“根”扎在女性世界中，我们比男人更为直接地把握住成为女性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并且，我们更加关切这些认识。我说过还存在着一些更紧迫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探寻性别给生活带来的后果，发现某些重要的东西。已经给了我们什么机会或没有给我们什么机会？等待着我们的年轻姐妹的是什么命运？她们将选取什么方向？当代由妇女撰写的关于妇女的书籍，由于更多地致力于弄清事实和理解事实，而不仅仅表达要求得到权利的愿望，这些书总的来说更具生命力。这一变化具有很大意义。我们正在摆脱过多争论的时代，本书作为一种尝试，将进一步证实这一情况。

但是，不带倾向性地讨论人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提出问题、假设观点的方式，都以利害关系为先决条件。所有对特性的表述，都暗示着价值判断。每一种被称为“客观”的描写，都隐含着伦理道德的背景。与其试图掩藏多多少少确实包含着的原则，不如一开始就公开说明。这样，就不必在每一页上详细解释所用的“优等”、“低等”、“好”、“坏”、“进步”、“反动”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浏览一些关于妇女问题的书籍，我们注意到最常采用的观察角度之一是公众利益，即总体利益；这一视角总是意味着希望维护和确立社会利益。就我们而言，我们坚持只有公众利益才能确保公民们的私人

利益；我们将按其为个人提供具体机会的效果来对制度作出评判。我们也不能把私人利益和幸福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虽然后者也是一个普遍的观察角度。伊斯兰教国家闺阁中的妇女不如拥有投票选举权的妇女幸福吗？家庭妇女不如职业妇女幸福吗？“幸福”一词实际意味着什么是不太清楚的，它的真正价值更是含混模糊。要测定别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把人们希望置身于其中的处境形容为幸福是容易的。

如果认为幸福就是安宁，那么，“呆人有呆福”的说法就可以成立了。我们反对这种看法，因为我们的看法是存在主义伦理学的看法。每一个主体将通过建功立业以寻求超越的方式；他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追求自由才能取得自由。目前的存在，除了扩展人无限开放的未来，没有别的存在意义。每一次从超越状态落回固有的、停滞的状态，就是一种存在的倒退，倒退到屈服于给定条件的畜生式的生活之中；也就是一种自由的倒退，倒退到压抑拘束及听天由命之中。如果主体同意这样做，这种倒退意味着一种道德上的过错；如果他受到打击，这将带来灰心丧气和苦恼烦闷。在这两种情况中，倒退都是绝对有害的。每一个关心他的存在意义的人，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中含有一种未明确规定的需要，需要超越自身，需要进行自由的选择。

现在，使妇女处境问题突出起来的原因是：她，一个象所有的人一样自由而自主的人，发现了她生活在一个男性迫

使她接受“另一种”人的地位的世界中。他们要求她安居于从属地位，理由是她的超越前景黯淡，而且将永远被本质的、至高无上的男性压倒。妇女的戏剧性在于每一个自我的基本要求的冲突之中；她总是把自己当作本质的，然而在处境的压制下，她又是非本质的。在妇女的这种处境中，她怎样才能获得完善？在妇女面前，什么道路是开放的？什么道路是堵塞的？在不独立状态中怎样才能恢复独立？什么环境限制了妇女的自由以及怎样才能战胜它们？这就是我试图加以说明的基本问题。这意味着我对个人命运最为关注的，不在幸福，而在自由。

非常明显，如果我们相信妇女的命运是无法避免地由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力量所决定的，那么自由的问题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我首先讨论生物学、心理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妇女的看法和见解。我试图准确地说明“真正的女性气质”概念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妇女被定义为“另一种”人，以及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将会产生什么结果。然后，我从妇女的角度描述了妇女必须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这样，当她们尽力摆脱迄今为止始终指派给她们的种种限制、追求成为完美的人类一员的时候，我们能够正视她们道路上的那些困难。

第一章　童年时代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作为整体的文明，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之间的所谓女性。仅仅是因为他人的介入，一个人才会被造成这另一性别。一个孩子，就他自身的存在而言，很难将他自己与性别联系起来。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的身体首要地是一种主观的投射，是一种使他们能了解世界的工具：孩子们是通过眼睛、双手而理解宇宙的，而不是通过性器官。男婴和女婴经历同样的出生与断奶过程，他们的兴趣相同，快感相同；刚开始，吮奶是最大的快感来源，接着是肛门期，他们从排泄的动作获得满足。男女儿童的性器官的发展过程是相似的；他们以同样的好奇心，同样的不经意的态度发现着自己的身体；他们从阴蒂和阴茎取得同样的模糊快感。当他们的感性发展到需要一个对象时，他们转向母亲，那柔软、平滑、富有弹性的女性肌肤引发性的欲望，而这些欲望是指向抓拿的；女孩，象男孩一样，意欲独

占地亲吻、缠弄和爱抚母亲。对新生的弟妹，他们怀着同样的嫉妒，并且用相似的行为方式发泄出来——发脾气、闷闷不乐、遗尿；而且他们使用相同的撒娇技巧，去赢得大人的喜爱。直到十二岁左右，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兄弟一样地强壮，显示出相同的心智能力；在任何方面，她都能和他们匹敌。假如，在青春期以前，有时甚至从婴孩早期开始，小女孩就显示出既定的女性特征，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天性，直接使她成为被动、卖弄风情、富于母性的人，而是因为，几乎从一开始周围的人就对这个孩子发生影响，于是她从生命初期开始便受到训练，成为既定的女人。

初生的婴儿仅凭内在的感受来领悟世界；他还象住在黑暗的子宫里一样，沉浸于宇宙整体的中心；在吮吸母乳或奶瓶时，他还被母体的温暖所包围。一点一点地，他学会观察事物，将周围的事物和自我区别开来。在这一过程的同时，他或多或少残忍地被从滋养的母体上扯离开。对这种分离，有时婴孩会产生严重的反应；不论怎样，当分离完成之际，也就是婴孩大约六个月左右，他开始显示出吸引旁人的欲望，借着模仿的动作引人注意，这些动作不久就变成真正的卖弄炫耀。当然，这种态度并非有意选择而采取的，它的存在无需构想出一种情景。婴孩直接经历了一切生命的基本经验：即他与其它存在的关系。人类痛苦地经历自身突然失去而孤独无依的感觉。于是逃避自由，逃避自我主体，宁愿将自己迷失在宇宙整体的中心。这里，就是人类宇宙性的、泛神

论的梦的真正源头，就是人们渴求遗忘、睡眠、狂喜、死亡的原因。一个人永远无法取消他独立的自我，但至少希望将自我固体化，稳定成形。尤其当别人凝目注视他时，他感觉到自己是独立的存在。

孩子的行为，必须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在物质的形式中，他发现了人类在这个陌生世界里的有限、孤独和遭受遗弃。他努力想补偿这种恶运，将自我的存在投射在一个影象中，影象的真实性和价值，则将由别人来证实。当他首次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形象，他可能就此开始确定自己的本体，这段时间大约与断乳同时。他将自身与镜中的形象混淆为一，辨认为一，以至他的自我只有在投射于外物时才能形成。不论镜子事实上是否扮演了这种或大或小的角色，可以肯定的是，婴孩长到接近六个月时，便模仿父母，并在他们的注视下，将自己认作是一个独立之物。他已经是一个自主的人，极力地伸展向外部世界；但他仅仅在投射在外的形式中，才遇到自己。

当孩子继续成长，他以两种方式反抗被弃绝的原初命运。他试图否认分离，冲人母亲的怀抱，寻找她生命的温暖，要求她的抚爱。另外，他试图从别人的赞许中，找到自我的确认。在他看来，大人就象神一样，因为他们有力量给予他存在。他感觉到他们对他评价的魔力，他一会儿可以是逗人喜爱的小天使，一会儿是小怪物。他的两种防御方式互相并不抵触，相反地却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当他讨好招诱的尝试获

得成功，他从所得的亲吻和爱抚中找到自我确认，这构成了孩子在母亲怀抱里，在她慈爱的凝视下所经验的被动的幸福感。在三、四岁以前，男孩与女孩的态度没有差异，他们都力图重温断奶前的幸福；他们都一样地有招诱和炫耀的行为；男孩们象他们的姐妹一样，希望讨好大人，逗大人笑，招大人欣赏。

否认痛苦比超越痛苦更令人满足，比较起被他人的自我所束缚，迷失在宇宙整体中心更为彻底；比较起在他人注视下的让步听从，肉体的结合产生的疏离感更深。招诱和炫示，比较起在母亲怀抱中的单纯放纵，代表着更复杂而困难的阶段。大人的注视所带来的魔力是变幻无常的。一个孩子装做自己隐身不见了，他的父母也参加进这个游戏，假装看不见他，边笑边摸索着找他。但是，他们会突然说："够了，你使我们玩得心烦了。其实，我们是看得见你的呀！"孩子用一句聪明的话逗乐了父母，但当他重复说这句话，父母却只是耸耸肩膀。在儿童的世界内，犹如在卡夫卡小说中的境况中一样，一切都不肯定、不可预料，每走一步都要绊倒一次。这就是许多孩童害怕长大的原因，假如父母不再将他们抱在膝上，或者不再让他们跟大人一块睡，他们就感到绝望。透过这种有形的挫折，他们越来越感受到荒凉和遭受遗弃的残酷，——面对这种荒凉与遗弃，人类永远不能无动于衷。

正是在这一阶段，小女孩第一次显示出拥有特权。第二次的"断奶"，比第一次较缓慢、较不残忍，将母亲的身体从

孩子的拥抱中拉走。但男孩却一点一点，被迫与过去所习惯的亲吻和爱抚告别。而女孩则继续受抚弄，她被允许紧贴母亲裙边，父亲抱她坐在膝上，梳弄她的头发。她穿着可爱漂亮的衣服，她的眼泪和脾气受到宽容，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的表情与撒娇逗得大人们高兴。身体的接触和友善的眼光保护着她，使她不受孤独之苦。相反，一个男孩不准撒娇，他的招诱的举动，他的故作姿态，只会惹得大人生气。人们告诉他："男子汉不要求别人吻自己……男子汉不要总照镜子……男子汉不流眼泪……"人们努力要求他做一个"小男人"；如果他能不依赖大人，独自做事，便受到赞许。假如他不显出故意讨人喜欢的样子，他就真让大人高兴了。

许多男孩，被强求他们的苛刻的"独立"吓坏了，他们希望自己也是女孩。先前，在他们和女孩穿一样衣服的幼年时候，当他们不得不改穿长裤，不得不看着剪去卷发，男孩子通常流下眼泪。他们中的一部分，固执地选择做一个女性——这是倾向同性恋的起始原因之一。莫里斯·塞克思（在《安息日》中）写道："我热切地希望自己是个女孩，根本不知做为男性的骄傲，甚至达到这种程度：故意蹲下去撒尿。"

然而，如果男孩起初显得不如女孩受宠，这是因为他的优势来得较迟。人们对他的苛求，当时就暗示着对他估计很高。法国作家莫若在回忆录中叙述他曾嫉妒他弟弟，因为他母亲和祖母只逗他弟弟玩。他父亲拉住他的手，牵他到房外说："我们是男人，让我们离开这些女人。"男孩终于相信，对

他的苛求，实在是因为他的优越，是为了赋予他将来战胜困难前进的勇气，他的男性意识就这样被培养起来。这种抽象的观念在他心中形成一种牢固的象征，一切都具体化为他的阴茎。他倒并不是自发地对他那小小的、懒洋洋的性器官感到骄傲，这种骄傲感是由他周围的人们的态度引发的。母亲们和保姆们一直保持着传统，将男性生殖器和男性观念合为一体；不论她们是因为对爱情的感激或顺从而承认它的伟大，或者是因为见到它在婴孩身上那微不足道的模样而感到报复的快感，她们都用一种非常自得的态度对待孩童的阴茎。拉伯雷给我们讲述了高康大的保姆们对他阴茎的种种摆弄和玩笑；而历史上也记载了路易十三皇帝的保姆类似的做法。很羞怯的妇女也会给小男孩的性器官起个绰号，跟他谈及它，仿佛它是个小小的人，一会就是男孩本身，一会又不是；她们沿用已有的表达方式，把它当作“转换的自我，一般比本人更聪明、伶俐，更诡计多端”。

从解剖学观点看，阴茎倒非常适合这一角色；它自由地突出于身体之外，看上去象个天然小玩物，象个小木偶。大人们让它附给孩子另一自我，于是使孩子感觉身价增高。有一个父亲告诉我，他的一个儿子已有三岁，却仍然蹲下撒尿；他被他的姐妹和表姐妹们包围着，是个胆怯、忧郁的孩子。有一天，他父亲带他上厕所，对他说：“我现在要教你看男人怎么小便。”从那以后，这个男孩对站着撒尿感到骄傲，并嘲笑女孩们“从一个孔撒尿”。他的轻视并不是源于女孩缺少一

个器官，而是因为她们没有象他一样，被父亲挑出来并加以指导。于是，远远不是阴茎代表一种直接优势，引起孩子的优越感；相反地，它的高价值在于它象是一种补偿——由大人们发明，而被孩子们热衷于接受——一种对第二次断奶的痛苦的补偿。他因此可以不再对失去了的婴孩身份，和没有生而为女孩而遗憾。长大以后，他将以自己的性别作为身份优越的明证。

小女孩的命运却与此很不相同。母亲和保姆对她的性器官不存任何敬意和柔情；她们不将她的注意引向那个秘密的器官，它除了表面覆盖物以外隐而不见，也不能握在手中；从某种感觉上说，她没有性器官。她并没有将这种缺少认作损失，对她来说，她的身体很显然是完整无缺的；但是，她发现自己在世间的地位与男孩不同，并且许许多多事实，在她的眼中能将这种差别转变成为自卑感。

没有什么比著名的女性"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的问题，更能引起心理分析学家的热切讨论。大多数心理分析学家今天都承认，女性对阴茎的羡慕在不同的实例中以各种不同方式显示出来。首先，有许多小女孩在很多年中，一直对男性的特征了无知觉。这样的孩子，将应该存在男人和女人视作完全自然的事情，就象天上有太阳和月亮一样；她的信念局限在字眼上，而她的好奇心最初还不具备分析能力。对许多别的女孩来说，这悬在男孩腿间的一小块肉，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可笑；它的奇怪就象衣服或发式的古怪一样。女

孩常常在新生的小弟弟身上第一次看见它；如海伦·多伊奇所说："当女孩年纪很小时，她对小弟弟的阴茎没有很深印象"。德茨举了一个十八个月女婴的例子，她对发现阴茎无动于衷，没有显出一点重视的迹象，直到很久以后，伴随她隐秘兴趣的出现，这种情况才改变。有时，阴茎甚至被认为是种身体变态：一种多余生长物，垂挂在身上，就象瘤子、乳房或肉赘；是种会激起厌恶的东西。最后，事实是，有无数的小女孩的确对她兄弟或游戏伙伴的阴茎发生兴趣；但那并不意味着她以真正性的方式对它产生嫉妒，更不是说她因缺少这一器官而深受影响。她想得到它，正象她想得到任何以及一切东西，但这种欲望只能停留在表层。

毫无疑问，排泄功能，尤其是排泄小便，孩子对此有着很浓的兴趣；事实上，尿床通常是孩子对父母偏爱其他兄弟姐妹的反抗形式。有些国家的男子坐着小便；又有些地方的妇女，与许多农村妇女的习惯一样，站着小解。但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习俗一般要求妇女坐下或蹲下小便，而将直立姿势留给男性。对小女孩来说，这样不同的方式，就是最显眼的性别差异。要撒尿，她必须蹲下、解开裤子，并因此要躲藏：一种可耻而不方便的程序。这种耻感，更由于女孩经常遭受不自觉遗尿的痛苦而加强，比如笑得太厉害时；一般来说，女孩对小便的控制力不如男孩好。

对男孩来说，小便看起来就象游戏，具有一切自由自在游戏所带的魔力；阴茎可任意摆弄，可以让它活动，这一点

是孩子们最有兴趣的。一个小女孩见到一个男孩撒尿，羡慕地叫道："好方便哟！"尿柱的方向可任意调节，并且射向相当的距离，这给男孩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弗洛伊德谈到"早期排尿顺利者的炽热欲望"；斯坦克理智地讨论过这一点，但的确如凯伦·哈尼所说："无所不能的幻觉，尤其是虐待狂者的无所不能幻觉，经常与男性小便的尿柱有关。"这些幻觉，在一些大人脑海中保留不散；而对孩子则十分重要。亚伯拉罕谈到"妇女在用水管浇花园中，获得巨大快感"；我同意萨特和巴奇拉的理论，相信将浇花水管认作是阴茎并非是这种"巨大快感"的必需来源——虽然在某些实例中的确如此。每一条划空而过的水流，看起来都象一个奇迹，一种对地心引力的抗拒；去操纵它、管制它，是对自然法则的小小胜利。无论如何，小男孩天天在这上面找到了女孩所没有的娱乐。从控制尿流的行为，男孩建立起与水、土、草和雪等等一类东西的联系。有些小女孩盼望分享这些经验，有的仰卧地上，试着向空中喷尿；有的练习站着撒尿。按凯伦·哈尼的解释，这些女孩还羡慕男孩能撒尿给人看的能力。她报道说："有一个病人，见到一个男人在路上小便，突然说道：'假如我能向上天恳求一个恩惠，那就是有一天能象男人一样小便。'"在许多小女孩眼中，男孩有权触拿阴茎，可以象弄玩具一样摆弄它；而她们自己的器官却是禁忌。

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许多女孩渴望拥有男性生殖器，这一点已被心理分析家所做的无数调查和收到的隐秘报

告所证实。哈夫洛克·埃利斯引述S·E·詹利弗博士的一个病人曾尼尔的话："喷射的水柱或水花，尤其是从浇花的长水管中射出的水柱，对我总是具有很强的性暗示，令我回忆起童年时见到的我兄弟或别的男孩小便的动作。"一个女记者，R·S·女士，告诉埃利斯：当她是个孩子时，她非常渴望摆弄男孩的阴茎，并将这种意念中的行为与小便的动作联想在一起，有一天，她获准握住花园中的水管，"这仿佛握着阴茎一样，给我快感。"她断言当时阴茎对她丝毫没有性的含义，她仅仅只晓得阴茎是用来撒尿的。最有意思的例子，是由哈夫洛克·埃利斯报道的（以后的分析由斯坦克尔作）关于佛洛里的经验。下面我引述详细摘要：

该妇女相当聪明，有艺术家气质，很活跃，生理健全，不是同性恋者。她说在童年时代，小便一事对她影响巨大。她与兄弟们一起玩撒尿游戏，沾湿双手，没有一点厌恶。"我最早关于男性优越的观念，就与小便有关。我觉得大自然不公平，因为我缺少这样有用和美观的一个器官。没有一个缺了壶嘴的茶壶，会感到如此的悲惨。不需要任何人向我灌输男性天生重要和优越的理论，不断的证明总是在我眼前。"她在乡间撒尿获得极大快感。"没有一种声音能比得上在林中深处，尿液落在枯叶堆上的声音动听；她观察着尿液的渗透。她对往水中撒尿，更感

到趣味无穷”（就象许多小男孩一样），佛洛里抱怨长裤的式样妨碍了她想做的各种各样试验，而当她经常在乡间散步时，她尽力忍住尿，然后突然站着解放自己。“我能清晰地记得这种不被允许的做法带来的奇异和甜蜜的感觉，也记得站着撒尿时的迷眩感受。”以她的观点，孩子的衣裤式样，通常对女性的心理有重大影响。“撒尿时，必须解下内裤，再蹲下，以免弄湿前面，这不仅使我讨厌；而且在撒尿中还要将后背上的衣服移开，露出屁股，这在我幼小时形成一个印象，以为女孩撒尿的功能与后面的部分有关。给我第一次留下印象的性差别——两性间巨大的不同——就是，男孩站着撒尿，而女孩则必须坐下……我最初的羞耻感更多地与身体后部而不是前面相关，很可能就是根源于此。”在佛洛里的例子中，这些早年印象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她父亲常常鞭打她至流血，她的保姆也曾经因她不肯撒尿而责打她。她被自虐的梦和幻觉纠缠不休，仿佛看到自己在众目注视下遭一个学校女教师鞭打，不得不违愿撒尿，“这是一个给人奇怪的满足感的念头”。在十五岁时，她尿急忍不住，在一条背街上站着撒了出来。“在试着分析当时各种感觉时，我想最强烈的就是因站着撒尿，结果尿必须从这么高的地方落下而带来的羞耻感，虽然当时有裤子遮盖

着。但这事显得显眼而非同一般。平常蹲坐小便，给人隐秘感。小孩时站着撒尿，离地也不高；但我十五岁时已经长得很高，当一想到尿要落下这么一段出乎意料的长距离，似乎给人一种羞耻的快感。（我敢肯定，那些从朴茨茅斯的新式厕所中惶恐地逃出来的女士，一定认为，让妇女跨过地上立着的陶制船形器皿，一只腿在一边，站着拉起衣裙毫不羞愧地小便，让尿就那么落下，实在是太下流了。）”她在二十岁时，又有了一次同样的经验，此后经常重复。想到她可能某次就突然被人发现，想着她无法控制自己不这样做，她体验到混杂着羞耻与快感的复杂感情。“尿液似乎不经我的同意就流了出来，然而却比我有控制地撒尿给我更大的快感。（重点是佛洛里所加）这种奇异的感觉——被什么无形的、决定着一个人将做什么的力量所牵引而去——是一种纯粹女性的快感和微妙的诱惑——受一种至上的力量所挟裹，一个人不由自主地奔向某种目的，在这种急流中，有一种强烈的诱惑力。”此后，佛洛里发展起一种总与小便迷恋混合在一起的撒管性性欲倾向。

这一实例之所以令人十分感兴趣，因为借此可以明了儿童经验中的许多要素。但是，显然有一些特殊情况，赋予这

些要素无法预料的重要影响。对正常地教养长大的女孩，男孩的小便特权对她们的影响十分有限，绝对不足以直接引发她们的自卑感。追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家，假定一个小女孩仅仅因发现阴茎的存在，就足以导致心理创伤，这实在是大大地误解了儿童的心智能力。儿童的智力远比他们想象地假定的要缺少理性，因为它不能清晰地将事物分类，也不会被矛盾的事物所困扰。当一个很小的女孩看见阴茎并宣布说："我以前也有一个的，"或者"我也会有一个的"，甚至"我现在也有一个"，这话并非一种自我辩护的撒谎；存在与非存在在孩童那里并不互相排斥；正如他们的图画所显示的，他更相信自己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的那些富有意义的图型，而不是他实际所看见的东西。他们作画时，常常不用眼睛看；无论何种场合，他们的感觉被他个人之成见所左右。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索绪尔引述卢威特的重要观察："一旦一张素描看上去画错了，它仿佛就消失了；孩子实际上再也看不见那张图，而是被取代它的新素描所迷住，正如他毫不在意他纸上多余画出的线条一样。"男性的身体组成一幅有力的形象，经常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而她实际上再也看不见她自己的身体。索绪尔提到一个四岁女孩的例子，当她试着象男孩一样在大门的柱子间撒尿时，她说希望自己有"一个长长的会喷水的小东西"。她马上坚持说，她过去有一个阴茎，但现在没有了；这与皮亚杰所描绘的，儿童中的"参与"(participation)思维相吻合。小女孩往往相信，所有的小

孩生下来都有阴茎，但是后来父母割掉了一些孩子的，使她们成为女孩；这种解释满足了儿童的想象力，儿童神化父母，正如皮亚杰所说的，“设想父母是他们所拥有一切的来源”。在孩子小时候，她们并不将割掉阴茎看作是种惩罚。

一个小女孩必须由于一些原因对自己的处境不满，然后她的挫折感才能存在。如海伦·德茨恰当的评论所说：象看到阴茎这种很小的事情，不可能影响人的心理发展。她说：“发现男性性器官如果能造成心理创伤，那只不过表示早期经验环环相扣，积累到当时而产生的结果。”如果小女孩发现自己不能用手淫或暴露的方式满足愿望，如果她的父母压制她的自我恋情，如果她发现自己不如她的兄弟招人爱、受到欣赏，那么，她将会把自己的不满心理投射到男性器官上。“小女孩发现了自己的身体不同于男孩，这就为她早已感到不满找到了证据；可以这么说，她将那种不满合理化了。”阿德勒坚持认为，事实上是父母和亲友建立起的价值标准，给了男孩身价尊严，在小女孩眼中，阴茎就变成了这种尊严的解释和象征。人们认为她的兄弟优越，兄弟本人对自己的男性气概充满骄傲，于是她羡慕他，并感到自己受了挫折。有时她归怨于母亲，很偶然也会怨恨父亲；或者，她会责怪自己天生残缺，或者她也会安慰自己，想着阴茎是藏在身体内部的，将来有一天会长出来。

但是，即使小女孩对阴茎没有产生强烈的羡慕，缺少这一器官也将肯定很深地影响她的命运。男孩从它那里获得的

主要益处，是他有一个可以看得见、抓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借助它部分地确认自己。他将自己身体的神秘和威胁，用它投射在外，以此使他能和它们保持一段距离。的确如此，他感觉到与阴茎有关的一种危险，他害怕它被割掉；但比较起小女孩感受到的对她身体“内部”的担忧来，他的这种害怕很容易克服。女孩对“内部”的担忧，通常会持续终身。她极端关注她体内发生的一切，在她心目中，从一开始，她就比男性晦暗，更深地沉浸在生命的朦胧神秘之中。小男孩因为有一个转换自我，他在上面看到自己；所以他能大胆地采取主动态度。他将自己投射进去的那一特定对象，变成了他的自主性、优越性和力量的象征；他量自己阴茎的长度，与同伴比较谁的尿柱粗；将来，阴茎的勃起与射精，将成为满足与挑战的基本内容。但是，小女孩却不能将自我物化为她身体的任何部位。为了补偿这一缺憾，并为自己找到一个转换自我，她将自己投入到一种身外之物中：洋娃娃。应该提出来的是，在法语中，“洋娃娃”(poupée)一词，也指缠在受伤手指上的绷带；一个缠好绷带的手指，区别于其它手指，它被孩子既觉有趣又略带骄傲地对待，孩子对它说话，显示出某种自我确认的迹象。然而，一个带有人的面孔的小雕像——或者无面孔的一条玉米，甚至一片木头——最好地满足了女孩渴望代替那转换自我，代替那天然玩物——阴茎的心情。

其间主要的区别在于，洋娃娃一方面代表整个身体，另

一方面，它是一个被动之物。因此，小女孩被引导着将自己整个地与它认同，将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被动的无生命之物。当男孩在阴茎中寻找作为自由主体的自我时，小女孩则抚抱她的洋娃娃，替它穿衣服，就如同她梦想着自己被抚抱和打扮一样；她于是颠倒地将自己认作是一个美妙的洋娃娃。随着赞美与责备，透过形象与文辞，她学到了“漂亮”和“难看”这些词语的含义；她很快懂得了，为了使她招人喜欢，她必须“象画一样漂亮”。她努力把自己弄得看上去象画中的人一样，穿动人的衣服，在镜子中研究自己，将自己与公主和仙女相比较。玛利·巴士科荻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孩子气的卖弄风情的极好例子。她被断奶很迟，大约三岁半，因此在她四至五岁的年纪上，她强烈地感到一种需要：需要别人的欣赏、为别人而活着，实在不是偶然的。对这样大年纪的孩子，断奶引起的震动必定非常强烈，她也必然会更热情地试图补偿这种强加给她的分离。在日记中她写道：“五岁时我穿上妈妈的花边衣裳，头发上插着花，到客厅去跳舞。我是大舞蹈家蓓蒂巴，而全家的人聚在一起看我一个人。”

这种自恋的心理，这样早熟地出现在小女孩身上，在她成年后，又将在她生命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人们很容易认为这起源于女性神秘的本能。但是，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事实上，并不是一种生理解剖上的命定在左右她的态度。与男孩的身体不同是事实存在，而她可能以许多方式来接受这一事实。拥有阴茎，无疑是种特权，但当孩

子对它的排泄功能失去兴趣以后，阴茎的价值自然就减低了。如果孩子过了八、九岁，在他心目中阴茎的价值仍然保留着，那是因为它成了具有社会价值的男性气概的象征。事实是，在这一问题上教育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最为重大。所有的孩子都试图通过招诱和炫耀行为，来补偿断奶过程中痛苦的分离，男孩被迫超越这一阶段，他通过将注意力引向阴茎而摆脱了自恋情绪；而同时，小女孩被获准将注意力引向自我——这是所有儿童共有的倾向。洋娃娃对她有所帮助，但已不再有决定性的影响；男孩同样可以珍爱一只玩具熊，或者一个木偶，在它们身上投射他自己。只有放在他们生命的全过程中看，每一种因素，无论是阴茎还是洋娃娃，才获得其重要性。

因此，十分“女性化”的妇女，被动性是她们的基本特征，这种特点是从她最初所受培养一直发展而来的。但如果说这与身体构造有关，就错了，事实上，这种特点是由她的教师、由社会加在她身上的命运。男孩享有的最大优越性，是由于他的存在方式和对外界的关系，引导他维护的自身的主动自由。给予他的为未来生活而设的训练，由外部世界的自由运动组成；他与其他男孩比赛勇气和独立性，他看不起女孩。爬树、与同伴打架、玩粗野的游戏，在其中他意识到他的身体，是为主宰自然而生的，是进行搏斗的武器。他为自己的肌肉骄傲，就象为性别骄傲一样；在游戏、运动、打架、挑战、比赛力气中，他学会了准确地运用自己的力量；

同时，他吸取了暴力的残酷教训；从早年起他就学会挨揍，学会蔑视疼痛，吞回眼泪。他行动，他创造，他挑战。当然，他也将自己视为仿佛另一人而考验“他”；他向自己的男性气概挑战，并将许多困难放在与大人和其他孩子的联系中解决。但是，很重要的地方在于，他关注实际是他自身的那个客体形象，和他在具体计划中自我实现的意愿，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性冲突。正是通过行动，他创造自身的存在；他的行动与存在二者合一。

相反地，妇女从一开始，她主动的存在和她的客体自我，她的“成为另一物”之间，就存在冲突。人们教会她：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使她成为某种客体；她因此应该放弃她的主动性。人们对待她象一个活的洋娃娃，拒绝给她自由。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她越少运用她的自由去理解、抓住和发现她周围的世界，她在自身内部能找到的活的源泉越少，她大胆地将自己肯定为主动个体的意愿越小。假如她的自由得到鼓励，她可以表现出与男孩同样的活力、同样的好奇、同样的勇敢。这种情形有时发生在受到男孩式教养的女孩身上；在这些场合，女孩避免了面对许多困难。值得注意的是，作父亲的往往喜欢给女儿这种教育；由男性监护下成长的女子，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女性化的缺陷。但社会习俗反对象对待男孩一样对待女孩。我知道的几个小村子里的三、四岁女孩，被父亲强迫穿长裤。其他所有孩子都嘲弄她们：“她们是姑娘还是男孩啊？”孩子们提

议检查她们身体来决定。这些可怜的女孩于是央求穿女装。除非小女孩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么即使她的父母赞同她以男孩方式生活，她也仍然会使她周围的人、她的朋友、教师感到吃惊。她身边总有一群阿姨阿姑、祖母外婆、表堂姐妹，来抗拒她父亲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涉及女儿的教养，父亲的发言权很小。女子身上沉重的不幸之一，正如米什莱所说，就是童年时代被放在女人手中。男孩最初的确也由母亲带大，但她尊重他的男性意识，并且男孩也很快脱离这种监护，然而母亲却一心一意使她的女儿适合于进入女性世界。

我们在后面将看到母女之间关系是多么复杂：在母亲眼中，女儿既是自己的复制，又是另一个人；她既对女儿过度亲爱，又怀有敌意；她将自己的命运又缚在女儿身上：这是对自己女性命运的骄傲的申张，却也是为自己向它的报复。同样的心理过程在男同性恋者、赌徒、有毒瘾的人以及所有同类人身上发现，他们既骄傲于属于某特殊集团，又对这种联系感到屈辱；他们都竭力地劝诱，想获得新的跟从者。因此，当一个女孩来到女人们的教养之下，她们尽其所能地将她塑造成象自己一样的女人，表现出一种傲慢与憎恨交织的热忱。即使是一位心胸宽大的母亲，真心诚意地寻求她孩子的幸福，也按照一般规律认为，将孩子造就成一个“真正女人”是明智的，因为，社会因此会更容易接受她。于是，她被指定与女孩在一起游戏，被交托给女教师，生活在如同古希腊时代的女眷内室一样环境的年长女人群中；要读的书、做

的游戏都已由人为她选择好了，以便引导她步入她命定的生涯。她耳中灌满了女性宝贵的智慧，女德的苛求加在身上，人们教她烹饪、缝纫和理家，以及如何保养容貌，如何有魅力，如何恭谦；她被打扮而穿上必须小心翼翼的极不方便的华丽衣服，头发做成动人的式样；她被授以行为举止的规则："站要站得直，走路不能象只鸭子"；为了培养优雅风度，她必须压抑自发的动作；人们告诫她：动作不能象男孩那样，不许参加激烈运动，不许打架。简而言之，她被迫着变成一个奴仆和一个宠物，就象她的女性长辈。今天，感谢对这种女性主义的战胜，鼓励年青女子受教育，投身体育运动，变得越来越普遍了；但她们如果在这些领域失败，比起男孩来更容易被原谅；因为人们还要求她们完成另一类事业，所以她们在这里要获得成功比男孩更艰难。无论如何，她同时必须还是一个女人，她不能够丢掉她的女性内容。

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女孩接受这一切还不存在太多麻烦。小孩的行动止于游戏和做梦的层次，她扮演生存，扮演做事；当一个人仅仅关注想象中的成就时，"做事"(to do)与"生存"(to be)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分界。对现实中的男孩具有的优势，小女孩可以用未来的允诺来作心理补偿，即她继承有女性伟大的天职，这种天职她已经在自己的扮演中实现过了。因为至此为止，她仅仅知晓她的童年的宇宙，母亲在她眼中比父亲更具有权威；她想象中的世界是一种母权社会，她模仿母亲，在她身上确认自己；她甚至时常调换两人

的角色："当我长大，而你是小孩时……"，她喜欢这样对母亲说。洋娃娃不仅是她的另一自我，也是她自己的小孩。这两种功能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正如她真正的自我也同时是她母亲的一种转换自我一样。当她责备、惩罚，然后又安慰洋娃娃时，她既是向自己的母亲证明自己是对的，又为自己接过了母性的尊严：她在自身之上结合了母亲——女儿的两种因素。她向洋娃娃倾诉心事，她抚养它，在它身上运用至上权威，有时甚至撕掉它的肢体，打它、折磨它。这就是说，她通过洋娃娃，经历了自我的肯定和确认。母亲经常参与进这一想象中的生活：女孩和母亲一起扮演洋娃娃的父与母，组成排除了男人的一对。在这里，同样也不存在什么与生俱来的和神秘的"母性"。小女孩是被这样教育的：照看孩子是母亲的职责，她就这样确信着；她听到的故事、阅读的书，以及她微末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观念。人们鼓励她去感受这些未来职责的魔力，给她洋娃娃，使她能够从此有机会理解这些价值。她的"天职"被强有力地印在她心上。

因为小女孩感觉到，养育孩子将是她未来的命运，也因为她比男孩更对自己身体的"内部"感兴趣，她就特别地对生育的秘密感到好奇。她很快就不再相信婴儿从白菜里诞生，或从医生的皮包里跳出来，或由白鹤带来世间；尤其当又有新生的弟妹时，她很快就明白了，婴儿是在母亲身体内长成的。另外，现代父母不再守着过去习俗，不再把生育搞得很神秘。一般来说，小女孩对此深感惊异，而不是害怕，因为

这现象在她看来富有魔力，她还无法抓住其中所含有的生理意义。起先，她没有意识到父亲在其中的角色，而假想妇女吃某种特定食物就怀孕。这是一类传说的主题（在故事中，皇后吃了某种水果，或吃了特殊的鱼，就生下一个小女孩或一个可爱男孩），而且，这一假想在日后会引导一些妇女将怀孕与消化系统联想在一起。这些疑问和这些发现，合在一起，吸引了小女孩相当多的兴趣，并极大地丰富了她的想象力。我在这里引用荣格记载的一个实例，作为典型；这与弗洛伊德在大约同一时期所分析的小汉斯例子，有显著的类似之处。

将近三岁时，安娜开始询问婴儿是从哪里来的，在一段时间里，她相信他们是小小的天使。四岁时她有了一个新弟弟，却显然一直没有注意到母亲的怀孕现象。她在祖母家住了几天，回来后对新生的婴儿表现出嫉妒，在各方面捣乱，并时时指责母亲没有说实话，因为她怀疑母亲在生孩子上一直在骗她。她问：将来她是否也会变成象妈妈一样的妇女？半夜里，她叫醒父母，说她害怕她听说过的地震，并询问关于地震的许多问题。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她弟弟出生之前在哪里，为什么他不早点来？以及这一类问题。当她得知弟弟出生前象植物一样生长在母亲体内，她看上去满意了；但又问：既然他还不能走路，那么他怎么出来的，是不是妈

妈胸前有一个洞？等等。然后，她宣布说，她知道是白鹳带来婴儿；以后，她不再忧虑地震了。此后不久，她看到父亲睡在床上，便问：是不是他的身体里也长了一个植物？她梦见有小动物从她的诺亚方舟船底一个洞中掉出来。她把自己的洋娃娃放进裙子里，然后让它“掉出来”。她对父亲的角色想来想去，一天，她俯卧在他床上，两脚踢动，询问：爸爸是不是这样做的？后来，她在花园里种下一些种籽，问道：是不是眼睛和头发也种在人的脑袋里？她父亲解释说，眼睛和头发在出生前就象胚芽一样长在胎儿头上。她于是问：她那小弟弟怎么进到妈妈身体里的？是谁将他种在里面的？他又怎么出来的？她父亲反问她的想法，她就指着自己的性器官；父亲说：对。但她仍然想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于是父亲解释说：是父亲，提供了种子。这样，她显然满意了。在五岁时，她差不多了解了一切；以后，她再也不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了。

以上的过程具有典型意义，但通常小女孩对父亲的角色不会问得那么精确，或者父母通常回避不答这一点。许多小女孩将枕头放在围裙下，装做怀孕，或者将洋娃娃放在裙折间走路，让它掉在摇篮里；她会给洋娃娃喂奶。男孩象女孩一样，对母亲的一切奥秘深为好奇；所有的孩子都对“深层”

抱有想象，这使他们以为在一切东西的内部藏有宝贝；对箱子、对大娃娃内装小娃娃的玩具、对盒内套盒、对逐渐缩小比例的同一组图案，他们都感到神奇；孩子们都乐于看到撕开花蕾，守望蛋壳中的小鸡，注视水盆中“日本花”的开放。当一个小男孩打开一只复活节彩蛋，发现里面塞满了小小的糖球时，他兴高彩烈地喊：“啊！它是个母亲！”从一个人的身体中分解出一个婴儿，这真比一切戏法都高妙。母亲仿佛赋有神奇的法力。许多男孩对缺少这一特权感到遗憾；假如日后他们偷鸟蛋、践踏幼苗，假如他们以某种疯狂的态度毁灭周围的生命，那是他们对自己不能创造生命而进行的报复。小女孩却因怀着未来她将创造生命的想法，感到快活。

这种希望在与洋娃娃游戏中得到具体的显现，除此之外，家庭生活为小女孩提供了其它自我表现的机会。大量的家务劳动都是很小的孩子力所能及的，但男孩通常被排除在外，而他的姐妹们则得到允许，甚至被要求擦洗、扫灰、剥土豆、为婴儿洗澡、照看锅里在煮的东西。尤其是家中的大女儿，常常分担这些母亲的工作；不论是为了便利，还是因为敌视和虐待欲，母亲这样做为自己免去了许多劳作；大女儿就这样被提前投入并适应严肃的人生舞台，她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这使她承担起她的女性职责。但是，她被剥夺了快乐的自由，剥夺了童年时代的逍遥自在；由于早熟地变成一个妇女，她过早地知道了加在一个妇女身上的种种限制；她在进入青春期时已象个成年人，这给她的一生带来特殊的

印记。一个肩负了过度劳作重担的孩子，很可能变成一个早熟的奴隶，注定要过没有欢乐的一生。但如果对她的要求不超过她能力轻易可及的范围，她会骄傲于自己具有与大人一样的能力，高高兴兴为成人分担责任。这种共同的分担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没有不切实际地要求小孩子变成家庭主妇。一个在职业上有专长的男人，在他工作的年月中，脱身在孩童生活的世界之外。因此，小男孩觉得父亲的所作所为十分神秘，对他自己未来的形象，他心中一点也描画不出来。相反地，母亲所做的，女孩也能做，象她的父母所说："她已经是个小大人了"；人们通常认为她比男孩更早熟。事实是，假如她真的较接近于成人阶段，那是因为在大多数妇女中，成人阶段传统地遗留有多多少少的稚气成分。女孩实际上意识到自己的早熟，实际上她以向弟弟妹妹们扮演小母亲而骄傲；她高兴自己变得重要，她有条有理地讲话，发布命令，她造成一种自己优越于小弟弟的气氛，她站在平等地位与母亲谈话。

尽管有这许多补偿，她也并非不带一点遗憾地接受这既定的命运；随着她的成长，她羡慕男孩们的精力。父母和祖父母可能很难隐藏他们宁愿要男孩而不是女孩的事实；或者，他们可能对她的兄弟表现出更多的疼爱。实际调查清楚地表明，多一半的父母希望自己生的是儿子。人们用更严肃和尊重的态度与男孩说话，他们享有更多的权利；他们自己用瞧不起的态度对待女孩；他们自己玩，不许女孩加入他们的圈子，反而侮辱她们，比如叫她们做"娇里娇气的"，以及

这一类话，以此暗示她们的秘密的屈辱。在法国的男女合校中，男孩集团有意地压制和为难女孩集团。

假如女孩们想与男孩斗争以捍卫她们的权利，就会受到非难。她们对专属于男孩的活动加倍地羡慕，首先因为她们具有一种自发的渴望去展现自己征服世界的力量，其次因为她们反抗命定给她们的卑屈地位。举例来说，因为传统上不许她们爬树、登梯或者上屋顶，她们感到苦恼。阿德勒指出：高与低的标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升到高空，暗示着精神上的优越，就象在许许多多英雄神话中可以看到的一样；登上一座高峰、一处绝顶，就是超出尘世，做了战胜自我之人。在男孩群中，爬高常常是相互间的主要较量。小女孩，自己被禁止加入这种冒险，只能坐在树下或岩石下，眼望着兴高彩烈的男孩们高高地在她头上，不得不感觉到她自己无论身体还是心灵都低他们一筹。如果她们在赛跑或跳高比赛中落后，在打架上被摔倒，或被迫仅做一个旁观者，她们同样感觉到自己低人一筹。

当她变得更成熟，她的世界扩大了，而她对男性的优越地位，则观察得更清楚。十分常见的情形是，她再也不以同母亲的认同为满足。假如小女孩起初接受了她的女性天职，那不是因为她愿意放弃自我，相反地是因为她希望借此去支配一切。她想成为主妇，是因为主妇的世界显得拥有特权；但当她通过同伴、通过她的学习、游戏和阅读，被引出主妇的圈子，她看出控制这个世界的不是妇女，而是男人。这一启示，

远胜过对阴茎的发现，不可抗拒地改变了她对自我的观念。

这相对的两性等级差别，首先在家庭生活中引起她的注意；一点一点地，她懂得了，如果父亲的权威没有时常表现在日常事务上，那只表明这种权威实际上更高；不为细碎琐事所累，却更具有尊严。而且，即使事实上母亲是一家之主，掌管着家事，她通常总是明智地留心先满足父亲的各种愿望；在重大事情上，她用父亲的名义，通过他的权威来提出要求，执行赏罚。父亲的生活具有一种神秘特权：他留在家里的钟点、他工作的房间、他四周的东西、他的追求、他的嗜好，都有种神圣的色彩。他供养着家庭，负有一家的主要责任。作为通例，他必须出外工作，于是，家庭是通过他而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他是那广大、困难、充满冒险的神奇世界的化身；他象征着超越，是个神。这些，就是小孩在将她举起来的有力臂膀中，在她紧紧依靠的充满力量的身架里所具体感受到的。由于他，母亲的王位被废除了，有如埃及女神伊西斯被太阳神拉所废除，有如大地被太阳夺去光彩。

但就在这里，女孩的处境深深地改变了：过去，她等待着有一天变成象她万能的母亲一样的妇女，现在她却永远无法成为一个至上的父亲；过去，是主动的仿效心理将她与母亲维系在一起，但现在，从父亲那里她仅仅只能被动地等待赞许的表示。男孩带着竞争的感觉想到他父亲的优越性，但女孩却不得不怀着无能为力的仰慕心情去接受它。我已经指出过，弗洛伊德所称的"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并非

象他所假设的，是指性欲；而是指的彻底放弃主体，甘心情愿地在臣服与崇拜的心情下，变自己为客体。如果父亲向女儿表现出爱，她便感到她的生存意义得到了动人的肯定，她获得了别人不得不费力争取的各种价值，她的生命得到充实和神化。终其一生，她可能都在努力地寻找那失去了的充实和宁静的感觉。如果她没获得父爱，她可能永远在未来的时日中感到自己有罪和受罚；她也可能转向其它地方寻求自我补偿，并对父亲不再重视，甚至敌视。而且，通往世界的钥匙并不是只握在父亲手中，所有的男人一般都分享有男性的尊严，没有必要将他们看作"父亲的替身"。就仅仅因为他们是男人，所以祖父、哥哥、叔叔、男伙伴、父亲、家里的男性朋友、男教师、牧师、男医生，都令小女孩神往。成年妇女对男人表现出的热情关怀本身，就足以把男人捧到高坛上了。

在小女孩眼中，无论什么事情都帮着肯定这种男性权威。她所从属的历史与文学的文化背景，伴随她进入梦乡的歌曲和故事，都是对于男人的一连串的赞歌。是男人们建立起的希腊、罗马帝国、法国，以及所有其它国家；是男人们冒险去发现世界并发明出相应的工具；他们治理世界，创造出世界上的雕塑、绘画和文学作品。孩子们的书籍、神话、故事、童话，统统反映着一种产生于男性的骄傲与欲望的盲目信念；因此，小女孩是透过男人的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的，并且透过男人的眼睛看到自己的命运。

男性优越的证明，的确充斥了世界：珀修斯、赫尔克里

士、大卫、阿喀琉斯、兰斯洛特等神话中的英雄，以及古代法兰西勇士德·格斯克林和贝阿德、拿破仑……如此众多的男性，却只有一个女性：圣女贞德，即使在贞德的背后，人们还能看到大天使迈克尔的男性身影！再没有什么能比著名女性的传记更令人厌倦的了：与伟大的男人相比，她们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人物，并且，她们中的大多数躺在某些男英雄的光辉之中。夏娃的创造，并不是为了她自身的理由，而是为了给亚当一个伴侣；她也是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的。在《圣经》中真正知名的妇女很少很少，鲁思只不过为自己找到一个丈夫而已。埃丝特为犹太人取得恩宠，是通过在阿苏勒斯面前下跪做到的；但她在莫迪凯手中，仅仅是个柔顺的工具。朱迪思较有胆量，但对牧师们却屈膝奴从，而且她的功劳也还留有令人怀疑的余味，绝对不能与大卫清清楚楚、辉煌灿烂的成功相比较。异教神话中的女神们都是轻佻或反复无常的，她们在主神朱比特面前都战战兢兢地发抖。男神普罗米修斯庄严地为人间从太阳盗来火焰，而女神潘多拉却将她的邪恶之匣向人世打开。

的确，在传说和故事中，倒有一些女巫和女魔，她们掌着吓人的威力。其中的一位，安徒生《天堂花园》里的“风母”形象，令人想起原始的伟大女神；她的四个巨人儿子，恐惧而战抖地服从她；当他们做错了事时，她打他们，把他们封在麻袋里。但这些女性神袛并没有吸引人的可爱之处。比较令人愉快的是仙女、海妖和水精，她们都不受男性的控制；

但她们均无个性特征，她们的存在是飘渺无定的。她们参与人间的事情，但却没有自身命运：安徒生笔下的小海妖一旦变成女子，她立即得知爱情的束缚，而受苦就成了她的命运。

在现代小说中，如同古代的传说，男人还是具有特权的英雄。德·赛古夫人的作品是奇特的例外，在她的作品中，描绘了一种母权社会，当丈夫在场时，他总显得极其荒谬可笑。但在一般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如同在现实世界中一样，总是环绕着神圣光圈。名著《小妇人》中的女性剧情，在一个因不出场而被神化的父亲的庇护下展开。在冒险小说中，周游世界的总是男孩，他在船上当水手而旅行，在丛林中靠吃野果维持生命。世界上一切重要的事件都经由男人而发生。现实世界肯定了小说、传说里所叙述的。只要小女孩看报，只要她听成年人谈话，她就知道，今天如同以往，是男人操纵着世界。她所崇拜的政治领袖、将军、探险家、音乐家和画家，都是男人；难怪是男人在她心中激起热情。

这种男性尊严在超自然的世界中反映出来。做为规律，因为宗教在妇女生活中占有很大地盘，而小女孩又比男孩更多地受到母亲的控制，所以小女孩也更容易臣服于宗教的影响。现在的西方宗教中，父性上帝是个男人，是个带着特殊男性特征——一把茂密白胡子——的老绅士。对基督徒来说，基督本人更是个有血有肉、留着棕色胡须的男人。根据神学家的解释，天使没有性别，但他们有男性名字，以年轻英俊的男子形象出现。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罗马教皇、主

教（人们吻他的戒环）、做弥撒的神父、传教士、人们跪下秘密地向之忏悔的人——他们全都是男人。对于一个虔诚的小女孩，她与永恒之父的关系，正类似于她与生父之间的关系；当前者借助想象力而发展时，她得知的甚至是更接近于彻底的自我放弃。在诸教之中，天主教对年轻女孩最具有迷惑的影响。处女在长跪中听到天使的言语，于是回答："看哪！主之婢女。"玛丽·玛德琳匍匐在基督脚边，用眼泪洗他的脚，用她头上的发、长长的女性头发拭干它们。圣徒们跪着，宣称他们对光辉的基督的爱。双膝跪地，呼吸着点燃的薰香味，年轻女孩在上帝和天使的凝视之下，放弃了自我；这种凝视是一种男性的凝视。学者发现，在色情的语言与女人倾诉的宗教语言之间，存在着极类似的地方。比如，圣特里萨这样写耶稣："哦，我深深爱着的，有你的爱，我甘愿不再有感觉，在下面此处，你嘴唇的无可名状的吻……但我祈求你，用你的爱将我焚烧……啊，让我在炽热的疯狂中，躲藏在你心中……我愿变成你的爱的牺牲……"如此等等。

但我们不能就此下结论，认定这些倾吐总与性有关；事实上，倒是当女性的"性"发展起来时，它与宗教情绪这种从早年起妇女通常导向男人的感情弥漫交融在一起。小女孩在忏悔师面前，甚至独自在圣坛下面时所经验的激情颤动，与她将来在爱人怀抱中的感受非常相象。这里的意义在于，女性的爱是一种经验形式，在其中，女性为了一个超越自己的存在，将有意志的自我变成一种客体；这种被动的快感，也

是虔诚的年青女教徒在幽暗的教堂中徘徊时所获得的享受。

垂着头，将脸埋在双手中，她知晓了放弃自我的奇迹；跪在地上，她却在攀登天堂；向上帝的双臂投降，却保证了她在白云和天使伴随下的轻举升天。正是从这种奇妙的经验中，她预先经历了未来尘世中的快感。她也能从其它途径获得这种经验：一切事物都在引导她，在白日梦中放弃自我，投入男人的怀抱，以便被引领到某种光辉的天堂。她懂得了，必须被爱，才会幸福；而要被爱，必须等待爱的光临。女人是睡美人、灰姑娘、白雪公主，她接受，她服从。在歌曲和故事中，我们看到小伙子出发历险，将去寻找女人；他杀死恶龙，与巨人搏斗；而她则被锁在塔中，关在宫殿、花园、山洞里，被链子锁在岩石上，她是一个俘获物，沉沉睡去——她在等待。

“我的王子终将来到……总有一天他会出现，我所爱的男子”——这些流行歌曲的歌词，用耐心和希望的梦想将她填满。

于是，女人的最高需要，是迷住一颗男性的心；无论女英雄们何等刚毅、富于冒险精神，最终这也是她们所渴望的报偿；而最常见的是，女人不需任何特长，只要她们美貌就行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年青女孩对自己的肉体外貌如此关注着迷；不管她们是公主还是牧羊女，她们都必须漂亮才能获得爱情和快乐；难看总与邪恶残酷地被拉扯在一起，当不幸落到相貌丑的人头上时，人们不禁要疑惑：到底是因

为她们犯了罪，还是她们因不受欢迎的外表，而受到惩罚？通常的情形，美丽的年青女子，未来前景辉煌，却首先以牺牲品面目出现；布拉邦的吉娜维夫，以及格里莎达的故事，并不象初看时那么简单；在她们心中，爱和折磨混合为一，扰得她们不安。女人通过首先堕入卑贱的深渊，而使自己保证获得最甜蜜的胜利。无论涉及的是上帝还是普通男人，小女孩学到了：用最彻底的自我放弃手段，她将变得无所不能；她沉溺于一种允诺她未来征服一切的色情受虐之中。圣布兰丁雪白的身体在猛狮的爪下鲜血淋漓，白雪公主象死人般被放在玻璃棺材内，睡美人在熟睡，阿达拉昏厥了，整群娇美的女英雄伤痕遍体、流血、被动、屈膝、受辱，为她们年轻的姊妹展示了殉难、遗弃、自绝之美的迷人尊严。这不必使我们惊奇：当小女孩的哥哥扮演一个英雄，她十分愿意扮演殉难者，让异教徒把她抛给猛狮，蓝胡子丈夫（法国民间故事中连续杀掉六个妻子的人）拖着她的头发，她做国王的丈夫将她放逐到密林深处；她服从，她受苦，她死去，而她的头上于是戴着荣誉的光圈。"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德·诺艾尔夫人写道，"我想吸引男人的爱，让他们不安，想使自己被他们拯救，死在他们怀中。"在玛利·勒·哈多因的《黑帆》中，我们找到这类自虐性白日梦的明显例子：

七岁时，从不知哪根肋骨，我创造出我的第一个男人。他个子高而单薄，很年轻，穿着袖子拖到

地的黑缎子衣服。他金色的长发卷曲得厉害……我叫他埃德蒙……然后我给他两个弟弟：查尔斯和塞德里克；这三个长相一样、穿的衣服一样的兄弟，让我体会到奇特的快感……他们一点点的脚和纤细的手，给了我各种内在的活动……我成了他们的妹妹玛格丽特，喜欢自己整个任由他们摆布的感受，埃德蒙对我操有生与死的权利……他一有借口就让我受鞭笞……当他向我讲话时，我总被恐惧摄住，回答只能是支支吾吾的："是的，我的主"，象白痴一样，但却有奇异的快感……当我的受苦变得不堪忍受，我乞求他的怜悯，吻他的手，而同时感到我的心碎了。我最终达到了那种境界：因过度的快乐而想死去。

多少是早熟地、小女孩梦想着自己已经长大，可以去恋爱。九岁、十岁时，她在脸上化妆来开心；在胸部的衣服下垫东西，假装自己是个成熟的大姑娘。但她并不寻求与小男孩的实际性经验；如果她也偶然跟小男孩躲在一起，玩"彼此暴露身体"的游戏，那仅仅是种对性的好奇。在她的爱情梦幻中，她的伴侣是个成年男人，或者是纯粹想象出来的，或者实有其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小女孩满足于远远地默爱。这种孩子气的白日梦，可以在科利特·奥德丽的回忆录中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她叙述自己在五岁时发现了爱情：

当然，那和童年时小小的性快感和满足毫无关系，比如我跨骑一张椅子，或者睡前抚摸自己感到的满足……它们唯一的共同处，是我小心地将这两种事都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我对这个年轻人的爱，就在于临睡前思念他，编织动人的故事……我相继恋爱着我父亲手下的所有高级职员……当他们离职时，我深深地伤心。他们是我梦幻的借口……当我上了床，我因为自己太年幼、太胆怯，向自己报复。我小小心心地准备，我能轻易地让他浮现在眼前，但我必须先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不再是“我”，而变成了“她”。首先，我十八岁，美丽动人……我有一个精致的糖果盒子……我有短短的棕色卷发，穿着薄纱长袍。我们分别了十年。他一点不见老地回来了，一见到这位人间天仙，他神魂颠倒。她呢，看上去好象不大记得他，态度安适，满不在乎，充满机智。我为这第一次相聚，构思了精彩的对话。接着是相互的误解，征服所有困难；他经历了残酷的失望和妒嫉。最后，逼到了绝路，他承认了他的爱。她静静地听着，正当他认为一切都完了，她突然说自己一直在爱着他，他们拥抱在一起……我看着他俩靠在一起，常常坐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听到他们喃喃耳语，同时，我感觉得到他们身体接触的温暖。但只到此为止，以后的一切就散乱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结婚那么远。……第二天早晨，我边漱洗边想一会。我欣赏自己涂满肥皂的脸（虽然在其他时候我不认为自己美丽），感觉到它带着希望地将我引向遥远的未来。但我不得不快快洗完，一旦我将脸拭干，一切就结束了。在镜子中，我再看到自己平凡的孩子脸，它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

游戏与白日梦将小女孩引导向被动存在，但是在变成一个成年女人之前，她还是一个人，她已经知道，要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女人，必须退让和让自己残废。如果自我退让还有吸引力，残废自我却是可恨的。男人，爱情，都还远远处于“未来”之雾中；目前，小女孩象她的兄弟一样，追求活动与独立。对孩子来说，自由的负担并不重，因为它没有暗示“责任”；他们知道，在成年人的保护下，他们是安全的，他们不想逃走。她的本能的生命之潮，她对游戏，欢笑，冒险的享受，使小女孩将母性的世界看作狭窄的天地，令人窒息。她但愿能逃开母亲的权威，运用在她身上的这种权威，比男孩子不得不接受的要更为紧密，而且日复一日。很少有象科利特笔下的西多那样的例子。母亲的权威是可理解而谨慎的，除去一些很平常的类似病态的例子——母亲象只野兽，在孩子身上满足自己的控制欲与虐待狂，作为母亲，她的女儿是她拥有特权的对象，在这对象面前，她充满权威地站着。母亲的这种态度，引得孩子起而反抗。科利特·奥

德丽描绘过这种普通孩子对普通母亲的反抗：

我无法回答她实话，不管事情原来是多么单纯无罪，因为在妈妈面前，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单纯无罪。她是个那样了不起的重要人物，而我对她抱着如此的怨恨，至今我还没有解脱出来。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残忍的敞开着的伤口，我敢肯定它一直处在燃烧之中……我倒没有认为她太严厉，或者超越了她的权利，我只是用尽全身力量想道："不，不，不！"我责备的不是她的专横、命令和这样那样的禁令，而是她那屈辱我的欲望，这欲望有时在她的语言中直接表露出来，有时我则在她的眼神中和声音中感觉出来。当她告诉一些来访的太太，说孩子们在受罚后更容易改邪归正，她的话哽在我的喉咙中，无法忘却；我吐不出它们，也吞不进去。这种情感代表了我在她面前的罪咎，也代表了我在自己面前的羞耻（因为她到底吓着了我，而我只能用几句粗暴无礼的词句和无礼的态度做为报复）。但是，不管怎样，这也是我的光荣：只要这伤口还在那里，只要一重复"屈辱"、"改邪归正"、"惩罚"、"低贱"等字眼，我的心就被缄默的狂怒抓住，因此，我将不至于真正被屈辱。

当母亲失去尊严，就象经常发生的那样，女儿的反叛变得更为激烈。这种母亲仅仅等待、服从、抱怨、哭泣、吵架，她是一个讨厌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被尊敬。做为一个牺牲者，她被瞧不起；做为一个悍妇，她被憎恶；她的命运象是快速重现的典型：生命在她身上只是种重复，而不导向任何地方。她被固定在“家庭主妇”的角色上，停止了生命的发展，她变成了障碍和一种否定。她的女儿希望不要象她。女儿崇拜一些逃避了女性桎梏的女人：女演员、作家、教师；她热心参加运动，努力学习功课；她爬树，撕破衣服，试着与男孩子们竞争。

通常她有一个心腹至交；那是一种类似爱情的排外友谊，彼此经常分享有关性的秘密，相互讨论小女孩们所能获得的这类知识。她们中经常形成三角关系，一个女孩喜欢上她朋友的哥哥。象在«战争与和平»中，索尼亚是娜塔莎的至交，爱上她哥哥尼古拉斯。不管在那种情形下，这种友谊被神秘气氛包围着，而且一般而言，在这一阶段孩子们都喜欢保有一些秘密；她们将无足轻重的事情当做秘密，这通常是她们制造神秘的好奇天性的反应。保有秘密也是一种提高自己重要性的方式，而这是她想尽方法寻求的：比如试图参与大人的事，编织自己半信半疑的故事，而她在故事中占据重要角色，等等。与同伴们在一起时，她装做看不起男孩，正如男孩看不起她；她和她的朋友形成一个独立的集团，咯咯发笑，取笑男孩子。

但事实上，当男孩们平等地对待她，她心里非常高兴，她还试着获取他们的赞许。她很想属于他们那特权等级。自古以来，女性反抗男性统治的同一种行为，在每一个新入门者身上，通过拒绝自己命运的方式表现出来：超然的存在，拒绝内在的荒谬性。她不喜欢受到礼仪的规则威胁，不喜欢为衣饰烦恼，被家务操心羁绊，被割断高飞的翅膀。对这方面的研究调查不在少数，几乎都得出一样的结论：差不多所有的男孩——象古代的柏拉图——都宣称绝不愿做女孩；而几乎所有的女孩都为没有生为男孩而遗憾。根据哈夫洛克·埃利斯的统计，一百个男孩中，有一个希望做女孩；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女孩，愿意改做男性。根据卡尔·皮帕尔的研究，在二十个十二岁到十四岁的男孩中，十八人说他们宁愿遭受一切恶运，也不愿做女孩。在二十二个女孩中，十九个想当男孩，理由是："男孩比较好，他们不必象女人那样受苦……我妈妈将会更爱我……男孩做的工作更有趣味……男孩更倾向于学习……我是男孩的话，就可以开玩笑地吓唬女孩子……我就不必再怕男孩……他们更自由……男孩的游戏更有趣……他们不为穿什么衣服烦恼。"最后这一点常常被提到：大多数女孩抱怨她们的服装使她们心烦，使她们行动不自由，她们被限制得小心翼翼，避免弄脏她们浅色的衣裙。

在十岁或十二岁的年龄，大多数小女孩都很有男孩子气，是道地的"garcons manqués"——那就是说，她们是缺了什么东西的男孩。她们不但感觉这是一种剥夺，不公道；

她们还发现自己命中注定给她们的领域很不健全。女孩的生命力被压抑，她们无以寄托的精力转变为神经紧张；她们的琐细工作用不尽她们洋溢的旺盛活力；她们变得厌倦，透过厌倦，并且为了补偿自己的卑微地位，她们纵容自己陶醉在忧郁而浪漫的白日梦里。她们尝到这种轻易逃避方式的甜头，失去了她们的现实感。她们带着不加控制的激动，屈服于自己的感情。替代实际行动的，只有她们的聊天，在聊天中时常将正经的句子跟无意义的字眼混杂乱用。她们被忽视，被"误解"，于是到自恋式的幻想中寻找安慰：她们带着自我欣赏和自我怜悯的心情，将自己想象为小说中的浪漫女主角。自然而然地，她们变得做作，卖弄风情，这些弱点在青春期变得更加明显。她们的不适在缺乏耐性、耍脾气和眼泪中表现出来；她们喜欢流泪——许多女人在未来岁月中一直保留这一爱好——主要因为她们喜欢扮演牺牲者的角色：这不但是她们对严酷命运的反抗，同时也是一种引人怜爱的手段。小女孩有时在镜子中看自己哭泣，以获得双倍的快感。

大多数年轻女孩在生活中的演戏与她们的家庭关系有关。她们试着斩断与母亲的联系：她们有时对她表示敬意，有时流露出对她的保护的强烈需要；她们希想独占父爱；她们嫉妒，敏感，苛求。她们经常编造故事，想象她们的父母不是她们真正的父母，她们是被收养的孩子。她们假想自己的父母过着一种秘密生活，冥想他们的真正关系；她们时常幻想父亲被误解，不快活，娶的妻子不是理想伴侣，远不及女儿

懂得如何陪伴他。或者，相反地，她们认定母亲正确地将他视作野兽般粗暴，因而害怕跟他的任何身体接触。幻想，演戏，孩子气的悲剧，错误的热情，古怪的行为——对这一切的起因，我们不应该在女性的神秘灵魂中追寻，而应该在孩子的环境和她的处境中找寻。

对感觉自己是一个自主的、超越万物的主体，一个完全的人，突然发觉自己实在是个被固定的、被安排好的东西，的确是一种奇异的经验。对任何一个视自己为待展示另一自我的人，这都是一种奇异的经验。这正是小女孩在世界上逐渐学习领略人生，终于得知身为女人的意义时，她所体验的感觉。她所属的空间到处被男性宇宙封闭、限制和支配：不论她将自己抬举得多高，不论她冒险走得多远，她头上永远有天花板压着，她的路上永远有墙壁挡着。男性供奉的神处在辽远的天空，所以对他们来说，神并不存在；小女孩却生活在由人扮演的神群中。

这种处境不是独一无二的。美国的黑人也了解它，因为他们被部分融化在一种视他们为低等种族的文明中。在理查德·赖特的作品《土生子》中，比格·托马斯在他生命的早期痛苦地感觉到的，就是写在他肤色上的这种被规定了的劣等，这可诅咒的另一自我。他看着飞机飞过，而他知道只因为他生为黑人，他飞不上天空；因为她是个女人，小女孩知道自己与海洋，南北极，千百种冒险和数不清的欢乐绝了缘。她生活在线的另一旁，生错了性别。在黑人与女人之间有一

个极大区别：黑人怀着反叛的心情屈服，没有任何特权补偿他们严酷的命运；然而女人有接受合谋的诱惑。我早先就提到，一个要求绝对自由的人，除了具有真正的对自由的渴求外，同时还存在一种不真实的对放弃与逃避的需求；父母和教师，书籍和神话，女人和男人，合在一起使年轻女孩相信被动的快乐是值得追求的；她自幼就被教导去享受被动的快乐，这种诱惑的力量在不知不觉间加大；而当她的"超然存在"粉碎在生活的阻隔上，她就更加死心地屈服于这种快乐。

但是，就这样去接受她被动的角色，小女孩就等于同意毫不抗拒地屈服于由外界强加在她身上的命运，这种灾难使她恐惧。小男孩无论有没有野心，是否无心或胆怯，都面向开放的未来；他将做个水手，或工程师；留在农村，或者进入城市；他将历览世界，将会致富；他感受到自由，面对着充满未知的将来。年轻的女孩呢，她将成为妻子，母亲，祖母；她将和她的母亲一样操持家务，她将给予自己的孩子象她幼时所接受的同样照顾——她才十二岁，她一生的故事却已经写在了天书上。她甚至不用去编织它，就发现它一天接一天地展开；当她沉思冥想这种每一步骤都可以预见的人生，而每一天都不可抗拒地移向这早已规划的布局，她惊奇至极，但又深为恐惧。

这解释了为什么小女孩，比起她的兄弟，对于"性"的神秘更好奇而专心。虽然，男孩们也对这些事情深感兴趣，但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他们将来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角色。

然而，对于女孩，婚姻与做母亲涉及到她整个命运；从她开始窥见它们的秘密之时起，她的身体就仿佛遭受到可恶的威胁。母性的魔力消逝了，女孩不管是否通过正常途径，迟早会知道婴儿并非偶然来到母体，也不是凭着挥动一根魔杖而诞生人间。她不安地询问自己。通常，她不再觉得自己体内寄生一个物体有什么美妙，反而觉得可怕；一想起这种神秘的隆起，她就充满恐惧。

还有，婴儿是怎么生出的呢？即使没有人告诉过她生孩子时母亲的哀叫与痛楚，她也会偶然听过这类话，或者读过圣经上的句子："你将在忧苦中生产孩子。"她对这无法想象细节的折磨有种预感，她想象在肚脐部位做各种手术。如果她假设胎儿从肛门生出，她也不会就此安心。曾经有过一些小女孩，因为误以为婴儿从肛门生出来，患了心理因素引起的便秘症。给她们确切解释也无济于事。隆起，撕裂和流血的图片，会在她脑海中萦迴不去。想象力越丰富的女孩，受这些景象的折磨越厉害，没有一个女孩能面对它们不打个冷噤。科利特叙述她母亲如何念给她听一段左拉对一个女人生产的详尽无遗描绘，念完后发现她已经晕了过去。

大人们给孩子作的保证，使她感觉不安；当她长大一些后，学会不再相信大人的话；尤其有关生育的事情，她经常发现大人说谎。她也知道大人们常常将最可怕的事情看作正常的事；如果她经历过几次肉体上的强烈痛苦——割扁桃腺、拔牙、割甲沟炎——她会将记忆中的疼痛，投射在将来的生

育上。

怀孕与生育的肉体性质，暗示着丈夫与妻子之间，发生着某种身体上的关系。“血”这一个字眼，经常出现在这种说法中：“同一血统的孩子”、“纯血统”、“混血”，有时引致孩子气的想象；例如，他们可能设想婚姻涉及一些输血的严肃仪式。但他们更可能将这种“身体上的关系”跟大小便的器官联在一起。小孩们特别倾向于相信男人撒尿在女人体内。性行为被认为是肮脏的。孩子被严格禁止触摸“脏”东西，因此实在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大人能接受这种事，作为生命整体的一部分？最初，小孩对他所发现的荒谬事情无动于衷：他在听到、读到或写下的东西中，看不出意义，一切在他眼中都显得不真实。在卡森·麦卡勒斯的小说《婚礼上的成员》中，年轻的女主角撞见一对男女住客赤裸裸在床上，这种超出常规的情况，反而使她不去想这有什么重要。

那是个夏季的星期天，马罗夫妇房间的门敞开着。她只能看到房间的一部分，部分梳妆台，以及挂着马罗太太胸衣的床脚。然而安静的房，有一种她不知来自何处的声音。她走进房门内，向里一探头，禁不住吃惊地跑到厨房，口里叫道：“马罗先生发疯了”！波绿妮斯急忙跑到走廊，向前房一探头，却噘起嘴唇，砰地把门关上……佛仑琪想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波绿妮斯只回答说：他们是些没

有教养的中下等阶级的人；并且补充说，家里既然有某一个人，他们至少应该懂得关门。虽然佛仑琪知道“某一个人”指的是她，但她还是不理解。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疯？她问。但波绿妮斯只是回答说：小娃儿，那不过是一种平平常常的癫病。佛仑琪从波绿妮斯口气中，知道她隐瞒了什么东西。从此以后，她只记得马罗夫妇是没有教养的中下阶级的人……

当大人警告小孩们不要接近陌生人，或者听向她们解释有关性交的事，很可能将这一切归之于病人、狂人或疯子，这是最方便的解释。小孩在电影院里被邻座的人摸了摸，或在路上看到过路人暴露性器官，便相信她遇到的是个疯子。不错，遇到狂癫者令人不愉快：发羊癫疯，歇斯底里的发作，或者剧烈的吵架，扰乱了成人世界的秩序，而小孩见了，感觉到威胁。但说到底，正如同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存在有一些乞丐、一些残疾人、一些长疮的病人，同样地，也会有一些基本健康但却有点反常的人。只有在小孩怀疑父母、朋友、老师在暗中搞黑魔术时，她才会真正被吓坏。利普曼医师在《青春与性》中，举出这样的一个实例：

当我第一次听到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我否认这种事情的存在，因为这要包括我父母在内，而我太

尊重他们，不信他们会做这种事。我说，这样令人恶心的事，我是永远不干的。不幸得很，没过多久，我听到父母性交时的声音……那真是可怕的时刻，我用被单蒙住脸，堵住耳朵，但愿能离他们一千里远。

怎样才能对衣冠齐整、有尊严、有操守、有理智的人的观念，一下子转变为对两个赤裸裸相对的动物的看法？这里的确是成年人自己败坏了名誉，动摇了他们自己的高坛，污染了晴空。小孩通常固执地拒绝接受这种发现，她坚持说，“我父母不做那种事。”或者，她试图为自己设想出一种体面的性交情景，就象一个小女孩所说的，“当父母想生一个孩子时，他们就上医生的诊所，他们脱掉衣服，并且捂起眼睛不看。于是医生将两个人合在一起，照看着使一切进行顺利”。这样，她将做爱的行为转化为一种外科手术，虽然还是令人不愉快，但至少象去看牙医一样，是种正当行为。然而，不管怎样否认与逃避现实，不安和疑惑还是潜入小孩心里，产生一种有如断奶一样的痛苦效果：这次不再是将小女孩与母亲的肉体分离，而是眼见护卫着她的宇宙，在她四周崩塌。她发现头顶上再也没有屋顶，在黑暗的“未来”到来之前，她被遗弃了，绝对孤独。

而使小女孩更加沮丧的，是她无法清楚地辨别出那压迫在头上的暧昧诅咒的真相。她获得的信息是不联贯的，书本

上的东西互相矛盾；甚至连学术性解释，也无法驱散重重黑暗；一百个问题等待回答：性交疼痛吗？还是带来快感？它持续多久——五分钟，还是一整夜？有的书说，女人只要拥抱一次，就变成母亲；有的却说她享受许多小时的性交快乐，却没有怀孕。人们每天都“做它”吗？还是仅仅偶然一次？小孩为了寻找答案，去读圣经，请教辞典，询问朋友，她就这样在晦暗与厌恶中探索。利普曼医生的研究，得出了这方面的有趣资料。以下是一些他搜集的有关年轻女孩第一次获得性知识时的反应：

我继续沉迷在自己古怪而模糊的观念中。没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母亲不谈，老师也不谈。没有一本书谈透这个题目。一种危险和丑恶的神秘气氛，罩在我先前看来是很自然的行为之上。十二岁的大姑娘们，用一切粗鲁的玩笑，沟通他们与我的同学们之间的鸿沟。那一切仍然是模糊而令人厌恶的；我们争论婴儿在哪里形成；也许男人一生只做一次那种事，因为婚礼是那样麻烦的一件事。我十五岁时初潮，让我大吃一惊……

性的启蒙！我们家决不提起！……我涉猎群书，但徒劳无益，找不到途径……对于我的老师，这问题好象根本不存在……终于，有本书向我展示

了事实，我的热情也随之消失；但我变得非常不快活，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理解真正的爱情是由性欲与性交构成的。

我的启蒙诸阶段：（一）开始有疑问与不满足的想法，三岁半至十一岁……没有答案……七岁时，我的宝贝兔子生了小兔，母亲告诉我，动物和人的幼子，都在母亲体内生长，而后从腹侧生出。我觉得不合常理……一个女仆告诉我有关怀孕、生育和月经等事……最后，我向父亲追问他在生育中的作用，他用雌蕊与花粉的比喻来回答我。（二）试着自我启蒙，十一岁至十三岁。我参阅百科全书和一本医学书籍，……仅仅找到用奇怪而夸大的字眼叙述的理论解说。（三）获得实际的知识，十三岁至二十岁；（1）通过日常生活；（2）通过科学书籍。

八岁时，我和一个同龄男孩游戏。我把母亲对我说的话又告诉他：一个女人身体里有许多蛋……当母亲强烈地想要时，小孩就从其中一个蛋中生成……他说我是个笨蛋，并说当屠夫和他太太想要个小孩时，他们就上床做下流的事。我呆了……我十二岁半时，我们有个女仆，她告诉我各式各样荤

人听闻的事……因为羞耻，我一个字也没对妈妈说，但当我问她，坐在一位先生的膝上会不会让人生孩子，她便尽可能地将一切解释给我听。

我在学校得知婴儿是从哪里来的，觉得这是件可怕的事。但他们是怎样降生到世间的？我们两个人对这一些形成一个奇异的观念。尤其在一个灰暗的冬季早晨，我们遇到个男人向我们暴露性器官，并问我们想不想吃它之后，我们深深感到厌恶，内心翻腾作呕。直到二十一岁，我一直以为婴儿是从母亲肚脐生出来的。

一个小女孩问我知不知道婴儿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她说我是笨蛋，告诉我婴儿是从女人体内出来的，而要造出他们，女人必须和男人做令人作呕的事情。然后她告诉我这种事情的细节，但我不相信有这种事。一次，我睡在父母的房间里，听到了我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为父母感到羞耻。这一切使我变成另一个人。我感受到可怕的道德痛苦，视自己为一个堕落的人，因为我已经明白了真相。

我们应当说明，即使是明白清楚的教导，也不能解决这一难题。父母和老师们，怀着世界上最好的愿望，也不可能将

性经验诉诸文字和概念；只有实际经验它，才可能理解它；任何分析，无论多么严肃，都免不了显出滑稽的一面，而无法传达出真实。当一个人开始从花的授粉繁殖，鱼的交配繁殖，进而小鸡，小猫，小孩，达到了人类的层次，他在理论上对于传种接代的秘密已经明白了然——但性快感与爱情这一神秘，却依然存在心中。

对一个还没有性热情的小孩，我们怎么去解释接吻或抚爱的快感？家里的人时常互吻，有时甚至吻在嘴唇上。为什么这种粘膜的接触，在某些时候，竟能带来天旋地转的效果？这等于将色彩解释给盲者听。要是没有对于性兴奋的直觉，不懂得性行为后面的欲望，那么性行为的各种各样举动将显得令人震惊和可怕。尤其使小女孩深感厌恶的，是当她懂得自己是个完整的处女，而要变成一个妇女，她必须让一个男人的性器官戳入她体内。因为“暴露癖”是种相当普遍的心理病，许多年轻姑娘都见过坚挺的阴茎；无论如何，她们见过雄性动物的性器官，不幸地，马的生殖器经常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她们很可能被它吓坏。害怕生孩子，害怕男人的性器官，害怕威胁已婚夫妇的“危机”以及对猥亵行为的厌恶，对毫无意义的行为的蔑视——这一切，经常使得小女孩宣誓：“我永远不结婚。”那将是最可靠的抵御痛苦、愚蠢和猥亵的办法。无论人们怎样向她解释，有一天她将不再认为性交与生育有那么可怕，千千万万的女人都经历过这一切，而没有任何坏结果，但都无济于事。当一个孩子对外界

事物存有恐惧，我们解除她的恐惧；但如果我们预言她将来会自然而然接受它，那她就会害怕面对将来改变了的、迷失了的自我。毛毛虫蜕变为蛹，再变为蝴蝶，使小孩感觉不安：在它睡醒长长的一觉后，还是同一条毛毛虫吗？长出了漂亮的双翅，它还认得出自己吗？我遇到过一些小女孩，一看见蛹就禁不住产生惶恐的幻想。

然而变形还是发生了。小女孩捕捉不到其意义，但她注意到自己与世界、与肉体的关系之间，有某种微妙的改变。她开始感受到以前从没有注意过的触觉、味觉与嗅觉；她心中泛过奇异的图象；她几乎认不出镜子中的自己；她觉得“滑稽”，样样事情都显得“滑稽”。理查德·休斯在《牙买加疾风》中描写的埃米莉，就是这样一个女孩：

> 那是她的十岁生日……埃米莉想要凉快一下，便将自己浸在水中，水漫到下巴。数百条小鱼用它们好奇的嘴骚痒她的每一吋肌肤，象一种无意识的轻吻。
>
> 然而，她最近变得厌恶被人摸触——而这更是可恶至极。最后，当她再也受不了时，她爬起来将衣服穿上。

就是玛格丽特·肯尼迪的《永恒的女仙》一书中文静的女主角特莎，也感觉到这奇异的骚动：

突然她变得特别痛苦。她向下凝视着黑暗的厅廊，那里被透过敞开的门的月光分割为二。她再也忍受不住，绝望地轻叫一声，一跃跳起："哦！"她呼喊道："我多么恨这一切！"……她冲出门去，把自己藏在山中，恐怖，愤怒，被充满那静静的屋子中的一种荒凉预感所缠扰。当她磕磕绊绊向上爬往山口，她不断喃喃自语："我但愿能死掉！我但愿自己已经死了！"

她知道自己言不由衷；她一点也不想死。但是，这样一种宣布中的暴力似乎使她感到满足……

在卡森·麦卡勒斯的书《婚礼上的成员》中，对这一种骚扰心情的时刻，有着充分的描写：

这就是弗仑琪对自己感到厌恶的那个夏天，她恨自己。她变成一个游荡者，一个在夏日厨房里闲荡的无聊的人；肮脏，贪心，卑鄙而忧伤。除了卑鄙得无法过活，她是一个罪犯……而那年的春天，也曾是个漫长的古怪的季节。一切在发生变化，而弗仑琪无法理解这种变化……四月中的绿树和鲜花，不知为什么却使弗仑琪悲伤。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悲伤，但就因为心中有种奇异的忧郁，她开

始明白自己应该离开这座城市……她应当离开，搬到遥远的某处。那年的春天实在太懒散，太甜蜜了。漫长的下午开着花，绿色的芬芳令她厌恶……许多事物让弗仑琪突然想哭。有时，一大早，她就走到院子里，久久地站着，守望日出的天空，就好象有什么问题来到她心中，而天空却拒绝回答。她以前从没注意过的事物却开始刺伤她：傍晚街道上人家的灯火，从小径传来的不相识的声音。她总凝视那些灯火，聆听那声音，而她心中好象有什么突然变硬了，在期待着。而那些灯火终将熄灭，声音也要隐去，她虽然在等待，却不再有下文。她害怕这些事情，因为它们使她突然奇怪：自己究竟是谁？她疑惑自己将来在世上的命运，也不明白为什么在此时此刻独自一人看着灯火，听着，或者凝望天空。她恐惧，心中奇异地痉挛。

……她在城内四处游荡，而她所见所闻的一切，总好象不完整，还没有完成。她心中的痉挛总也舒展不开；她总是急着做点什么事，但她所做的事永远不对劲儿……在这个季节的漫长的黎明，弗仑琪走遍城内的人行道之后，一种不调和的悲伤使她的神经战抖，她的心脏发硬，几乎停止跳动。

在这一段不安的时期发生的，正是小女孩的身体在转变

为女人的肉体，长出脂肪。除非由于内分泌不足，使女孩停留在婴孩阶段，青春发动期在十二岁或十三岁时来临。这一关口女孩开始得比男孩早，而且变化也更重要。年轻女孩用不安、不快活的心情接待它。当乳房开始发育，长出体毛，她心中的感受有时变成骄傲，但基本上是羞耻；突然之间她变得害臊，即使在姐妹或母亲面前也不肯脱光衣服。她用惊奇与憎恶混杂的心情检查自己，并痛苦地望着奶头下一向象肚脐一样平滑的乳核，开始变硬而且肿大，还微微发痛。她不安地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了个容易疼痛的软弱地方；这种疼痛之处比起烧伤或拔牙的疼痛实在微不足道；但不论是由于受伤或疾病而造成的疼痛，都是不正常的；而年轻的胸脯又通常是个令人不完全满意的地方。身体在产生某种变化——却不是一种病；那在生存和规律中暗示了出来，但仍然具有挣扎、割伤的性质。当然，从婴儿期到青春发动期，女孩一直在成长，但她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发育：一天又一天，她的身体一直是个眼前的事实，确定的，完整的；但现在她却“发育”着。这个词本身，看上去就令人憎恶；只有当它们达到平衡状态，肉体象鲜花般丰满、有光泽时，这些激烈的发育现象才使人放心。但女孩在乳房发育过程中，却感受到“生命”一词的含混意义。她既不是金，也不是钻石，而是一种奇怪的物质，永远变化着，不确定，体内深处有不洁的成份在演变。她已经习惯于有一头软软卷曲的丝发。但现在，腋下与阴部长出的新毛使她变成了某种动物或海藻。不论她是

否事先得到过警告，她在这些变化中预感到一种定命，这种定命将她席卷而去，脱离自我：她眼见自己被抛入淹没她“自我”存在的强烈漩涡中，而预知了自己必将依附于男人、孩子和死亡的命运。乳房本身就显得无用，讨厌。四肢、皮肤、肌肉，甚至那圆润起来的臀部——这一切，到目前为止，一直有着显而易见的用处。性器官除了能尿之外，用处有点可疑，但它隐秘不露在外。在她的毛衣或衬衫下面，双乳却显露出来。而这一个她一向认为是自己的身体，她现在得知是“肉体”。它变成了人们注意和注目的物体。“整整两年”，一个女人告诉我，“我穿披风来遮掩胸部。我真为它感到羞耻”。另一个女人说：“我还记得我当时感到的奇异迷惑，一个跟我同样年龄但比我早熟的朋友弯下身子去捡球，我从她胸衣的开口处看到了一对饱满的乳房。见到与我年龄如此相近的朋友的身体，想到我自己的身体也会变成这样，我不禁为自己脸红起来。”又一个女人对我说：“十三岁时，有一天我出外散步，穿着一身短装，赤裸着双腿。一个男人一边低笑，一边批评我的小腿过于粗大。第二天我母亲就叫我穿长袜，并放长裙子，但我永远忘不了那种被人看到赤裸之身的震惊。”年轻女孩觉得她的身体开始与她脱离，它不再是她个性的直接表现；它变得陌生；同时，在别人眼里，她变成了物：在街上，男人们用眼睛追随她，对她的身体品头论足。她但愿能隐形；她害怕变成肉体，展览肉体。

许多女孩在这方面的厌恶，通过她们渴望自己瘦削表现出来。她们不再想吃东西，如果强迫进食，她们经常呕吐出来。她们随时注意自己体重。另一些女孩则变得病态地胆怯。对她们来说，步入客厅，甚至上街，都是一种折磨。从这种开端，时而会导致精神病。珍妮特在《困惑与精神病》中，以一名叫纳迪亚的女孩为例，描写出此类典型病例：

> 纳迪亚出身于富有而智力颇高的家庭，年轻，时髦，有艺术天份，而且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但她自小就固执，容易发脾气。“她向家人和仆人要求过份的情爱，但她如此苛求，如此好强，很快就让人疏远。人们为了改变她，采用取笑方式，而她竟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羞耻感”。此外，她对情爱的需要使她希望自己永远是个被宠的孩子，使她害怕长大……而早临的青春增加了她的烦恼。“既然男人喜欢丰满的女人，她将保持瘦削。”阴毛和渐渐长大的乳房加深她的恐惧。从十一岁起，她就觉得人人盯着她的腿和脚。月经的出现逼得她半疯；她以为自己是世上唯一长阴毛的怪物，因此直到二十岁，她总痛苦地自行拔毛。……她如此惧怕变得丰满——因为那样她就“耻于露面”——以致她试着用一切祈祷与诅咒，以阻止正常的发育，因为“如果她长胖，没人会再爱她。”最后她决定不

吃东西，以此保持小女孩的身子。当她屈服于母亲的恳求，吃下一点东西，便要下跪数小时，写下一张张誓言，又撕掉它们。她十八岁时，母亲去世，于是她严格地实行绝食，以致饿得滚在地上，狠命啃咬手绢。她长得很漂亮，但却以为自己面孔浮肿，长满粉刺，并且坚持说她的医生对她的处境不了解，才看不见她脸上的疙瘩。她离开家庭，躲在一间小公寓里，绝不出门。她多半时间都在黑暗中生活，觉得自己相貌可怕至极，不能见人。

通常的情形是，父母的态度导致女孩对自己外貌的羞耻感。一个女人向斯坦克尔报告说：

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强烈的自卑，痛苦不堪，而家里人的唠叨更加剧了我的痛苦。……我的过度骄傲的母亲，总要求我仪表美观；做衣服时，她总向裁缝师挑剔出我所需要"弥补"的缺陷。比如：下垂的肩膀！突出的臀部！背部太平！胸部太显眼！等等。我尤其为四肢的外观而烦恼……而我步行的姿态也被挑剔……每句批评都有几分真实……但有时我窘迫至极，尤其在我尚未外出交际那一阶段，有时我简直不知如何移动身体才好。当我遇到一个人，我的头一个念头是："如果我能把脚藏起来就好了！"

此种羞耻感导致女孩行动笨拙，不断脸红；这种脸红增加她的胆怯，它本身含有病态的恐惧。

有时，女孩在将临青春期前，也即月经来到之前，还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感觉羞耻。她骄傲于变成于一个女人，满足地望着自己胸部隆起，用手绢垫高胸部，并且在大人面前引以为骄傲。她还没有捕捉到身体内部变化的意义。她的初潮终于揭晓了这种意义，她的羞耻感也由此产生。如果羞耻感以前已经有，则从此变得更加强烈、更加夸张。事实证明，不论孩子是否事先被告知，月经的来临对她都一样令人反感，让人羞耻。经常有母亲忽略告诉孩子这件事；学者们曾注意到，母亲们倒是较经常地向女儿们解释怀孕，生产，甚至性交等秘密，而没有解说月经的事实。母亲们自己好象就憎厌这种女性的负担，怀着一种接近于古代男人的神秘恐惧一样的憎恶，憎恶将其留传给自己的后代。当女孩发现自己裤子上可疑的污迹，她相信自己闹泻肚，或患了致命的出血症，或染上什么可耻的疾病。据哈夫洛克·艾利斯一八九六年的研究报告，一所美国中学的一百二十五名学生中，三十六人在她们初潮时，对此事完全无知。三十九人仅有模糊的知识。那就是说，有半数以上对此是无知的。而根据海伦·多伊奇的报告，在一九四六年事情并没有两样。企图自杀的例子时有所闻。事实上，当她看到生命之血流了出去，或许是因为内藏器官受到了损伤，一个年轻女孩当然

会吓坏。即使明智的指点免除了她过度的焦虑，女孩依旧感觉羞耻，受到沾染，而急匆匆地赶往洗澡间试着洗涤或者隐藏她弄脏的棉布。科利特·奥德丽在她回忆录中，详细地描写了一段典型经验。概要如下：

有天晚上，在脱衣服时，我以为自己一定生了什么病，但我缄默不语，心里希望第二天早晨一切都会过去……四周后，它又发生了，比前次严重。我将内衣放进脏衣服的篮子里。母亲来到我房里，将一切解释给我听。我不记得对她的话作出什么反应，但当我妹妹基基好奇地向内张望，我心烦得很，嚷着叫她走开。我要母亲惩罚她，因为她没敲门就进来。我母亲那副安详自满的神气令我恼怒，她走出去后，我陷入了一夜的痛苦。

突然，我联想起两件事：一位老医生在街上碰到我们，说道："夫人，你的女儿长大起来了。"我立刻无缘无故地厌恶他。此后不久，基基见母亲将一盒卫生带放进抽屉内，问说做什么的，母亲用一种透露一分隐瞒三分的大人神气回答："这是不久要给科利特用的。"我无言，问不出半句话，心里真恨母亲。

那一整夜，在床上我辗转无眠。这怎么可能！妈妈是错的，当我醒来，一切都会过去，不再重

现……翌日，背地里换纸，悄悄地又沾染。我必须面对别人。我恨我妹妹，因为她在不觉间突然变得优我一等。接着我开始恨男人，因为他们不必经历它，却又知道此事。我恨女人，因为她们轻轻松松地接受它，而如果她们知道我的处境，一定会开心地想："现在轮到你了。"……我步行不自在，又不敢跑……它终于过去，而我又开始愚蠢地希望事情不再发生。一个月后，我不得不屈服于证据……从此以后，"过去"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而我生命剩下的部分，仅仅是个"以后"。

对大多数女孩，此事的发生大致相似。她们多半极不愿意将她们的秘密透露给家人或朋友。我有一个朋友，母亲已故，与父亲和一个女管家同住。她告诉我，有整整三个月，她生活在恐惧与羞耻中，藏起她弄脏的内裤，最后她的情况才被发觉。甚至连农村妇女，应该因为熟知动物的性行为而对一切感觉麻木，但却也极端厌恶月经，因为它在农村仍然是种禁忌。我知道一个年轻农妇，一整个冬天，偷偷将自己的衣物带去冰冷的溪水中洗涤，甚至湿淋淋地将内衣穿上，以隐藏她难于启齿的秘密。我能举出一百个相似的例子。甚至承认了这一令人震惊的不幸，也不等于获得解脱。无疑地，一个母亲如果鞭打她女儿，骂道："白痴，你太年轻！"那倒是一个例外。但却有些母亲会露出坏脾气；大多数母亲则

没有给女儿足够的指导，而使后者对初潮带来的新身份充满焦虑。她不知道将来是否还有这种料想不及的痛苦事件在等她；或者，她会幻想，从此一和男人见面或接触就可能怀孕，于是对男人产生真正的恐惧。即使她获得明智的解释，免除了这类惶恐，她也不容易就此安心。先前，小女孩只需要一点点自欺，就可以认为自己是无性的人，甚至可以丝毫不去想这一问题。她甚至会梦想自己一觉醒来变成男人。但现在，母亲们和姨姑们象恭维一样低声说："现在她是个大女孩了。"女人群胜利了；她属于她们的一员。她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被归入女人一边。她可能因此骄傲；她觉得变成了大人，而这将从此彻底改变她的生活。比如迪德·莫妮尔在所著《我》中说：

> 我们中的几个人，在假期中变成了"大女孩"。另外几个人则在学校里取得了这种地位，于是我们一个跟一个到后园的厕所去"看血"。她们坐在马桶上，象皇后一般，接待臣民。

但小女孩很快醒悟，生活一如既往，她并没有获得任何新特权。唯一的新事件就是这每月重复出现的不洁之物。有些女孩，当她们了解到这是逃不了的命运，会悲泣几小时。而使她们更厌恶的，是男人也知道女性这一耻辱的弱点；她们盼望至少将她们屈辱的女性处境在男性面前守住秘密。但

事实不然，父亲、哥哥、表哥、堂哥，所有男人都晓得，甚至有时还开这事的玩笑。就这样，女孩心中引起或激发起对自己肉体的憎恶。虽然初潮的震惊已经过去，但每月的麻烦却留存下来；每发生一次，女孩就重新体验一次对发自自身的凝滞臭味的厌恶——一种类似沼泽，或枯萎兰花的臭味——她厌恶这暗红、暧昧的污血，它与童年时代跌伤时流出的鲜血不一样。一天到晚她必须记着换卫生带，必须留心内衣裤、被单，必须解决上千的实际而又令人讨厌的小问题。在节俭的家庭中，卫生带每月洗净，再包上干净的布巾放回去。她必须将自己身体流出的东西交给洗衣的人——洗衣妇、女佣、母亲或姐姐。杂货店出售的卫生带，是用一次就丢的。但在旅行中，访友时，或游览时，却不大容易把它们扔掉；尤其当厕所中明文规定不许将东西投入马桶时。年轻女孩在月经期间，很可能因为身上戴着卫生带，除非在黑夜里，不肯解衣；甚至连在自己姐姐面前也不肯。这一讨厌的东西，在剧烈运动时可能脱落，这比起在大街上内裤脱落更令人羞耻。这种可能的恐怖，有时会导致心理上的病症。由于自然的恶作剧，月经在不知不觉间光临，而身体的不适和疼痛常常在这之后才发作，年轻女孩的经期时常还不准确，她们无论散步、上街或访友，都冒着被偷袭的危险。她们每次坐下，就有可能沾染衣服或椅垫。有些女孩因此而处在持续不断的惊恐中。女孩对这一女性的弱点越憎恶，就越是战战兢兢，以免发生意外，让自己陷入可怕的难堪，或让别人

得知她的秘密。

利普曼医师在《青春与性》一书中，记录了年轻女孩们对此事的下列陈述：

十六岁月经初潮时，是在一个早晨。我吓得要命。实际上，我知道它迟早会来；但我对它的降临深感羞耻，以至于一上午都留在床上，别人问时，我只回答说起不来。

当我十二岁时初次来经，我吓呆了。我害怕得要死。当我母亲简单告诉我，它以后每个月都会来，我将它认作是件十分肮脏的事，并拒绝承认男人没有这种事儿。

母亲告诉了我有关月经的事。当我初次来经，兴冲冲地唤醒母亲说：“它来了！”母亲却只回答一句：“就为此大惊小怪叫醒我！”虽然感到失望，但我仍旧认为这是生命中的巨大改变。

当我初次来经，发现几分钟还血流不止，我真是吓坏了。但我没对任何人说。我当时刚满十五岁；此外，月经几乎没带给我痛苦，只有一次，我痛得昏倒在自己房间地板上，整整三小时。我依旧没告诉人。

我快满十三岁时，它第一次来临。我曾与同学们谈过此事，而非常骄傲自己变成了大人，我向体育老师强调地解释说，今天我不能参加运动，因为我身体不适。

我母亲没警告我。她自己十九岁才来经，而由于害怕被家人责备她把内衣弄脏，她出去把衣服埋在旷野中。

十八岁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月经来了，当夜流血很多，而且很厉害地抽筋。第二天早晨我向母亲哭诉，希望得到指点。她只是严厉责备我把床弄脏，没给我任何解释。我痛苦地疑惑到底我犯了什么罪。

我事先已经知道有这回事儿。我性急地等待它到来，因为我希望着母亲那时就会告诉我婴儿是如何制成的。那重要的一天终于到了，但母亲没说什么。虽然如此，我快乐地想："现在你也能制造小孩了，你已经是个妇女。"

这一关头在很年轻时就来到了；男孩一般在十五、六岁时抵达少年期，女孩则在十三、四岁时变成"女人"。然而，男

女孩这一阶段经验的基本差异，不在于年龄；也不在于女孩所经验的使她震惊的生理现象。青春期对两性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因为它预示着男女两性不同的未来。

不错，在青春期男孩也对他们的身体感到难堪，但因为自幼骄傲于生为男孩，他们于是骄傲地将这段发育时期投射在男子汉气概中。他们得意地互相展示腿上新长出的毛，认作是男子的特征；而他们的生殖器官与以前相比，更是经常作为互相比较与挑衅的东西。变为成年人是一种具有威胁性的转变：许多少年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性的“自由”感到烦恼；但他们都愉快地承担起作为男性的尊严。

相反地，小女孩为了要变成一个长大的人，必须被限制在她的性别加在她身上的规范中。男孩在自己身上逐渐长出的毛发中，高兴地看到“将来”的模糊许诺；女孩则羞惭地站在注定她命运的“野蛮而预先排好的戏剧”面前。正如阴茎从社会观点取得被尊敬的特权，月经在社会观点中，却是一种被诅咒的东西。前者象征男性，后者象征女性；正因为女性意味着“被动的我”，意味着卑劣低下，它的代表才受到这样的屈辱。在女孩的眼中，她的生活一向被某种模糊的因素决定，而这因素并不仅仅是缺少阴茎。她在双臀间流出的红潮中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如果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就会以愉快的心情接待月经的来临——“现在，你是个女人。”如果她一向拒绝接受她的身份，这一血淋淋的判决会震撼她；她极可能支持不住而跌倒。每月的污浊，令她感觉憎厌

与害怕。“原来这就是‘变成一个女人’的涵义！”到目前一直未定型地、从外界压向她的注定的命运，现在已经蹲伏在她的肚内；无法逃避，她感觉被它抓住了。

在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中，女人仅仅将月经看作她到达成年生活的特别之路。无论男人或女人的身体，都有其它的、比这更不讨人喜欢的需要而等待被照料，但这些都容易适应，因为大家都同样有这些需要，因而不代表任何人的弱点或污点。月经引起少女的憎恶，实在是因为它将她抛入一种卑下与残缺的类别中。这种丧失地位的感觉，会沉重地压在她心上。如果她没有失去做人的尊严，她对流血的身体将保持骄傲。而如果她的确能保持做人的尊严，她就能比较不敏锐地感受到肉体的屈辱。一个女孩，如果能在运动方面、社交方面、知识方面和宗教活动中超越众人，就不会将她的性特征看作一种残疾，她将能轻易地超越它。如果年轻女孩时常在这一阶段发展出一种心理病状，那是因为她在无法想象的判决带给她灰暗的命运面前，感觉到无依无助。在她眼中，她的性别就等于疾病、痛苦与死亡；而她深深地被这命运困扰。

一个显示这种焦虑的好例子，是海伦·多伊奇在《妇女心理学》描写的一个名叫莫莉的病人。下面是症状的摘要：

莫莉十四岁时开始精神不正常。她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第四个孩子。根据描述，她父亲极端严格，

心胸狭窄。每顿饭时，他总批评孩子们的外表和行为。母亲忧心忡忡而不快活；父母常常至不说话；一个哥哥离家出走。病人是个很有天赋的少女，踢跶舞跳得很好；但她胆怯，把家庭纠纷看得很严重，并且害怕男孩。她对姐姐的怀孕感到极大兴趣，知晓了详细情形，并听说女人常在生孩子时死去。她照顾婴儿两个月；当姐姐离家时，家庭又起大纠纷，母亲因而晕倒。莫莉的思想过多地涉及分离、晕倒和死亡。

根据母亲的报告，病人在数月前开始来经。她显得困窘，告诉母亲说："它来了。"她与姐姐一同去买卫生带，在街上遇到一个男人，她便垂下头。一般而论，她显得厌恶自己。她来经时从不痛苦，但总试图不让母亲知道，即使母亲看到了床单上的污迹。她对姐姐说："现在，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我可能怀孕。"姐姐告诉她："你必须先和一个男人同住，才会怀孕。"她回答说："我和两个男人同住——我爸爸，和你丈夫。"

父亲不许他的女儿们夜晚出门，因为城内有不少兵，而人们听说发生过强奸。这些恐惧更使莫莉认定男人是可怕的动物。自从她初次来经，她就被怀孕的焦虑和将死于难产的恐怖所萦绕，以致不久就拒绝离开她的房间。现在，她有时终日躺在床

上；如果出外玩，一想起离开家附近，她就浑身猛烈发抖。她醒卧床上倾耳细听，害怕有人试图破门而入；她一阵阵哭泣，做白日梦，她还写诗。她大吃大喝，以免昏倒；她害怕乘汽车，不能上学，不能过正常生活。

南希的病例与此类似，但和初次来经无关，而是涉及小女孩对自己身体内部的焦虑。

到将近十三岁，这女孩跟姐姐非常亲密，而当姐姐秘密订婚然后结婚时，她很骄傲自己能得知内情：能分享一个成年人的秘密，就等于被成年人所接受。她与姐姐同住一段时期，但当姐姐告诉她：不久将“买回”一个婴儿时，南希开始嫉妒姐夫和即将来临的婴孩。再度被象孩子般对待，听人们故意将事情说得很神秘，使她不能忍受。她开始体验到体内不适，要求将盲肠开刀取出。手术顺利成功，但在住院期间，南希一直处在极度的不安状态；她与一个她不喜欢的护士大吵大闹。她企图引诱医生，说她“知道一切”，并想法使他与她过夜——大概心里明知他不会答应，但希望他能将她作为一个成年女人而接受。她责怪自己，认为年前弟弟去世，是她的罪过。她特别一口咬定医生没将她的盲肠割去，

或者还留下一部分在她体内。她宣称她吞下了一枚铜板，目的大概在于借此叫人替她照X光。

这种对手术的渴望——尤其是割盲肠——在这一年龄段经常发生，年轻女孩用这种方式显出她们对强奸、怀孕和生产的种种幻想。她们感觉身体内部有某种模糊的威胁，而希望外科医生能将她们从等待着她们的不知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并不单单是月经的出现，向女孩宣布她作为女人的命运。其他暧昧的现象也在她身上发生。到目前为止，她的性感觉仅仅限于阴蒂。不容易调查是否手淫在男孩中比在女孩中更普遍；女婴出生后头两年就有手淫现象，甚至可能在不满一岁时就开始；满两岁后，好象就停止，过几年后又开始。虽然男人身上干净利落的阴茎，比起女人隐藏在内的粘膜区域，摸起来更诱人；但偶然的接触——小孩爬绳爬树，或骑自行车——衣服的摩擦，游戏时的接触，或者甚至游伴、大孩子、或大人的引发都时常使女孩领略到性的感觉，而使她努力尝试用自己的手重温这种感受。

无论如何，当获得这种快感时，它是一种独立的感受：具有一切儿童消遣所特有的轻松、天真的性质。女孩很少将这种私下的享受与她女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与男孩的关系，如果存在的话，基本上是出于好奇心。而现在，她突然感觉自己被混淆的感情刺穿，她简直不再认得自己。身上引

发性欲的区域具有的敏感不断发展，而这些区域是这样多，她的整个身体都可视为引发性欲的区域。这一事实，通过家人的爱抚、天真的吻以及裁缝、医生或美容师的无意接触，朋友的手在她头发上或颈背上的轻触，向她展现出来。在男女朋友的游戏打斗中，她开始领略更深更尖锐的快感。吉贝婷与普鲁斯特的扭斗，就是如此；她在母亲监视下跳舞，却在她舞伴的臂中感受奇妙的昏迷。此外，即使被紧密卫护的处女，也可能知晓别人的经验；在“有教养”的社交圈中，大家都一致地对这些值得遗憾的事件保持缄默。然而，时常有些家庭朋友、叔舅、表兄堂兄、甚至祖父、外公与父亲等的爱抚，并不象母亲想象中那样单纯，不惹人厌。一个教师、一个牧师或一个医生可能曾经大胆、不安分。关于这类经验的叙述，我们可以在一些作品中找到。斯坦贝克认为祖父和外公时常可能是危险人物。

我当时十五岁。在葬礼前一天，祖父来我们家住。次晨，我母亲起床后，他过来要求上床和我玩；我立刻起床，没回答他……从那时起，我开始怕男人。

另一年轻女孩记得八岁或十岁时，曾受过严重的惊吓。当时她的七十岁的老祖父，玩弄了她的性器官并将他的手指戳进去。那小孩感到激烈的疼痛，但不敢提起此事。从那时起，她害怕一切与性有关的事。

小女孩因为羞耻，对这类事件通常闭口不提。此外，她如果告诉她父母，他们的反应通常是责备她："别说这种话。""你真顽皮。"她对于陌生人的某些奇怪行为，也保持缄默。一个女孩对利普曼医师做了下面的陈述：

> 我们向一个补鞋匠租了一间地下室住。当我们的房东独自在家时，他常常来找我，把我抱在他怀中，长久地拥抱我，身体前后摆动。此外，他的吻并不是表面的，他将舌头放进我嘴里。他这种行为使我憎恨他。但我因为非常害怕，一字都不敢提。

除了用意不善的游伴与心理变态的朋友，还有电影院中压向小女孩的膝盖，夜车中在她腿上滑动的手，她走过时在旁边窃笑的年轻家伙，在街上尾随她的男人，还有些拥抱，那些偷偷摸摸的接触。她对这类事情的意义浑然不知。一个十五岁女孩的头脑是一团迷乱，因为她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联系不到一起。她已经感受到欲望萌发的炙热，但在她的幻想中，一个男人的吻就能使她怀孕。佛朗西斯·詹姆斯笔下的克拉拉就正是这样。克拉拉对性器官的解剖有详尽而正确的知识，但当她的舞伴拥抱她，她却将自己感受的激情，归之于偏头痛。

无疑地，现代的年轻女孩比起以前来常识丰富，但有些

心理分析家认为，还有很多少女仍然不知道性器官除了解尿外，还有其它用途。无论如何，她们看不出她们的性感觉与性器官之间有什么联系，因为她们没有男人的勃起现象，可以清楚地显示两者的关联。在她们对男人的罗曼蒂克的白日梦幻中——那就是爱，——与她们所知的某些粗野的事实之间，存在着这样大的裂痕，以致于她们无从将二者综合为一。迪德·莫妮尔在她的作品《我》中，叙述她如何与几个朋友宣誓去确定男人身体的构造，并互相报告：

> 我故意没敲门走进父亲房内，于是我做了下列报告："它看起来象只羊腿一样的袖筒；也就是说，它象个滚轴，上面又带个圆形的东西。"实在不容易说清楚。我画了一张图——事实上画了三张，每人拿去一张，缩着脖子，过一会看它一眼，直发笑，然后显出幻想的神色……象我们这样天真无知的女孩，怎么可能将这样一个东西，与感伤的歌曲、美丽的浪漫故事中所歌颂、叙述的爱情联系在一起？爱情全由尊敬、羞怯、叹息和吻手构成，爱情被升华到无性的地步！

然而，经由阅读、谈话，以及所见所闻，年轻女孩将意义加在自己肉体的骚动上；她变得动人，充满欲望。通过她的兴奋、刺激、润湿、隐约的不适，她的身体取得了崭新而

不安的一面。年轻男人公开地欢迎自己的性欲倾向，因为他高兴地担当他男性的身份，对他来说，性欲的本质是进取的、猎获的；在其中他看到对自我超越的肯定；他向友伴们夸示它，他的性器官依旧是他引以为骄傲的另一自我。那将他引向异性的冲动，正如将他投向大世界的冲劲，在这二者间他认识了自己。相反地，女孩的性活动则一向是秘密的；当她的性欲改变并侵占了她身体各部分，它的奥秘变得非常痛苦：她深受骚扰，如同患了什么可耻的疾病；它不是主动的，而是一种即使在想象中也不能由她的意志找到释放的状态。她不能梦想猎取、塑形和侵占；她的角色仅仅要她期待、渴望；她感觉到需要依赖；她在跟自己变得陌生的肉体中嗅到了危险。

这是因为她的散漫的无助，她快乐的被动之梦，向她显示了她的身体是注定被另一人当做物品的；她但愿仅仅获得独自内在的性经验；她所渴望的，是与另一个人的手与嘴的"接触"，而不是另一人的手、嘴与肉体本身。她将对象的形象留在阴影中，或任它迷失在理想之雾里。然而她阻止不住他的存在，他的纠缠。她对于男人的恐惧和厌恶变得比以前更暧昧不清，同时更令她痛苦。以前，这种恐惧和厌恶起源于她孩童身体与她成人的未来之间的深远隔阂；现在，这种感觉都出自年轻女孩在她肉体上的极其复杂的感受。她心知自己命中注定被占有，因为她渴望如此；但她又向自己的欲望抗争。她既渴望又害怕那个自愿牺牲所带有的可耻的被

动。在男人面前赤裸身体的念头使她充满兴奋；但她又觉得在他的凝视下自己会变得完全无助。那停放她身上触摸她的手，比起眼睛更具有实实在在的专横意义：她的恐慌更进了一步。然而，身体占有的最明显最可恨的象征，是男人性器官的戳入。年轻女孩恨恨地想，有人居然有能力将她代表“自我”的身体，象在皮革上穿洞一般戳穿，或象撕裂布料一样将它撕裂。但比起这种伤害和随之而来的痛苦，年轻女孩更反对的是这种伤害和痛苦必须加在她们身上。一个年轻女孩曾对我说："想到要被男人'刺穿'太可怕了。"并非对男性器官的恐惧导致对男人的恐怖；对器官的恐惧其实是对男人恐怖的象征。“戳入”的观念，在一种更笼统的意义范围中，获得了它猥亵而令人屈辱的涵义；而在这种意义中，实际的“戳入”是基本的内容。

年轻女孩的焦虑在折磨人的梦魇与纠缠人的鬼影中表达出来：当她感觉到自己心中潜在的意愿时，同时也就是她被强奸的念头困扰之时。这一念头通过许多尚未定形的形象，在梦中和在行为中表露出来。上床前，女孩探望床底，唯恐发现一个用意不善的强盗；她似乎听到屋内有贼；一个恶棍从窗口爬进来，拿着一把刀要刺她。男人多多少少使她害怕。她开始对父亲感到某种憎厌；他的香烟味变得不可忍受，她不喜欢在他之后去上厕所。即使她对他仍保留着爱，这种对身体的厌恶却常常存在；她显出绝望之色，就象她已经跟父亲产生敌对，如同对妹妹们常有的态度。精神病医生

说他们的年轻病人常做一个同样的梦：她们在幻觉中感到自己在一个默许的成年女人面前，被一个男人奸污。显然地，她们是以象征的方式，要求她们的母亲准许她们屈服于欲望。

因为，女孩心上的压迫之一就是伪善观念。年轻的女孩必须表现得“纯洁”，“天真”，而她正在自身与周围开始发现生命与性的神秘骚动。人人认为她应该洁白如云，透明如水晶，她穿着透明的薄棉纱衣，她的房间糊着纤美的壁纸，她走近时人们放低声音，人们禁止她看淫书。然而，没有一个“好女孩”不将自己放纵于“可怕”的思想与欲念中。她努力向她最好的朋友隐瞒它们，甚至对自己也隐瞒；她要仅仅根据要求去生活、去思想。她对自己的不信赖，给予她一种狡猾、不快而病态的神色；而日后，克服这些限制对她将是更为困难的事。而且，不管她如何压抑，她将感觉到在不可言状的犯罪重负下，被压得粉碎。她不仅在羞耻中，甚至在悔恨中，经历这转变成女人的过程。

我们可以了解，这一尴尬的年岁对女孩是一段痛苦的骚动时期。她不想停留在孩童阶段，但成年人的世界显得可怕而令人厌倦。如科利特·奥德丽所说：

因此，我盼望着长大，但我从未认真地想，我要去过我所见的大人们所过的生活……就这样，想长大而又不担当成人身份的愿望，一直留存在我心里，我永远无法加入父母、管家、家庭主妇、家长的群体。

年轻女孩希望能摆脱母亲的约束，但她也感觉到极端需要母亲的保护。之所以需要这一避难所，是因为有一连串压在她良心上的越轨行为，比如手淫、暧昧的友谊、以及不正当的阅读。下面是一封十五岁的女孩写的信，被采录在海伦·多伊奇的《妇女心理学》一书的第一集，很有代表性：

妈妈要我在赴W家大舞会时穿一件长衣——我的头一件长衣。我不肯，她觉得很惊奇。我求她让我最后一次穿粉红色短衣。我真感到害怕，长衣使我觉得妈妈好象要出远门，而我却不知道她的归期。听来真傻，对不对？而她有时望着我，就象我是个小女孩似的。啊，如果她知道！她会将我的手捆在床柱上，而看不起我。

在斯坦克尔的《女人的性冷感》中，有一段很好的关于一位女人的童年的叙述。她是个维也纳的女孩，在廿一岁时道出一段详细自白。它将我们分开讨论过的各种现象具体地综

合起来。下面是其摘要：

"五岁时，我选择了一个小伙伴，叫理查德，是个六、七岁的男孩……许久以来，我一直想知道人们如何辨认一个孩子是男是女。人们告诉我：看耳朵而定……看鼻子而定。这些回答似乎使我满足，虽然我觉得他们向我隐瞒了什么。突然理查德想小便……于是我想到借给他我的尿盆……当我看到他的器官，我所从未见过的器官，我欢喜到极点：'你这是什么东西？老天，这真妙！我也想要这么个东西。'于是我拿起这器官，热心地握着它……我姑婆的咳嗽惊醒了我们……而从那天起，我们的行动和游戏都被小心监视着。"

九岁时，她和两个男孩，八岁与十岁，一同玩"结婚"与"医生"的游戏。他们摸她的器官，有一天，其中一个男孩用他自己的器官碰触她的，并且告诉她，她父母在结婚时也这样。"这引起了我的愤慨：'哦，不！他们从没做过这样顽皮的事！'"她和这两个男孩，长期玩这类游戏，并保持着性接触。有一天被她姑姑发现，接着是一场可怕的吵骂，并威胁要将她送入感化院。她被禁止继续与她很喜欢的阿瑟交往，她为此深感痛苦；她的功课变坏，写字不成形，并且眼睛成为斜视。接着她另与沃尔特和

弗朗兹两男孩有了关系，“沃尔特变成了我全部思想和感情的中心。当我和他坐在桌边，假装忙着做功课时，我顺从地容许他将手伸入我的衣服内。每当我母亲……打开门，他立刻缩回手；我，当然一直忙着写字做功课……时间一长，我们也做夫妻之间的行为；但我从不让他停久；每当他以为进入了我的身体，我立刻挣脱，说有人来了……我并不认为这是‘罪恶’之事……

“我童年与男孩的友谊，现在已经完全成为过去。我所剩的全是女朋友。我与艾米最要好，她是个优雅而有良好教养的女孩。有个圣诞节，我们交换了镀金的心形项链小盒，上面刻着我们名字的缩写——我相信我们当时是十二岁——而我们视此为‘订婚’物品；我们发誓彼此永远忠实，‘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艾米给了我多方面的训练。她也教给我一些有关性的事情。早在小学五年级时，我就认真地怀疑婴儿由白鹤带来世间的传说。我认为小孩生长在人体中，而临产时，由解剖肚子的方法生出来。她灌输给我对手淫的恐怖。在学校里，《圣经》也帮助我们对性的事睁开了眼睛。比如，当玛莉去找伊利沙白时，据说胎儿，‘在她子宫中跳了跳’；而我们又读到其他类似的醒目段落。我们在这些字句下面划线，而当老师发现后，全班同学的操行几乎

都被列入黑名单。我的女友还告诉我，席勒的作品中提到过‘九个月满期’之事……艾米的父亲搬家离开了我们的住宅区，于是我又形单影只。我们彼此通信，采用我们自己创造的神秘字母；但我深感寂寞，终于又交上一个犹太女孩，名叫海达。一次，艾米撞见我和海达一起离校，她因为吃醋而大吵大闹了一番。……我与海达继续做朋友，直到我进入商校，我们变成了密友。我们梦想着成为亲戚，因为我喜欢她的一个哥哥。他是个学生。每当他与我说话，我总迷乱得不能给他有条有理的回答。黄昏时我们坐在音乐室中，一同挤坐在小长凳上，听着他弹钢琴，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流下眼泪。

“在我与海达结为朋友之前，有好几个星期，我和一个名叫艾拉的穷人家的女孩子一同上学。有一次，她听见她父母正在发出某种声音。是床的叽咔声把她弄醒的……她来告诉我，她父亲爬在她母亲身上，接着母亲可怕地叫出声来；于是父亲对母亲说：‘赶快去洗掉，免得出事儿！’从那以后，我对她父亲感到愤怒，并避免在街上与他碰面；同时对她母亲则感到最深的同情。（她既然那样叫出来，他一定害她痛得要命！）

“我又和另一个女孩讨论男人性器官可能有多长；我曾听说它大约有十二至十五厘米长。在学校

上自习课时，我们拿起软尺，将这长度量在我们肚子上，居然达到肚脐。这真把我们吓坏了；如果我们真的结婚的话，岂不真的要被刺穿！”

她见到一只雄狗由于一只雌狗的接近而性欲亢奋，于是感到自己体内有奇怪的骚动。“如果我看见一匹马在路上小便，我总目不转睛地盯着地上的湿处。我相信是小便时间之久，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她守望苍蝇交配，并在乡村守望家畜交配。

“十二岁时，我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叫来了一位友善的医生。他在我床上坐下，将手伸入被窝内，几乎触到我的性器官。我大叫：‘别乱来！’母亲跑进房来；医生十分尴尬。他宣称我是只小坏猴，说他只是想拧拧我的小腿。我被迫请他原谅我……当我终于开始来经时，有一次我父亲看到了充满血迹的布巾，他大发脾气。为什么他这么一个干净的人，却必须与如此肮脏的女人们生活在一起？……我感到因月经而被指责，实在太不公平。”

十五岁时，她又与另一个女孩用自造的文字通信，“这样就没人能读懂我们的书信。那时我们有许多事互相报道。她抄给我许多录自厕所墙壁的对句和片语；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之一。我觉得我一向在幻想中认为至高的爱情，被它拖入了污泥之中。那对句是：‘什么是爱情的最高目标？一根茎上的四片屁

股。'我决心绝不落入这种地步；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孩，绝不可能向她要求这样一件事。

"十五岁半时，我有了一个新弟弟。我嫉妒极了，因为我一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我的朋友提醒我观察'男婴是怎样构造的'，但无论我存着怎样的好奇心，也无法提供她想知道的消息……我简直没法向那方向看。大约在同一时期，另一个女孩向我描述新婚之夜的情景……我想大概就在那时我决定到底还是结婚，因为我变得非常好奇。她的描写中，仅有"喘气如马"一句，触动了我的美感……我们女孩谁不愿结婚，然后在所爱的丈夫面前脱衣，被他抱上床？想来真令人兴奋！"

人们可能抗议——虽然这实例是"正常"，而非"病态"——认为这孩子例外地"邪恶"；其实，她只是比别的孩子受到较少的监督而已。如果所谓"有教养"的女孩的好奇和欲望没有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它们会借着幻想和游戏的形式存在。我曾认识一个年轻女孩，非常虔诚，而且令人困窘地天真无知——后来她成了个道地的妇人，充满母性与忠诚——有一夜，她兴奋地颤抖着，对姐姐说："在一个男人面前脱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让我假设你是我丈夫。"于是她脱去衣服，激动得发抖。没有任何教育能阻遏小女孩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幻想自己的命运。别人最多能将严格的

压抑加在她身上，而这日后将成为她性生活的沉重负担。相反地，最好的方法是教导她，使她能够不经自我满足、不感觉羞耻地接受自己。

现在我们了解了少女在青春期所忍受的戏剧性的冲突：她无法不接受她的“女性”就变为成年人；而她已知她的性别判决她必须去过残缺而固定的一生。在目前，借着每月的污秽、不适以及一种模糊的罪感，她已经窥见了这一生。早先，她的自卑仅仅源于一种被剥夺的感觉，但现在，阴茎的缺乏变成了一种玷污与犯罪。就这样，负着伤，带着羞辱和惩罚，她走向未来。

第二章　少女时代

虽然小女孩整个童年时代的行动都受到限制和剥夺，她却依然觉得自己是个自主的人。在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上，在学校作业和游戏中，她都象个超然的存在（a transcendent being）；她未来的被动性还只是个梦。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这“未来”不仅逼近，甚至驻扎安顿在她的体内；未来变成了具体的现实。它保持着始终具有的命定性格。当青春期男孩主动地走向成年，少女却静候着这一崭新而不可预知时期的展开，从此以后，其情节是编排定了的，时间裹挟着她向它走去。她已告别她天真烂漫的过去，而“现在”似乎只是个过渡时期；它不包含任何切实有效的目标，仅仅是对时间的占有。她的青春，在或多或少的伪装下，消耗于等待之中。她正等待着男人。

少男无疑也梦想着女人，他渴望她；不过她永远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她并不能概括他的命运。但是女孩从童年起，无论她想要拘守于还是超出于女性的界限，都指望通过

男性来得以实现和逃脱。他显现出伯修斯或圣乔治那种光彩夺目的面貌；他是救主，他有钱有势，他掌握着幸福的钥匙，他是迷人的王子。她以为在他的爱抚下，她将感觉到自己就象安憩在母亲的胸怀一样，被生命的巨潮席卷前去；对他温和的权威的屈服，使她将重新发现那为父亲怀抱着时所曾有的安全；拥抱与眼神的魔力，会再度把她石化成一尊偶像。她一向相信男性的优越；这种男性的威望并非孩子气的错觉，而是具有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的确，男人是世界的主人。一切都在告诉年轻的姑娘，之所以需要变成他们的臣民奴仆，正是为了她自己的最高利益：父母如是怂恿她；父亲骄傲于女儿的成功，母亲在其中看到如花似锦的未来；朋友们嫉妒最受男人注意的那个女孩；在美国大学中，女生的社会地位是以约会的数目来衡量的。

婚姻不仅是一项光荣的事业，并且比起其它许多事务来，更少烦累；唯有它，才容许一个女人完整地保持其社会尊严，同时以被爱者和母亲的身份获得性方面的满足。这就是她周围的人对她未来的设想，也是她本人的设想。大家都一致同意找丈夫——或在某些情况下，找"保护人"——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她眼中男人是另一自我（Other）的化身，就象她自己是男人的另一自我一样。但这另一自我对她来说似乎是基本的、实质性的，而根据他那方面，她则把自己看成非基本、非实质性的。她要将自己从父母的家，从母亲的掌握中解放出来，她要开启自己的未来，但是她被

动而温顺地将自己献人一个新主人之手，没有采取主动的征服方式。

人们常说，如果她乖乖地这样屈从，就表明她在物质和道德上逊于男孩，无法与他们相匹敌；于是她放弃毫无希望的竞争，而让优胜种族中的一员来确保她的幸福。但事实上，她的屈从并不是来自什么先天的的低劣：相反，是屈从导致了她的全部缺欠。屈从起源于少女过去，她周围的社会，特别是起源于预先安排给她的“未来”。

的确，青春期改变了少女的身体。它比从前脆弱，功能精微的女性器官易受损伤；她那陌生而麻烦的乳房是种负担，在剧烈运动时总是痛苦地上下颤动，以提醒她它们的存在。从此以后，她的臂力、耐力与敏捷均将低于男人。她的荷尔蒙的不均衡，造成了神经上和血管上的不稳定。月经是痛苦的：头痛、疲惫、腹痛，使日常活动变得令人沮丧，难以忍受；心理故障常常发生；神经质而易怒，一个女人可能暂时陷入半精神错乱状态；神经中枢对末梢系统和交感系统不再能完全控制；循环上的困难与某种自体中毒使身体变得如一面介于女人与世界之间的屏障，如一团火一般的雾笼罩着她，使她窒息，使她死亡。整个宇宙，经由这一团抱怨的、被动的肉体来体认，似乎成为一个沉重得不堪承受的负担。负着过重的担子，被淹没着，她对她自己成为陌生人，因为她对这世界的其余一切变得陌生。综合的组构变得七零八落了，时间的片刻瞬间不再能贯接，能够认清周围的人，但变

得心不在焉；而如果象在忧郁症中那样，推理能力和逻辑保持完整，则它们就会被有机体错乱状态引起的种种感情现象所支配。这些事实都是相当重要的；但给予其份量的，是女人对它们所持的态度。

大约在十三岁的时候，男孩子们经历了一场货真价实的暴力演习，他们的侵略性、强权意志、竞争嗜好都得到发展；而就在这同一时期，女孩放弃了粗野的游戏。运动仍是许可的，但运动是专门化的，必须服从人为的规条，绝不等于无所顾忌的较力。它顶多只算得上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象一场痛痛快快的打斗或一时兴起的攀登那样，能够提供有关世界和自我的信息。女运动员永远无法感受到一个男孩揪住肩膀，将他对手按倒在地时的那种征服了的骄傲。此外，在许多国家里，大多数女孩不怎么爱好运动；既然扭打与登攀是被禁止的，她们就不得不以消极被动的方式忍受一切；比起年幼时她们受着更多的限定，必须循规蹈矩，不超越他人：她们不许探索、冒险，不许扩展可能性的界限。特别是对青年男子们来说最为重要的竞争态度，她们几乎全然不知。当然，女人之间也互相比较，但竞争与挑战完全不同于这类消极的比较：两个自由的人互相对抗，象是要扩大把持世界的权柄；比同伴爬得高，将对方手臂扳倒，就几近乎统治了世界。这种专横的行为对女孩子是不适合的，尤其当它牵扯到暴力的时候。

不错，在成人世界中，正常时局下暴力占不了多大位置；

然而它缠绕着这个世界，许多种男性行为起源于潜在的暴力：每个街角都有争执、吵架的威胁，它们常常被引燃触发；但对一个男人来说，如果感觉到自己抓牢了自我肯定的意志，就足以保证自己的统治权了。遇到任何侮辱，任何想将他贬低为客体的企图，男人都借助于双拳，将自己置身于打击之下：他不许自己落于人后，他是他自我的中心。暴力是一个人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的热情和意志的真凭实据；对于这意志的根本否定，就是使自己拒绝接受任何客观真理，从而将自己禁闭于一种抽象的主观性中；不能输入于肌肉中的愤怒与反叛则留存为想象力的虚构。不能将自己的感情显现于世界表面，实在是件令人十分灰心丧气的事。

在美国南方，黑人绝对不能对白人使用暴力；这一规则便是神秘的“黑色灵魂”的关键。黑人在白人世界里的感受，他为适应环境而采取的行为，他所寻求的补偿，他的感觉与行动的整个方式，都要根据他被判定的“被动性”来加以解释。在法国被占领时期，一些即便遇到挑衅也下决心不使用暴力抗击占领军的人（不论是因为出于自私的谨慎，还是因为他们有要紧的工作等待完成），发觉他们在世上的地位有极大的改变：别人可以任意决定是否将他们变成“物”；他们的自我再也无法具体表现，因为他们变成了低一级的东西。

同样，对于一个获许专注于表现自我存在的少男，与一个怀着不切实际的空幻感情的少女，宇宙景象是不同的。前者不断向世界发出疑问；他能随时起来反抗它；所以他觉得

当他接受它时，是他能动地批准了它。后者则简单地屈服；对世界的解释与她无关，对她来说世界的景象是恒定不变的。这种自然权力的匮乏导致了更普遍的胆怯：她对不曾在体内经验的力量没有信心；她不敢进取、反叛、发明；注定了要驯顺、屈从，她在社会中仅能取得预先为她安排好的位置。她把现状看成是固定的。

一个女人告诉我，她年轻时，虽然深知自己体力差，却一直坚决否认这事实；因为一旦承认了它，就会失去从事学术与政治方面任何工作的热情和勇气。我认识一个少女，从小受男孩式的教育，非常健壮，自以为与男人一样强健；她很漂亮，又有讨厌的月经来定期折磨，但她对自己之为女性却毫无意识；她有男孩的迟钝、活力充沛与积极主动，还有男孩的鲁莽，见到孩子或妇女在街上受到欺辱，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打架。但吃了一两次亏后，她明白了蛮力是男人占上风。当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有多么软弱，她的自信心便丧失殆尽了；这使她承认被动性，接受依靠，开始向“女性”演化。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就等于失去了自信。只要看看骄傲的小伙子们对自己一身肌肉的看重，一个人就能明白每个主体把身体看作是自我的真实客观表现这一情形。

年轻男人的性冲动只肯定了他对自己身体的骄傲：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超越与力量的征象。年轻姑娘可能会毫无困难地承认自己渴望性爱这一事实，但通常总附带着一种羞耻感。她的全身都使她窘迫。年幼时对自己“内在器官”的

不信任，促使她对月经抱着半信半疑的暧昧态度，从而厌恶它。就因为她受月经之累而引起的那种心理状况，使月经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少女在经期感到的威胁有时会令人极端难以忍受，以致于她愿意放弃旅行和其他娱乐，以免她的羞耻被人知道。由此引起的恐怖影响遍及她的机体构造，加剧了她的经痛。我们提过，女性的心理特征之一是内分泌液与神经调节之间的紧密关系：其中存在着交互作用。女人的身体——特别是少女的身体——是“歇斯底里”的，也就是说，在心理生活与生理现象之间，没有什么距离。青春期身体内部的紊乱，被少女因此感受到的心烦意乱而加剧了。因为她疑虑自己的身体，以惊慌的眼光看待它，她的身体显得有病：它也就真的病了。我们已经清楚，这身体事实上是脆弱的，而且体内确实发生了机体紊乱。然而妇科医生们一致认为，他们的病人中十分之九是自以为有病者；这就是说，她们的病或者根本缺乏生理依据，或者是由心理状态引发的：是心理病症。对于身为女人的焦虑，是摧残女性身体的重要因素。

显然，如果女人的生理情况说得上是种障碍，那就要归因于她总的处境。只要没病，神经和血管的不安定不会妨碍她从事任何职业；男人之间的气质性情也互有差异。每月有那么一两天不适，即便难受些，也说不上碍事；事实上许多女人都适应了它，尤其是那些本来对每月一次的倒霉最容易感到烦恼的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妇女，如运动员、旅行家、舞

蹈家。多数职业所需要的体力都是妇女力所能及的。而在体育界，夺魁与其说与身体条件无关，勿宁说是在各种身体类型限制下达到的完美：轻量级的拳击冠军，毫不亚于重量级冠军；女滑雪冠军，并不比快于她的男滑雪冠军逊色：她们乃是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别。因为对自己的项目深感兴趣，恰恰是女运动员在与男性相较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累赘。不错，女性身体的弱点不允许她尝试暴力；但如果她能通过身体呈现出自我，以其它一些方式面对世界，那么这缺陷就能轻易得到补偿。倘若要求她游泳、登山、驾驶飞机、搏击风雨、冒险、游历，则她在世界面前就不会感到我所提及的那种胆怯。在没处发泄的情况下，她通过间接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对儿童时代就产生了的自卑感的肯定，使自己身体中的诸特异点突出重要起来。

这自卑感进一步会严重影响她在学术上的成就。人们常说，女孩自青春期后在学术和艺术领域中就不会再有出息了。原因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少女不仅不能象她兄弟那样得到社会上的鼓励，恰恰相反，人人都期望她不光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人”，还要成为一个女人；而她除了职业方面的努力外，还不得不担负起作为女性所不言而喻的一些责任。关于这一内容，一位职业学校的负责人有如下陈述：

这个少女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靠工作来赚钱谋生的人。她新产生的念头不再与家人有关了。她经常

要非常辛勤地工作……晚上回到家已累得半死，脑子塞满了白天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家里人又将如何对待她呢？母亲差她跑腿做件事，一些家务活留着等她干，还有她自己的衣服要收拾。无法摆脱那些不住地纠缠着她的隐秘思绪。将自己的处境与不担负任何家庭责任的兄弟的处境相比，她感觉不快活，遂起了反叛的念头。

母亲们毫不犹豫地将家庭杂务和其它累人的活硬压在女学生女学徒肩上，最终使她们劳累过度。战争期间我亲眼看到我班上的学生为学业之外的家务重担所累倒，结果一个得了脊椎病，另一个患了脑膜炎。我们将谈到，母亲内心里对女儿的解放充满了敌意，她对女儿的责骂，多少是成心的。而男孩想成为男人的努力却受到尊重，他还可以享有许多自由。女孩则必须呆在家里，出人行迹受到监视；人们不鼓励她自寻欢娱。我们很少看见女人自行组织起长途远足或进行徒步的、骑车的旅行游览，也见不到她们热心于台球或滚木球这类游戏。

不光所受的教育造成女人缺乏主动性，习俗也使她们难以得到独立。如果在街上游逛，她们会被人盯视，有人还可能上前搭讪。我认识一些少女，她们毫不胆怯，却不喜欢独自在巴黎街头散步，因为她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纠缠，以致于必须随时有所戒备，以防被扰，而这败坏了她们的兴

致。如果女学生们象男孩一样成群笑闹着穿街过巷，则要惹得众目睽睽；跨着大步，一边走一边唱歌、高谈，或者大笑、吃苹果，都会被看成是轻佻行为；这样做，难免被侮辱，或有人跟踪、搭话。无拘无束的欢乐是不规矩的；强加于女人的自我控制行为，扼杀了她们自发自然的本性，而成为所谓“有教养少女”的第二天性；她的充沛活力被窒息。结果是紧张、厌倦。

这厌倦是有传染性的：少女们很快就互相厌倦，在囚牢一般的环境中她们并不为共同利益而团结一致；这是她们之所以离不开男孩陪伴的原因之一。这种不能自我满足的特性，产生出贯串她们一生，甚至在她们工作中都打下烙印的“胆怯”。她们相信只有男人才能获得了不起的成功，不敢把自己的目标悬得太高。我们看到十四岁的小姑娘，在将自己跟男孩进行比较后，断定“男孩更好些”。这是一种丧气的信念。它导致懒惰与平庸。一个对男性并不特别看重的少女，责备一个男人没胆量；当人家指出她自己也是个胆小鬼时，她得意洋洋地回答道：“哦，女人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种失败主义的根本症结，在于少女不认为她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她的命运最终不是依靠她本人的努力，因此她明白多方面地要求自己是徒劳的。因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低下（inferiority），并接受了有关她低下的观念，所以，她交托给男人的远不是她的全部，而是自己的低劣性，她坚信不

移地确立起有关她低劣的“真理”。

事实上，她不是通过提高自己作为人的价值，从而在男人眼里抬高身价，而是通过模仿男人的梦想。当她还天真幼稚的时候，她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可能象男孩一样地具有侵略性，她可能试着以粗暴的权威和骄傲的坦率来征服他们，但是这种作法几乎必定导致失败。所有女孩子，从最低三下四到最高傲的，总有一天会明白过来，要想讨人喜欢，必须先退让。母亲叮嘱她们，不许再把男孩子看成是平等的伙伴，不许进攻，必须扮演被动的角色。如果她们想建立一段友谊或调一次情，就必须小心不要采取主动。男人们不喜欢假小子、女学者，或聪明绝顶的女人；太多的胆量、教养、知识，太有性格，都会吓坏他们。如乔治·艾略特所说，在大部分小说中，结尾总是没有什么脑筋的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的女主角击败了较有男性气质的浅黑肤色女人。在《弗洛斯河上的磨房》一书中，玛吉徒然地尝试完全改变自己的角色，但她终于丧生，金发碧眼的露西嫁给了斯蒂芬。在《最后的莫西干人》中，赢得男主角心的，不是勇敢的克拉拉，而是缺乏生气的爱丽丝。在《小妇人》中，可爱的乔只是劳丽童年的伙伴；他的爱情则保留给了枯燥乏味的艾米和她漂亮的卷发。

所谓女性化就是显得脆弱、无用、驯顺。人们认为少女不光要修饰打扮，将自己收拾妥当，她还应抑制自发天然性，以长辈传授的做作的优雅妩媚来取而代之。任何自我表露都

将减少她的女性特征和诱人之处。比较起来，年轻男人的生命行程容易许多，因为在他“做人”与“做男人”两个使命之间，没有什么矛盾。这一优势甚至在童年时期就显露出来了。透过独立自由的自我表白，他同时获得了社会价值和男性威望：他象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一样，是个有野心的男人，财富、声望、女人，都是他想要的；促使他努力的榜样之一，是受女人崇拜的显赫势要的男人。

相反，对一个少女来说，在“做一个真实的人”与“做女人”这两种职份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女人的青春期是一个如此艰难而又有着决定意义的时期。在此以前她一直是个自主的人，现在她却必须放弃自己的主权。她不仅同她兄弟一样，甚至更加痛苦地被分裂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另外还发生了别的冲突：一方面，与生俱来的权利允许她成为主动、自由，充满活力的存在；另一方面，她的性欲和社会压力却将她塑成被动的客体。她的自然倾向是将自己看作本质的，她怎么能下决心去变成一个非本质者？但是，如果我只能以另一自我的身份完成我的命运，我将如何放弃掉我的自我？这就是未成年女性必须在其中挣扎的痛苦境地。在欲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之间徬徨无依，她所需要的逐渐变得萎缩起来，她徘徊不决于童年的独立与妇女的屈从这两截时期之间。置身于如此难堪的年龄，这种犹豫不定使她仿佛一颗依然泛青的果实，味道又苦又涩。

根据早年的倾向，少女对此处境会产生不同的反应。那

些“小母亲”型的未婚女子，能够轻易接受她的蜕变。但是她在扮演“小母亲”的过程中，也许养成了对权威的爱好，致使她抗拒男性加给她的枷锁：她准备组织一个母权家庭，不让自己沦为仆佣和性欲的发泄对象。姐妹中较年长的常常变成这一类型，因为她们还在年幼时就担负起很重的责任。“假小子”在发觉自己是女人时，有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受骗感，她可能因此成为同性恋者。不管怎样，她在独立与暴力中追寻的，是对世界的占有：一般说来，她不可能希望放弃她作为女性的权力、做母亲的经验及她命运的全部。虽然总有些抵触，但少女通常都会接受她的女性身分；从在父亲面前和在与性爱有关的幻想中她那些孩子气的撒娇上，她已经体验到被动的诱人之处，她知道了它的力度，虚荣心马上就和她肉体所产生的羞耻心搅在一起。挑动她感情的她那只手、那副面孔，是一种呼吁，一种祈祷；她的身体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它是财宝，是武器，她感到骄傲。她那在无拘无束的儿童时代已经消歇的撒娇、卖弄风情，又重新焕发出来。她试用各种化妆品，研究头发的不同做法；她不再掩饰乳房，反而摩挲它们，使之长得丰满，她在镜子里端详自己的笑靥。

性感觉与引诱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所有对性的感觉麻痹迟钝的实例中，我们观察到她也没有想取悦于人的欲望。实验已经表明，甲状腺有缺陷的病人——感情冷漠、脾气乖拗——可用腺液注射的方式改变个性：他们开始微

笑，快活无比，并且饶有风度。具有唯物哲学观的心理学家们，曾大胆宣布卖弄风情是甲状腺分泌出的“本能”；但这可疑的解释，无论就该阶段还是就早些的童年而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在所有机能有缺陷的实例中，譬如贫血，整个身体变成一种负担，它象个含有敌意的陌生人，既不希望也不允诺任何事情。但当它恢复了平衡与活力，其主人则立刻认为己有，并凭借它追寻对别人的超越。

对少女来说，性的超越在于为了达到她的目的，必须先成为牺牲品。她变成客体，她视自己为客体，她惊奇地发现自己这新的一面：她觉得好象变成了双重的人；现在她不再完全与自我相吻合，而是开始存在于自我之外。于是，在罗莎蒙德·莱曼的《邀舞》中，我们看到奥莉薇亚在镜子里发现一个不相识的人物：那就是客体化的她突然间与她的自我对质。这引起了一种短暂，却是令人迷惘的感情：

> 近来，每当面对镜子就泛起一种古怪的感情：一个稀奇的陌生人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一个新的自我。
>
> 同样的情形已发生过两三次了……她望着镜子看着自己……啊，怎么回事？……这不是她自己。这是一张神秘的脸，闪动着幽黑的光亮，披散开的头发被前后推弄着，仿佛卷入了能量巨大的狂潮之中。是身上衣服作的手脚吗？她觉得她身体里面象

是和谐地组织起来，变得既紧凑集中，又扩展弥漫，既静止又流动，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是幅着粉红色衣装的少女肖像。室内一切被反射到镜中的物体都在里面框架着她，呈现着她，低声细语：这就是你……

使奥莉薇亚惊愕的，是她以为在这影像中所看到的许诺。在这影像中她认出了自己童年的梦想，而它居然就是她自己。少女还爱上了这实实在在的肉体，它就象旁人的肉体一样，使她迷恋。她爱抚自己，亲吻自己滚圆的肩膀、臂弯，她凝视自己胸脯、双腿；她借口自我愉悦而做白日梦，在其中寻求热情的自我占有。青春期时，在自我爱恋与使她成为被占有对象的性冲动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她的自恋通常在性成熟时就消失了。但女人并不象自我把玩一样就此再变成情人的玩物，在她的性欲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混乱。在一种复杂的冲动之下，她渴望着凭借此身体所注定要归属的男性的尊崇，而荣耀自己的身体；如果说她是为了想迷住人才爱漂亮，或者说她想吸引人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美貌，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在她闺房的孤寂中，或她在客厅里设法吸引男人时，对男人的欲念与对自我的爱恋在她是分不清楚的。这种混乱在玛丽·巴斯克赛尔身体上体现出来。我们已经知道她很迟才断奶，这使她比别的孩子更希望被人照顾、重视。从五岁起一直到青春期结束，她都一心爱着自己

的影像。她狂热地爱恋自己的手、脸和优雅风度。她写道："我是自己心目中的女主角。"她想当一个女歌手，好让目眩神迷的观众凝视，这样她就能以骄傲的面孔回视他们；不过这种"自我中心"是以浪漫的梦幻方式表达出来的。从十二岁起她就在恋爱：就是说，她想要被人爱，而在她渴望引起的爱慕中，她只寻求那些她自我爱恋的印证。她恋爱着从未和她交谈过的H公爵，梦想他投身于她的脚边："你将眩目于我的光彩，并且爱上我……只有我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你。"《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的娜塔莎，也有同样的矛盾心理：

> 那天早晨她又回到了她所喜爱的心境——对自己的喜悦与爱慕。"娜塔莎是多么迷人啊！"她又说，仿佛出自那么一个局外的、笼统的男人之口。"漂亮，声音悦耳，年轻；并且只要人们不找她的麻烦，她从不碍人的事。"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在中篇小说《序曲》中描写了一段故事，其中自恋狂和对女人命运的浪漫欲求，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

> 在餐厅，贝丽尔坐在壁炉边的膝垫上弹着吉它，木柴燃起的炉火摇曳闪烁……她一边对自己弹唱，一边还自我欣赏着。炉火照亮了她的鞋子，照

亮了吉它的红色琴箱，以及她白皙的手指……

“如果我在窗外望里看，看见自己，我一定会心旌摇荡，”她想道。她更柔和地弹弄曲子——不再唱，只静静地听。

……“我第一次见到你，小姑娘——哦，你连想都没想到还有别人在场——你坐着，小脚搁在膝垫上，在弹吉它。天哪，我永远也忘不了……”贝丽尔仰起头，又开始唱道：

连月亮也倦了……

传来重重的一下敲门声。女仆的红脸探了进来。……哦，不，她不能忍受这个傻女仆。她跑进幽暗的客厅开始踱来踱去……哦，她焦躁不安，焦躁不安。壁炉上端有一面镜子。她用两臂撑着，望着自己淡淡的阴影。她看上去多么美啊，但没有人看她，没有人……

贝丽尔微微一笑，她的微笑实在是可爱动人，她又笑了……

这种自我崇拜并不仅表现在少女对自己肉体的爱慕，她希望占有并敬重她的整个自我。那些私人日记就是为的这一目的，她可以在日记中无拘无束地倾吐自己的心灵。玛利•巴士科茨的日记很有名，可算是个典型。女孩子跟她的小笔记本交谈，就象她过去和洋娃娃说话似的；它是朋友，是知

己，她问它问题，仿佛它是个活生生的人。那一页页纸上铭记下瞒着亲戚、朋友、师长们的真理，这一真理使作者在孤寂中感受到至上的喜悦。一个十二岁女孩，记日记直到二十岁，写下了下面几句扉页题词：

我是你的小本子
干净漂亮又知礼
你的秘密告诉我
我是你的小本子

又有些少女留下注言："我死后方可翻阅"或"死后烧毁"。青春期之前女孩就有的秘密感，如今变得更加强烈了。她将自己裹在冰冷的幽寂中；她不向周围的人表露她所认为是真实自我而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虚幻人物的隐秘自我（the hidden ego）。她可能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那样装扮成一个舞蹈者；或者如玛丽亚·勒尼如般装成一个圣女；或仅仅扮演那个最了不起的自己。在这个女角色与这一亲友熟知的客观本人之间，始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她一心认为没有人理解她，她与自己的关系因此而更趋热烈：她迷醉于自己的孤独，她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等，无与伦比；她向自己保证，她的未来将会对现在平庸的生活进行报复。她从毫无价值的狭隘生活中，躲进梦想幻觉里去。她一向喜爱梦想，而现在比以往更甚；她用富于诗意的陈腔滥调来掩饰那令人

恐怖的宇宙，她把男人理想化成月夜的光辉、淡红的云彩、以及天鹅绒似的夜晚；她把自己身体视为大理石、碧玉、珍珠母修建装点的神殿；她讲给自己听荒唐的神仙故事。她之屡屡陷人这种愚蠢，是因为她把握不住这世界；假使她必须行动，她就不得不认清现实，然而她尚可在迷雾中等待。小伙子也做梦：特别是梦见自己的冒险经历。少女喜欢绮美的事物，胜过喜欢冒险，她在各种人和事物上都洒下一层摇曳的神奇光彩。这神奇(Magic)涉及到一种消极的力量。因为少女命中注定要变得消极被动，而她却又渴求权力，因此她必须相信神奇的魔力：相信自己身体有魔力，能使男人束手就范；相信自己整个命运中有魔力，使她不费举手之劳，就能成就一切愿望。至于真实的世界，她则试着忘掉它。

“在学校，我有时会对老师的讲课走了神，振翅飞入梦想的国度……”一个少女写道。“我陶醉于愉快的幻想中，以致完全失去了现实感。我一动不动地呆坐在座位上，当我从发楞中醒过来，我会吃惊地发现自己被囚禁于四面环墙之中。”

“我比写诗更喜欢胡思乱想，”另一个少女承认说，“喜欢去瞎想一些无头无尾的美妙故事，喜欢凝望着星光下的群山编出一个神奇故事。它之所以更使人愉快，是因为它比较模糊，给人一种宁静清新之感。”

做白日梦可能会引起辖制人一生的病态，如下列实例所示：

玛丽亚·B.，一个聪明而好幻想的孩子，在十四岁进入青春期时，出现了“夸大妄想”（delusions of grandeur）的心理病症。她声称自己是西班牙皇后，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唱歌，发号施令。有两年，她每到经期就如是发作；然后连续八年她正常地生活，只是依旧多梦、好幻想，并且抱怨自己的社会地位。将近二十三岁时，她的病开始恶化，一度住进医院。出院后，她一连三年躺在家里，脾气乖戾，懒惰，成为家庭的负担。终于再度被送入疗养院，而这一次是永久性的了。她对生活毫无兴趣，但每隔一段时间（经期？）她会下床来，随便披上衣服，做出傲慢的架势，并时时对医生露出淫荡的讥笑。她更深地沉涵于梦幻世界，毫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常常赤身裸体，却佩戴着古怪的饰物，象一个锡箔制的冠冕和一些缎带作成的手镯。时而她对自己的病情作出清晰的判断，说自己象个跟洋娃娃玩或盛装打扮自己的小孩，好象生活在梦中，是一个幻想世界里的女演员。她说，她好象同时过着好几种生活，在这些生活中，她自己是主要人物。她有一栋大房子，她在里面举办宴会。她活在原始穴

居人的时代。她有无数同床共眠过的伴侣。她从前有过朋友，有花有香水有貂皮大衣，他们送给她贵重的礼物。“当我在被子里赤裸着身体，我总是想起往日的时光。”她在镜子里欣赏自己，想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卖俊，吸毒，交情人。她说她是其中一个医生的情妇。她告诉人她有好几个小孩，其中一个到处旅行，这孩子的父亲长得极帅。她有许多这类的故事要讲，全是她在幻想中虚构的。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病态地做白日梦，是为了减弱感觉到生命不充实而又害怕面对现实生活的少女自恋狂。玛丽亚·B.只是将许多青春期女孩所常有的补偿过程，发展到了极限。

然而，对于少女来说，这种孤独的自我崇拜是不够的。为了得到满足，她需要生存在另一个人的意识中，她于是常常转向同伴，以寻求帮助和安慰。当她年龄尚小的时候，她最好的朋友帮着她逃开母亲的控制，去探寻世界——特别是性的世界。现在，她的朋友既是个将她引出自我之隅的客体，又是将这自我归还与她的证人。有些女孩互相展示自己的裸体，比较各自的胸脯：我们也许还记得《穿制服的少女》中描写寄宿学校女生这种大胆取乐的情景，她们甚至于互相爱抚平常的或细微的部位。如珂利特在《可劳婷在学校》中所表现的，以及罗莎蒙德·莱曼在《模棱两可的答复》中婉转表

达出来的那样，几乎所有的少女都有同性恋的意向，而这一意向与自恋的快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在另一人身上渴望着自己皮肤的柔嫩，线条的优美；反之亦然，在她的自恋中，蕴含着她对全体女性的崇拜。男人在性方面是自主(Subject)的，所以男人们通常各怀欲望追求异于自己的对象，是这欲望驱使男人们互相分离开来。而女人是欲望的绝对受体(object)，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学、大学、以及艺术家的工作室中，盛行着那么多"特殊的友情"的原因。它们之中有些是纯粹精神上的情谊，有些却完全是肉体的亲近。前者显著的迹象是，朋友们互相敞开心扉，交谈知心话；而最能证明其感情诚挚的，是向选定的朋友交出自己的私人日记。女朋友们在表达彼此钟情爱慕的时候，一般不采取具有性爱色彩的拥抱，而是经常以委婉的方式互赠有形的纪念品。因此，娜塔莎用一把烧红的尺子灼伤自己手臂，来证明她对索妮亚的爱。特别是她们给对方起了许多亲昵的名字，还写一些热情洋溢的信。譬如下面一封，是美国新英格兰一位清教徒式的年轻女性艾米莉·狄更森写给她一个朋友，一位年轻太太的：

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念你，昨夜我梦见你了。……我梦见和你一起在一个异常美丽的花园散步，我帮你摘玫瑰，尽管我们拼命采撷，花篮却怎么也装不满。于是今天一整天我祈祷着能和你一起散

步，再去采玫瑰花。夜幕降临，我感到愉快，我不耐烦地计算着时间，期待着黑暗，期待着再梦见你和玫瑰，还有那只永远满不了的花篮。

在《少女的心》中，作者曼杜斯引用了许多同样内容的信：

亲爱的苏珊……我真想在此抄录圣经雅歌中的诗章：你多美啊，我亲爱的，你是多么美啊！象那神秘的新娘，你在我眼中是沙仑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象她一样，你在我心中胜过任何普通的女孩；你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切美好高尚的品格……为此，纯洁的苏珊，我以一种虔诚、无私的爱，深深地爱着你。

为曼杜斯所征引的另一女孩，在日记中记下了略欠高尚的情愫：

我在那儿，腰肢被她那白皙的小手按住，一只手搭在她圆润的肩上，我的胳膊触着她温暖的裸臂，她将我搂向她柔软的胸脯，她那漂亮的嘴就在我眼前，双唇微启，露出细小的牙齿……我颤抖着，感觉自己涨红了脸。

爱华德夫人在她的书《少女》中，也集中了许多这类热情洋溢的倾泻：

> 给我心爱的仙女，我最亲爱的爱人。我美丽的仙女。啊！请告诉我你还爱我，请告诉我我能永远作你最忠诚的朋友。我很悲伤，我爱你爱得这样深，哦，我的L——我的爱说不尽，道不完；我的爱没有任何文字能加以形容。只说我崇拜你实在太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有时我觉得整个心都要迸裂了。能够为你所爱真是太美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啊，我的宝贝，告诉我，你会天长地久地爱我吗？……

从这种高贵的感情跌落到有罪的幼稚的私通，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有时，一对朋友中的一个支配了对方，虐待狂般地逞威施害；但恋情经常是交互的，没有屈辱也没有挣扎；所施所受的欢悦都象孤独中的自恋之情一样纯洁无邪，只是成双结对而已。但是这种纯洁是缺乏生气的。当少女想融入生命，屈服于另一自我，她就要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唤回父亲那魔力般的凝视，她要求天神般的爱和做爱。她将转向一个女人，因为女人不象男人那样陌生、可怕，不过这女人必须多少具有些男子汉的声望：一个自己养活自己并在世界上有所展现的职业妇女，会轻易变得象男人一样富有魅力。我们

知道在学校里，许多学生倾心于她们的女教师、女领导。在《女人队》中，克莱门斯·戴恩用高雅的文体描写出最狂热的情欲。有时候少女向她最好的朋友吐露自己激越的爱情；甚至有可能两人爱上的恰巧是同一个人，于是乎各自夸耀其感受的敏锐。玛格莉特·爱华德的《少女》一书，引用了一个女学生写给她朋友的这种类型的信：

> 我感冒躺在床上，一直想着X小姐。我从来如此深地爱过一位老师。头一年我就很爱她，而现在已经是真正的恋情了。我想我比你更热情。我想象我吻着她，一想到回学校看她，我就快活得几乎晕过去。

试着向她心中的偶象直接剖白情愫，则更为常见，譬如同书中引录的另一例子：

> 关于你，亲爱的小姐，我真是陷入一种难以言传的境地……每当我看不见你，我就愿意以任何代价跟你在一起；我始终思念着你。每当我看见你，我就热泪盈眶，一心想躲藏起来；比起你我是如此的渺小无知。而当你和我说话，我就觉得窘迫而心动，我象是听到了无法模仿的仙女之音和爱情的呢喃；我守候着你的一举一动，因此而失去话头咕哝

出些笨话，你会说那整个是一盆烂菜糊。但我在其中清晰地看到一点：我从灵魂深处爱着你。

利普曼的《青春与性》记载了一位女职业学校校长的叙述：

我记得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争吵着想得到一位年轻女教师包午饭的纸，就连那些碎纸片，我们都肯花上两毛钱。她的地铁车票也是我们收集的热门货。

因为这一被爱的女人必须扮演一个男性角色，所以她最好是没有结婚：婚姻不见得会一例地使年轻的崇拜者沮丧，但总会使她有些心烦；她不喜欢让她所迷恋的对象受制于一个什么丈夫或情人的权威。这类热情通常都秘密地藏在心里，顶多也只是到达精神恋爱的地步；但通往性爱的路径，要比在被爱者一方是男人的情况下，容易得多。即便少女不曾从她同龄的朋友那儿得到一点经验，女性的胴体也不会使她感到恐慌。跟她的姐妹或母亲在一起，她会时常体验到一种感情染上了微妙的肉欲色彩的亲昵行为；而与她所仰慕的爱人，爱情也会不知不觉地演变为肉体的寻欢。在《穿制服的少女》中，当多萝西·魏克亲吻海达·迪尔的嘴唇时，这吻既是母性的，也是性欲的。女人之间有一种默契能够解除羞

耻感，一个人在另一人身上激起的兴奋通常都不是强暴的；同性恋中的爱抚并不意味着失贞或戳入：它们满足那种孩提时代的阴蒂的性欲，而不想要令人不安的新变化。在少女意识到自己作为被动的对象时，她并没有感觉到深深的自我疏离。这正是雷妮·魏斐安在一些诗中所表达的，诗中她吟颂情人兼姊妹的轻触柔吻，以及她们在嘴唇和乳房上没有留下痕迹的做爱。①

她以诗意的不规矩字眼嘴唇和乳房向她朋友明确允诺的，就是不破损其身体。部分地出于这种对暴力和强奸的恐惧，少女一般宁肯将初恋献给一个较为年长的女人，也不给男人。在女孩眼中，男子气的女人既是她父亲也是她母亲的化身：她具有父亲的威严和卓越，她是价值的来源与标准，她超越世界，她太不平凡了；但她还依然是个女人。不论女孩在幼年时得到母亲的抚爱太少，还是被母亲宠爱得过久，她都象她兄弟一样梦想着那温馨的胸脯。如今，在这与自己贴近的肉体中，她又一次寻到了那随着断乳而失去的无忧无虑，以及与生命的直接交融；并且，在另一人的这种渐次扩展的凝视中，那使她变成一个孤独个体的“分离”被克服了。

---

① 比起他们的躯体，/我们的身躯是友善的明镜，/我们月亮般的亲吻不乏淡淡的柔情，/我们的手指从不把面颊的绒毛揉碎，/何况，在宽衣解带的时候，/我们可以既是情人，又是姐妹。（《合掌时分》）
因为我们喜爱妩媚和温存，/我在占有你时从不蹂躏你的胸脯……/我的娇嘴决不会贪婪地紧咬你的双唇。（《足迹》）

——原注

当然，每种人际关系都潜伏着冲突，所有的爱情都引起嫉妒。在处女和她的第一个异性情人之间隐约可见的许多烦扰，在此却尽被消弭了。同性间相爱慕的经验能够形成真正的性爱，它能带给少女如此欢快的协调，以使她想长久依恋它，重复它，对它永怀眷恋。的确，它可能引起或彰明一种女性同性恋的（lesbian）嗜好。

不过这一经验通常将只代表一个阶段，正是它的简易便利判处了它的死刑。在少女对一位较年长女人的爱中，她实际上是在恋爱着自己的未来；她会把自己与心中的偶像等同起来；如果这偶像不是特别优越，她就会很快地黯淡失色。当少女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表现自己，她会去判断、比较；那个只是因为与自己相类、沒有什么威胁而被选定的对象，缺乏足够的相异性（otherness），不能长久地影响她；男神们的地位就稳固得多，因为他们居住的天庭比较遥远。她的好奇，她的肉欲，诱使少女渴望更强劲的拥抱。她从一开始就常常把同性间的爱恋只看作是一个过渡，一个引子，是暂时的。她串演过爱情、妒嫉、愤怒、骄傲、欢乐和痛苦，而心中也多少坦率地承认，她是不冒什么危险地模仿着她所梦想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既没有勇气追求、也没有机会实现的奇特遭际。她明白自己是注定为男人而存在的，她想要那个正常而完整的女人命运。

男人使她目眩，也使她害怕。为使她有关他的各种矛盾感情互相妥协，她会将他里面使她害怕的那个“男性”与她

所虔诚崇拜的辉煌灿烂的男神分离开来。她对男伴们态度生硬、羞怯，却一心崇拜着某个遥远的魅力王子：一个相片被她别在床边的男电影演员；一位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接近的英雄；一个她偶然注意到，并知道永不会相逢的陌生人。这种爱情不会导致任何烦难。少女所想望的经常是个具有社会地位或才学出众，但缺乏身体魅力的男人：譬如一位老迈而又相当可笑的教授。这些较老的男人居于少年男女的世界之外，于是她能秘密地把自己献给他，如同一个人将自己供奉于上帝；这毫不屈辱，因为没有肉体欲望的存在。中选者甚至可以出身微贱或相貌平常，因为只有这样她才会感觉更安全。选择望尘莫及的人，她就能将爱情做为一种不威胁她肉体完整的抽象主观的经验；她感受期待、希望、痛苦的激情，却没有真正的纠葛。十分有趣的是，偶像离得愈远，他就能愈出众；每天见面的钢琴教师最好长得丑些，而不可企及的英雄顶好英俊、具有阳刚之气。重要的是不论怎样都要把性的因素排除在外，这样，就能没有另一自我的实际存在，而拖延比较内向的性欲所引起的自恋。

少女经常就是以此方式，来避免真实的经验，建构起热情的想象生活，自然，有些时候幻想与现实混淆不清。海伦·多伊奇描述了一位少女值得注意的情况，该少女想象自己与一位从未说过话的年龄较大的男孩，有种很复杂的关系。她不断地在日记中记载虚构的情形，有眼泪，有拥抱，有别离，有和解，并给他写从未寄出的信，再自己回覆。所有这一切，

显然是她对所惧怕的实际经验的一种防御。

这是一个病态的极端，但其过程是正常的。玛丽·巴斯克赛夫在想象中与一位根本无以接近的贵族保持着感情联系，希望借此在作为女人所无法获得独立成功的处境下，提高她的自我。她希望做个名人，但身为女人如何能有所成就？她需要一个男人，但他必须是最上等的男人。她写道："一个好女人最大的骄傲，必然是向男人的优越卑躬屈膝"。于是，自恋引导出一种以受异性虐待为快的病态色情狂(masochism)，就象我们在儿童身上所已经看到的，对欺凌女性的暴徒和神圣的殉道者的幻想。"自我"可说是为别人，被别人建构而成的：别人愈是强有力，"自我"也就愈丰满强旺。在别人面前取消自己，正是在自己身上、并为自己实现他人。如果玛丽·巴斯克赛夫为尼禄王所爱，那么她就成为尼禄王。实际上，这种虚空的梦想乃是一个有关"存在"的豪迈意志；事实上，她从未遇到过一个男人，能超群绝伦到足以使她放弃自己。跪拜在自己构想出的遥远的神祇面前，与屈服于一个有血有肉的男性跟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许多少女坚持在现实世界中追随这一梦想，她们寻求一个超卓于世间万物的具有财富、声名的男人；通过这一绝对主体的爱，她们能够享有他的光华和本质。因此，她们之所以献出爱情，不是因为他是男人，而是因为他是那一个超凡的人；她们的爱情由此而被理想化了。一个朋友对我说："我想得到巨人，却只找到了男人"。就因为这些过高的条件，少女看

不上只是一般努力上进的人，并避开性的难题。她安然地在心中珍藏起她的自我幻象——一个迷人的意象，但绝对无意去适合它。于是，玛利·勒·哈多因在《黑帆》中，讲述了她虽然事实上处处盛气凌人，却怎样乐陶陶地设想自己是某个男人的忠诚牺牲：

> 我们痛苦地生活着。我补他的衣服，补得眼睛都快瞎了。我们的独生子病得气息奄奄。但我唇上挂着一丝受难的温柔微笑，眼中流露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我会极其看不顺眼的静默的勇气。

除了这类自恋性的屈服，有些少女会比较现实地觉得需要一个指导，一个教师。从父母的控制下逃脱出来，她们发现这个尚未习惯的“独立”十分令人困窘；她们只能消极地运用它，行为不是任性多变，就是放肆过分，结果她们巴不得放弃这分自由。任性、高傲、不听话、令人难以忍受的少女，被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治得服服贴贴，这种故事是通俗小说、电影的一个标准样式。这一套陈腔滥调使男男女女们听得都很开心。比如德·赛古夫人在《多幼稚的爱！》中，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吉瑟乐的女孩，对过分溺爱她的父亲感到失望，喜欢上了一位严厉的老姑母；少女时她受到一个爱挑错的青年——朱立安的影响，他对她讲刺耳的真话，羞辱她，设法改正她；她嫁给了一个品德卑劣的阔公

爵，生活很不幸福，直到当她成了寡妇，接受了她那位良师益友热切的爱情，她才终于获得了快乐和智慧。在路易莎·M·阿尔柯特的《好妻子》中，任性的乔在因错受到她未来丈夫的严厉指责之后，开始爱上他。尽管美国女人不可救药地傲慢，好莱坞影片却一再上演难以驾驭的年轻女人被丈夫或情人合宜的暴力制服的故事：一两个巴掌，或者更好是痛打一顿，似乎就能万无一失地把姑娘勾引到手。

但事实上，从理想中的爱情转变为性爱并不那样简单。许多女人多少都能坦率地承认，她们之所以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心爱的对象亲近，是因为怕受到欺骗。如果那位英雄，那位巨人，那位半神半人，对他所惹起的爱情有所反应，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体认，少女立刻就会害怕；她的偶像变成了让她厌恶嫌弃的男性。有些喜欢卖弄风情的女孩千方百计地吸引一个她们认为“有趣”或“迷人”的男子，但若他反过来真地对她们产生了浓厚兴趣，她们却又惶恐起来。他的有吸引力，是因为他显得难以接近；作为情人，他就未免太平凡了——“他只是个男人，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少女责怪他使她丧失尊严，并以此为借口避免威胁着她处女的敏感的肉体接触。如果她屈服于她的“理想”，冰冷地躺在他的怀里，就会象斯坦克尔所说的：“有时一个心志高傲的女孩会在那种事后自杀，不然就是她爱情梦幻的整座大厦崩坍倒地，因为她那位理想人物原来是个‘野蛮的畜生’”。

这种对于无望的对象的喜爱，常常诱使少女爱上某个对

她的女友发生兴趣的男人，并且他多半还是个已婚男子。她很容易被唐·璜式的人物迷住，她梦想着征服并控制这个没有女人能长久拴缚住的诱惑者；虽然明知不会成功，她还是希望去改变他，而这也正是她所以选择的原因之一。有些少女永远不能体验到真实而完整的爱情，她们一生都在追寻无法实现的理想。

显然，在女孩的自恋与她的性别所注定给她的经验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如果女人在自我放弃的行为中对自己有了重新认识，她就会只接受她的非本质的地位。要是听任自己变成客体，她就成为一个她能骄傲地加以认可的偶像；不过她唾弃那仍使她慫延于非本质地位的毫不容情的逻辑。她愿意做个迷人的宝贝，而非为人占取之物。她喜欢象个奇妙的物神，充满着向外发散的魔力般的东西，而不愿把自己看成是个能被人观看、触摸、损伤的肉体：一点不错，男人喜欢以女人为祭品，他们逃避女妖魔得墨特尔。

少女骄傲于引起男性的注意和爱慕，但她厌恶反过来被人俘获。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她已经懂得了羞耻，而这份羞耻心与她的虚荣和卖弄风情混杂在一起，延宕不去。男人的注视既抚慰又刺伤了她，她只想要人们看她显露在外的，但眼睛却偏偏具有极强的穿透力。男人们大惑不解地看出了这种自相矛盾之处：她袒胸露腿，但一当男人们盯视，她就脸红、愠怒。她乐于点火烧男人，可如果发现她引起了他的情欲，她就厌恶地退避三舍。男性的欲望是恭维，同时也是一

种冒犯；在感觉到她主宰着自己的魅力，并主动地加以运用时，她对自己的成功就很喜欢，但是一想到容貌、身材、肉体这些她所必须忍受的事实，她又想将它们遮掩起来，不让渴求她的那些自主自在的陌生人看到。

这就是少女首要的羞耻——它令人困恼地搀杂在最大胆的调情中——的深层意义。一个小女孩可能惊人地大胆，因为她不了解在她采取主动时，却正显露出她的被动性；一旦明白了这点，她就会惊恐恼怒。没有什么比凝视更模棱两可了；它存在于一定的距离之外，隔着距离，它显得充满敬意，但它却在不知不觉间占有了被凝视的形影。未成年的少女就在这些陷阱中挣扎。她开始自我放任，但立刻就又束缚自己，压抑涌起的欲念。在她那仍然扰乱不安的身体中，爱抚一会儿是种美妙的快感，一会儿又象是令人生厌的骚痒；接吻最初使她心动，接着又突然使她发笑。每次的屈服过后总接着来一次反叛：她听任别人亲吻自己，却当面擦净嘴唇；她笑容可掬，充满柔情，接着就突然变得讥讽、敌对；她许诺，转瞬又故意忘记。

借着这种乖拗、孩子气的小把戏，“未成熟之果”防御着自己被男人袭击。人们常把少女形容为半野生半驯良的动物。譬如科利特在《可劳婷在学校》和《玉蜀黍》中，就通过爱装魔作怪的文卡，描写了少女的这一特性。她对自己所面对、并以君王般的威权统治着的世界，具有浓烈的兴趣；她也对男人感觉好奇，还对他怀着肉体的和浪漫的欲望。文卡

捉蝌蚪，爬树，被荆棘划破皮肤，当朋友菲尔触摸她的手，她却一下子感觉到颤栗般的激动；她体验到身躯变为肉体，女人初次意识到自己是女人时的兴奋。从沉睡中醒来，她开始希望自己漂亮：她不时地做头发，用化妆品，穿透明的玻璃纱衣服，以感人、卖弄风情自娱。但是，有时她又象是要为自己而非为他人生存似地，将自己包裹在难看的旧衣服里，或者穿上不合身的长裤；她自我中的重要一部分不赞同卖弄风情，认为这是对原则的放弃。于是她故意将手指涂上墨水，不梳头发，一副邋遢相。这种反叛行为带给她一种使之恼怒的窘态，她因此而烦躁，脸红，加倍地手足无措，并为自己流产了的引诱企图而冷颤。这一段时期，少女希望自己不再是个孩子，却又不接受成人的身份，她一会儿责怪自己孩子气，一会儿又责备自己的女性软弱。她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否定状态之中。

这就是少女的特性，也是我们理解她大多数行为的钥匙。她不接受自然与社会派定给她的命运，但也不完全拒绝它；她自身的矛盾分歧太多，以致于无暇与世界作战；她将自己限制于逃脱现实或对它的象征性斗争之中。她的每个欲望都有与之相应的焦虑：她一心渴望要掌握自己的未来，却害怕与过去断绝；她想“得到”一个男人，但不要他象对待祭品一样地占有她。而在每一恐惧后面，又都潜伏着一道欲望：她害怕被侵犯，却渴望消极服从。于是她命中注定要变得缺乏诚意，满口遁辞；注定要受到各种消极观念的困扰(negative

obsessions)，无法摆脱那种焦虑与欲望相混杂的矛盾心理。

青春期挣扎中，最常见的抗争方式之一就是轻蔑地大笑。女学生和年轻女工们在互相讲起感伤的或粗俗的故事，或者叙述她们的调情经历时，常常爆出一阵大笑。走过男人身边，或看到恋人拥抱，她们就咯咯地傻笑。我知道有些女孩，故意走入卢森堡公园的“恋人巷”(the‘lover’s lane’ in the Luxembourg Gardens)，好使自己发笑；另有些女孩经常出入于土耳其浴室，以取笑那些肚腹肥大、乳房耷垂的胖女人。取笑女性的身体，挖苦男人，嘲弄爱情，合起来就构成一种对于“性”的否认方式。在这笑声和对成年人的挑衅中，有一种克服自己的困窘和压抑的方法，人们玩弄文字和意象的游戏，为的是杀死那危险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我看见年轻学生们，在拉丁文课本中发现temur（大腿）一字，便哄堂大笑起来。

如果少女让人给乱摸或吻过，她会更加理直气壮地以当面发笑或跟伙伴们一同大笑的方式来进行报复。我想起有天晚上在一节火车车厢里，两个少女被一个为自己的好运气沾沾自喜的旅行推销员轮流“摸来摸去”；每过一会儿她们就歇斯底里地纵声大笑，然后在性欲和羞耻心的交杂混合中，重新回复到尚未成熟的青春期的典型作派。

在这个年纪，少女不光放纵地大笑，还骂人，有些女孩用的词汇，粗野到令她们兄弟脸红的地步。毫无疑问，这种语言不会对她们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在半知半解中，她们所

运用的词句还无法在她们脑海中唤起明确的意象；此外，运用这类词句的目的是阻止，或至少是减少而不是产生这些意象。女学生们彼此讲述的猥亵故事，与其说是为了满足性方面的感受，不如说是为着否认“性”：她们想以它的那副滑稽相来对待它，把它看成是一种机械的、或者类似于外科手术的操作。但是正如大笑一样，污秽语言的运用不仅是种抗争的方法，也是一种对成年人的冒犯，一种对神圣的亵渎，一种有意的邪恶行为。蔑视着自然与社会，少女以不少古怪方式向它们挑战。其中最常被提到的，是怪诞的饮食习惯：吃铅笔芯、封缄纸、木屑、活虾，吞服成打的阿斯匹林药片，甚至吃苍蝇和蜘蛛。我认识一个女孩，不是傻瓜，却自己调制一种咖啡和白葡萄酒的可怕混合液，强迫自己喝下去；她也吃浸泡在醋中的糖。我看见另一女孩在生菜盘中找到一只白虫子，硬是把它吞下了。所有的儿童都坚持用眼睛，用手，更加内在地，就用嘴和胃去体味这世界；但在这尚未成熟的青春期中，女孩更倾向于在难以消化、令人恶心的领域中探索。“令人厌恶作呕”的东西常常能迷住她。有个这类的女孩，在她愿意时会讲究修饰，打扮得漂漂亮亮，擅长于卖弄风情，但她居然对每件肮脏东西着迷：她鼓弄昆虫，盯着血污的卫生巾看，吸自己伤口的血。玩脏东西显然是一种战胜那在青春期初始阶段变得非常重要的厌恶情绪的方法。我们已谈到，女孩对她的肉体、经血，对成年人的性交，对她命中注定要归属的男人，一概感觉厌恶；她否认这种厌恶情绪，采

取的恰恰是去亲近、喜爱那些她所反感的东西的方式。仿佛她在说："既然我每个月都得流血，我从伤口吸血就是要证明我并不怕血。既然我将来不得不去忍受一种令人作呕的生活，吞下一只白虫子又怎么样呢！"

这一态度更明确地表现于这段年龄所常发生的自我伤残中。少女会用剃刀划破大腿，用香烟烧灼自己，剥自己的皮肤。为了避免参加一个无聊的游园会，我年轻时的一个朋友用斧头砍伤了自己的脚，伤势很重，一直在床上躺了六个星期。这种施虐与受虐性(Sado-masochistic)行为，既是对性经验的期待，也是对它的抗议；通过这些考验，一个人就能坚强地面对苦难，并减轻它的痛楚，包括新婚之夜的疼痛。当她把蜗牛放在胸上，当她吞下一瓶阿斯匹林药片，这少女伤害自己，就是向她未来的情人提出挑衅——"你无法比我对自己所做的更重地伤害我了"。这些就是进入性领域时的骄傲而阴郁的初始姿态。

少女虽然命中注定要成为男人被动的牺牲品，可她维护自己的自由权甚至到了经受痛苦和恶心的地步。当她划破或烧伤自己，她是在反抗处女膜的被戳破：她以相互抵销的方式来进行反抗。这一举动给她痛苦，属于自虐，但它更可说是施虐：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她鞭笞、嘲笑、折磨这具从属性的肉体，这注定要向她所憎恨的男人屈服的肉体——但是无论如何，她并不想与之脱离关系。不管怎样，她不愿意真地拒绝自己的命运。她的施虐和自虐性心理失常，涉及

到一个十分重要的“虚假性”(insincerity)问题：如果少女听任自己做出这些行为，那就意味着她通过拒绝而接受了等待着她的女性未来。如果她没有首先承认自己便是肉体，她将不会愤恨地残损自己的肉体。

甚至她暴烈行为的发作也起源于屈从。当一个男孩反叛他父亲，反叛世界时，他的暴力是有效的；他向同伴寻衅吵架，他打架，用拳头来确立他的自主地位：总之，他把自己强塞给世界，他超越它。少女却无从去确立自己，强塞自己，这使她内心充满了反抗：她也许既不希望改变世界，也不想超越它；她知道，或至少相信她被禁锢着——或许她甚至希望如此；当她被激怒时，她砸玻璃杯、玻璃窗、花瓶——不是为了征服命运，而只是种象征性的抗议。在她目前的无能为力中，少女反抗她未来的受奴役；而她那些无济于事的发作，非但不能解开她的镣铐，反而常常束缚得更紧。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包围着她的天地万物的暴力行为，总带有一种消极的性质：它们比较引人注目，却没什么实效。好斗的男孩把他的小伤口看成是他积极活动的无关紧要的后果，并不专门去追究或避免它（除非某种自卑感使他处于女孩一样的境地）。女孩则眼看着自己受苦：她在心里玩味着暴力和反叛的滋味，对其结果毫无兴趣。她的乖张源于她在儿童世界中的滞留，她不能也不肯真正离开那里。她在樊笼中挣扎，却不试着逃脱；她的思想主体是消极的，习惯性、象征性的。

在有些情况下这种乖张可能会变成一件严重的事。不少处女染有盗窃癖(kleptomaniacs)；盗窃癖是一种非常含糊不清的“性的升华”(sexual sublimation)。违法犯禁的意志，被禁止的冒险性行为引起的高度兴奋——这种挑战必然是女窃贼身上的基本因素，不过问题是两面性的。去拿无权拿的东西就是傲慢地肯定她的独立，就是在被窃之物与谴责盗窃行为的社会面前扮演了一个主体角色；也就是否认了法律和秩序。但这挑战还有自虐性的一面：窃贼为她所冒的危险蛊惑，为她一旦被拘捕所将面临的深渊诱引，被捕的危险给了盗窃行为一种情欲激发的魅力；然后，在苛责的眼光下，在捉拿她的手掌下，在极端羞辱中，她将感觉到自己是孤独无助的唯一的客体。

在未被捉拿的情况下窃取，在极度的痛苦中提防着自己成为牺牲品，这就是青春期女性的危险游戏。少女所有的堕落与犯罪行为模式都包含着这同一要义。有些少女专门寄匿名信，有些以戏弄朋友自娱：一个十四岁女孩，骗得全村人相信某栋房屋闹鬼。她们同时享受着秘密行使权力的快乐，以及对社会的挑衅、不顺从——还有被发现的危险！这末一项是她们的乐趣中相当重要的因素，以致她们时常自我暴露，有时甚至对自己未曾犯的过失和罪行供认不讳。对变成客体的拒绝反而导致她成为客体，发现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这一机械论适用于一切消极的心理纠结。在一个单一的反应中，歇斯底里的瘫痪症患者既害怕又希望瘫痪，从而将

病引发；正如心理性的面部痉挛症一样，只有在完全不想它时治疗才会奏效。

她虚假的深度是正常少女与这些神经病类型之间的一个衔接。躁狂、痉挛、行为反常邪恶——我们能在她身上找到许多因为我所谨慎指出的那种欲望与恐惧混淆错杂的矛盾心理而引起的神经病症状。常见的如出走，她可能随便地离开家在很远的地方流浪，两三天后又主动回来。这不可能是一种真心的离开，不可能是真的想与家人断绝关系；它只是一出逃走的喜剧，如果有人当真提出带走她，她多半会变得十分不安：她想离开，又不想离开。有时出逃的念头与想入非非的卖淫有关：她幻想自己是个妓女，并多少有些胆怯地扮演这一角色；她戴上花花绿绿的饰物，倚窗凭栏，向路人递着媚眼。在某些情形下，她离开家，将喜剧演得太过火，以致与现实混淆一片。这种行为通常表示对性欲的厌恶，表示一种罪恶感。她想：“既然我有这种意图、这种欲望，我就不比一个妓女好多少，我就是个妓女。”有时她努力使自己摆脱，“让我们什么都干，让我们走入穷途末路，”她对自己说。为了向自我证实性是件无足轻重的事，她会将自己的身体轻易交给最先来的人。

同时，这一态度可能常常表示对母亲的敌意，无论少女是被她母亲的严正德性所疏远，还是怀疑她母亲本人水性杨花；或者它表露的是对过份冷淡她的父亲的忿恨。无论如何，这一心理困扰——就象我已提及的时常与之相关的怀孕幻想

——包含了标志着神经失常的反叛与合谋的错综纠结。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行为模式中，少女并不孜孜以求于超越自然与社会的秩序，她不打算扩展可能性的界限，也不想重新调整价值观；她满足于拘束在其原有疆界与法律维持不变的世界中来展现她的反叛。这就是通常被称为“恶魔般”的态度，它暗示出一种根本性的掩饰：承认善行是为了要嘲弄它；制定法规是为了要破坏它；敬重神圣，则是为了能进一步渎圣。少女的态度可以基本上根据这一事实加以界定，就是在她的“虚假性”的痛苦阴影中，她一面否定一面又接受这世界和她的命运。

然而，她并不止于消极地抗议强加于她的境遇，她也努力地设法弥补其缺欠。如果说未来使她恐慌，那么现在则使她不满；她犹疑着不敢成为女人，却又恼于仍然是个孩子；她已把过去甩在后面，但尚未开始新生活。她忙忙碌碌，却什么事也没做；因为她诸事不为，所以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她必须以演戏和弄虚作假来填补这空白。人们常责备她狡猾、不诚实、好撒谎。事实是，她命中注定要诡秘、说谎。一个女人十六岁时就已经历了痛苦的考验：发育、月经、性觉醒、初次的情欲、初次的性兴奋、恐惧、厌恶、暧昧不清的体验，她将这一切牢记在心，并学会谨慎小心地保住秘密。单单必须收藏月经带和隐瞒她的身体状况这件事，就已经使她惯于推诿撒谎。波特在《古老的人》这个故事里，叙述了一九〇〇年前后，美国南方的女孩在参加舞会前为了

暂时停经而喝兑盐的柠檬水，以致恶心呕吐的事。她们害怕年轻男人们会从她们眼睛里、从手的接触上，或可能从某种气味中发现她们的身体状况，这个念头吓坏了她们。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双腿间夹着一块血淋淋的布片，或者更广泛地说，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原本是个肉身的惨状，她就很难扮演一个偶像、一个仙女、一个遥远的公主。那种本能地拒绝承认自己肉体事实的羞怯，几近乎虚伪。

但是，一个青春期少女命中注定要经受的首要虚假，就是在当她意识到自己是个人格分裂的不确定存在、并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缺陷时，还必须要假装是客体，假装是一个迷人的东西。化妆品、假发、紧身褡、以及垫高的乳罩统统全是谎言。就连脸孔也变成了假面：出自自然的表情被人工雕饰过了，模拟出令人惊叹的被动神态；最令人惊异的，莫过于突然发现一个平素熟悉的少女呈现出女性状态时的容貌。它的超越性被弃置一旁，模仿起内在固有；眼睛不再有穿透力，而仅仅是反射；身体不复是活力充沛的了，只静候着；每一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变成种恳求。解除了武装，听任人摆布，少女如今仅只是一朵用来献祭的花，一颗等待采摘的果实。

男人对被引诱的渴求鼓励了这种诱惑，尽管事后他会恼怒地怪罪女人。他对自然率真的少女既冷淡，又充满敌意，唯独设置陷阱的女孩他才觉得有魅力。虽然她自己被用来献祭，她却埋伏着等待牺牲品；她的被动辅佐了她的冒险事

业，她将自己的弱点转化为权力的工具；因为不准许她公开攻击，她不得不依靠策略和计谋；而表现得象是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了出来对她颇为有利：她因此被人有理有据地指责为背信弃义、奸诈不忠。但事实上，她不得不向男人提供一套有关她顺从的神话，因为他坚持要处于支配地位，故她的屈从自始就只能是被歪曲了的。另外，她的诡诈也并非完全出于存心的算计。如我们所知，她先前曾经历过幼稚的“扮演”(play-acting)和接下来的“成为自己”(being herself)这样几个阶段；在她这样的处境中探问其天性的究竟，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她只能存在，不能行动。她的青春幻想比起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对她显得更为真切，那些毫无节制的幻想使她在缺少现实行动的情况下，产生一种自高自大感。她象小孩一般，采取吵闹、发脾气、欺骗、诽谤、幻想等方式使自己显得重要。她没有真正的意志，只有多变的欲望。但是她把自己的不合逻辑看成是绝对的、权威性的；不能控制自己的未来，她将决意去获得永恒。“我永远要得到一切，”玛利·莱尼如写道。“如果我要接受生活的话，我必须加以选择”。这一点引起了剧作家阿努义笔下的安娣冈妮的共鸣：“我什么都要，马上就要。”这种孩子气的专横只能在幻想自己命运的人身上找到；这种梦幻取消时间和障碍，而任何考虑现实计划的人，都具有一种估量他的具体实力的限定感。少女想要一切，因为无物依赖于她。于是她变得爱折磨人。因此，在易卜生《主人建筑师》中，海尔达盼望苏尼士给

她一个王国：征服它可不是她的任务。让他建筑得高高的，爬上去；她在地面上，毫不理会人类的脆弱，躲进她那些辉煌壮观的梦幻里，无视种种限制的存在。对于一个没什么可损失的人来说，成年人总显得平板乏味，过于谨慎；而没有经受过现实考验的女孩，能够毫不害怕自相矛盾地夸耀最惊人的美德。

无论如何，她的不确定性是起因于她的缺乏控制；她梦想着永恒无限，但是她仍然扮演那个装扮出来供人倾慕的角色，这一角色是要依赖陌生人的情绪、意向的。在这个她认同为己、其存在她又必须被动接受的双重角色中，存在着一种危险。这也就是她敏感、虚荣的原因。些微的批评，一丝儿善意的嘲笑会使她满怀疑忌。她不是从自己的努力当中，而是凭别人变幻莫测的赞赏来认识自己的价值。这种不基于任何特定活动的声望仿佛是可以计量的；商品变得太普通时，其价值就降低，因此，只要别人都平凡黯淡，少女就是珍贵、优异、卓越、非凡的。她的伙伴是对手，是敌人；她想方设法贬低、否认她们；她妒嫉，充满恶意。

显然，所有这些过错都只是源于少女的处境。在充满希望、雄心勃勃的年纪，在求生与竞争于世的意志奔涌强旺的年纪，却感觉到自己消极被动，仰赖他人，这是一个最为不幸的处境。就在这欲征服一切的年纪，女人得知在她根本就没有“征服”这一说，她必须否认自己，她的未来系于男人的快活上。在社会方面也跟在性方面一样，新的渴求欲望

在她体内苏醒，却持续得不到满足；所有对行动的热望，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立刻受到挫折。难怪她几乎要心理失衡了。她反复无常的性情，她的眼泪，她神经方面的危机，与其说是生理脆弱的后果，不如说是她对处境极不适应的明证。

但也可能，少女确实接受了这一处境，同时又以成千种虚幻的方式来逃避它。她的过错令人恼火，但有时其特殊品性又令人惊异。两者同出于一源。她对世界的否定，她焦虑不安的期待，她的虚空无有，都能作为一种跳板使她到达孤寂与自由的顶点。

正如我们所知，少女诡秘内敛，情绪纷乱，是严重冲突之下的牺牲品，不过这种复杂性使她丰富起来，她的内心生活比她兄弟们发展得深刻得多；她非常注意自己的感情，所以她的感情更加微妙细致，变化多端。比起兴趣集中于外部世界的男孩，她具有更多的心理洞察力。她能掂量出使她与世界相敌对的反叛的分量。她躲避着过分严肃与顺世随俗的陷阱。朋友们有意捏造的谎言遭到她的讥讽，被她看穿。她每天都感觉到自己处境的暧昧不清：在无济于事的反抗之外，她能勇敢地对公认的乐观、陈旧的价值、伪善和快乐的道德提出疑问。在《弗洛斯河上的磨房》中，乔治·艾略特用玛吉来具体体现了她自己年轻时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怀疑和勇敢的反叛。男主角们——特别是玛吉的哥哥汤姆——顽固坚持公认的原则，将道德凝固成死板的教条；而玛吉试图给它

们注入新的生命气息，她打翻它们，走到孤独的边缘，终于成为一个超然于僵硬刻板的男性宇宙之外的真正自由的人。

对于这份自由，少女几乎只能予以消极的运用。但她的静止状态却能产生一种可贵的接受能力，她因此能忠实虔诚、专心留意、宽容善解、富有感情。罗莎蒙德·莱曼笔下的女主角们，就以这种驯顺的慷慨行为而著名。在《邀舞》中，我们看见奥莉薇亚依旧胆怯、尴尬，并不卖弄风骚，她以富有感情的好奇心来审视即将进入的世界。跳舞时，她细听一个接一个舞伴们的话，并试着照他们所希望的来回答，她变成一个回声，她共鸣，她来者不拒。《模棱两可的答覆》中的女主角朱蒂斯也同样可爱。她还未放弃稚气的欢乐：她喜欢夜晚裸着身体在她花园旁的小河里洗澡，她爱自然，爱书籍，爱美和生命；她不自恋；她不欺诈骗人、自私自利，也不通过男人寻求自我的超越：她的爱是赠予。她将它给予任何赢得她欢心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珍妮弗还是罗狄。她给予，但并不丧失自己：过着学生的那种独立生活，她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计划。她区别于男孩的，是她的观望态度，她的温柔驯顺。不管怎样，她已微妙地被注定隶属于人家：在她眼中，“人家”的样子是这样出色，以致她同时爱恋着邻居家所有的年轻男人，以及他们的房子、姊妹，他们的世界；珍妮弗不是以朋友的身份，而是以她的相异性迷住了她。她使罗狄及其表兄弟们动心，因为她愿意为他们塑造自己，依照他们的欲望来剪裁自己；她是忍耐、温柔、接受与沉默

顺从的化身。

玛格丽特·肯尼迪的《永恒的仙女》中的蒂莎则大不相同，她本色自然、柔和、忠诚，同时她那种对所爱之人的竭心尽意，也非常动人。她拒绝哪怕是一丝一毫的退让：女性的华服丽饰、化妆品、虚假、伪善、矫揉造作的优雅风度，都是她所深恶痛绝的；她想要被爱，但不是在假面具下。她屈服于刘易斯一时的兴致、念头，却毫不奴颜婢膝；她了解他，与他相共鸣；但一旦他们吵架，爱抚将无法使她回心转意。虚荣傲慢的弗洛伦斯能被亲吻所征服，蒂莎则奇迹般地在爱情中保全了自由，这使她能够不怀敌意、毫不骄傲地恋爱。她天生的天真单纯性格，具有计谋诡诈的全部吸引力；取悦人时，她从不自我践踏，自我贬低，或甘愿充当客体。在全神贯注于音乐创作的艺术家们的包围中，她并未亲身感受到这吞噬人的精灵的存在；她只全心全意地去爱，去理解、帮助他们。她以一种富有感情的、自发的慷慨，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点。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她忘我地帮助别人时，她也能保持完整的独立。由于这种纯粹的真实，她免除了青春期惯有的冲突；她能够在保持人格完整的情况下承受起世界的严酷；她具有无忧无虑的孩子和明智女人共有的内心和谐。这位敏感、大方的少女，热情又能包容一切，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具有博大爱心的妇女。

当她找不到爱时，她可能发现了诗。因为她不行动，她便观察、感受、记载；一种色彩，一个微笑，都能在她心里

激起深深的回响；她的命运外在于她，散布在已经建成的城市中，散布在已被生活烙下印痕的男人的脸上，她触摸接近，并热情地玩味，然而她的态度比年轻男子更超然、更自由。由于不能浑然一体地融入人类宇宙，并且差不多无法使自己适应其中，她象孩子一样，反倒能客观地来看待世界。她不仅对事物的把握有兴趣，还追索其意义；她捕捉它们特有的轮廓概貌，它们出乎意料的质量变化。她很少感受到粗犷大胆的创造力，一般说来，她缺乏自我表现的技巧；但在她的言谈、信件、散文和小品中，表露出一种独到的敏感。少女热诚地将自己投入一切，因为她的超越性尚未被剥夺；况且，她一无成就、虚空无物这一事实，将会使她的冲动更加热情奔放。她空洞而漫无限制地寻求从她一无所有的底层，上升到获得所有的一切。这就是她对大自然怀有特殊的爱的原因；比起少年男子来，她更崇拜它。大自然不受控制、毫无人性，同时又是显而易见地包罗统摄着存在的全部。少女尚未获得宇宙的任何一部分供自己享用：因此整个宇宙成为她的王国；她占有了它，也就是骄傲地占有了自己。科利特时常描述这种少年的狂欢，例如在作品《西多》中：

我爱黎明，我总提着空篮子，顺着沙路走下去，走向长着草莓和红醋栗的河边。三点半时，一切都是深蓝色的，既潮湿又模糊，我在浓雾中漫步，直到雾水侵入了我的耳朵和敏感的鼻孔……于是我

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蒙受天恩般的心境，感觉到我与第一缕微风，第一只啼鸟，与朝阳融为一体……返回之前，我还定要吃个痛快。走遍森林，并从两个隐秘的泉眼中饮水。

玛丽·韦布也告诉我们少女在亲近熟悉的乡野时所体验的狂喜：

屋里的气氛变得嗡然作响，艾伯神经紧张得要迸裂了，她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森林里去……她觉得当道殿依据法律生活的时候，森林却凭冲动而存在着。通过对自然之美的逐渐醒悟，她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对美的感知。她开始觉察出相似之处。对她来说，大自然不再是美丽事物的偶然组合，而是一种和谐，一首神圣严肃的诗……“美”呼吸于此，“光”闪耀于此，但并非源自花朵或星辰。一阵神秘而令人激动的颤栗象是与光一同袭来……森林在悄声低语着……她进入这绿色世界，其中颇有些宗教礼拜的成分。六月初的一个宁静早晨……她终于来到森林的高处，立刻就被美摄住了魂魄。在与自然的亲密交谈中，她真切地感受到某种角力，某种氛围在对她说：“如果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走”……倚在一棵野梨树上，经过内心的倾听，她

感觉到树液的浪潮如大海咆哮般地汹涌激荡。一缕微风摇动开花的树冠，她的感官苏醒了，感悟着树叶不熟悉的声息……每一花瓣，每一叶片，都象在沉思默想着她所从来之处一些深沉的记忆。每一精巧有致的花朵，象是充满了其柔脆所不胜的崇高回响……一阵芬芳从山顶飘来，悄悄地萦绕充溢在树枝间。有形的、并以一定形式死亡的事物，在无形的永恒存在经过面前时，不禁颤栗发抖……因此，这里不再仅有树木麇集丛生，而是成为星空般璀璨强劲的所在……因为它永远在一种不为我们所知的、恒定不变的活力中，自我归属，自我占有。正是这一点吸引了艾伯，使她怀着急促的好奇心，进入大自然的隐秘场所。正是这，使她现在欣喜若狂……是这一切诱使艾伯气喘吁吁地来到大自然萦回出没之地，并入定于罕有的狂喜之中。

许多迥然不同的女人，象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娜·德·诺阿耶，都曾在年轻时体验过这种狂热——并终生保留下来。

上面引的几段表明少女在旷野森林中找到了何等美妙的避难所。在家里，母亲、法规、习俗、惯例支配了一切，她巴不得逃避这过去种种；她也想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然而作为社会的一员，她只有在成为一个女人时才能进入成人

生活；她取得自由的代价是退让。但是在动植物中，她便是一个“人”了，她同时从家庭和男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她在森林的隐秘之处找到她孤寂灵魂的反照，在平原广阔的地平线上寻得她超越的具体映象；她本人就是这一望无垠的疆土，这高耸云天的山巅；她可以沿着这些通向未知的将来的路径，一直走下去；坐在山顶上，全世界的财富都在她脚下铺展开，全部归她所有，供她取用。在水的奔流，光的闪烁中，她预感到一种还是陌生的欢悦、泪水、心醉神迷；池中的涟漪，斑驳的阳光，模糊地允诺着她内心的冒险。

气味和色彩讲述着一种神秘的语言，但有一个字异常响亮：这就是生命。存在并非只是载于城市案卷中的一种抽象的命运，而是肉体丰腴的未来。长着个身体，不再象是令人羞耻的污点了；在少女受母亲监视而禁绝的欲望里，她可以辨认出那树中涌起的汁液；她不再是不幸的，她骄傲地向树叶花朵认亲；她揉碎一朵花，她知道有一天一个活生生的祭品将填满她空着的双手。肉体不再是一种玷污，它意味着欢乐和美丽。与大地天空浑融一体，少女是给宇宙灌注生机、燃点光亮的隐约气息，是植物的每一枝丫；她是植根于土壤，植根于广大无边的意识的有机体，同时也是精灵和生命；她的存在象大地一般是专横的、胜利的。

除了大自然，她有时还追寻一种更遥远、更眩目的现实；她容易在神秘的狂喜中迷失自己。在宗教信仰盛行的时

代，许多年轻女人指望通过上帝来填补她们内心的空白，圣凯瑟琳和圣黛丽莎的供奉圣职，都是在早年生活中就显露端倪的。圣女贞德是个年轻姑娘。在别的时期，最高目标在于造福人类，于是神秘的冲动转化为明确的社会计划。但点燃象罗兰夫人和罗莎·卢森堡等女人胸中火焰的，也是对绝对的青春渴望。在屈从和破灭中，少女有时能从她对抗的深处鼓起过人的胆量。她可能富于葱茏的诗意，也可能做出英雄壮举。要面对自己与社会不相协调的事实，方法之一，对她来说就是要跨出她有限的见识圈子。

天性的富足强健，使得一些女人在良好的处境下，能将青春期热情的构想带进成年期。但这些是例外。乔治·艾略特和玛格丽特·肯尼迪，让她们的女主角玛吉和蒂莎年轻轻死去，不是没有道理的。勃朗特姐妹命运偃蹇。少女的动人，是因为她孤单、柔弱地与世界相抗。但是世界太强大了，如果她坚持对抗，它会把她碾得粉碎。贝勒·德·瑞兰以她的讽刺能力和独到的机智使欧洲眼花缭乱，同时也吓跑了她所有的追求者：因为拒绝丝毫让步，她就注定了要长年过着阴郁的独身生活，以致她公开宣称“处女与牺牲”（Vierge et martyre）一辞过于冗长。这是罕见的固执。大部分少女都看出这种挣扎太不平等，于是最后便屈服了。“你们都死在十五岁”，狄德罗为苏菲·沃兰写道。当抗争只是如平素所发生的一种象征性的反叛，那么失败就是必然的。多向梦中渴求，充满了希望，却又态度被动，少女博得大人们的只

是怜悯的一笑；他们期待着她顺从。果然两年后，我们发现这个一度古怪、难以管束的孩子，终于安静下来准备接受女人的生活。科利特为她的女主角文卡预示了这一命运，莫里亚克早期小说中的女主角们也复如此。青春期危机是一种堪与拉加盧医生所谓“悼亡的痛苦”相比拟的“痛苦”。少女慢慢地埋葬了她的童年，存封起她独立专横的过去的存在，俯首帖耳地着手成年人的生活。

当然，我们不能只按年龄把类分清楚。有些女人一辈子都象个孩子；我所描述的行为有时延续到高龄迟暮。尽管如此，在十五岁的嫩芽和“大女孩”之间，一般来说确实存在着很大区别。后者准备接受现实，她几乎不复在幻想的平面上前行；比起从前，她较少自我分裂了。玛丽·巴斯克赛夫在大约十八岁时写道：“越是接近我青春的尾声，我越是变得无忧无虑。以前什么事都骚扰我，现在没有什么能扰乱我了。”

艾琳·雷魏思特讲道：

为了让男人们接受，你必须象他们那样思想、行动，否则他们会视你为怪物，孤寂就成为你的命运。至于我，已经饱尝了寂寞，我要大家包围住我，与我同在……现在我要生活，我不要暗哑呆滞地存在、等待、梦想、自言自语。

她继续说：

> 由于被人恭维奉承、献殷勤等等，我变得异常的野心勃勃。那不再是十五岁少女颤抖、惊讶的快乐，那是一种报复生活、往上爬的冷冰冰、硬梆梆的狂怒。我调情，我在恋爱中逢场作戏。我并不爱……我增加知识，学会沉着冷静，养成洞察一切的习惯。我失去了内心的温暖。象是一次干净利落的决绝……二个月后，我已将童年抛在了身后。

下面一个十九岁少女的自白几乎如出一辙：

> 从前，啊，在那个似乎无法与现时代妥协的内心世界与这时代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冲突！如今我却意识到一种安宁。每一个崭新宏大的念头，在我心中都不再引起痛苦的骚动，或一种无休无止的毁灭与重建，而是巧妙地适应了我脑中已有的思想……现在我不知不觉、没有中断地从理念移向了实际生活。

少女终于接受了她的“女性”——除非她长得特别难看；在安定固着于生活中之前，她常常乐于不花什么代价地享受生活所提供给她的喜悦和狂欢。她还不受任何义务的约束，没有责任感，自由自在，但她并不就把“现在”视为空

洞或虚妄，因为它只是一个阶段。修饰打扮和调情，似乎仍然只是场游戏，而她有关未来的梦想，掩盖了它自身的无用、无益。在《浪》中，弗吉妮亚·沃尔芙通过大学中的一场谈话，如是记录了卖弄风情的少女吉妮的思想：

> 我感觉自己在黑暗中放光。丝绸兜住了我的膝。我的丝绸裹着的腿平滑地互相磨擦着。项链上的宝石，冰凉地垂在我的颈前……我盛装艳服，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的头发梳成一个大波浪。我的嘴唇鲜红。现在我准备去跟楼梯上男男女女的同辈在一起。我走过他们，任他们凝视，正如我凝视他们……在这种气息，这种光辉中，我开始舒放扩展，就象叶子蜷曲的小草舒展开一样……我感觉身上涌起千万种可能性。我一会儿调皮，一会儿快乐，一会儿倦怠，一会儿忧郁。我脚底生根，却又流动。所有的金黄都向那边流去了，我对这人说，"来……"他走近，面朝着我。这是我所体验过的最兴奋的时刻。我颤栗不安。我飘飘欲仙……我们不是愉快地坐在一起，我身穿绸缎，他著黑白两色衣裳？我的同辈们现在可能正望着我。男绅女仕们，我径直地回视你们。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这是我的世界……门敞开着。门继续敞开着。现在我想，下次门开时，我的整个生命都将改观……门敞开着。噢，来罢，我

对这个人说，全身流金溢彩。“来”！他向我走来。

但是当少女成熟，母亲的权威会更重地压在她身上。她讨厌做家务只当个助手，因为她愿意致力于她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孩子。她时常发现跟母亲作对是件很不痛快的事，要是还有弟妹出生，她就更加心神不宁。她觉得母亲已经生活过了，现在已轮到她生孩子，管家。如果她工作在外，她不喜欢回家后仍只被当作家庭的一员，而愿意被当作独立自主的人来对待。

不象从前那么浪漫了，她开始更多地考虑婚姻，而不是爱情。她不再用动人的光环来为她未来的丈夫增辉：她要的是在世界上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来开始她女人的生活。在刚才提到的书中，弗吉妮亚·沃尔芙描述了一个富有的乡村少女的冥想：

过不多久，在炎热的中午，当蜜蜂在蜀葵间嗡嗡飞动的时候，我的情人就要来了。他站在雪松下。我会用我的一个字来回答他的一个字。我将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他。我将有孩子；有系围裙的女仆，拿草耙的男佣；我将有个厨房，小羊羔生病时他们会把它带进来在篮子里取暖，厨房里挂着火腿，还有亮闪闪的洋葱。我将象母亲那样，系着蓝色围裙，不作声地锁起食橱。

在玛丽·韦布的《珍贵的毒药》一书中，柏绿·萨恩有类似的梦想：

> 永不结婚真是件可怕的事。所有的女孩都结婚……当女孩们结了婚，她们就有一间小屋，也会有一盏灯，好在她们男人回来时点亮。如果只有蜡烛那是一回事，因为她们可以将蜡烛放在窗口，他就会想"我的太太在这儿，点亮蜡烛吧！"于是有一天，贝奎迪太太将为她们编一个灯芯草的小床，等有朝一日一个小娃娃会睡在里面，好庄重，好神圣，洗礼仪式的邀请发出了，邻居们都跑来了，象蜜蜂围着女蜂王一样围着婴儿的母亲。当事情不顺利时，我经常对自己说："没关系，柏绿·萨恩！总有一天你会是你自己小巢里的女王。"

对于大多数成熟了的女孩，不论她们辛勤工作还是过着轻浮的生活，不论她们禁闭在家还是享受到一些自由，得到一个丈夫——或至少有一个固定的情人——成为愈来愈紧要的事。对这件事的关切，时常毁坏了女性间的友谊。"挚友"失去了她的光荣席位。少女把她的同伴看成是竞争对手，而不是盟友。我认识一个这样的女孩，聪明、天赋很高，她在诗和散文中形容自己是"遥远的公主"。她真诚地表示她对童年时的伙伴已毫无感情了：如果她们又丑又蠢，她会讨厌；

如果是妖媚动人，她则害怕她们。对男人的急切期待，经常与花招、计谋、屈辱联系在一起，这使少女的视野变得狭窄；她变成自私自利、冷漠无情了。而如果“魅力王子”迟迟不露面，倦怠、酸楚的情绪便会抬头。

少女的性格和行为都是她的处境造成的，如果处境改变了，那么少女也会面貌一新。今天，少女正逐渐可能将她的未来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把它委托给一个男人。如果她专心于学问、运动、职业训练，或一些社会和政治活动，她就不会一天到晚想着男人，也就不怎么留意她在感情或性方面的冲突。话虽如此，在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寻求自我实现上，她仍然要比年轻男子困难许多。如我所述，她的家人或社会习俗，都不赞成她在这方面的努力。

而且，即使她选择了独立，她也仍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为男人、为爱情保留一席之地。她很可能害怕如果全身心地投入于某项事业，她会失去女人的命运。这一感觉常常不被承认，但它确实存在着；它削弱已经确立的目标，设置界限。不管怎样，职业妇女希望将职业上的成功与纯粹女性的才能互相协调起来；这不仅是指她必须花许多时间打扮自己，而且更严重的是，还意味着她的生命乐趣被割裂开来。男学生在正规的工作之外，感兴趣于思想的自由驰骋，由此产生出他的绝妙灵感；而女人的幻想方向完全不同：她会关心自己的外貌，想男人，想爱情；在学问、职业上，她只满打满算地花费最为必需的一点精力，事实上在这些领域中，没有什么比

剩余精力更为必需的了。这并不是因为智力低、不能全神贯注，而是被分割开的各种兴趣难以协调一致的问题。一种恶性循环就此建立起来，而惊人的是看到一个女人一旦找到个丈夫，常常是多么轻易地放弃了音乐、学问、事业。显然，她对她那些设想投入的太少，以致她觉得不值得去实现它们。一切都联合起来抑制她的个人野心，而巨大的社会压力仍然怂恿她在婚姻中寻找社会地位和正当的庇护。自然，她不会试图靠自己的努力，在世界上建树自己的位置；如果要这样做，她也只有胆怯行事。只要社会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经济平等，只要风俗习惯还授权女人以妻子或女主人的身份从男人把持的特权中分享利益，那么，她不劳而获取得成功的梦想，就将持续地存在下去，从而阻碍着她自己有所成就。

但是，不论少女以何种方式步入成年，她的学徒期都尚未终结。无论是通过缓慢习得，还是突然触发，她必须要跨入“性”的门坎。有些少女回避这个问题。如果她们童年时受到过性的不愉快事件的伤害，如果错误的教育逐渐在她们心中培植、巩固起对性的恐惧，她们可能保留着对男性孩子气的深恶痛绝。此外，环境有时会迫使某些女人违心地延长处女生活。不过一般来说，少女迟早会实现她性的命运。如何接受它，显然与她过去的经验密切相关。但无论如何，它是在未曾料知的情况下发生的一种新经验，而她独立自主地做出了反应。现在，我们必须来认识这一新的阶段。

第三章　性的引入

在某种意义上说，性的引入对女人与对男人一样，开始于童年初期。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存在一个准备时期，从口腔、肛门、性器官阶段，一直导向成年，这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但是少女的性经验不仅仅是她前期性活动的延伸；通常，它们是突如其来的，不愉快的；而且它们在性质上，总是一种割断既往的新事件。当她实际经历着这些经验时，少女所有的一切问题都尖锐而迫切地体现在其中。在某些情况下，危机很容易度过；但也有悲剧例子，危机只有通过死亡或疯狂才能解决。在所有情形中，每一个女人当时对危机的反应方式，都强烈地影响到她的未来。精神病学家们都同意，女人的第一次性经验极其重要：它们的影响，贯穿她此后的一生。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处境”，无论在生理、社会和心理各方面，对男人和对女人，差别极大。对男人来说，从孩童的性到成熟的性，转变过程比较简单：性快感是具体的，欲望的对象是另一个人；而不是在自我的范围中实现。“勃起”

是这一需要的表现；一个男人用阴茎、手、嘴，用他整个身体迎向他的对象，但他自己却依然是这一活动的中心，因为整个来说，他是活动的"主体"，而不是被他看作的"物品"或者被他操纵的"工具"；他将自己投向对方而不失去自己的独立；女性的肉体是他的祭品，通过它，就象借助任何物品一样；他达到他所渴望的目的。当然，他并不能真正占有她们，但至少他拥抱了她们。爱抚和接吻暗示一种不完全的抗拒，但这种抗拒本身就是兴奋剂，就是一种快感。做爱在性高潮中完成，这是自然的结局。性交具有一定的生理结局和目的；在射精中男性解脱某种令他不舒适的分泌物。在享受快意的性激动之后，他获得了完全的松弛。当然，这种快感并不是唯一的目标；通常，失望之感随之而来；虽然他并非在各方面心满意足，但"需要"消失了。无论如何，一个确定的行为完成了，而男人的身体依然保留着他的完整；他传宗接代的任务，与他个人的享受合而为一。

女人的性欲则复杂得多，它反映出女性处境的复杂性。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种"的延续具有强大的驱使力，这种力与女性的个人生活并不统一；女性是"种"的牺牲品，"种"的利益与女性作为个体的利益无关。这种矛盾，在人类女性中达到高峰；举一点来说，它表现在两个器官——阴蒂和阴道——的对立上。在孩童时期，前者是女性的性感觉中心。虽然有的精神病学家认为，有些小女孩存在阴道的感觉，但这点有争议，而且它毕竟只属于次要的。阴蒂组织在成年后

并不改变，而女人终身存在这一性感中心；阴蒂的性高潮，和男性的一样，是一种膨胀的消退，在一种类似机械的方式中完成；但它与正常的性交仅仅有间接的联系，而它与“传种”毫无关系。

女人被戳穿、怀孕，是经由阴道完成的，必须通过男人的参与，阴道才会变成性感觉中心，而这总是一种“侵犯”。过去，女人经过真正的或假装的强奸，被从孩童世界拉出来，抛入“为人妻”阶段；将女孩改变成妇女，迄今仍是一种侵犯行为；我们仍说“摘走”一个姑娘的贞操、她的花，或者说“破了”她的处女膜。这种贞操破坏并不是一种持续演变的逐渐结果，它是与“过去”的突然断裂，是一个新周期的开端。此后，性快感来自阴道壁的收缩；这种收缩是否真的引致的的确确的性高潮？这一点仍有争论。生理解剖的论据相当模糊。金赛报告（The Kinsey Report）叙述如下：

> 有许多解剖学与临床的证据，显示出大部分阴道内壁并没有神经。阴道内壁可以进行许多外科手术，而不必用麻药。神经仅仅呈现于阴道内壁前段，靠近阴蒂的根部。

然而，除了这无神经区域的刺激外，

> 女性可以感觉到阴道中有物体戳入，特别是当

阴道肌肉收紧之时；但是，这样获得的满足，与其说是对性神经刺激的结果，不如说是肌肉收缩的结果。

然而阴道快感的存在无可怀疑；因此，对阴道的手淫——在成年女人中——似乎比金赛显示的更为普遍。但可以肯定的是，阴道反应极为复杂，可以看作兼具生理与心理的因素，因为它不仅涉及整个神经系统，而且还取决于个人的整体经验和环境；它要求女方毫无保留地接受。

首次性交从而开始了新的性感觉周期，这种周期的完成必须依赖神经系统的重新组合。必须绘制一种以前未有的图案，这包括阴蒂器官的参与。这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达成，有的人也可能永远没法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女人有两个系统可供选择，一种保持青春期的“独立”，另一种则将女人委托给男人与生育。正常的性行为实际上将女人置于依赖男人和“传种”的状态。正象大部分的动物，男性是侵略的角色，女性屈服于他的拥抱。通常，她能随时被男人占有，而男人却只能在勃起时和她发生关系。除非患有阴道痉挛症，使阴道封闭得比处女膜更有效，男性总能够强迫不愿意的女性；即使在阴道痉挛封闭的情况下，男人也能靠他的力气在她身上泄欲。既然她是“物”，她的麻木不仁并不太影响她的天然女性功能。事实证明，许多男人根本不费心去了解与他们同睡的女人到底是渴望性交呢，或仅仅是被动屈服。甚至与一具尸体性交，也是可能的。男人不愿意，性交不能发

生，男性的满足是其自然的结束。女人可能毫无快感而怀孕。但对她而言，怀孕绝不代表性活动过程结束；相反地，她对“传种”的服务此刻才算开始，这一过程缓慢而痛苦，要经历怀孕、生产和哺乳。

这样，“身体构造的命运”，对男人和女人大不相同，而同样具有差别的是他们在道德上与社会上的处境，男权文明将女人奉献给贞操；它多多少少公开地承认男人的性自由，而女人却被限制于婚姻。没被制度和律条所允许的性行为，对她是一种过失、堕落、失败和弱点；她应该捍卫她的美德、她的荣誉；如果她“屈服”，如果她“堕落”，她就被轻蔑；然而人们对她的征服者，即使责怪，也混杂着钦羡。从原始时代至今，性交一直被视为女人对男人的一种“服务”，男人给女人礼物或保证她的生活，做为酬谢。但所谓服务就是给自己一个主人；这种关系并非相互的。婚姻的性质，以及妓女的存在就是明证：女人给出她自己，男人付钱而且占有她。没有什么能阻止男人去做一个主人，去占有低劣的异性。与女佣私通的事，一向受到容忍。然而一个委身于车夫或园丁的中产阶级妇女，则会丧失等级地位。美国南方种族主义偏激的男人，一直为传统所允许与女黑人睡觉，这在南北战争之前和今天都一样，而他们以了不起的傲慢态度使用这一权利。但一个和黑人私通的白女人，在奴隶时代将被处死，在今天很可能遭到私刑。

一个男人要表达他和一个女人发生过肉体关系，会说：

他曾“占有”她，或“拿”过她；希腊人称一个不曾和男人有过关系的女人为“未被制服的处女”；罗马人说皇后美莎琳娜“没被征服”，因为她的情人中没有一个能给她完全的满足。因此，就情夫来说，爱的行为是征服，是胜利。即使别人的勃起常常被看作是种自发动作的可笑喜剧，每个男人却对自己的勃起怀有几分虚荣感。男性的色情词汇常常出自军队术语：情人象士兵般勇敢，他的器官胀满如弓，射精是“爆炸”；他谈及攻击、突袭、战胜。在他的性激动中，含有英雄主义的味道。“生殖行为”，贝达在一部著作中写道：

> 存在于一个体被另一个体的占据中；它一方面硬塞给人一个征服者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塞给人某种东西被征服的概念。的确，当人们谈起他们的爱情关系，即使最文明的人也用征服、攻击、突袭、包围、以及防卫、战败、投降的字眼，明显地将恋爱观念套入战争观念。性行为涉及一个人玷污另一个人；玷污者是骄傲的一方，而被玷污者，即使她同意，也蒙受一些屈辱。

这一说法引出一种新的神话：即男人将污浊沾染给女人。事实上，精液不同于粪便一类排泄物；人们谈及“夜间的玷污”是因为自然的目标没有达到；一个人不会因为咖啡会弄脏浅色衣服就说它是一种会污染胃肠的垃圾。反过来，

有人认为不洁净的是女人，因为她有“肮脏的排泄物”，会玷污男人。无论如何，沾染对方者并没有明显的优越地方。事实上，男人的特殊地位，来自生理上的进取角色和社会上的领袖或主人身份的合二为一；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功能上的差异，生理方面的区别才变得有意义。因为男人是世界上的统治者，他认为他的强烈欲望是他统治权的表征；性能力强的男人被说成是强壮的、有势能的——暗示着活跃和超越。但在女人一方，因为她只是一件“物品”，她将被形容为“温暖”或者“冷感”，也就是说，她表现的将永远只是被动的性质。

这样，女人性启蒙的环境、气氛，与环绕青年男子的环境大有区别。此外，女人的性态度，在她首次面对男性的时刻非常复杂。处女并不象人们所说，对性欲毫无所知，从而需要男人启发她的性感觉。这一传说再次暴露了男性的控制欲，表达出他的希望，即她在各方面——即使在她对他的渴望中——都无法独立。事实上，就男人来说，常常是因为与异性的接触而引起他第一次性欲望，相反地，大多数的少女在她们尚未真正感觉过爱抚的手之前，就热烈地渴望爱抚。伊莎多拉·邓肯在《自传》中写道：

> 我一向平坦的双乳，开始柔软地膨胀，我惊奇地感受到迷人却又使人窘迫的骚动。我的男孩般的臀部，增多了一层起伏。透过全身，我感觉到一种汹涌的萌升、渴望、冲动，以致夜里不能入睡，在

燥热而痛苦的不安中，辗转反侧。

斯坦克尔报道一个年轻女病人的经历如下：

> 我开始尽力去调情。我必须得到我当时所称的“神经挠痒者”。……我是个热情的舞迷，跳舞时，我总是闭起眼睛享受……跳舞时我有点暴露癖；我的性感似乎战胜了我的羞耻心……头一年我贪婪而兴奋地跳舞……我睡得很多，每天手淫，常常持续一小时之久……通常直到我满身大汗，疲乏得不能再继续下去才入睡……我整个人象着了火。我会接受第一个向我求婚的男人。我不寻找理想的男人，寻找的是任何一个男人。

事实上，处女的欲望并不以确切的需要来表达：处女搞不清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童年期进取的性意识还保留着；她的最初冲动仍是想抓拿，她还要拥抱、占有。她要那令人羡慕的牺牲品，它必须在味觉、嗅觉和触觉上，具有她认为是有价值的性质。因为“性”并非孤立的领域，它持续着早年“性”的梦幻和欢乐；不论男孩女孩，都喜欢平滑、如奶油般的、绒布的、柔和的、具有弹性的东西：即在用力时能够不折断、不变形，看起来摸起来光滑的东西。象男人一样，女人也喜爱柔和、温暖的沙丘，它时常被比喻为乳房；也喜欢

丝绸的轻柔感觉、鸭绒的细致棉软，花与果表面的粉霜；少女尤其爱淡而优美的蜡笔色彩，爱轻雾般的薄纱和细棉布。她不喜欢粗布、砂砾、粗雕刻、苦味道、酸气味；正如她兄弟，她最初爱抚和珍惜的是她母亲的肉体。在她的自恋中，在她或模糊或明确的同性恋经验中，她的行为是主动的，寻求占有一个女性的身体。当面对男性时，她在自己的手中和唇上，感觉到一种主动去爱抚一个祭品的愿望。粗鲁的男人——硬肌肉、粗糙而时常多毛的皮肤、强烈的体臭、粗大的五官——并不吸引她；他甚至显得可憎。

如果女人的抓拿、占有倾向，一直强烈保持着；那么她——就象雷妮·魏斐安一样——将向同性恋方向发展。否则，她将选择可以象女人般对待的男人；拉契德的小说《维纳斯先生》中的女主角就是这样，她为自己买下一个年轻的男人；她享受热烈地爱抚他，但不让他戳进她。有的女人喜欢抚弄十三、四岁的男孩，或者甚至是男童，但却回避成年男人。但我们已经知道，大部分的女人自童年就培养出被动的性感；女人喜欢被拥抱、被爱抚，特别在青春期后，她要在男人的怀里变为肉体；她知道主动的角色通常由男方担任。人们一再告诉她"男人不需要长得好看"；她不应该在他身上寻找"物"的无能性质，而应该寻找力量和阳刚力量。

这样一来，她自我分裂为二；她渴望着能使她战抖的强有力的拥抱，但粗鲁与暴力却使她厌恶，失去反应。她的感觉既存在于皮肤中，也存在于手中，而这两方的要求却是部

分对立的。她尽可能地选择折衷，她将自己给予一个雄赳赳的，但却年轻英俊的男人；而在一个潇洒的少年男子身上，她能找到她所羡慕的一切诱惑。在圣经的"雅歌"中，夫妇两人的喜悦具有一种匀称美；她在他身上找到他在她身上寻求的、大地的动物与植物、珍贵的宝石、河流、星辰。但她缺少取得这些财宝的工具；她的身体构造迫使她象个阉人一般笨拙和无能；占有的希望由于缺少一个表证它的器官而落空，没有结果。无论如何，男人总会拒绝接受被动的角色。通常，环境使得少女屈服于一个用爱抚使她心动的男人，虽然她对这个男人的外貌毫不喜欢，也无意爱抚他。人们很少注意到，在混杂于她欲望的厌恶中，不仅含有对男性侵略的恐惧，还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女人获得的性快感，与她自发的性感冲动是对立的；而男人在触摸与视觉中获得的快感，却与那特殊的性快感同出一源。

然而，甚至被动的性感也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任何东西比"摸触"更为模棱两可。有许多男人，不怕操纵各种器物，却厌恶碰到植物或动物。女人的肌肤在接触丝绸或天鹅绒时，可能欢快地微微颤动，也可能厌恶地抖动。我记得我年轻时一个朋友，一看见桃子就起鸡皮疙瘩；从"不适"到"愉快搔痒"，从"惹恼"到"快感"，转变很容易；围抱身体的手臂可能是种保护、是避难所，但也可能是监狱，让人窒息。处女因为自己的矛盾处境，因而保留这种模糊不清：可以引致她彻底改变的器官，是封闭着的。她肉体的含糊而炽热的

召唤传遍她整个身体——只除了性交必须涉及到的那块地方。没有任何器官能让处女满足她主动的性欲；而她对那注定她被动身份的器官，也没有实际经验。

虽然如此，她的被动还不是单纯的迟钝。被激发起性欲的女人，必定呈现某些积极的现象：性感区域的兴奋、勃起组织的膨胀、分泌液的产生、体温的上升、脉搏与呼吸的加快。正象男人一样，女人的欲望和性快感要求付出极大的力气；虽然是接受性的，但女人的性渴望也可以说是主动的，它表现在神经与肌肉的紧张状态中。感觉迟钝、无精打彩的女人总是冰冷的。至于女人是否有它生理构造上的性冷感，仍然存有疑问，而心理因素确定对女人的性能力大有影响；但无疑地，生理的欠缺与活力的降低，部分地体现在对性的漠不在乎态度中。

另一方面，如果主要的精力消耗在自主的活动中，比如运动，那么它将不被引入“性”的渠道；北欧女人健康、强壮，但却冰冷。热情的女人是那些将“火”带进“倦怠”中的女人，象意大利和西班牙女人——也就是说，是那些仅仅靠肉体的松弛来消散热情活力的人。“使”自己变成物，“使”自己被动，与“身为”被动之物不同，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既没沉睡也没死去；在她体内有一股潮不断上升下降：退潮带来暂时休息，使欲望保持新鲜活跃。但热情和放荡之间的平衡，是很容易破坏的。男性的欲望是紧张；它能传遍全身，收紧神经与肌肉；身体的姿式和动作使特定器官自主地参与

性行为，使性行为得以发展，而不是妨碍它。相反地，女方的一切自主的努力，都阻碍女性肉体被“拿”；这就是为什么女人自发地拒绝要求她的努力与紧张的性交方式；突然或太多的姿势改变，任何要求有意识指导的活动——无论是言语或行为——都会中断沉迷的享受。放肆的热情形成的压力，可以产生恼怒、收缩、紧张；有的女人用手抓或用口咬，身体僵硬，力气剧增；但这些现象只在达到某种爆发状态时才出现，而要达到这种状态，必须让一切禁忌——身体的与道德的——统统消失，而将全身的活力完全集中于性行为上。这就是说，少女的“让自己放松”是不够的；温顺、懒怠、心不在焉，就既不能满足对方，也不能满足自己。在这件由于禁忌、限制、偏见和强求而使她的处女身体与心愿并不积极渴望的事情上，她却被要求主动而积极地参与。

我们不难理解，在这种状况下，女人的“性”导引实在不容易。我们已经知道，童年期或青春期所发生的事故，常在她心中筑起抗拒的高墙，有时永远无法克服；但通常少女继续活下去，不理睬这种抗拒，但随之会导致严重的冲突。她所受的严格教养、她对犯罪的恐惧、她对母亲的罪咎感，都制造出强大的障碍。在许多社会中，贞操如此受重视，如果在合法婚姻之外丧失了它，被看作是真正的灾难。由于冲动或意外而屈服的少女，觉得自己丧失了名誉。新婚之夜，处女被奉献给一个往往不是真正由自己选择的男人，任其摆

布，而在数小时——或数分钟——内，要完成她全部的性引人，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一般而论，任何转变都令人沮丧，因为它们具有确定而不可挽回的性质：变成一个妇人，就意味与过去永远断绝。而这一转变比任何其他转变更具有戏剧性；它不仅造成昨天与明天之间的裂痕，而且将少女从她一向沉溺的想象世界，抛入真实世界。以训练一头牛为比喻，米歇尔·莱利斯称新婚之床为“真实之物”（“the real thing”）；对于处女，这一说法的确有最丰富而可怕的含义。在订婚、调情、追求阶段，是婚姻的序幕，她继续生活在她所习惯的仪式和梦幻的宇宙中；她的追求者以罗曼蒂克的，或至少是客气的口气谈话；还可以继续玩捉迷藏。但突然间，她发觉自己被真实的眼睛凝视，被真实的手掌抓住：这凝视与抓握的毫不容情的真实，吓住了她。

引入者的角色，在生理构造和传统习惯上，属于青年男人。当然，童男的头一个情妇也会给他指导；但即使如此，他有性独立；他的情妇仅仅实际地供给他早已渴望之物：女人的身体。少女却需要一个男人向她展示她自己的身体：她的依赖性深得多。不论男人是付钱寻欢，或多少以追求方式引诱她，从最早的经验开始，男人通常是主动的，有决断的。相反地，在大多数情况下，少女则被追求，被说服；即使是她先挑逗男人，他却是控制他们关系的一方；他通常年纪较大，较有经验，而他倒也真的应该负责这件对她是崭新的事；他的欲望是更为主动而专横的。不论他是情夫或丈

夫，是他领她到床上，而她只须将自己给出，听从他的吩咐。即使她心里接受了这种支配，在她必须实际接受的片刻，她却变得恐慌。

首先，她避免那包罗一切的凝视。她的害羞心理部分是学来的，但也有很深的根源。男人女人都对自己的肉体感到羞耻；在它纯粹的、不活跃的状态中，在它不合理的含蓄中，肉体在他人的凝视下是种荒谬的偶然之物，然而它却是"自己"，哦，别让它为别人存在！哦，怎样能否认它！有的男人说，除非在勃起时，它们无法忍受在女人面前赤身裸体。而的确，透过勃起现象，肉体变得活跃、有力量，性器官不再是麻木无能之物，而变得象手象脸，具有自主的专横表情。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更容易被羞耻击倒；由于男人的进取角色，他们较少受到凝视；若被凝视，他们也不怕被人判断，因为他们的情妇要求他们的，并非麻木迟钝的性质；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他们做爱的能力和给予对方快感的技巧；至少他们能保卫自己，并试着赢得胜利。女人则不能任由自己意愿改变肉体：当她不再遮掩它时，她也就毫无防卫地将它让出；即使她渴望爱抚，她却反对被看被摸；更因为她的胸脯和臀部特别丰满；许多成年女人即使穿着衣服也不喜欢让人从背后看她。而我们不难想象一个恋爱中的新手，在同意让她自己被凝视时，必须克服何等的心理反抗。无疑地，弗绿恩不需要害怕男人的注视；相反地，她高傲地展露自己——她一身美色。但一个少女即使象弗绿恩一样美，

她却永远不能对此肯定；除非男性的赞同已经肯定了她年轻的虚荣心，她是不能骄傲于自己身体的。而就是这一点使她充满恐惧；她的情人比起凝视更为可怕：他是个法官。他会将真正的她向她自己揭示。虽然每个少女都热情地迷恋自己的形象，但在受男性宣判之际她却没有信心；于是她希望熄灯，她藏在被子下面。当她在镜中欣赏自己，她仍然只是梦见自己，仿佛透过男性的眼睛梦见自己；现在真正的眼睛就在那里，无法欺骗，无法挣扎：一个神秘的自主之人将下判决——而且再不能上诉。在性经验的实际考验中，童年期与青春期萦回的忧虑终于消散，或永远固定成形。许多少女对于太粗的足踝、太小或太大的乳房、太瘦的臀部、某个疣肿都会感觉沮丧；而她们时常害怕某种隐藏的变形。根据斯坦克尔的报告，所有少女都充满荒谬的恐惧，暗中相信她们可能生理上不正常。比如有一个少女认为肚脐是性交的器官，看见它是封闭的，便心中不安。另一个少女以为自己是个两性的阴阳怪物。

不受这种忧虑纠缠的少女，通常担心自己身体的某些并不存在的部分会突然冒出来。她的新模样会不会引起厌恶？冷漠？讽刺？它必须经历男性判断的考验：总结算的时刻来临。这就是为什么男人的态度将对女人留下深刻而永久的影响。他的热诚和爱情可以给予女人信心，对她很有帮助：她直到八十岁，都会相信自己是那曾在某夜促使一男人萌发欲望的花朵，是被人爱的人。另一方面，一个笨拙的情人或丈

夫可能引发女人的自卑感，有时会更进一步造成永久的神经病症；而女人可能感到如此深的怨恨，从而导致执着的性冷感。斯坦克尔报道过显著的例子：一个女人多年来一直患恶性背痛与性冷感，因为在新婚之夜她非常疼痛，而丈夫又指责她骗他，说她不是处女。另有一个丈夫批评他新娘的腿过于粗大，她立即感到冷漠，从此性冷感，后来又有了神经方面的问题。另一性冷感的女人诉说她丈夫如何残忍地抱怨她过分纤瘦。这类例子俯拾不尽。

被凝视是一种危险；被粗暴地对待是另一种危险。女人通常都不熟悉暴力，她们不象男人般在童年期与少年期经历过打斗；而现在，少女却在男人占上风的这种身体搏斗中，被捕捉，被掳劫。她不能再自由自在作梦、拖延、操纵：她在他控制中，由他摆布。这些象肉搏的拥抱使她害怕，因为她从来没有打斗过。她习惯于一个未婚夫、同伴、同事、一个有礼貌有修养的男人的爱抚；而现在的他现出古怪的一面，顽固而自我中心；她无助地面对这陌生人。少女的首次性经验常常如同被强奸，男人的态度粗野可憎。在乡下，或任何不重礼节的地方，乡村少女常常半推半就地在河渠中失去贞操，心里充满羞耻与恐惧。无论如何，在各种社会圈子和阶级中，最常发生的情形，就是处女或者被一个只关心自己欢乐的自我中心的情人，或者被一个操有婚姻权利的丈夫突然间“拿”去。如果妻子抵抗，他会感到受辱；如果戳入困难，他甚至发脾气。

此外，不论男人多么恭敬有礼，首次的戳入总还是一种侵犯。因为她渴望口唇或乳房的爱抚，或甚至渴盼一种体验过的或想象中的进一步的性快感；而所发生的，却是男人的性器官撕裂少女，并戳入并不渴望它的领域。许多作家描写过处女的痛苦意外——迷醉地躺在情人或丈夫的怀中，心想终于将要成全她的肉体之梦，却突然感到自己隐秘的性器官一阵意外的疼痛；于是梦幻消失，兴奋退尽，而爱情变得如同外科手术。

在利普曼医生收集的自白中，我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女孩出身于一中等家庭，对性方面非常无知。

> "我以前总以为接吻就会怀孕。十八岁时我遇到一位男士，深深迷恋上他。"她常常与他外出约会，而在他们谈话中，他告诉她如果一个少女爱一个男人，就应该委身于他，因为男人没有性关系就活不下去。如果他们没有足够钱去结婚，也必须和少女发生关系。她坚持不答应。后来他安排远途旅行，使他们一同过夜……她反对，但她爱他，而且心志被控制，跟他进了一家旅馆，求他放了她……抗拒良久，他终于使她安静下来；她不再是自己的主宰，于是让他行事。她只记得她全身剧烈抖动。事后，在街上，她觉得一切是场恶梦，她会醒转过来。她与这男人断绝来往，此后九年没交男朋

友，再之后她便结了婚。

在这一例子中，处女的破坏就等于强奸。但即使在自愿的情况下，初次性交也可能是疼痛的。我们知道年轻的伊莎多拉·邓肯曾经多么狂热。当她遇到一个英俊的演员，就一见倾心；而且他也热情地追求她。

> 我也同样激动而眩晕，一种不可抑制的贴紧他身体的欲望在我体内涌起，直到有一夜，他失去一切控制而陷入一阵疯狂，将我拥抱到沙发上。惊吓、但狂喜，又痛苦地叫着，我便被引入爱的行为中。我承认我最先的印象是可怖的惊吓与尖锐的疼痛，仿佛我一下被拔去几根牙齿，但是他显然也为之受苦，我对他的巨大怜悯，阻止我当时逃离开这纯是纯粹的残害与折磨……第二天，再一次重复这一痛苦经验，我在殉难者般的哭声与眼泪中忍受下来。我感觉仿佛被乱砍了一气。

但不久她却开始享受——首先与这个情人，然后又与别人——她用抒情笔调描绘了“极乐狂欢”。

然而在实际经验中，正如以前在处女的冥思中，最重要的倒并不是身体的疼痛：戳入的事实更重要。性交时男人只用外在的器官，而女人却被深深侵入身体内部。无疑地，许

多年轻男人在探入女人的秘密黑暗之际，心中也有担忧，再一次感受到了童年时在山洞口或墓穴口体验的恐惧，害怕那狭窄的入口、害怕镰刀、怕陷阱：他们想象自己胀大的阴茎，可能被箍在胶质的套中。女人一旦被戳入，就没有这种危险感；但她却感觉她的肉体被侵犯。

土地拥有者维护他对土地的权利，管家维护她对住宅的权利——“不许侵犯！”特别是女人，由于她在自我超越方面受到的挫败，于是非常吝啬地保卫她身边之物：她的房间，她的橱柜，她的箱子，全是神圣之物。科利特叙述说，一个老妓女有一次告诉她：“夫人，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进过我的房间。巴黎已经够大了，足够我去做必须和男人交往的事。”她如果占有不了自己的身体，她却能占有一块别人不能侵犯的小领域。

但是少女除了自己身体外，简直没有什么可以称作属于自己的东西：身体是她最宝贵的财富；进入她里面的男人将这一财富从她那里“拿”走，这习惯说法与实际经验相符。她预料的屈辱变为实际的经历：她被制服，被迫同意，被征服。正如大多数雌性动物，她通常的性交姿位是在男人下面。阿德勒强调由此导致的自卑感。从孩童时期起，凌驾与低劣的区分极其重要；高高爬在树上就了不起；天堂在世界上面，地狱则在下面；跌倒、下降就是失败，上升就是成功；在摔跤扭斗中，将对方的肩膀压下触地便是胜利。而现在，女人以失败的姿势躺卧；更糟的是，男人骑在上面，就象骑

一头受制于口嚼缰绳的动物。她总感觉被动：她被爱抚，被戳入；当男人主动地发挥他自己，她却只经历性交。不错，男性器官并不是条纹状的自主肌肉；也不是犁头或者刀剑，而只是肉体；但是，男人给它一种自主的动作；它来回动作、停止、又动，而女人只是顺从地接受。决定做爱姿势的总是男人——尤其当女人是新入门者时——而他又决定性交持续时间和间隔周期。她感觉自己是工具；全部自由都在对方手中。有句诗意的话，说女人是提琴，男人是她颤抖的乐弓，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做爱中"，巴尔扎克说，"除了灵魂的问题外．女人就象一把七弦琴，只将自己的秘密给予一个知道如何弹它的男人。"他从她身上"取"快感；他"给"她快感；这些习惯字眼暗示出性交中缺乏互动关系。

女人很早就被灌输以习俗的观念，认为男性的热情是光荣的，而女人的性感觉则是可耻的：女人的切身经验证明了这种不平等的事实。我们不能忘记，少男与少女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获得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少男很容易接受自己的身体，并对它的欲望感到骄傲；而少女不管如何自恋，身体却是个奇怪而令她不安的负担。男人的性器官象一根指头一样简单而干净，它明显可见，也常常被骄傲地展示给友伴，并且互相比较；但女性器官即使对女人自己，也是神秘的，它是封闭的，胶粘而潮湿；它每月流血，又常常被身体的排泄物弄脏；它自身具有秘密而危险的生命。女人不在它之中体认自己，这就大部分解释了女人为什么不将它的欲望承认为

自己的欲望。因为这种欲望的表达方式十分难堪。男人“变硬”，而女人“变湿”；这字眼中含有童年尿床的记忆，那种有罪的、不由自主的、对要小便的屈服。男人对于夜间不由自主的射精，也感觉同样的厌恶。射出一种液体，不论是小便或精液，并不屈辱：它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但如果液体被动地流出，则是屈辱的事，因为这样一来，身体就不再是个受大脑控制、能表达意识的由肌肉、神经、括约肌组成的有机体，而变得象个容器，由麻木之物构成，而且由变化无常的机械力量支配的玩物。如果身体漏水——象古老的墙或者尸体会漏水那样——身体好象在分化为水，而不是在射出液体：这是种可怕的分解腐化。

女人的性欲象是软体动物的轻微颤动。男人冲动，女人却只是“等不及”；她的期待可能变得热烈，却还是被动的，男人象鹰隼般扑向他的牺牲品；女人则埋伏等候，象吞食昆虫的植物，象吞噬小孩的泥炭沼泽。她吸收、吞噬，她是腐植土、漆胶、一种被动的混合流体，滑溜而胶粘：至少她隐约地感觉自己如此。因此，她心中不但存在着对男性征服意向的抗拒，还有自身的矛盾冲突。在教育与社会加在她身上的禁忌和压制之外，又增添了性经验本身带给她的厌恶感与否认感：这些影响互相加强，以致于女人常常在首次性交后，对她的女性命运比以前更加反感厌恶。

最后，还有另一种因素常常使男人变成女方的敌人，而使性行为变成一种严重威胁：这就是怀孕的危险。对一个未

婚女人，私生子是她社会名誉和经济的不能承受的负担，以致于少女在得知怀孕时可能自杀，还有些未婚母亲弄死她们的婴儿。这样巨大的危险构成一种性的约束力，足以使许多少女保持传统所要求的未婚贞操。即使当这一约束力不够强大时，少女也不免害怕她情人身体内隐伏的可怖的危险。斯坦克尔提到一些实例，其中这一害怕十分清楚地被感受到，有时是在性交时表达出来，比如："只要没事就好了！不知是否安全！"纵使在婚后，由于健康情形或经济问题，小孩可能也不受欢迎。

如果女人对于她的伴侣——不论情人或丈夫——没有十分的信心，她的性欲将由于谨慎而丧失。或者她将一直焦急地等待男人的一举一动，或者，她将被迫在性交后起身，设法清除射入她体内的精液。这一卫生程序和肉体的爱抚陶醉太不相称；在相互欢乐的结合之后，它却将两个身体完全分开。在这一刻，男人的精液就象有害的细菌，是惹人厌烦的东西；她洗涤自己，就象洗涤一个肮脏的容器，而男人却在最高的松弛完整中休息自己。一个离过婚的年轻女人告诉我，她在新婚之夜并未获得快感，而她必须找浴室而她丈夫毫不在乎地在抽烟，她心中即刻萌发起厌恶；她婚姻的失败，好象在那一片刻间已经决定。对注射器和洗涤器的憎恶，无疑常常是女人性冷感的原因。

获得较可靠和自然的避孕方法，是女人性解放迈出的一大步。在一个这些进步方法普及的国家，例如美国，少女结

婚时还是处女的，人数远比法国少。这些方法，无疑在性行为中提供了较为自由和无虑的心情。但即使如此，少女在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物”之前，必须克服某种憎恶感；她无法轻易接受被男人戳穿这一概念，而她勉强让男人为了自己求欢而“填塞”她，也不是件愉快的事。不论她用堵住宫颈方法或者用杀精棉塞来避孕，一个懂得并不是每次都能获得身体与性快感的女人，总会因为这类冷静的事先准备而懊恼——而且许多男人也不喜欢使用这类安全品。“性”的各种动作只有在如下整体性的场合中才是合情合理的：当冷静分析时显得应该反对的行为，在两个身体被性冲动转化之际，却变得十分自然；而相反地，当身体与行为被分析为单个的、无意义的成份，这些成份就变得卑污、猥亵。被看作联姻、与爱人结合为一的戳入行为，使恋爱中的女人狂喜，但如果它发生在缺乏性兴奋、性欲和性快感欢乐的情况时——比如有计划地运用避孕物可能造成的情况——则它将恢复小孩想象中那种外科手术式的卑污性质。无论如何，并非每个女人都能获得这种避孕用品；许多少女全然不懂任何防止怀孕威胁的方法，而焦急地认为她们的命运全依赖她们所委身男人的好心。

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个障碍重重、份量沉重的考验，会常常导致严重的心理创伤。有时，首次的性经验会将隐伏的精神病引出到表面。斯坦克尔在«妇女的性冷感»中，举了许多例子。下面是其中两个例子的摘要。

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患极度的精神错乱，呼喊着她不要，她不要，而扯掉自己的衣服。在医院她安静下来，但后来变得狂癫不治。调查结果，得知她曾痛苦地爱着一个男人，却在同时与另一个男人同度数夜，允许他有亲密行为，虽然可能勉强保留了处女之身。这一切，与她自幼的教养和信仰相违背，从而引起冲突，她只好躲藏到疯狂之中。（第1卷，第76页）

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女人，因为极度沮丧并发生幻觉，被送到精神病院。当斯坦克尔诊视她时，她注意不到探望她的人，脸上现出恐怖，并象在抗拒性攻击。突然她的表情变为快乐，喃喃道出亲昵的字句，并显然模仿性引诱的镜头。后来查知她曾与一个已婚男人有过性关系。过了一段时期，她终于病愈，但拒绝与男人交往，甚至回绝了一次求婚。（第1卷，第81页）

在其他例子中，这样引发的病可能没有这样严重。对失去贞操的悔恨，可能导致各种恐惧症，比如病人可能沒道理地害怕从马桶座意外地怀孕，或者跳舞时，或者由别针之类的东西伤到处女膜等。等在斯坦克尔的病例中，有个女孩终于向她的未婚夫坦白一切，嫁给他而痊愈。在另一病例中，沒

有性快感的委身，导致了悔恨与过度的自卑。该病人后来找到另一个爱人，他给了她满足并娶了她，她于是恢复正常。

一个维也纳女孩对斯坦克尔叙述她初始的性经历：

> 尽管她有过各种早年经验，但她的“引入”对她却是桩新奇的事。简单地说，有两三次她与不同的男人在车中、公园中、公寓中热烈一阵，但却不失处女之身摆脱出来，虽然她一心好奇，并且渴望“刺激”；后来她终于在一次旅行中遇到一个游客，接受了他的亲吻。在树林中，他们互相裸露，并做性游戏，两天之后，不顾她的哀求，他使用暴力残忍地戳破了她。她以为她就此订了婚，但他对她说了些粗鲁的话后，让她独自回维也纳。流着血，哭泣着，她将此事告知不同情她的母亲，也告知她做事的公司里的男朋友。他很好心，继续爱慕她，但在对她亲密时，她感到一种可怕的羞耻。她遇到另一个男人，与他性交时她完全冰冷，只感觉憎恶。在经历另外几次不令她满足的恋爱，以及经过精神病院里的一段治疗之后，她遇到又一个男人，与他结了婚，她的性冷感在婚姻中消失。（第348页）

在这些许多事例中挑出的病例里，男人的兽性，或至少事件发生的突然性，是导致创伤或引起憎恶的因素。性引入

的最理想情况是，不用暴力，不使女孩感到意外，不照一定程序，也不故意拖延，而让少女慢慢学会克服自己的羞耻心，认识对方，并享受他的做爱。从这一观点，我们只能赞赏美国年轻女人所享有的，而且法国女孩开始为自己争取的那种行动自由：她们几乎不知不觉地从接吻、爱抚进入彻底的性关系。禁忌一旦失去，一旦对她尊重的男伴感到更自由，而他的男性支配态度趋于消失，那么“引入”就顺利得多。如果她的情人也年轻，也是胆怯的新手，与她平等，那么女孩的压抑心理会减弱；但在这种情况下，她成为“妇女”的转变，将不是太深刻的改变。

正是这样，科利特作品《玉蜀黍》中的维卡，在经历了困难戳人的第二天，却显得十分安详，使她的男朋友菲尔惊讶。事实上，她并不觉得她被“拿”，相反地，她觉得骄傲于摆脱了处女之身，她沒体验压倒一切的惶惑感。实际上，菲尔大可不必惊讶，因为他的女友并沒有真正认识男性。而克劳丁仅仅在雷诺怀中跳一次舞之后，却不能说沒有受伤。我知道一个未成熟的法国女孩，与一男孩同过一夜之后，一大早就跑到朋友家里宣布：“我和C睡过觉了，真是太有趣了。”一个美国大学的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们在真正变成“女人”之前，就失去处女之身；她们的男朋友太尊重她们，因此不撼醒她们的羞耻心，而他们自己也羞于引发女孩错综复杂的心情。

有的少女为了松弛她们性方面的紧张，一次接一次地投入性经验中；她们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解除自己的好奇心以及

对性的执着兴趣。但她们的行为留有些许理论性质，使它们象其他女孩盼望未来梦幻一般，同样不真实。由于挑战、害怕或清教徒式的理性而将自己给予对方，则不能经验真实的性感；只能获得一种不太冒险、沒什么味道的性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性行为不会带来焦虑和羞耻，是因为感情保持肤浅，而肉体并沒有被欲望所改变。这些失去贞操的处女还只是少女；很可能当她们真正面对一个色情而熟练的男人时，会作出处女式的反抗。她们可以说仍旧停留在“尴尬的年岁”；爱抚挑逗她们，接吻常使她们发笑，她们将肉体之爱看作一种游戏，而当她们无意做此游戏时，情人的要求马上就显得粗鲁、不合时宜；她们保留憎恶和恐惧感，以及青春期的羞怯心理。如果她们永远离不开这一阶段——按美国人的看法，许多美国女人就是这样的——她们将在性的半冷感状态中度过一生。只有在性欲和快感中完全接受肉体的女人，才能达到真正的性成熟。

然而，这并不是说性欲强烈的女人就沒有困难。事实可能恰好相反。女人的性兴奋可以达到一种男人无法知道的强烈程度。男人的性兴奋是锐利的，但却是局部的，除了达到高潮的片刻可能例外，男人在性活动中一直是自己的主宰。反过来，女人则会真正丧失理性；这效果对许多人来说是爱情的最肯定、最肉感的片刻，但它也有一种可怕而不可思议的性质。男人有时可能会害怕一个女人在他怀中如此忘形，会成为她自己神经错乱的牺牲品。她所经验的狂乱对她的改

变，远远比男人侵略性的激情改变男人更为深层。这阵狂热使她在这一刻失去一切羞耻心，但事后她觉得可耻，害怕去想它。如果她高兴地——甚至骄傲地——接受它，那她必定是在快感的温暖中尽情地舒展了自已；只有在欲望获得完全满足时，她才能承认这种欲望是存在的，否则她会愤怒地否认它们。

现在我们将要谈到女人性欲的一个严重问题：在女人性生活的开始，她对男人的投降得不到肯定的性快感的补偿。如果在她投降时乐园园门就能打开，那么牺牲了羞耻心与骄傲感，并不怎么困难。但我们已经谈过，在年轻恋人中，处女膜的戳破并不是愉快的事；反过来，在戳破的同时获得快感是少而又少的；阴道的快感并不能马上获得。依据斯坦克尔的统计——许多性学家与心理分析学家也同意——一百个女人中，仅仅有四人一开始就享受到性快感高潮；五十人在经过数周、数月、或甚至数年后，才达到阴道的性高潮。

在这点上，心理因素占有主要地位。女性的身体特别容易受心理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女人心理与机体之间，通常有紧密的关联。一个女人的道德禁忌阻止性感觉的产生；得不到性快感的补偿，这些禁忌就趋向加强并形成一层更加坚固的阻碍。在很多情况下，一种恶性循环就此开始：男人的笨拙，一个字眼、一个粗野动作，一个高傲的微笑，会影响整个蜜月，或甚至整个婚姻。而年轻女人，失望于没有立即的快感，于是产生憎恨的感觉，这对以后的相互关系，是非

常不利的。

当然，在正常的满足达不到时，男人总能采用刺激阴蒂的办法加以补偿，这一方法，尽管道德主义的说法不同意，到底能带给女人性高潮和让紧张得以松弛。但许多女人拒绝这种方式，因为它比阴道的快感更加显得是硬塞给她的；而即使女人也象男人一样自我中心，一心只顾自己性欲的释放，她也会不满意太明显地给她快感的努力。“使对方获得快感”，斯坦克尔说，“就等于控制对方；将自己给予某人，就是放弃自己的意志。”女人如果感到快感是自然而然地来自男人所感觉的快感，如正常的性交成功时达到的情形，那么她比较容易接受它。正如斯坦克尔所说的：“当女人不觉得她们的对方想征服她们，就会乐意屈服”；反过来，她们一旦觉出他们的征服欲望，就会反抗。许多女人厌恶被男人用手激发性欲，因为手是一种工具，它并不参与快感本身，它不代表肉体，只代表活动。如果男人的性器官也只象个被人熟练运用的工具，而不象被欲望充满的肉体，女人将会感到同样的憎恶。此外，任何这类的弥补对她都象在证明障碍的存在——一种阻止她体会正常女人性快感的障碍。斯坦克尔在多方观察之后，认为所谓性冷感女人的性欲，趋向于正常女人：“她们要以她们认为是正常的方式获得性高潮，因为其他方式都不符合她们的道德要求。”

因此，男人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他的欲望狂暴鲁莽，他的对方会觉得在他怀中变成物；但如果他过于自制，

太疏离，他就不象肉体；他要求女人变为物，丝毫却不让她掌握他。在这两种情况下，她的自尊心都会反抗；她如果要让转变为肉体和她的自主要求互相妥协，她就必须在变为他的牺牲品的同时，也使他成为她的牺牲品。这就是女人常常固执地保持冷感的原因。如果她的情人缺乏诱惑力，如果他冷漠、疏忽、笨拙，他就引不起她的性欲，或不能使她满足；但如果他男性化而且技巧熟练，也可能引起拒绝的反应；女人害怕他的控制。有些女人在胆怯的、先天贫弱的、或甚至半阳萎的男人身上得到享受，因为他们不值得害怕。

此外，男人很容易在他情妇心中激起痛苦与憎恨的感觉。而憎恨是女性冷感的最常见的根源；女人在床上，以侮辱对方的冰冷来惩罚她认为他对不起她的一切。在她的态度中，常有显而易见的挑衅性自卑，比如一个女人会说："既然你不爱我，既然我有令人讨厌的缺点叫人看不起，我将再也不纵情于爱情、欲望和快乐。"这样，她同时向他和向自己进行报复——如果他曾经以慢不经心屈辱了她，如果他曾经令她嫉妒，如果他迟迟不公开他的心意，如果她想结婚而他只将她作为情妇。即使开头非常快乐，怨恨也能突然燃起，从而导致这种反应。男人一旦引起对方这种敌意，就很难克服它；但是爱情或者尊重的有力证据，可能会有所帮助。对情人挑衅的一些顽强的女人，曾因获得结婚戒指而改变态度——快乐、得意、心境宁静，所有的禁忌都消失了。然而一个值得尊重、爱恋而敏感的新情人，最容易将一个被残酷对待的

女人转化为一个快乐的情妇或妻子；如果他将她从自卑感中解放出来，她会热情地献出自己。

斯坦克尔对女人性冷感的研究（上文多次引录）主要在于表明造成这种状况的心理因素。他的许多例子都明白地显示，通常最主要的因素是对丈夫或情人的憎恨。比如在一例中，一个年轻女人期待着婚后才将自己给出，虽然她自视为“解放女性”，但没有坚持这一点。事实上她是个传统礼教的奴隶，而当男方对她的话信以为真，她就逐渐失去性感能力，终于拒绝了他过迟的求婚。她甚至考虑自杀，来彻底惩罚他。另一例中，一个已婚女人，由于丈夫在她生病期间对她不忠，于是抑制自己的性感，终于变成性冷感。又一例中，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在一次私通中获得了强烈的快感。怀孕后，她要求结婚，但她的情人犹豫了三周才答应。她不能原谅他使她忍受了三周的焦虑，从此变得性冷感，直到后来经过一番解释，她才恢复正常。

即使女人克服了一切内在的抵抗，并且或迟或早达到了阴道性高潮，她的困难并不是就此了结；因为她的性节奏和男人性节奏并不吻合，一般来说，她达到高潮，比男人慢得多。金赛报告中谈到这一点，下面抄录一部分：

对于大约四分之三的男人，性交开始后两分钟内就达到性高潮……当考虑到许多性要求很高的女人在性方面如此不利，需要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极

小心激发才能达到高潮，又考虑到不少女人终身没达到过高潮，那么，如果要求男人配合女方，不射精而延续性动作，当然对他是过份的不正常要求。

据说在印度，丈夫习惯于在性交中抽烟或阅读，以此分散他对性感觉的注意力，以便为妻子延续性动作。在西方，一个风流荡子喜欢自吹他重复性交的能力，而最使他得意的，便是让女方哀求放了她——而这一点，根据色情传说，他是很难办到的。男人倾向于抱怨他们女伴的过分要求；疯狂的子宫，食人的女魔，贪婪女性；她永远不知足！蒙田在他的“散文”中表达出这一看法：

在做爱中，她们远比我们能干而热情，古代那先是男人，后变为女人的祭司，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我们从她们自己口中得知，生于不同世纪的某一个罗马皇帝和一个罗马女皇——两人都精通此道——所提供的证据（他确实在一夜间，破了他掳获的十个撒马丁处女的贞洁，但她却真的在一夜间性交二十五次，随心所欲地交换男伴。）

……器官还胀着，仍旧燃着欲火。
她永不餍足，却因困乏而告终①。

后来当加达罗尼亚郡的一个女人抱怨她丈夫要求过分——倒不是过分，我想，因为她觉得不舒服（因为我只在宗教上相信“奇迹”的存在）……于是导致纷争与讨论，阿拉贡女后与会议议员审慎商谈的结果，下令一天六次是合法而必须的限度。如此牺牲她的同性们很大一部分的需要与欲望，她说，为的是能制订一个容易的，进而永久性的处分程序。

的确，女人的性快感与男人的大不相同。我已经提过，女人的阴道感觉是否真能导致确定的高潮，还是有疑问的：女人对此的陈述很少，而且极端含糊不清，显然，反应因人而异。但无疑的，对于男人，性交具有一定的生理终结：射精。当然，为达到这一目标，牵涉到其它许多相当复杂的意向；但一旦达到它，就象是一个固定的结局，如果不是欲望的全部满足，至少在目前是个终点。相反的，就女人来说，目标一开始就不确定，而且心理因素重于生理因素。她广泛地渴望性兴奋与性快感，但她的身体并不给性行为提供准确终结的标志；这就是她永远感觉不到完结的原因：它实在没有终点。男人的性感觉象箭一般突然上升；当它达到一定的高度或关口，就可以完成，而在射精高潮中突然消失；性行为的模式是有限的、不连续的。女人的性感觉则透过整个身

① 这两行是罗马诗人朱维诺（Juvenal）的拉丁诗句——译者

体而焕发，并非总集中在性器官上；即使是阴道的收缩，与其说是真正的高潮，不如说是一系列的波浪，有韵律地上升、消失、又重新出现，时而达到发作性的状态，又变含糊，沉没下去；却永不完全消失。因为没有一定的目标，女人的性感觉延伸而无穷；限制女人性能力的，常常是神经或者心脏的疲乏，或者心理上的满足，而不是确定的餍足。即使当她觉得足够、精疲力竭时，她还可能没有获得彻底发泄。

男人不应该将自己的节奏硬塞给对方，或竭力想带给她高潮：这样做，他通常只能破坏她用特殊的方式即将获得的性感满足。这种满足轻柔得足以塑造它本身：某些集中于阴道或全部性器官、或者涉及全身的痉挛，可以组成一种结局：有些女人的这种痉挛特别强，具有规则，可以看作是性高潮。但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也能在男人的高潮中找到使她满足的结局。而且，性感觉状态也可能不经过突然的高潮，而逐渐平静地溶解。性交的成功，并不象小心翼翼的男人们常常设想的那样，需要双方数学般精确的同时感受，而靠的是建立一种复杂的性感觉模式。许多人认为，"使"一个女人获得性快感只是时间和技巧的问题，需要粗暴的行为；他们不了解女人的性感觉怎样地被整个处境所左右。

女人的性快感，如我已经说的，是一种魔阵；它要求彻底的放纵；如果言语或动作与爱抚的魅力相违背，那么这魔阵立刻消散。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常常闭起眼睛；在生理上，这是瞳孔放大后的反射作用；但她即使在黑暗中也垂下眼帘。

她要消除周围的一切，消除这奇特的片刻，她自己、她的情人，她但愿迷失在有如母亲子宫般幽暗的肉体之夜。她尤其渴望消除存在于她和男人之间的隔离；她渴望与他融化为一。正如我们谈过的那样，她要在被人转化为物的时刻，保留自由。因为她的整个身体都被欲望与兴奋左右，她比男人感受得更深刻，不能自已，而她只能通过与对方合而为一，才能获得自主；给予与接受的合一，必须是双方的。如果男人只取而不给，或如果他没接受而只给出快感，女人就会觉得自己被利用，被操纵；她一旦意识到自己是“另一个”，她就变成微不足道的另一个体，于是她必须否认自己这种身份。

这点解释了为什么女人在两个身体分开的片刻，总感到相当沮丧。性交之后，男人不论感觉快活或丧气，不论他是天生的受骗者或者女人的征服者，他总是离开“肉体”；他再度变成一个诚实的身体，他要睡觉、洗澡、抽烟、出外呼吸新鲜空气。女人则希望延长肉体接触，直到使她变为“肉体”的魔阵完全消散；“分开”对她是一种痛苦的拔根，就象重新断奶一般；对于一个过分突然地离开她的情人，她心怀怨恨。但对她伤害更厉害的，是一些违反她此时深信的“合一”的语言。马德琳·布度斯讲到这样一个女人，当丈夫问她是否快乐时，她伸手堵住他的嘴；这种话使许多女人厌恶，因为它将性欢乐贬低为一种内在的、分开来体会的感受。“够了吗？还想要吗？感觉好吗？”——问出这样的话，就是强调分离，而将做爱变成一种由男性指挥的机械活动。而实际上，

这也是他这样问的原因。他的确追求支配远胜过交融与合一；当两人的结合分开后，他再度是唯一的自主者：要放弃这一特权的地位，需要极深的爱和慷慨。他喜欢使女人不自禁地感觉受屈辱、被占有：他总要向她索取比她愿意给的更多一点。如果男人能免除许多复杂心情，不将做爱看作一场战斗，那么女人可以省去许多困难；她也能不把床看成一个竞技场。

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少女有一种想被控制的欲望与她的自恋和自尊共存。依据一些心理分析家的观点，自虐是女性的特征之一，而就是这一倾向，使她能够适应自己的性别命运。但这一"自虐"的概念特别混乱，我们必须仔细谈一下。

跟随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家将自虐狂分为三类：一类存在于将"疼痛"与"性快感"联在一起，第二类是女性对于性依赖角色的接受，第三类则使用自我惩罚的手段。按这一观点，女人应该是自虐的，因为对她而言，处女膜的戳破与生儿育女，都是快感与痛苦合而为一的。再者，她接受的是被动的角色。

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将性感觉的价值加在痛苦上，绝不意味着是被动屈服的行为。痛苦常常能使肌肉更为坚韧，而唤醒被性兴奋和性快感弄钝了的敏锐感觉；它是肉体之夜中的一道锐利闪光，它将情人从令他炫晕的炼狱中提升，为的是叫他再度沉入炼狱。疼痛通常是性疯狂的一部分；人体，那欢悦于互相给予的身体，彼此寻找，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合

而为一，又彼此对抗。性爱之中，含有一种从自我撕离、心荡神移的狂癫；受苦也就是撕裂自我的界限，它是种超越，是种发作；放荡的狂欢中，总伴随肉体的疼痛，而人人都知道，精美与痛苦经常混杂为一：爱抚可以变为折磨，痛苦可带来欢乐。拥抱很容易导致咬、拧、抓；这类行为常常并不是虐待性的；它显示一种合一的欲望，而并非毁坏；这样做的人，并非寻找拒绝和屈辱，而追求的是融化为一；此外，它并不是男性的特殊行为——差得很远。事实上，肉体痛苦只有在被当做奴役的证据而需要和接受时，才有自虐的特征。至于戳破处女膜的疼痛，与快感并没有紧密关系；而生育的痛苦，每个女人都害怕，而且都高兴地得知新式的生育方法已经逐渐在消除痛苦。"痛"在女人性感觉中，并不比在男人性感觉中更重要。

此外，女性的顺从是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我们已经谈过，少女通常"在想象中"接受一个神化的人、英雄、男子的控制；但这仍只是个自恋性质的游戏。它绝不使她在实际上屈服于这种权威的肉体操纵。通常恰好相反，她拒绝她所崇拜佩服的人，而将自己给予一个毫不出色的男人。在这种幻想中寻找具体行为的钥匙，是错误的；因为幻想之所以被创造、被珍视，就因为它们是幻想。怀着恐怖与赞同混杂的心情，幻想被人侵犯的少女，并不真的希望被侵犯；如果这样的事果真发生，将是可恨的灾难。我们已在玛利·勒·哈多因的《黑帆》中，注意到这种事实与幻想互不相关的典型例

子，她甚至招认："在我的梦中，没有一件卑劣可耻的事我没做过。"而我们可以再引录玛利·巴士科茨的话："我一生都在追寻，想让自己屈服在某种幻想中的支配力之下，但我试过的所有男人，都比我平凡得多，我只感到厌恶。"

虽然如此，女人的性角色大体上的确是被动的；但这种被动角色的实际表现，不能说是自虐狂，正如男人正常的进取行为，不能说是虐待狂。女人可以超越爱抚、兴奋和戳入，而达到自己的快感，这样维持她的自主；她也能寻求与情人合一，将自己给予他，这代表自我的超越，而不是自弃。只有当一个人选择居于他人意志之下，被转化为纯粹的"物"，将自己也视为"物"，表演"物"的角色，才是真正的自虐狂。萨特说："自虐狂的人，并不是企图用我的'被动性'迷惑他人，而是企图在他眼中，用我的被动性迷惑我自己。"萨德的朱丽叶和他的《闺房哲学》中的处女，将自己的身体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给予男人，但为的总是她们自己的快乐，这绝不是自虐狂。劳伦斯笔下的查特莱夫人和凯特虽然放纵，却不是自虐。自虐狂仅仅存在于"自我"被隔离、而这一隔绝的自我被看做是附属于他人意志的时候。

这样说来，真正的自虐狂能在某类女人身上观察出来。少女有这样的倾向，因为她时常自恋，而自恋是将"自我"移开自身，做为一个投影、一个陌生人。如果她在"性引入"的初期就感到强烈的欲望，她将在自己内部体会这些经验，而不再将它们投射于她认为是"我"的理想幻影上；但如果

她冷感，这身外的“我”将继续存在，而变为男人的“物”，将象一种犯罪行为。“自虐狂，正如虐待狂，是‘罪’的承受。我有罪，仅仅因为我是物”。萨特的这一概念，与弗洛伊德的自我惩罚的观念一致。少女因为让自我屈服于他人而觉得自己有罪，于是她自动加倍自己的屈辱与奴役，来惩罚她自己。如我已经说过的，处女对她们将来的情人怀着挑衅心理，而用各种自我折磨，为她们即将体验的屈服而惩罚她们自己；当情人变为事实，她们这种态度仍旧持续下去。我们已经谈过，性冷感可以说是女人加给自己的，正如加给男方的惩罚一样；由于虚荣心受到创伤，她对他、对她自己都感到憎恨，于是她拒绝给自己快乐。在自虐中，她将拼命地做男性的奴隶，说崇拜的话，请求屈辱、被殴打；她将把“自我”更加远远地隔离开，因为她怨恨自己允许了这种隔离的产生，斯丹达尔《红与黑》中的玛蒂尔德显然就是这样；她对自己屈服于于连感到恼恨；所以她有时跪倒在他脚边，自愿地任由他玩弄，为他牺牲她的头发；但同时她却憎恨他与她自己。我们很可以想象，她在他怀中必定冷若冰霜。

自虐女人虚假的放纵，在她与欢乐之间筑起了新的障碍；同时，她利用无法享受，向自己报复。这种性冷感和自虐的循环，可以永久持续下去，又可能诱发虐待狂的行为做为补偿。在有些情形下，性感觉的成熟可以将一个女人从性冷感和自恋中解救出来；一旦接受了自己被动的性角色，她就能实际地经验它，而不再演戏。这是因为自虐狂有一个内在

矛盾：自虐者在拚命自弃的同时，一直在维护着她自己。而要达到真正忘我的境界，必须将自己没有自我考虑地给出，必须自发地投向对方。这样说来，女人的确比男人容易受到自虐的诱惑；她的被动的性地位引导她扮演被动；这场游戏是她自恋性的反叛和随之产生的性冷感而导至的自我惩罚。事实上，许多女人，特别是许多少女，是自虐狂。科利特在她的《我的学徒时期》中，提到她最初的性爱经验，她向我们这样倾诉：

> 受到年幼无知的默许，我的确开始沉溺于一种得意忘形心情中，这是一种该责备的得意忘形、一种可恶而不纯洁的青春浪潮。许多少女，还不到结婚年龄，就梦想自己是一个成熟男人的玩物、想象着淫荡的、秘密的场景。这是种丑恶的欲望，而她们以满足这种欲望来做为补偿；这种欲望与青春期的一些心理病态属于同一类，比如咀嚼粉笔和黑炭、喝漱口药水、读淫书、用针刺手掌等等习惯。

事实上，自虐狂属于青春期倒错行为，它不能真正解决女人的性别命运造成的冲突，它只是一种沉溺其中、从而逃避它的方法。自虐狂绝不代表正常、愉快而美好的女性性感觉。

这种完满的发展，需要女人在爱情、挚爱和性感中，成

功地克服自己的被动性，并与对方建立一种彼此互动的关系。男人的性感觉与女人的性感觉之间的差异，只要还存在“两性间的战争”，就必然产生无法克服的困难；当女人对男人存有欲望和尊敬时，这些困难就能轻易解决；他如果在渴望她肉体的同时，也承认她的自由，她就感觉到自己的重要，她得以在变“物”的同时保持她的完整；在她同意的屈服中，她保留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情人们可以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共同享受快乐，各自体验快感，只意识到这种快感的来源是对方。“给”与“取”的意义发生转换；欢乐是感激，快感是爱情。在一种具体的肉体形式下，深切感受着“他”与“我”的存在，有一种“自我”与“他我”的相互体认。有些女人说，她们感到男性器官在她们体内就象她们身体的一部分；有些男人觉得他们就是他们戳入的女人。这些显然都不是确切的表述，因为“他者”的外形和关系依旧存在；事实是，“他者”不再有敌对的含义，而正是这种分离的两个身体的结合感，赋予性交行为以感情性质；更为动人的是，这两个在热情结合中既否认又保持他们界限的人，既是相似的又是不相同的。这种常常使他们隔离的彼此不同，当他们合而为一时，却成了他们迷醉的泉源。在男人雄性的躁动中，女人看到了燃烧在她内部的被动之火的反面；男人的性能力反映出她作用在他身上的威力；这一勃起的充满生命的器官也属于她，正如她的微笑属于那给她注入欢乐的男人。所有男性和女性的宝贵特质都相互反映，这样，它们形成一种永远

运动而永远喜悦的统一。这种和谐的必要条件并非技巧的完善，而是基于此时此刻性魅力的一种灵与肉的相互慷慨。

这种慷慨常常受到禁忌的阻挠：男人受阻于虚荣心，女人受阻于胆怯。只要她的禁忌还存在，这种慷慨就无法达到，这就解释了女人获得充分性享受通常较迟的原因：她大约三十五岁才达到性感觉的巅峰。不幸的是，如果她已婚，她丈夫到时已经习惯于她比较冷淡的性欲了；她虽然还能引诱新情人，但她开始丧失青春；她的日子不多了。许多女人就在她们不再迷人的时刻，才终于决心坦白地公开欲望。

女人性生活展开的条件，不仅依赖上述这些因素，而且还依赖她社会与经济的一般处境。脱离这一脉络而作进一步研究，将会偏离实际。但从我们的探讨中，已经现出几个有一般价值的结论。性经验是最锐利地向人类揭示他们模糊处境的经验；在性经验中，他们感受到自己既是肉体，也是心灵，既是对方，也是自我。对女人，这种冲突更具有戏剧形式，因为她起先感觉自己只是“物”，而不了解存在于性欢乐中的一种纯粹的独立；她必须重新获得超越与自由的尊严，并同时担当她的肉体角色——这是充满困难与危险的事业，而且常常以失败告终。但她处境的这种困难，却恰好保护了她，使她不致于跌入男人容易堕入的陷阱；由于他的侵略性角色和性高潮的独立满足，男人很容易受骗于这种虚假的特权；他犹豫地不将自己完全看作肉体。女人却在更真实的形式中，过她的爱情生活。

不论女人是否多多少少确切地适应了她的被动角色，当她作为主动的个体，她总是遭到失败。她羡慕男人的，并非他那占有的器官，而是他的牺牲品。

这是一个从古至今的矛盾：男人占据着甜蜜、温馨、柔和的性感世界，即女性的世界；而女人却在艰涩粗糙的男性宇宙中跋涉，她的手依旧渴望接触柔软平滑的肉体：青春期的少男、女人、花朵、软毛、婴儿；她体内仍有一个领域未被占据，而是渴望着占有象她给予男人的那种珍宝。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女人多多少少具有同性恋的倾向。有一类女人，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种倾向用不寻常的力量表现出来。并非所有的女人都能够，或者愿意用标准的、被社会唯一赞许的方式来解决她们性方面的问题。

第四章　结 婚 以 后

结婚，是社会按照传统指派给妇女的命运。现在仍是这样，有的妇女结了婚，有的妇女结过婚，有的妇女准备结婚，有的妇女因未结婚而痛苦，以上四类占了妇女中的绝大多数。由于失恋，由于对婚姻持反对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未结婚的妇女，就称为独身妇女。我们必须对婚姻这个问题加以分析研究。

妇女在经济地位上的逐渐提高，伴随着婚姻制度的日趋变化。婚姻正在变成两个独立的人彼此同意的自由结合。婚姻的双方都有义务，要互相对对方负责。对男女双方来说，私通都是对婚姻契约的违反。在相同的条件下，双方都可以获得离婚。女人的功能不再被限制于生殖作用，她的生育子女，已逐渐从天职变为自愿。妇女的生育子女，已经不再与参加生产劳动发生特别尖锐的矛盾，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国家或私人机构已经规定了妇女的产假制度。苏联的婚姻，曾经有一段时间被看作是建立在夫妻双方绝对自由基础上的契

约，但现在似已成为国家强制加给他们双方的义务。尽管哪一种倾向将流行于将来的世界，要看社会的一般结构而定，但无论如何，男性对女性的监护形式，必将逐渐消失，一去不返。不过，我们所处的这个二十世纪，在很多妇女看来，仍然只是过渡时期。现在还只有一部分妇女参加劳动生产，而且，就是对这部分妇女来说，她们所属的社会，也还是一个残存着古老形式和过时的价值观的社会。旧的婚姻制度力图使自己永存，我们要理解现代的婚姻制度，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对于男女双方来说，婚姻的意义相差很远。男女双方相互需要，但这种相互需要并没有使双方处于平等地位。我们看到，妇女从来没有能成立这样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可以和男人的团体平等地做交易和订契约。从社会性来说，男人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个体。他首先是一个生产者，他存在的意义由他为团体做的工作所证实。妇女被限于扮演繁殖后代和料理家务的角色，没有象男子一样对团体作贡献，这就是她们不能获得和男子同样尊严的原因。的确，男人需要她。在有些原始部落中，不会照顾自己生活的单身男子，往往会变成流浪汉。在农业社会里，男人需要她一起劳动。大部分男子都乐于将一些琐事让他的女伴去承担。他希望能有有规律的性生活。他希望能有后代，而国家也要求他延续种族。但男子并不直接向妇女本人显示出他的吸引力，使她感兴趣，而是男人的团体允许它的每个成员满足自己做丈夫和做父亲

的欲望。在父兄统治的家庭里，妇女的地位象奴仆一样，常常由这一帮男人把她嫁给另一帮男人。在原始社会里，父系家族把妇女几乎看作货物，她常常被列入两个团体的交易品中。在婚姻进化过程中出现契约式婚姻以后，妇女处境的改善并不十分大。有嫁妆或有权继承遗产的妇女，似乎有了人的地位，但嫁妆和遗产仍使她成为娘家的奴隶。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婚约由岳父和女婿来订立，而不由丈夫和妻子来订立。那时，只有寡妇才能享受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女孩子在选择上的自由，是受到很多限制的。如果她嫁不出去，又不是象罕见的情况中那样成为一个神圣的角色，她就将沦为寄生虫或贱民。只有通过结婚，她才能得到支持，她的存在才有意义。

妇女被迫接受婚姻，还有两点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妇女必须为社会生育子女。有极个别的特例，如斯巴达和纳粹统治下的有些地方，国家把妇女监护起来，只要求她们做母亲。即使是没有传宗接代概念的原始社会，也要求妇女有丈夫，因为她们的作用在于满足男人的性欲并为他们照料家事，而这就是妇女被迫结婚的第二个理由。社会加在妇女身上的这些任务，被看作是她给予配偶的服务。为了报答，男方应该送给她礼物，娶她，养活她。社会以他为媒介，把欠她的债务转移到他的身上。妇女因为完成任务而得到的权利，由男子必须承担的义务来表示。男子不能随便破坏婚约。只有在政府作出这种决定时，他才能抛弃妻子或离婚，

即使这样，有时丈夫也要付给她一笔补偿费。这种习惯，在埃及早就流行，而在今天的美国则称为赡养费。一夫多妻制一直或多或少地被公开容忍，男人可以和奴婢、妾、情妇或妓女睡觉，但他必须尊重合法妻子的某些特权。如果合法妻子受到虐待，她有权利回到娘家去，她可以提出分居或离婚，她的这些权利一般说来是受到保护的。

对男女双方来说，婚姻都意味着义务和权利，但双方承担的责任和从中得到的好处，并不是对称的。就女子而言，婚姻是使她掺合到集体中去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人娶她，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她就成了废品。这就是做母亲的为什么总急于为女儿物色对象和安排婚事的原因。在上个世纪，中产阶级家庭的婚姻，一般很少与女方本人商量。在事先安排好的“相亲”中，她们被奉呈给可能的求婚者。

女孩子在婚事中似乎总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她被父母嫁出去，她被丈夫娶去。男子则不同，他是主动地结婚，他是娶一个妻子。男人把结婚看作是自己存在的扩大和证实，不仅是权利，也是自愿承担的义务。对男人来说，婚姻只是生活模式的一种，并不是注定了的命运。他们可以考虑婚姻中的得与失，他们有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过独身生活，他们可以晚婚，他们也可以一辈子不结婚。

结婚以后，妇女得到了似乎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天地，法律保护她可以反对男人善变的行为，但她成了他的附属品。在这个联合体中，男人是经济上的领导人，是一家之主，从

社会的角度看，他代表家庭。她改用他的姓，她信奉他的宗教，她属于他的阶级和他的生活圈。她进入他的家庭，她随着他搬迁，由他的工作地点来决定住家的地点。她必须或多或少地与过去告别，她向他奉献出她，她的童贞，她的绝对忠诚，她隶属于他的宇宙。她失去了未婚女子的一些法定权利。罗马法将妻子交在丈夫手中，地位就象女儿一样。十九世纪初叶的保守派作家邦纳认为，妇女对丈夫，应该象子女对母亲一样。一九四二年以前的法国法律，要求妻子应该服从丈夫。现在的法律和习俗仍然给男子以很大的权威，这种权威隐含在夫妻生活中。

丈夫既然是一个劳动生产者，他就会越过家庭利益而看到社会利益。由于他为集体的将来作出努力，他个人的前程也是无限的。他实现了超越。妇女命中注定要生育子女与操劳家务，她的责任是固有的。事实上，每个人的存在都包括超越和固有两个方面。为了向前迈进，每一个存在必须被维持；为了向未来进展，必须与过去融合一致，而与他人交往时，必须找到自我肯定。这两种因素，维持和进步，隐含在任何生命活动中，而对于男人，结婚正是这两方面快乐的综合。在他的职业和政治生涯中，他经历了变化和进步，他感受到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中发展。当他奔波得疲倦时，他可以建立一个家庭，锚泊在世界的一角。晚上，他可以在家中得到休息，恢复饱满的精神，有妻子为他照顾小孩，保管好积聚起来的财物。但是，妻子除了为维持日常生活而反复操劳

以外，别无他事可做。她一个个地生孩子，她要保证家庭生活的宁静与继续，她总是做着许多琐事，如看管门窗是否关好等等。她不被许可对未来和对外部世界发生直接影响。她只有通过丈夫的媒介，才能进入社交圈。

大部分婚姻至今仍维持着这种传统形式。首先，婚姻对女子的专制压力，比对男子的压力要大得多。在许多社会阶层中，结婚仍是女子唯一的出路。在农民家里，没有出嫁的妇女是地位最低下的，她是父兄的奴仆，她不能到城里去找工作。出嫁虽然要使她受到另一个男人的奴役，但她毕竟成了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在中产阶级的圈子里，女子仍无自行谋生的可能，她们只能作两种选择，或是留在父亲家中当寄生虫，或是到另一个人家去占一个低下的地位。即使是比较解放的妇女，别人也总劝她结婚而不劝她埋头于事业。既然经济上的利益都掌握在男人手里，她应该去找一个地位比她高的丈夫，或者是事业上比她有希望、更快取得更大成就的丈夫。

很多人仍然同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一种说法，性爱是妇女对男人的服务。他得到享受，他应该付给她报酬。对他来说，她是他买来的货物；对她来说，他是她有权剥削的资源。她可能带来一些陪嫁，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她操劳家务和养育子女。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她都有权利接受供养，而传统的道德观念也促使她接受供养。她很自然地被这条容易走的路吸引，更何况，对妇女开放的职业往往不太好，待遇也太低。总之，对妇女来说，结婚是比其他任何职业都有

利得多的职业。

此外，社会习惯仍然不允许未婚女子有性自由。在法国，虽然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妇女自由恋爱，但如果作为妻子而与别人私通，至今仍被人视为非法。不过，尽管如此，女子如想找一个情人，她必须首先结婚。甚至直到今天，许多行为受到严格限制的中产阶级的年轻妇女，她们的结婚就是为了获得这方面的自由。美国的多数少女都有性自由，但她们的实际经历有点象在《野蛮人的性生活》中描写的少女那样。她们在单身宿舍里做一些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大家都知道，等她们过几年完全成为大人后，她们是要结婚的。美国的独身女子，即使她能自食其力，仍是一个社会性不完整的人，她们受到的歧视比法国更甚。如果她想取得完整的人格尊严和所有的权利，她就必须在手上套一枚结婚戒指。特别是做母亲，只限于结了婚的妇女。没有结过婚的母亲在众人眼中仍然受到鄙视，而她的私生子，将成为她终身的话柄。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现在美国的许多少女，与欧洲的少女们一样，当被迫问她们将来的打算时，她们的回答和从前完全相同："我要结婚。"但年轻的男人并不把结婚当作他主要的事业。只有经济上的成功才能使他站稳脚跟，这种成功也可能包含着婚姻的成功，对农民来说尤其如此。但经济上的成功也不一定意味着就要结婚，因为现代的生活情况不象过去那样稳定，男人结婚后的责任变得更加沉重。另一方

面，结婚给男人带来的利益也在相对减小，因为除婚姻以外，他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食宿供应和性要求的满足。当然，结婚能够提供物质上的许多方便和稳定的性生活，可以免去他个人的寂寞，给他家庭和孩子，使他建立了在空间和时间中生活的安全感，是他的存在的一个决定性完成。但是，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男性的需求少于女性的供给。我们可以说，一个父亲嫁女儿，其实是甩包袱。女孩子找对象难，正反映了这一状况。

在法国，由父母安排婚姻并未成为过去，整个资产阶级一直保持着这种习俗。在拿破仑墓旁，在戏院里，在舞会或茶会中，在海滩上，美丽的少女梳起最流行的发式，穿一身漂亮的新衣服，羞怯地展示她们苗条的体态和温文尔雅的谈吐。父母语重心长地叮嘱她："你已经在许多次这样的相亲中花去不少钱了。下决心吧。下一次该轮到你妹妹出来了。"这个不幸的姑娘知道自己的机会已越来越少，而年龄却越来越大，就要变成老姑娘了，求婚的人越来越少，几乎绝迹，她的选择自由已经和只能交换一群羊的农村少女差不多了。正如科利特所说："一个没有财产、又没有好职业的少女，应该咬紧牙关，少说废话，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机会。"

在上层社会里，青年男女被允许在母亲的监视下会面。比较开放的女子，出门的机会多些，她们可以上学，可以找一个容易与男人接触的职业。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克来尔·利普拉夫人对比利时中产阶级的婚姻问题作了调查

研究。下面我引述她所得到的一些结果：

>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仍然流行的由父母安排的婚姻，目前几乎绝迹了。有些婚姻通过神父来订约，或用通信来协商。在已订婚的男女中，由于社交接触而订婚的占百分之四十八；由于一起学习或工作而认识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私人介绍或自己认识的占百分之三十；由于从小认识而终成眷属的，极为罕见。在许多问卷答案中，金钱占主导地位的婚姻占百分之三十到七十。父母急于把女儿嫁出去的占百分之四十八；百分之十七的父母想把女儿留在身边。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少女十分急切地盼望结婚；希望结婚的占百分之三十八；宁可不结婚也不愿草率从事的占百分之二十六。一般认为，少女盼望用结婚来增加自己的自由度。绝大多数人说，在寻求对象和采取行动方面，少女比少男更为主动。

对于法国的情况，没有类似的调查文件。但中产阶级的情况是相似的，无疑也应该得出相应的结论。父母安排的婚姻在法国一向比其他地区多，俱乐部为这类事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生意十分兴旺。征婚启事在报纸上占了不少篇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法国，象在美国一样，母亲、年长的朋友、还有妇女杂志，教给少女如何追捕丈夫的艺术，就象

用捕蝇纸捉苍蝇一样。这是一种类似于钓鱼和打猎的事，需要很多技巧："目标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要现实主义，不要浪漫主义；要在卖弄风骚时仍不失端庄；要求不能过多，但也不可太少"。年轻的男子对急于想结婚的女人是不信任的。利普拉夫人报导过一个比利时男青年的看法："感觉到自己被女人追逐或知道有一个女人想钓住你，对男人来说，确实是最不愉快的事了。"男人总极力避开妇女对他们设下的圈套。女孩子的选择通常是有限的。她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自由，除非她感到不结婚也算是自由。当她下决心和某一个男人结婚时，在这个决心中往往缺少热情，而有的倒是犹豫、厌恶和屈从的痕迹。如果一个男人在诸如健康和地位等方面略有可取，她就接受他，不论爱与不爱。

然而，在盼望结婚的同时，女孩子又往往怕结婚。她从结婚得到的好处要比他多得多，因此，她总是比他更渴望结婚。但这也意味着她的牺牲要更为惨重，特别是因为结婚要使她向过去告别。我们看到，许多少女因想到要离开娘家而苦恼，这种顾虑随着婚期的逼近而加深。妇女的神经衰弱往往起源于这种时刻。男孩子可能也会害怕他们将要承担的新责任，从而产生顾虑。但女孩子的问题在这转折的关键时刻要更严重一些。

女孩子对结婚的恐惧，有时来源于早年吃过苦头的性经验，以及由此而害怕自己失去童贞的事被发现。但更经常的，是女孩子对娘家的强烈眷恋，使她一想到要嫁给一个陌

生人时，就觉得难以忍受。由于种种原因，例如，由于考虑到这是迟早要做的事，由于感到所受的压力太大，由于这是唯一明智的出路，由于她们需要过妻子和母亲的正常生活，在下决心要结婚的妇女中，有不少人心里仍然藏着秘密或严重的抗拒感，以至造成新婚生活的困难，甚至会使她永远不可能达到幸福的心理平衡。

照此看来，婚姻并不总建筑在爱情的基础上。弗洛伊德说：“丈夫最多不过是情人的替身，并不是情人本身。”这种婚姻和爱情的分离，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它正是婚姻制度本质的反映。婚姻的目的是使男女双方在经济上和性的方面结合，为社会利益服务，而不是保证个人的幸福。在家族统治下，就象现在的某些伊斯兰教徒那样，婚约完全由父母决定，男女双方甚至在婚前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从社会角度看，终身大事不可能建立在感情或性爱的幻想上。蒙太尼说：

> 在这种谨慎的安排下，欲望通常并不很强。他们比较清醒和直率。爱神所恨的是，人们被绳索捆绑在一起而不是靠爱情来结合。在以婚姻的名义安排和维持的亲昵行为中，爱神只起到微弱的作用。性关系和财富在婚姻中所起的作用，等于或超过了魅力和美丽。不管男人可能会怎样说，他们并不为自己而结婚。他们结婚只是为了有后代，为了有个家。

因为是男人“娶”妻，他就有较多选择的可能，尤其是当愿意和他结婚的对象很多的时候。由于性行为被看作是指派给妇女的“服务”，而且是有报酬的“服务”，因此，不考虑她们个人的爱好就变为合理了。她要结婚，就要承认自己不能具有和男人相同的自由。但由于没有自由，就既没有爱，也没有独立的个性。她必须放弃对一个特定的人的爱，以保证自己终身受到某一个男人的保护。我听到过一个守本分的母亲对她的女儿说：“爱情是一种只有男人才有的粗俗感情，正经女人是不懂得什么叫爱情的。”这正是黑格尔以朴素形式宣称的教条。黑格尔认为，女人做妻子和母亲是基本的共性，并不是个性。因此，黑格尔还认为，女人的问题不是要嫁给“某一个”丈夫，而就是要嫁丈夫，要生孩子。妇女的性生活并不基于她个人的感情，而是为了普遍的需要。因此，和男人不一样，妇女的情欲被视为她道德上的污点。

这就是说，妇女并不关心与选出的伴侣建立个人关系，她关心的是尽自己的本分。她只能在指定的形式下得到性的享受，而不能由她个人来作出选择。除了婚姻以外，她没有权利做其他任何性爱的活动。但是，男人有较便利的条件，在婚前或婚外偶尔有一些风流韵事。在任何情况下，男人可以从其他方面来为自己辩护，然而，在这个只把女人当作雌性动物的世界上，妇女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由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异，男人在完成传宗接代的特殊任务的同时，肯定可以得到一些性快感，而女人则相反，生殖作用往往和性的满

足分离。因此，婚姻说起来是把道德上的地位给了妇女的性生活，但实际上是压抑妇女的情欲。

借助乐观主义的哲学，男人把妇女的这种苦难归因于自然规律，他们为自己开脱说，这是她命该如此。圣经中对妇女的某些说法为证实他们的意见提供了方便。怀孕时痛苦的负担，是妇女为短暂而不很确定的快乐被迫付出的沉重代价，甚至会成为谈笑的话题。有人作了玩笑式的对比："五分钟的快乐，九个月的痛苦"；"进去是容易的，出来却就难了"。但这是一种虐待狂的哲学。很多男人以欣赏的态度对待妇女的苦难，根本不想如何去解救她们。由此可以看出，男人在否定妇女也应该从性生活中得到享乐时，他们是一点内疚感也没有的。

如果丈夫使妻子懂得了性快感，他就等于教会她如何在其他男人的怀抱里追求欢乐。蒙田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们同时要求妇女健康，充满活力，丰满，贞洁，无异于说，要她们既热情又冷淡。"普鲁德霍说得比较含蓄，他认为对男人而言，把爱情排除在婚姻之外才是正确的做法；"即使是对已订婚的或已结婚的男女来说，所有的甜言蜜语也都是不适宜的，它会破坏夫妻间的相互尊重，会破坏对工作的热爱，会破坏对社会义务的履行。"

然而，在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的观念有些转变。有些人努力维护婚姻制度。另一方面，由于个人主义的发展，对妇女的要求已不再能简单地压制。圣西门、傅立叶、乔治·桑

以及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极力提倡爱的权利。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把一向被忽视的个人感情与婚姻结合起来。这时发明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夫妻之爱”。那是为方便而结合的传统婚姻的果实，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果实。巴尔扎克不合逻辑地表达了保守的中产阶级观念，他认为，就原则而论，婚姻和爱情是两回事。但他又认为：把神圣的婚姻等同于简单的交易，把女子看作货物，这种做法是令人厌恶的。因此，他在《婚姻生理学》一书中，得出了许多互相矛盾的结论。他把婚姻比作一种契约，认为对多数男人来说，订立这种契约是为了使生殖合法化，在契约中不应该包含爱情这种荒谬的东西。但他接着又说到“两个灵魂的完美结合”和“由男人的守约而得到的幸福”。他又进一步敦促人们服从“使感情开花的神秘自然法则”，号召“真诚的爱”，并断言，这样培养出来的对妻子的爱，将永不衰减。

巴尔扎克继续说明他的婚姻学说，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按照他的观点，男人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被爱，而在于如何避免受骗。他认为，丈夫应该果断地使妻子继续保持无文化、软弱和愚蠢，以维持自己的优越。如果在这种糊涂概念中还会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大概就是，男人为方便而结婚，取乐时不动感情，按照某些公式去唤醒妻子的爱。但是，巴尔扎克是否真诚地相信，当爱情不占主要地位时，挑逗招来的结果确实是爱，而不是厌恶？事实上，他在许多讨论中故意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他没有把握住这样的事实：男女之间，并

没有中性的感情；缺少爱，只有紧张和厌倦，不可能激发出柔和、亲切的感情，而只会引起怨恨、不耐烦和敌意。

婚姻和爱情的协调一致，确实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神灵的相助，很难成功。这就是基克加德几经曲折才得出的结论。他说，爱情是自发的，结婚是一种决心，而情欲则是由结婚或希望要结婚的决心所激发的。一种神秘得只能用神灵行动来解释的事物，自相矛盾地按照反省和决心来发生，整个过程还必须是同时的。这就是说，相爱不等于要结婚，爱很难转变成责任。但这种矛盾并没有能使基克加德气馁。他同意“反省是破坏自发之情的天使”。但他又说，决心是基于伦理的一种新的自发之情，是一种“应该可以激发情欲、并使之免遭各种危险的宗教观念”。他说，一个真正的丈夫，“是一个奇迹”。至于妻子，理性不属于她，她没有什么“反省”，“她的爱情就是宗教”。简单地说，这意味着，一个恋爱中的男人，要凭着对上帝的信仰才能有保证感情和义务相协调的行动，才能下决心结婚；而恋爱中的女人总是想结婚的。

法国的“世纪末”作家不大相信爱情神圣。他们比巴尔扎克更大胆，认为情欲和合法的爱情有可能融合。马塞·普雷伏斯特劝导年轻的丈夫应该象对待情妇那样对待妻子，并仔细描绘了这种幸福的婚姻生活。

现在美国人尊重婚姻，同时又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用不同的方法，加倍努力地使婚姻和性爱合一。

出版了许多以婚姻生活为题材的书，指导夫妻们如何彼此相适应，特别注重于指导男子怎样和妻子幸福和谐地相处，但是，年轻人即使熟读二十本婚姻手册，也未必能使新婚的妻子爱他。

结婚典礼展示出普通而抽象的意义，一对青年男女在众人面前以象征性的仪式结合。但在神秘的新房，是两个具体的人结合在一起。科利特十三岁时作为客人去参加一个农民的婚礼，当朋友带她去看新房时，她心中充满了慌乱。

> 这是青年夫妇的新房。挂着帐幔的新床，高而狭，堆满了好看的被子和枕头。这张床，将是一天紧张劳动后的归宿。汗水、牛羊的气息、烟味、鱼肉的腥味，都将终止于此。……新人就要进房，他们将睡在这张床上。……他们将做一些我似懂非懂的事。然后又会怎样？我对着这从未想过的新房和新床，感到害怕了。

处于幼稚的困惑中，她对比着婚礼的服饰和挂着帐幔的大床的神秘性。婚礼的淫秽面很少出现在妇女没有独立个性的希腊、罗马和东方文明国家，在那些地方，动物功能似乎和社会仪式同样地一般化，缺少个性。但在我们现代的西方，男人和女人都被认为是有独立个性的人，参加婚礼的宾客会窃窃私语或偷偷地笑着，因为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在

仪式和鲜花的掩盖下，即将完成一次秘密行动。的确，有一种阴森的对比，存在于壮丽隆重的葬礼和终将腐朽坟墓之间。但死者在入土时不会惊醒。然而，当新娘发现，结婚证书和教堂的琴声所许诺给她的，就是这样一回事时，她感到可怕而惊奇。

少女在新婚之夜带着眼泪逃回娘家找母亲，并不是只有在滑稽戏中才能找到的事。心理分析的书籍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我自己还亲耳听到过：女孩子被过分谨慎地抚养，从来没有受过性教育，突然发现婚姻是性的结合，她们惊呆了。有的女孩子相信接吻就是两性结合的全部。斯坦克尔说过，有一个新娘，把丈夫在蜜月旅行中的正常行为看作是患了精神病，有些对性知识一无所知的女孩子，即使把她嫁给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她也会经过几年而不感到出了差错。

米休的诗《新婚之夜》简要地说明了这种情况。现在有许多女孩子比较懂事，但她们的了解可能仍然只是形式上的或抽象的，新婚时仍有被强奸的感觉。埃利斯说，婚姻之内的强奸确实要比婚姻之外的多一些。在他的报告中，六位中产阶级的妇女都说，婚后的第一次性交使她们震惊，其中的两位都在婚前一无所知，其他的四位虽然自以为懂得，身体仍然受到伤害。

处女想要完成她性的使命，必须克服许多犹豫与困难，因为她的初次经验，需要生理上和心理上两方面同时努力适应。把这些适应全部放在一个晚上来实行，是愚蠢而野蛮

的。把这些细腻而困难的行为当作义务，是十分荒谬的。女子对这件事更觉害怕，因为她要做的这件陌生的事是神圣的；因为社会、宗教、家庭和朋友，庄严地将她象交给主人一样交给丈夫；而且还因为她以为这件事关系到她整个未来，是人生唯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大事。男人也因为落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而焦虑不安，他有困难，他有复杂的心情，使他变得胆小、笨拙和粗鲁。有时由于把这件事看得过于隆重，使他在新婚的晚上失去了性能力。

过分急躁会使处女受惊，过分矜持使她感到受侮辱。女人一辈子痛恨自私的男人，他求得自己的欢乐时以她的痛苦为代价；但也永远埋怨那些藐视自己，不想或不能在新婚之夜给她以欢乐的男性。

事实上，有许多妇女虽然已经当了母亲或祖母，但都从来还没有体会过任何性生活的快感。有些妇女借口医生的嘱咐或用其他理由推辞、逃避这种她认为有失自己身份的“义务”。金赛说：许多妻子“认为自己的性生活太多，希望丈夫不要如此频繁地提出要求；也有些妇女则相反，希望能有更多的性生活。”

在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下，一个已订婚的少女向往的不是爱情，而是由平静的、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幸福。在某些繁荣太平的年代，这是整个中产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理想。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征服未来和征服世界，而一心只想平静地保存过去和维持现状。一个镀上金色的庸

人，没有野心，没有热情，平淡的日子不断重复，走向死亡的生命根本不问自己的目的何在，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幸福。这种伪造的智慧，模糊地产生于伊壁鸠鲁和季诺，到现在已失去了意义。让现在世界上的一切都保持和继续下去，似乎已经不是人们的希望，而且也并没有这种可能性。男人正在接受号召而行动，他们的职责是生产、战斗、创造和进步，使自己走向整个世界和无限的未来。但传统的婚姻并不邀请妇女随着男人一同追求超越，她们被局限在固有性里，封闭在自己狭隘的小圈子里。因此，她只能努力去建立一种稳定平衡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明天也必然会平安无事，这就是幸福的生活。她将感受到温柔和受尊敬的感情，那就是一般所说的夫妻之爱，用它来取代爱情。在她所管理的家中，她要把这个小天地封闭起来，她要在未来的日子里负责人类的延续。

过去的资产阶级认为，维持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通过自己的成功来显示这种秩序的优点，这就是一个男人对上帝、对国家、对政权和对文明的服务。作为一个男人，完成他的任务就是幸福。妇女也是这样，必须对平静的家庭生活设想出一些有意义的目的。但只有男人才能在她和世界之间起到媒介作用，只有他才能对她那无关紧要的生活给予人性的价值。他在和妻子的相处中得到了力量，他行动，他奋斗，他就是她的全部意义。她只要把自己完全交给他，她的存在的意义就会由他来肯定。这种情况预示着她要卑谦地克

制自己，但她在男性的指导和保护下，能得到补偿，她将能摆脱委曲，她仍会变得重要。作为蜂巢里的女王，她在自己统辖的小天地里过着安静的生活，被男人带到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中。她是妻子，是母亲，是一个家庭的主妇，她发现婚姻带给她的是生活的力量和意义。

不论你住的是茅屋还是城堡，幸福这个概念，往往取物质的形式表现在住宅内部。房子持久地屹立着，它把屋内的一切和世界隔离。在住宅内部，建立了家庭，它象一个完整的细胞，是一个单位的集团，保持着同一性，世代相传。由家具的样式和祖先的画像来维护的过去，许诺着未来的安全。在园子里，各种可以食用的蔬菜按季节生长。“年年岁岁花相似”，春去夏来，秋逝冬临，时间和空间都不会突然背离原来的途径，只是重复地运行在指定的轨道上。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文明中，有不少吟咏家庭的诗歌。在亨利·鲍多的《家》中，总结了中产阶级的种种优点：忠实于过去、忍耐、节约、有远见、对家庭和故土的热爱等。歌颂家庭的诗人往往是妇女，因为女人的任务是保证家庭的幸福，她是“家庭的主妇”。

现在，由于经常搬家，住宅已经不再具有当年的光彩。因为对多数男人来说，它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不再装载着对已故祖先的记忆，不再包含对未来世纪的设想。但在妇女的内心中，仍然装着住宅和家庭以往曾经有过的意义和价值。斯坦贝克描写过一个流浪的妇女，她和丈夫一同住在废

锅炉里，但却坚持要铺地毯和挂窗帘。丈夫反对她挂窗帘，说“我们根本没有窗户”，但这位妇女仍然坚持要挂。

这种对地毯和窗帘的关心最富有女性的特色。正常的男子把周围的东西都看作工具，他按照它们的用途来安排它们的位置，香烟、纸张、工具，都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对于他所安排的“秩序”，她都认为是杂乱无章。有些画家和雕塑家，能通过他们所选择的材料来重现世界，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却很不注意。

但是，一个人如果要在内心中找到家庭的温暖，必须首先在工作中或行动中得到自我实现。男人由于可以在工作中表现自己，对周围环境不大感兴趣。妇女被限制在家里，她必然要设法把牢狱转变为自己的王国。她以牺牲来获取，她以放弃自由来取得自由，她以放弃世界来争取征服世界，这种辩证法可以解释她们的一般处境，也支配了她对家庭的态度。

妇女把自己关在新的家里，她也不是没有任何遗憾的。当她还是女孩子的时候，整个乡村都是她的，森林也是她的。而现在，她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里，自然界被缩小到一盆花草的尺寸，墙壁隔断了她的视野。但她要来征服这种局限性。她用贵重的古玩作为摆设，把房间布置得变为有各种动物和植物的世界；她拥有远方的国家和古老的时代。她有丈夫，他代表着整个人类社会；她还有孩子，他们以可随身携带的方式给她以整个未来。

家庭成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成为世界唯一的现实。家是

避难所，是大后方，是地下室，是根据地，是防止外来危险的场所。正是一个家，使外部世界黯然失色。特别是到了晚上，门窗紧闭，妻子感到自己简直是一位女王。白天，她被普照大地的阳光打扰；晚上她不再感到不安，因为她已经除去了不属于她的一切。在灯罩下，她看见属于她的灯光照亮了她专有的住宅，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现实集中在家里，外部世界似乎全部消失了。

由于环绕在妇女身边的天鹅绒、丝绸、瓷器，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己触觉的欲望，这种欲望一般是不能用性生活来平息的。这些装饰品也可以表达出她的个性。她选择材料，制做，到外面去选购家具和摆设，她按照美学的原理来布置它们，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理经常是对称性。它们反映出她的个性，而且公开证明了她的生活水平。因此，她的家是她世俗的命运，表示她的社会价值和她真正的自我。正因为她无所事事，所以她渴望在她所占有的东西上自我表现。

在家务方面，不论是否有仆人帮忙，妇女总要亲自动手，为的是要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正确，为的是给自己提供一项职业，一项活动，熟练而满足地处理一些东西，如发光的火炉，整齐的新衣服，明亮的铜器，擦抹得很干净的家具。但这些都不能使她摆脱妇女的本性，也不能表现出她独特的个性。这种工作都有一个否定性的基础：清扫是为了否定污垢，整理是为了否定杂乱。家境贫寒的妇女，不可能得到满足。无论她流下多少汗水与眼泪，茅屋仍然是茅屋，决不会

变成大厦。大批妇女在永无休止的奋斗中始终不能战胜尘埃和污垢，即使是拥有很多特权的贵妇人，也决不可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干净的变脏了，脏的弄干净了，永无终期地重复。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事比做家务更象西西弗斯所受的折磨了。主妇费尽心血，她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只是维持了现状。她永远感觉不到正面的“好”，只是不断地与反面的“脏”作斗争。一个女的小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我永远不要做家务。”在她想象中的未来，是逐步走向某一个光辉的顶点。然而有一天她看见母亲在洗碗，她突然想到，她和母亲将会终身被这种琐事所束缚。吃饭，睡觉，做清洁工作，随着岁月的消逝她不可能走向幻想中的天堂。展现在她面前的，只是灰色和单调的日子，每天和灰尘及污垢作斗争，而这种斗争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

洗熨衣服，打扫卫生，从柜子里翻腾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霉烂，也是对生命的否定。创造和破坏同时在进行，而主妇关心的只是它的否定面。从哲学的观点看，她们的想法与摩尼教教徒相仿。摩尼教的基本观点是，不仅承认世界上有善与恶之分，而且还认为，应该要从取消恶来得到善，但不是以积极的行动去取得善。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与摩尼教也是不同的，因为基督教虽然承认有魔鬼，但他们认为与魔鬼斗争的最好方法是将自己奉献给上帝，而不是尽最大的努力直接去战胜恶魔。任何超越或

自由的学说，都将“建设善”放在“消除恶”之上。但妇女并没有被号召去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她的领域是固定的，他的任务就是与悄悄进入她领域的恶魔作永不停止的斗争。在她和灰尘、污斑、泥巴、脏物等作战时，她是在和罪恶战斗，是在和魔鬼战斗。

一刻也不停地忙于击败灰尘、污垢等敌人，不做什么正经事，这是可悲的命运。主妇狂热地忍受这一切，甚至可能会出现心理变态，成为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结合。狂热的主妇对污垢进行愤怒的战斗，她谴责生命：因为任何生命的成长一定会产生垃圾。当任何生物走进她的屋子时，她的眼睛就闪出厌恶的目光，似乎在说：“擦干净你的脚，不要乱动东西。”事事都增加她的麻烦，她甚至希望屋子里的东西都停止呼吸。严厉，全神贯注，时刻警戒着，她失去了生命的乐趣，她变得怨天尤人和贪得无厌。她把阳光挡在屋外，因为昆虫、细菌和灰尘可能随着阳光而来；此外，阳光还会使绸帘发脆，使椅套褪色。她喷洒香水，使空气变得芳香。她变得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抱怨、不满和敌视，有时甚至起了杀心。

健康的少妇不大会被这种无聊的恶习所吸引。冷淡和心灰意懒的妇女，老姑娘，受过欺骗的妻子，以及受丈夫欺凌而感到孤独和空虚的妻子，容易变得神经质或怀有恶意。我认识一个凶悍的老太太，她年轻时快乐而喜欢打扮，现在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仔细检查衣柜、碗柜、浴室、厕所等等。她嫁给一个对她冷淡的丈夫，带着一个孩子孤独而寂寞地生

活。她象某些人喜欢喝酒那样喜欢把家理得井井有条。她忙得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她把房间弄得异常整齐和清洁，几乎使别人不敢走进去。事实上，家里的确有数不清的琐碎事。当她处于精神涣散和精神空虚的状态时，通过和周围一切东西的狂热斗争，可以使自己出现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混合发作，这种发作往往会有性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爱洁成癖的情况在荷兰是最多的，那里的妇女都很冷淡。道德上极为拘谨的文明，用整齐和清洁来反对肉体的欢乐。

和清洁工作对比，做饭是比较积极和有趣的工作。去市场采购，这是一天中比较愉快的时刻。一边拣菜，一边聊天，可以解除寂寞。烹调是一种艺术，妇女会在一块烤得很成功的蛋糕上取得特别的满足，因为成功的蛋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烤得出来的，这需要有一点天才。

然而，和其他家务一样，每天如此，不断的重复破坏了烹饪的乐趣。主妇不可能天天以猎取宝藏的心情上市场，也不可能天天欣赏擦得明亮的水龙头。歌颂做家务的乐趣的男女作家们，往往是自己很少做家务或根本没有做过家务的。作为一种职业来说，做家务是疲倦、空虚和单调的。如果做家务的人同时也是生产者，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工人，做家务在他的生活中就象器官发挥功能一样自然。因此，男人做家务精神上就轻松得多。对他们来说，只干上一会儿，很快就可以脱身。又是妻子又是仆人的不幸命运，是由劳动分工造

成的，分给她们的只是最一般、最不重要的工作。住处和食物对生活是有用的，但并不给生活以重大意义。因此，管家的直接目标只是一种手段，并非最后的目的。她自然要努力使她的工作带有一些个性，并使它看起来显得很重要。她认为，除她以外，没有别的人能做得这样好。她有自己的习惯，她有自己的方法，还有某些迷信，例如，要避免十三这个不吉利的数字之类。但她的得意之作，往往不过是模糊的无意义的重新安排而已。

为这种创造性和完美无缺而奋斗，妇女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使她的工作变得更加繁琐，更加杂乱，具有永远做不完的特性，而且使家务的重担变得更加难以估计。最近的研究表明，已婚妇女每周平均用在家务上的时间大约为三十小时，等于一般雇员每周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三。这对没有其他工作可做的妇女来说，是轻松的；但作为附加工作压在职业妇女的肩上，就是一副沉重的担子。照顾几个小孩，自然要增加不少负担。贫穷的妇女往往终日忙碌。雇有仆人的中产阶级妇女，几乎无事可做，终日无聊而闲散。如果她们不外出作乐，只是为了找事做，往往会把家务事弄得更加大量和复杂。

最糟糕的是，这种劳动并没有创造出任何能持久的东西。妇女总希望把她们的工作本身看作目的。她越是这样想，她就越感到难受。她凝视着刚从烤箱中取出来的、做得很好的糕点，叹息道："吃掉它真可惜呀！"她不许丈夫和小孩带

有泥巴的脚踏上她打蜡的地板。她什么东西都舍不得用，因为使用过程中免不了要弄脏或弄坏。她把蜜饯和果酱存到发霉，她把客厅锁起来。但时光无情地流逝，贮藏的食物生了虫，招引来老鼠，蛀虫袭击毛毯和衣服。世界不是刻在石头上的美景，它是由可能会损坏的物质构成的。床单被烫坏了，肉烤焦了，瓷器打破了，这都是最大的灾难，因为东西破坏了，就永远没有了。从这些东西中，是不可能得到永久性和安全感的。强盗和炸弹，都威胁着她们的衣橱和房子。

做家务的成果，是一定要被消耗的。妇女的工作，只有在被破坏时才算完成，因此，她们需要不断地委屈自己。这种破坏必须反映出某一个人的高兴，才能使她欣然同意而不感到遗憾。但由于主妇的工作只是努力维持现状，所以，当丈夫回家后，如果家里很乱，就可能会引起他的注意，但如果整齐清洁，他会认为理所当然，视而不见。他更感兴趣的是吃上好的饭菜。她的胜利时刻的来临，就在于，当做得很好的一桌饭菜放到桌上时，丈夫和孩子不但口头上说好吃，而且确实吃得十分高兴。烹调技术达到了目的：食物变成了乳糜和血。

在一定条件下，使人吃饱吃好比保持清洁的地板具有更加具体和更加重要的意义；致力于烹调，显然是一种朝向未来的超越。但是，分享另一个人的自由超越虽然略胜于失去自我，但也并不更少危险。厨师的成绩只体现在围绕饭桌吃喝的嘴巴上。她需要他们的赞赏，要求他们喜欢吃她做的

菜，并且希望他们吃了还想再吃。他们如果不显出想多吃的样子来，她就不高兴。就这点而论，真使人想不出：到底是为了丈夫而炸土豆，还是丈夫为了吃炸土豆而存在。主妇的一般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勤俭持家，一方面又要求丈夫把收入都花费在购买家具和电冰箱上。她希望他快乐，但只许他在她规定的快乐范围内活动。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大家对这样安排一般都感到满意；那时，这种幸福也是男人的理想，他非常依恋家庭；孩子们往往以父母为榜样，继承他们的传统和过去。在那个时代，主妇统治着家，管着餐桌，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宗法制度下比较富裕的农民家中，妇女至今仍然处于这种无与伦比的统治地位。

但总的来说，今天的婚姻制度只是旧日生活方式的残余。妻子的处境比以前更难，她仍然有过去的义务，却不再享有过去的特权和荣耀。男人结婚，为的是找到一个暂时的归宿，但却不想使自己受到限制。他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却又希望保留足够的自由。他虽然定居下来，但仍心怀飘泊之意。他不轻视家庭幸福，但不将这种幸福当作目的。他不喜欢老一套的重复。他喜欢猎奇涉险。他寻求朋友，以摆脱只面对家人的寂寞。孩子们想逃避家庭的约束，比父母更甚。孩子们的生活兴趣在别处，他们总想追求新奇。妇女总想建造一个具有永久性和连续性的宇宙，但丈夫和孩子们却认为她所创造的不过是一个临时的环境，他们总想超越它。因

此，她即使不愿意承认她终身全心全意从事的工作不一定有意义，她仍然要强迫他们接受她的服务。就这样，她由母亲、主妇逐渐变成凶悍的女人和苛刻的后娘。

因此，妇女在家中的工作并不可能给予她意志的自由或人身的自由。她的劳动并不直接造福于社会，并不能开拓未来，也不会出任何产品。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它和其他人相连接，那些人超越自我，走向社会，积极生产。那就是说，她的工作非但不能使她得到自由，反而使她依赖丈夫和孩子。他们赋予她存在的意义，但在他们的生活中，她只起到次要的媒介的作用。“服从”已经不再是她法定的义务之一，但这并不能改变她的处境，因为她的处境并不由两个人的个人愿望决定，而是由婚姻关系的约束决定的。不允许妇女做一些积极的工作，因此，她们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人。不管怎样尊敬她，她总是附属的、低一等的人，是寄生的人。她所遭受的不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她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生活的意义。因此，夫妻生活的成功与失败，对她来说远比对丈夫来说要重要得多。他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个生产者，然后才是丈夫，而她则不是别的，仅仅是一个妻子。她的工作不可能把她带出她的处境，而且恰恰相反，是她的处境才使她的工作有或高或低的价值。爱和慷慨的献身精神，使她愉快地进行工作。但如果她带着怨恨的心情来工作，她就会感到单调而乏味。在她的一生中，做的工作始终是不重要的，这种工作不能对夫妻生活的美满与否提供帮助。我们必须继续来看

一下，在实际生活经验中妇女的情况如何。她的情况的特征是，在床上“服务”和为管家服务。她只有接受这种附庸的地位，才能获得尊敬。

女孩子从儿童时代进入少女时代，经历了一个转折点。从少女变成成年人，这是另一个更加剧烈的转折点。妇女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时，本来总会有些焦灼不安，现在再加上突然而来的初次性生活，就使她更加心乱如麻。尼采曾经这样描绘过：

> 就象被可怕的雷电袭击那样，婚姻把她一下子投进了现实，使她懂事起来了。她矛盾地发现了爱情和羞耻，意外地得知上帝和禽兽竟会是一路货色，使她不得不对同一件事产生各种复杂的感觉：陶醉、牺牲、义务、怜悯和恐惧。就这样，在她们灵魂上产生了难以想象的迷乱。

举行传统的蜜月旅行，也许就是为了缓和这种迷乱的心情。把她从日常世界中拉出去，暂时切断她原来的一切社会关系，使少女离开原先的时间空间位置。但或迟或早，她总要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来。她和娘家的关系，要比她和夫家的关系亲密得多，她在新居中总觉得心中不安。当她突然离开娘家时，她或多或少总会痛苦地感觉到抛弃家人的惆怅和对今后自由的高深莫测。

她对新的职责感到很害怕，即使丈夫是一个老练而有威信的人，她与他发生性关系以后，在她的心目中他也就失去了威信。他不能代替父亲，更不能代替母亲，他不能使她得到解救。在寂寞的新居里，她依靠的是一个仍然还陌生的男人。她已经不再是小孩，而是妻子，而且肯定就要做母亲了，这使她感到不寒而慄。她永远离开了母亲温暖的怀抱，被抛弃在冷酷的现实中，看不到将来的希望。她感觉到无聊、烦恼和空虚。所有这许多不幸，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她的日记里有异常清晰的描绘。她怀着幼稚的热情嫁给这位伟大的作家，但对他的过去和他的兴趣却一无所知。她并不是他生活里的第一个女人，她不能看清他的内心世界，她厌恶肉体关系。他的心情时常不好，也不向她表示爱情。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她觉得真不该离开娘家，真想去死。她无事可做，没有动力，没有盼望，只有烦恼。

婚姻对男人来说往往也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点。有些男人精神不正常，起源于订婚期或婚后生活的初期，正好说明这一问题。他不象他的姊妹那样依恋家庭。年轻的男人上中学，上大学，到工厂学手艺，参加球队，参加俱乐部，参加其他组织，他不会感到寂寞。但成年以后，他放弃了这些。他也怕孤独，常常用结婚来解除寂寞。许多人往往误认为夫妻俩总能组成团结而恩爱的一对，其实，除了那片刻的欢娱之外，他们不可能构成一个互相保护、一致对外的小集团。所有这些，他们在结婚的第二天就都已清楚了。不久以后，

她变得亲昵和温柔，但并不能免除他的孤独。她是他的一个负担，不是他的避风港。她不但不能解救他，反而加重了他的责任。性别的不同往往隐含着年龄、教育和处境上的差异，使他们不可能真正地相互了解。他们看起来似乎很亲密，但仍然还是陌生人。在结婚以前他们之间就有一条很难逾越的鸿沟：她在无知和天真中长大成人，没有什么"过去"；但她的未婚夫却有过"生活"。他应该把生活的真实介绍给她。有些男人愉快地强迫自己去做这种细致的工作，但目光锐利的男人，则在不安地估测自己和这个终身伴侣之间究竟有多少距离。在《天真的年龄》一书中，霍顿夫人记录了1870年一位美国青年面对着新婚妻子产生的疑虑：

带着新的敬畏之情，他凝视着未婚妻坦露的前额、严肃的眼睛和天真快乐的小嘴，他知道从此以后，她的灵魂将属他所有。她是他所属于的和他所深信不疑的社会制度的产品。这个产品真使人吃惊：她什么也不懂，却什么都想要。她象陌生人一样地回过头来看他。……他们能真正互相了解吗？既然他是一个"正派"人，他就有义务向她隐瞒自己的过去。至于她，这个即将结婚的少女，并没有值得隐瞒的往事。……她是这个精心设计的神秘系统的中心，她的真诚和自信使他觉得不可思议。她那样真诚，因为她并无不可告人的事；她那样自信，

因为她知道自己没有什么需要防卫。但就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她就被投入到人们含糊其词地称之为"生活真实"中去。……但当他从短暂的欢娱中醒过来以后，他觉得沮丧了，因为他发现，她这种坦率和天真都是人工的产物，其中多少含有虚伪的成分。……这种不自然的纯洁，是母亲、姨妈、姑妈、祖母以及女祖宗们狡猾地共同策划而制造出来的，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他需要的，是他的权利所在。她们要让他在打碎这雪人般的纯洁时，享受一下做主人的乐趣。

现在，鸿沟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深了，因为少女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虚伪，她比较懂事，知道怎样来生活。但妻子往往仍比丈夫年轻得多。年龄的差异过去一直没有被特别强调，并被误认为成熟度上的差别是由性别的不同引起的。在很多情况下，妻子在丈夫面前象个小孩，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人，只是因为她确实比丈夫年轻得多。丈夫的头脑清醒，他的朋友也如此。但他们的清醒却使她感到窒息，她简直被压垮了。托尔斯泰夫人在结婚一年以后写道：

他老了，他过分全神贯注于工作。而我觉得自己是这样年轻，我要及时行乐！我不想上床，我要疯狂地跳舞，但是，有谁可以陪我跳呢？

一种老龄人的气质环绕着我，周围的人都比我年长，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压抑自己充满青春活力的冲动，因为这种冲动似乎与这拘束的环境太不相称。

就丈夫来说，他把妻子看作“婴儿”，他觉得她不是他理想中的伴侣，而且他故意让她感觉到这一点，使她感到受了侮辱。毫无疑问，当她离开娘家时，她希望能得到一个新的领路人，但她也希望被看作“大人”。她既希望自己还是孩子，但又希望变成一个成年人。一个比她年纪大的丈夫，很难以恰到好处的方式来对待她。

然而，即使年龄的差别不大，一对年轻人也是在十分不同的环境中长大起来的。她在一个女性的世界中成长，她在那里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好的女人，如何以女性的价值来赢得尊敬；但他却从小就按男性的道德原则来培训。正因为这样，男女双方很难彼此了解，矛盾也就难以避免。

因为正常的婚姻是妻子从属于丈夫，所以对妻子来说，双方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妇女看来，丈夫有点象神，他有男性的尊严，他必然会取代她父亲的地位，成为她的保护人、供养人、老师和向导。妻子的存在只有在丈夫的影子中才能开花，他监护着她的价值，他手中掌握了真理，是夫妻关系伦理上的维护者。但他同时又是个男人，她必须随时和他干那种暧昧的事。他邀请她在肉体上寻求满

足，但他又坚决地领导她走向崇高的理想。关于这种情况，莫里亚克的《特丽丝·德奎》一书中有过一段描写：

> 那是巴黎的一个晚上，伯纳因为对音乐厅的演出不满而引人注目地退场。他愤愤不平地说："应该想想，外国人看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以后会怎样看我们。简直可耻！"特丽丝听了感到惊奇，正是这个一本正经的男人，不到一个小时以后，就要向她提出上床的要求。

一个女人同时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是可能的。有时，丈夫同时起到父亲和情人的作用。这时，性行为变成神圣的宗教仪式，虔诚的妻子在献出了一切以后，感到自己的灵魂终于得救。但这样热烈的爱情在婚姻生活中是极为罕见的。有时，妻子在精神上很爱丈夫，但她不愿意投身于她非常尊敬的男人的怀抱。有一个女子，嫁给了一个她非常崇敬的大艺术家，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她认为，如果她和他一起享受那种她视为平凡而腐化堕落的快乐，就会大大影响她对他的评价和尊敬。妻子在性生活方面受到挫折后，也许会把丈夫看作禽兽，恨他的肉体，看不起他的灵魂。倒过来，我们看到，蔑视、厌恶、埋怨又一定会造成妇女的性冷感。但在较多的情况下，他的动物性的弱点是可以被理解的，在性生活以后，丈夫仍然保持着受尊敬的地位。雨果的妻子阿黛尔的

情形，似乎属于这一种类型。另一种情况是，他只不过是一个愉快的伴侣，并不受到特别尊敬，她对他既爱又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曾在《序曲》中描写了这种矛盾：

> 她确实爱他。她是那样热烈地爱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尊敬到极点。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人。她对他了解得极深刻。他忠诚、正派，他的实际经历很简单，他容易满足，也容易伤心。
>
> 如果他不那样跳到她身上来，不那样大喊大叫，不那样用急切而热烈的眼光盯着她，那该多好啊！对她来说，他太强壮了。她从小就最恨那些冲向她的东西。有时候，他真可怕，可怕到极点。她真想放声嘶叫："你要弄死我了。"在这种情况下，她真想说一些最粗鲁、最愤恨的话。……是的，这是真的。……尽管她爱他，尊敬他，佩服他，但还是恨他。

年轻的妻子很少会这样真诚地对自己承认这种感觉。爱丈夫和感到快乐，是她对自己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这也是她的娘家希望她能这样做的。如果父母在以前曾反对过她的这门婚事，那么，婚后爱丈夫和感到快乐，就是证明他们以前反对错了的最好的方法。她往往信心不足地开始她的新婚生活，她很快地说服自己，她是非常爱丈夫的。她越是在性

生活上得不到满足，她的热情就越是疯狂，越是想占有，越是嫉妒。为了弥补她的失望，她强烈地希望丈夫能老和她在一起。从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由于缺少对丈夫的真实的爱情，她作了许多努力来弥补，给他以诗一般的赞美，向他提出急切而妒忌的要求，但都不能成功。

妻子常常想用道德、欺骗、骄傲、可怜等来保持她假装出来的爱情。她真正的敌意表现在竭尽全力以求摆脱丈夫的控制。在经过了蜜月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一段动乱期以后，她努力想恢复自己的独立性，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丈夫往往年纪比她大几岁，具有男性的尊严，是法定的"家长"，在伦理上的地位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占优势。他往往，或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在知识方面比她强得多。他受过较好的教育和职业训练，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关心世界大事，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事，他知道些法律，懂得点政治，他参加政党、团体或社会组织，作为劳动者和公民，他的思想关系到他的行动。他受过现实的严峻考验，一般都具有说理的能力，能理解现实和经验，有应付危机的意识。

这些正是许多年轻妇女所缺少的东西。即使她们曾经读过书，听过课，闹着玩似地有过一点小成就，她们那些琐碎的知识也构不成完整的文化教育。她们不能适当地进行说理，并不是因为她们智力上有缺陷，而是因为她们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对她们来说，思考是一种娱乐，并不是工具。由于缺少理性的训练，即使是聪明、敏感、真诚的妇女，也很

难说清楚自己的观点和归纳出结论。正因为这样，丈夫即使只有中等能力，也容易支配妻子，甚至即使他们错了，他们也容易证明自己有理。在男人们手中，逻辑往往取暴力的形式，其中还带有狡猾的色彩。如果丈夫的年龄大些，受的教育程度也比妻子高些，基于这种优势，当他不同意她的意见时，就对她的意见根本不予理睬，只是反反复复地向她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则固执地拒绝思考丈夫的论点，就这样，他们之间就会产生很深的误解。他不肯作任何努力去理解她未能表达清楚的感受和反应，尽管这些感受和反应已经深深地在她心中种下了根。她不能掌握：丈夫用来压倒她的那些学究气的逻辑的背后，究竟包含着什么重要的东西。她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哭泣，流泪，发脾气，甚至把东西扔到他身上。

有时候妻子想继续斗争。但更多的是，她由于不愿失去丈夫的欢心而不得已地弃权了。也许是由于胆小，也许是由于笨或懒，妻子可能把各式各样的事都留给丈夫作决定，把他的决定看作是双方共同的意见。有一位理解力很高的妇女，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独立的个性，她告诉我说，她婚后十五年一直按丈夫的意志办事，丈夫去世后，每当她必须对自己的信念和行为作出决定时，她总感到心绪不宁，无所适从，她总会苦苦思索：他如果还活着可能会怎样想，然后再作出自己的选择。

作为一种规律，丈夫往往很乐意担任教师和向导。易卜

生笔下娜拉的丈夫，就向娜拉保证说：“依靠我，按照我的话去做，听从我的指导。如果这种女性的无能不会增加你对我的吸引力，我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宽大的翅膀完全可以保护你。”丈夫和同事们一起奋斗了一天，小心地巴结上司，晚上回到家里，他喜欢感到自己是绝对的优越者，是当然正确的施主。联系到白天在外面发生的事，他解释在和反对者的争论中他是如何地对，高兴地发现妻子的意见和他差不多，增加了他的自信心。他评论报纸和政治新闻，故意大声地读给她听，使她和文化的接触也要依赖于他。为了增长他的权威，他故意夸大女性的无能，她则以或多或少的驯服来接受这一种从属的地位。如果丈夫不在家，需要她自己处理一些事，她虽然可能真心感到丈夫不在的遗憾，但她常常会惊喜地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有能力来主持工作，带好孩子，作各种决定，没有丈夫的帮助也可以过好日子。因此，当丈夫回来时，她又重新被看作无能，她感到不得劲了。

结婚促使男人成为任性的帝国主义者。统治欲是一般人常有的，是最难摆脱的一种欲望。使孩子服从母亲，使妻子服从丈夫，促进了世界上的暴政。丈夫往往受称赞，受敬佩，担任顾问和导师，仍然感到不满足，他要发号施令，他要成为她的主人。所有在儿童时代和他后来生活中所累积起来的怨恨，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其他男人的欺侮和伤害，所有这些，当他在家中对妻子滥施权威时，都发泄了。他粗暴，

专断，用严厉的声调发号施令，他大声呼叫，甚至拍桌子，这种插曲经常发生。他坚持他的权利，如果她显出任何一点要独立的轻微迹象，他就以为她在造反。如果没有他的许可，他甚至会不许她呼吸。

但她的确会造反。即使开始时她被男性的尊严所折服，她的迷惑也会很快消失。孩子终于有一天会看到父亲并不是超人，妻子很快就发现在她面前的丈夫不具有崇高的君王或长官的形象，只是个普通的男人。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自己一定要受他支配，他似乎变成了她不愉快和不公平的负担，有时候，她以一种被虐待狂的乐趣来顺从他，扮演了一个牺牲者，她的顺从不过是一种长时间的无声抗议。但她也可能采取公开的对抗，反过来对他施以暴政。

只有一个天真的丈夫才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制服妻子，可以按自己的喜爱来“塑造”妻子。巴尔扎克曾说：“妻子是按照丈夫的意愿做出来的。”但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很快又谈了相反的意见。在抽象和逻辑的领域里，妻子常常屈从于男性的权威，但牵涉到她真正关心的具体问题时，她会暗地里坚决地反对他。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对妇女的影响要比对男子的影响深得多。因为她被紧紧底局限在自己的历史范围内。她往往永远不可能摆脱早年生活给她留下的烙印。丈夫也许可以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给妻子，但他很难改变她的宗教信仰，也很难动摇她由于迷信而引起的一些信念。

尽管她学到一些新的看法，尽管她能完全模仿别人，谈一些原则，但她总保持着她对事物的特殊见解。这些阻力也许会使她难以理解比她高明的丈夫，甚至会使她象司汤达、易卜生和肖伯纳著作中的女主角那样，拔高到超过男性能够容忍的程度。有时，由于丈夫在性生活方面不能使她满足，或者相反，丈夫在这方面要求过分，引起她的报复心，她会故意坚持与他不同的准则和观点。她依靠母亲、父亲、兄长或其他她们认为是优越的人，甚至依靠神父和姊妹，为的是想达到超过丈夫的目的。有时她要反对，但又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理由，就故意和他闹矛盾，攻击他，伤害他，竭力要使他产生自卑感。如果她居然有了一些站得住脚的理由，自然就很高兴地在丈夫面前神气活现，把自己的判断、意见和命令强加给丈夫，使自己完全成为道义上的权威。

如果她在智力上不可能和丈夫竞争，她就会想在性生活方面向他报复。当她需要什么时，她以不让他拥抱来作为要挟。她以变幻莫测和故意调情的行为，把丈夫贬低为向她要赏赐的求乞者。她卖弄风情，使他嫉妒，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欺骗他，戏弄他。如果她不敢做得太过分，她就会把自己高傲的性冷感，引以自豪地隐藏在心底。这种秘密她往往会倾吐在日记里，也可能告诉朋友们。

有些妇女希望在白天和晚上都取得胜利，说话无理，行为粗暴，性交时冷淡。还有些妇女为了控制丈夫，就不断贬低他的容貌，小看他的能力，嫌他挣钱少，并以钱少来说明

他工作的价值低。她们用这些战术来对抗丈夫，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否认他们的优越性。当丈夫生病时，需要她照顾，她会有一种胜利的感觉。她把沉重的手放在病人身上，为的是使他知道，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肉体而已。

女人希望男人不是一个主动的个体，而仅仅只是一副被动的躯壳。她反对存在，只肯定生活；反对精神的东西，只肯定肉体的东西。对于男人的事业，她很容易采取一种古怪的态度。她相信那种“男人的全部灾难都来自一个原因，就是不能安安份份呆在他的房间里”的说法；她乐于把他关在家里。所有对家庭生活没有直接益处的行动，都激起她的反感。十六世纪的一个作家、化学家、陶瓷艺术家贝纳德·帕里斯，当他致力于发明一种新的釉质时，曾把家庭用具当作燃料来烧，他的妻子大为恼怒，她认为没有这种新釉料，世界也照样平平安安；文学家莱辛的妻子，想要他对她花园里的红醋栗发生兴趣，却不想读读他的悲剧剧本。

这种冲突可能发展得很严重，以致引起夫妻关系的破裂。但是，按照一般规律，当妇女抵制丈夫的统治的时候，她还想要“管住”丈夫。她和他斗争，为了尽力保住自己的独立性；另外，她还和世界上的其余人斗争，为保护她的“处境”，正是这个处境注定了她的依赖性。这种双重的游戏不是好玩的。很多妇女总是生活在恼怒不安和神经质状态中，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缘故。

“抓住”一个丈夫是一门艺术，“管住”丈夫却是一项职

业——此道中人，须得有相当的能力。一个精明的姐姐告诉一个任性的年轻妻子："小心点，跟丈夫发脾气会让你丢掉饭碗。"丢了这一份职业，实在是安危悠关的事情，这意味着失去物质和道德的保障，失去一个自己的家，失去多多少少能替代爱情和幸福的满足感。一个妻子，很快就会明白她的身体的吸引力，是她所有武器中威力最弱的一种；这种吸引力随着彼此的熟悉，很快就消退了；而且，天哪，周围还有那么多悦人心意的女人。于是，她竭力使自己妩媚动人、讨人喜欢；她常常感到苦恼，一方面，自尊心使她变得趋于冷感，另一方面，她又希望以自己的热情博取丈夫的欢心。她精心修饰打扮自己，但求为丈夫脸上"增光"；她努力用建议和劝告对他施加影响；甚至，她能尽力而为，使自己成为丈夫的成就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几千年的传统迫使妻子们建立了一门"管住"丈夫的技术。妻子必须发现丈夫的弱点，又必须迁就丈夫的弱点。妻子必须恰到好处地掌握奉承和嘲骂、驯服和抵拒、严厉和宽容的分寸。这些态度的揉合使用，是一种极其精细的事情。给丈夫的自由，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她过于仁慈，丈夫就会从她那里溜走；他奉送给别的女人的金钱和热情，都是从她身上分走的；她冒着这种风险：丈夫有了情妇，情妇有足够的力量使他和她离婚，或者，即使不离婚，情妇也会在他的生活中占据首要位置。但是，如果她把他看得太紧，管得太紧，可能把他惹怒，弄得夫妻翻脸。关键在

于懂得如何有计划地“让步”；如果丈夫搞点小欺骗，她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另一些时候她必须把两只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已婚妇女尤其警惕那些年轻姑娘，她认为，能偷走她的“饭碗”，是人家求之不得的幸福。为了把她的丈夫从某个令人不安的对手那里拉开，她带他出外度假，让他分心，转移他的注意力；如果必要，就学庞巴杜夫人的榜样，找一个新的、危险性不大的对手。如果还不成功，她就采取大哭大闹或假装自杀之类的办法；但是，吵闹得太过份，又会使丈夫离开家门，一走了之。在这种可能弄得丈夫不能再忍受的危险时刻，她最最需要的是魅力；如果她想要赢得这场游戏，她就要发明一套技巧，把眼泪和微笑，把威吓和撒娇揉合起来，交替使用。

这的的确确是一门可悲的学科——装假，耍手腕，既恨又怕，还要不露声色，玩弄男人的虚荣心和弱点，学会碍他的事，欺骗他，“管住”他，如此等等，显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对于此等行为，妇女有个最好的理由，即她是整个儿陷在她的婚姻中的，婚姻就是她的一切。她既无有收入的职业，又无法律方面的能力，也无她自己的个人关系，甚至连她的姓氏也不再属于她，她已换姓了丈夫的姓氏；女人除了是丈夫的“一半”之外，什么都不是。如果他离开她，无论从里从外，她都指望不到帮助。批评托尔斯泰夫人索非亚，是容易的；但是，如果她拒绝再在婚姻生活中扮演伪君子，她又能到哪里去呢？她能有什么别的命运呢？

确实，她仿佛素来是一个可恶的泼妇；但是，难道可以要求她爱他的暴君并庆幸她的被奴役状况吗？丈夫和妻子之间，如要维持忠实和友谊，根本的条件是：他们在相互关系中是自由的，在具体事务中是平等的。由于只有男人单方面地拥有经济上的独立性，由于他握有由法律或习俗附加给男性的种种优惠，这自然足以使他常常以暴君的面目出现，并且驱使她们反叛或欺瞒。

没有人梦想否认婚姻生活中的悲剧，以及这种生活现在已经满目疮痍。但是，婚姻的保卫者们认为，种种冲突是由个人的缺陷，而不是由婚姻制度本身造成的。他们用这种想法来支持婚姻制度。比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尾声处描写了一双理想的夫妻：彼埃尔和娜塔莎。娜塔莎原来是个风流浪漫的姑娘，但是，结婚以后，使人大吃一惊，她放弃了修饰打扮，放弃了社交活动，放弃了全部娱乐，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她成为一个典型的主妇，失去了“曾使她十分迷人的生命的光焰”，而且学会了对彼埃尔采取猜疑和紧逼的态度。彼埃尔自然也放弃了他昔日的伙伴，专心致力于事业和家庭。

这幅田园牧歌式的图景值得贴近了仔细察看。托尔斯泰说，这一对夫妻是一种灵肉一致的结合；但是，一旦灵魂离开肉体，留下来的只是一具尸体；如果彼埃尔不再爱娜塔莎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劳伦斯也拒绝接受男性多变的说法，在他的小说里，多拉蒙将永远热爱那个把灵魂奉献给他

的印第安姑娘泰来莎。然而，最为狂热地信奉爱情的绝对、永恒和无与伦比的人之一，诗人安德·白瑞德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现存的环境下，这种他认为绝对、永恒、无与伦比的爱情也可能发生问题：不论是过失还是变心，发生在男人身上的总是远远多于女人。彼埃尔是一个强壮而爱好感官享乐的男人，他可能被别的女人吸引；娜塔莎将会嫉妒，不久他们的关系就将变得痛苦难忍；他会离开她，这将毁掉她的生活；或者，他会向她撒谎，满怀怨恨地忍受她的管束，这将毒化他的生活；或者，他们达成某种妥协或采取某种权宜之计，这将使他们双方都不幸福。

也许有人会反对，他们说，娜塔莎至少还有她的孩子们；但是，只有在一个包括了孩子们的父亲在内的平衡的框架结构中，孩子们才可能成为欢乐的源泉；对于一个被丈夫冷淡的、心怀嫉恨的妻子来说，孩子们只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托尔斯泰赞美娜塔莎对彼埃尔的思想的盲目崇拜；但是，另一个男人劳伦斯，他也要求妇女盲目崇拜男人，却嘲笑彼埃尔和娜塔莎二人；一个男人，在其他男人看来，可能只是一个泥土捏成的偶像，而不是真正的神祇；崇拜这样一个人，她实在是枉费了生命。她知道这些吗？男性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这种权威性也难以再起作用。妇女必须进行判断，必须进行批评，不应该继续还仅仅只是一种有求必应的回声式的人物。此外，把一些不是妇女自己通过努力、自由地得到的原则和价值强加给她们，是对她们的一种贬损。

她可以通过自己的独立判断来决定她是否同意丈夫的想法；那些她本来不知道的东西，不能强迫她赞成或反对；她不应该从别人那里借取自己的生存意义。

对彼埃尔——娜塔莎神话，最有说服力的批评证据，是创造了这一神话的托尔斯泰自己的婚姻生活。托尔斯泰的妻子索非亚对丈夫深为厌恶，她认为他"惊人地枯燥无味"；他和邻近的每一个农妇串通一气欺骗她，她嫉妒得要命，也烦恼得要命；许多次怀孕弄得她神经质，孩子们也不能填补她那空虚的心灵和无所事事的生活；家庭对她来说有如枯燥无味的沙漠，对她的丈夫来说则是人间地狱。最后，这一切终于结束，索非亚，一个神经质的老太婆，深夜半裸着身子睡在潮湿的森林里，托尔斯泰，一个苦恼不堪的老头子，离家出走，最终否定了他们的终身结合。

当然，托尔斯泰的情况属于一种特别的例子。有很多婚姻，都是"美满"的，那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达成了某种和解。他们并肩生活，并且不发生太多的相互折磨，也并不过分互相依赖。但是，有一种灾因祸源，是他们都无法逃避的，那就是厌倦。不论丈夫成功地使妻子变成他的应声虫，还是他们各自埋头于自己的私人天地中，若干月或若干年后，他们之间就不剩什么可说的话了。夫妻是一种组合，成员们失去了各自的独立性，却依然不能逃避孤独寂寞；他们是一种静态的联合，他们合为一体，而不是保持一种动态的、富有活力的相互关系。正因如此，无论在精神领域还是

爱情领域，他们之间都没有什么可互相给予的，也没有什么可互相交流的。无数个夜晚，就是意义含混的闲谈或无话可说的沉寂中度过，不然，就只有对着报纸打哈欠，直到上床的时候。

常有人说，这种没话说的沉默，正可以证明夫妻之间相知甚深，以致不必说话了。肯定没有人能否认婚姻生活产生了熟悉和亲密；然而，所有的家庭都难免有些掩盖着的猜疑、嫉恨和埋怨，也是事实。这类熟悉和亲密，和真正的人类友爱之情相比，存在很大的区别。

拥护"夫妻之爱"主张的人，随时都认为，夫妻之爱不是恋爱，而正是这一点给予夫妻关系以了不起的特性。近几年来，中产阶级为歌颂这种夫妻之爱，发明了种种史诗风格的说法，于是，例行公事式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奇遇，忠实成为崇高壮丽的激情，无聊变成了智慧，家庭中的怨恨成了最深刻的爱的形式。然而，事实上，当两个人互相厌恶，却又不能各自分离，这种情况绝不是人类全部关系中最为真诚、最为动人的，而是最令人怜悯的。

相反，对两个完全独立自足的个人来说，理想的结合，只能建立于因相互爱慕而达成的和谐一致之中。在托尔斯泰看来，娜塔莎和彼埃尔的结合是值得赞美的，这种结合是"虽不明确，但却坚固有力，有如他的灵魂和他的肉体的结合"。如果我们接受二元论假说，相对灵魂来说，肉体体现的是纯属偶然的某些东西，于是，在夫妻关系中，每个人必然会对另

一个人产生随意性的厌烦，一些无意义的纠纷正是这样发生的。配偶中的一方必须被接受并被爱，这种说法象无法避免的生存条件一样，是非理性的，是不准选择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接受和爱，这两个词被蓄意混淆了，并且因此而变得复杂难解。一个人所接受的，未必是其所爱的。如果一个人接受，也就不得不忍耐另一个人的身体、过去和现状；但是，爱是一种指向外部的运动，是一种指向另一个人的冲动，爱情指向一个与已分离并性质迥异的人，指向一个可以看见的目标，指向未来；接受一种负担，接受一种暴虐，与爱情无涉，只会使人厌恶。

人际关系，只有在直接被体验的范围内，才有价值；比如，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只有当它们被有意识地实现的时候，才获得价值；当夫妻关系渐渐失去了能直接体验到的感情，在这一过程中丈夫和妻子也必然会失去他们的自由感。那种爱情和怨恨、压抑、顺从、麻木、虚伪的复杂混合物，恐怕只有经过粉刷掩饰，才会被尊重。但是，真正的爱情象真正的肉体之爱一样，若要它是纯真的、可靠的，它首先必须是自由的。

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感情多变，朝三暮四。亲切温柔的爱情并不是一种只能延续一时半刻的情感纠葛。然而，是继续保持这种感情，还是断然解除这种已经产生的关系，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当感情不受外界约束的干扰，当它充满无所畏惧的真诚，感情就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强制性的夫妻

之爱，会导致各种类型的压迫和谎话出现。首先，它使夫妻不能互相真正了解。日常的熟稔亲密，并不一定能产生理解和同情。丈夫过于尊重妻子，以致对她的心理活动不发生兴趣。承认她内心的秘密自治领域，似乎是令人烦恼和危险的。她真的从婚姻之床中找到了快乐吗？她真的爱丈夫吗？她真的愿意服从他吗？他宁愿不问这些问题；对他来说，这些问题本身就足以令人震惊。

因为他娶了个“好女人”，她天性贤惠、专一、忠实、纯洁、快乐，并且从来不作非份之想，所以，一个久病的男人，谢过他的朋友、亲戚和护士的关心之后，他对六个月来寸步不离守在病床前的年轻妻子说：“对你就不必谢了，你只是在尽你的义务。”丈夫不把妻子的优良品质当作某种特别的美德；他认为这些优良品质是由社会和婚姻制度为他确保的。他认识不到妻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传统道德经中走出来的角色。他把妻子的忠心耿耿看作理所当然的事，他并未考虑到她怎样克服了诱惑，她是否可能屈服于那些诱惑，也未想到她在各种情况下都保持忍耐、贞洁和适当的举止，是很难达到的。他依然很少了解她的梦想，她的爱好，她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她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变化。当他想起她或说起她的时候，可能满怀爱怜之情，却不把她当作一个自由的个人。因此，这种简单而忠贞的男人，当他突然知道妻子已不再爱他并将离他而去的时候，他常常被描写为因女性的不忠而恍然大悟、深为失望。比如，伯恩斯坦剧

本中的丈夫，当他们发现妻子的伤风败俗行为时，感到愤慨，他们以大丈夫气概承受这种打击，但是，作者依然未能成功地把他们写成慷慨而强有力的男子汉；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只是些没有真情实感和善良愿望的傻瓜。男人也许会指责妇女善于作假，但如果他们真是如此连续不断地受骗，他们实在是过分自以为是、自满自得了。

妇女是注定了只能“不道德”的，因为对她来说，所谓“道德”就意味着要求她成为一些超人才有的素质的化身，成为旧约圣经“箴言篇”中所说的“贤德妇女”，以及“完美无瑕的母亲”、“贞烈妇女”等等。如果让她未经允许就能思考、梦想、睡觉或呼吸，她就违背了男人的理想。正因如此，许多妇女只有在男人不在场的时候，才让自己流露真情，从而变成“真正的自己”。另一方面，妻子也不了解她的丈夫；她自以为了解他最真实的一面，因为，她看见了他的日常生活；但是，对男人来说，他在这世界上所做的头等大事，都是在别的男人中间做的。不理解他对超越的追求，就是抹煞了他的本性。如一个妇女所说：“如果有人跟一个诗人结婚，她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忘记拉抽水马桶的水箱。”他依然是个诗人，但是他的妻子对他的工作不感兴趣，她对他的了解，还不如某些遥遥相隔的读者。如果不准她参予，那么造成这种情况不能怪她。她不能接触丈夫所做的事情，她也没有追随丈夫工作所需要的经验和文化水平；她未能参加从事那些在他眼里远比单调的日常事务更为重要的工

作。

在一些特殊的例子里，妻子可能成功地成为丈夫的真正协作者，和他一起讨论计划，提出建议，和他一起工作。但是，如果她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完成的工作称作她自己的，那实在是一种痴心妄想，因为她的丈夫才是自由而负责任的行动者。如果她想在她的效劳中得到快乐，她必须爱他；否则她将自寻烦恼，因为她会感到她的工作成果被抢走了。男人们忠实信奉巴尔扎克的教导。巴尔扎克说，把女人当作奴隶对待，同时让她们以为她是皇后。男人们有意夸张女人对他们的影响力，心底里却明知道自己在说谎。乔其特·李·勃兰克就是一个受骗的傻瓜，她要求梅特林克在一本书上署上他们俩的姓名，她以为，这本书是他们一起写成的。葛来塞在为这位女歌唱家的«纪念物»一书所作的序言中，相当坦白地告诉李·勃兰克夫人，每个男人都愿意向作为同事和灵感来源与他分担生活的妇女致敬，但是，他依然有理由把这些工作完全视为他自己的。在每一个行动中，每一件工作中，只有作选择和作决定的人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妇女通常扮演的是算命者的水晶球的角色，换一个妇女也能做得很好。证据就是男人常以同样的信赖接受另一个顾问，另一个合作者。比如，托尔斯泰让一个女儿抄写并订正他的手稿，其时他的妻子正认为自己是这些工作必不可少的人。只有妇女自己的独立工作，才能确立妇女真正的独立性。

在不同的情况下，婚姻生活显示出不同的形式。但是，对

大多数妇女来说，日子过得都差不多。早晨，丈夫离家，妻子高兴地听着门在他身后关上。她自由了；孩子们上学去了；她是独自一人；她料理无数琐屑小事；她手里忙着，心里空着；她的所有计划都是为了全家；她的生活也是为了全家；当他们回到家里，她的无聊才有所减轻。她的丈夫过去惯于带给她一束花，或一点小礼物，但是现在这些显得多么可笑！他不慌不忙地回家来，耽心着发作间隔越来越短的吵闹，她出于无聊常常找碴寻衅，或者摆出一副简直不值得等他的样子发泄怨气。如果妻子一声不吭，丈夫也会失望。他工作之后感到疲倦，于是产生了矛盾的愿望，既想休息，又想寻找刺激，但妻子不能满足他。晚上更是单调乏味：读报、听收音机、漫无目的地闲聊，如此而已。在这种亲密之下，每个人仍是孤独的。妻子怀着希望和忧虑，想要知道今夜最后还会不会有点什么事情发生。她上床睡觉，失望，懊恼，却又感到心安，如同往常一样。第二天早晨，她又高兴地听着丈夫离家的关门声。辗转于贫困和劳苦之中的妇女，她们的命运更难忍受；她们的闲暇和消遣更少。但是，这种生活图样——无聊、等待、失望——在无数情况下重现。

某些逃避的通道向妇女开放；但在实践中它们并不适用于全体妇女。尤其在农村地区，婚姻的锁链是沉重的，于是，妻子必须设法使自己适应她无计躲避的处境。值得注意的是，她们有些成为凶悍刁蛮的主妇，有些成为百依百顺的、自我虐待的牺牲品，变成家庭的奴隶。有些继续保持少女时代自

恋自爱的行为，依然无所事事，顾影自怜，在浪漫的梦想、矫揉造作、慢性衰弱症、发脾气、想象戏剧性故事、花朵和服装之中寻求避难所。妇女通过这些象征性的行为寻求逃避，这些行为可能导致精神萎靡、走火入魔，甚至可能导致犯罪。作为一种忍无可忍的处境的唯一出路，一个可憎可恶的丈夫可能最终被谋杀。

一个不顾她的条件，决心以达观和纯真的态度生活的妇女，除了采取苦行僧的骄傲态度之外，可能没有别的手段。她在物质方面处于依赖状态，她能了解的只是内心的、抽象的自由；她拒绝接受现成的信条和价值，她运用她的判断标准，她提出问题，并且以此逃避夫妻关系的奴役；但是，她的超凡脱俗，她对“忍耐和节制”法则的忠诚，只构成一种否定性的态度。她不计较名利，她愤世嫉俗，但她缺少对自身力量的正面使用；她帮助别人，安慰别人，保护别人，她施舍，她做这做那；但是，她苦于找不到真正需要的工作，找不到真正的目标。在孤独寂寞和枯燥乏味中消耗殆尽，她可能否定并毁灭自己。

这种命运的一个典型范例，是由笔名为“岑丽德”的查利尔夫人提供的。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十八世纪的文学妇女。理性的爱，明澈的才智，富于活力的“生命火焰”，不足以把她从那个慢性谋杀似的单调无聊的婚姻中拯救出来。在她年轻的时候，她未能和一个对她真有兴趣的男士结婚，三十岁的时候，她嫁给查利尔先生。他是一个博学、诚实、迟钝

的数学家。他不管她的愿望，坚持把她带到一个瑞士小镇过着沉闷的家庭生活。她操持家务以消磨时间。她写了四部反映附近地区生活风情的小说，这些小说激起了当地人的敌意。有一部小说描写一个漫长而悲哀的婚姻，很象她自己的婚姻：妻子是生性活泼并感情丰富的，丈夫虽是个好人，但冷淡孤僻。这是一种缺少理解、使人失望、充满哀怨的夫妻生活。后来，本杰明·科斯坦出现了，并成为查利尔夫人的爱慕者达八年之久。当科斯坦被斯丹尔夫人所吸引之后，查利尔夫人把自己关在家里，深居简出达十五年，"厮守着查利尔先生，就象厮守着阿尔卑斯山"，并做一些帮助当地农民的工作。她写了一些信，又写了几本书，但是，她的大部分生命都消耗于一些极其琐细、乏味的事情中，这种生活在一个偶然经过的访问者看来，有如活的坟墓。

也许有人会说，查利尔先生的生活也并不比查利尔太太更多欢乐；但是，至少这种生活是他自己选择的，也一直适合于他的平庸的个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男人具备了"岑丽德"的才能，他一定不会把自己虚掷在偏远的小镇上。他会给自己打出个天下来，他将建功立业，奋斗，行动，生活。多少有才能的妇女吞没于婚姻的深渊里，用司汤达的话来说，"迷失于人性中！"有人说，婚姻销蚀了男人，这种说法常是事实；但是，婚姻往往毁灭了妇女。

结婚的开头几年，妻子往往被幻觉所催眠，心情平和；她一心崇拜丈夫，无保留地爱护孩子，自以为对于丈夫和孩

子来说，她是不可缺少的；不久，头脑渐渐清醒了；她知道丈夫没有她也能很好过活，孩子们早晚要离开她，而且多多少少有点忘恩负义。家庭不再能填补她的空虚；她发现自己孤零零的；她发现没有什么事与她相干。感情的连结和习惯的方式可能仍有很大的帮助，但也不能拯救她。所有诚实的女作家，都注意到了这种“三十岁女人”心中的忧郁；这也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多萝西·帕克、弗吉尼亚·沃尔芙笔下女主角的普遍特征。在刚结婚、刚做母亲的时候，这些女主角们都高高兴兴，歌声不断，但不久就表现出某种苦恼。在法国，三十岁以前，已婚妇女的自杀率低于未婚妇女的自杀率，三十岁以后，就不是这样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婚姻的悲剧，并不在于它未能保证曾经许诺给妇女的幸福——幸福本不是能保证的——而在于它摧残了妇女；它使妇女陷于千篇一律、单调重复的生活中。如我们所知，女性生命的开头二十年是非常丰富多采的；她发现世界和自己的命运。二十岁左右成为家庭主妇，被丈夫和怀中的孩子所束缚，就这样过一辈子。真正的行动，真正的工作，那是她丈夫的特权；她只有一些令人厌烦而且永远做不完的事情可做。她的顺从和忠诚，虽被赞美，但成天忙于照顾丈夫和孩子的生活，对她自己似乎并无益处。忘却自己固然很好，但是也依然需要知道这是为了谁，为了什么。最糟糕的是她的热心和忠诚还往往被人讨厌；甚至，这种热心和忠诚对丈夫

来说会转化成一种他设法逃避的暴虐；然而，也正是他，把这种热心和忠诚当作最高存在意义强加给妻子。娶了她，他责成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但是，他却并未承担相应的义务，不愿接受这种全盘奉献的后果。

正是丈夫的这种二重性，注定了妻子的不幸，而他还向她抱怨，说他自己是牺牲品。正象他在床上想要妻子同时既热又冷，他要求妻子既整体地属于他，又不要成为负担；他希望她给他建立一个安定的家，又要留给他自由，既承担单调重复的日常家务，又不要惹他厌烦，既随时跟在身边，又不要纠缠不休；他想要她完全属于他而他又不属于她；既结对生活又保持独立。因此，从结婚的那天开始，她就被出卖了。通过生活，她测量这种出卖的程度和范围。劳伦斯关于性爱的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如果两个有严重大缺陷的人试图通过结合互相补充，那么这种结合是注定要失败的；婚姻应该是两个完整的、独立的人的联合，而不是一种撤退、一种并吞、一种逃避、一种补救。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当她决定，在她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前，她首先必须做一个完整的人，这时候她懂得了上面所说的道理。一对夫妻不应该被看作一个单位，一个封闭的细胞；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由的社会的一员，在那里，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独立地发展成长；然后，两个同等适应于婚姻关系的人才能在纯正的宽容中结合起来，在承认对方自由的基础上结合起来。

这种平等的结合，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世界上确有

这样的结合存在。有些人出于强烈的爱情，两两结合，但也保留了友情和工作方面的自由；比较罕见的一种人，集爱人和朋友于一身，但是并不把对方当作生活的唯一理由。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很多细微差别：在合作奋斗、寻求欢乐、建立信任、发展爱好、互助合作等方面，他们可能成为给予对方快乐、财富和人生力量的最为丰富的源泉。对婚姻的失败，不应该指责个人；和孔德与托尔斯泰热烈鼓吹的主张相反，这种失败是由婚姻制度本身的问题引起的。以为男女不必经过互相选择，单凭义务的约束，就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互相满足，实在荒谬绝伦。这种情况必定引起虚伪、说谎、敌意和不幸福。

婚姻的传统形式现在正经历着改变，但是，它依然带有压迫性质，丈夫和妻子从不同的角度感觉到这种压迫。就抽象的、理论上的权利而言，他们今天几乎是平等了；他们比从前有更多的自由选择对象，离婚也比较容易了，特别是在美国，离婚并不鲜见；男女双方在年龄和文化程度上的区别，也普遍不象过去那么悬殊；丈夫比较愿意承认妻子的独立性；他们可能平均分摊家务劳动；他们一起享受娱乐活动：野营、骑自行车、游泳、驾驶汽车，等等。妻子不必成天守在家里等待丈夫归来；她可能参加运动会，参加俱乐部、联谊会、乐团，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她常在外面奔忙，她甚至可能有一个职业，有一点收入。

很多年轻人组成的新家庭，给人以建立于完全平等基础

上的印象。但是，只要丈夫仍然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这种平等便只是一种错觉。他们根据他的工作需要决定住处；她跟着他从城里搬到乡下，或者从乡下搬到城里，或者搬到遥远的殖民地，搬到外国去。他们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他的收入；他们的生活节拍服从于他的时间安排；他们的交往范围随他的职业而定。作为比妻子更为主动的社会成员，他引导着家庭的智力、政见和道德状况。对于那些不能独立谋生的妇女来说，离婚只是理论上的空谈。如果说在美国赡养费成为男人的沉重负担，在法国，被遗弃的妻子和母亲依靠少得可怜的津贴生活，她们的命运令人愤慨。

但是，根本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丈夫在工作和行动中得到了具体的自我实现，然而对他的妻子来说，只可能从消极方面行使自由。今天美国年轻妇女的处境，使人想起罗马颓废时期解放了的妇女的情况。如我们所知，罗马的妇女可以在两种行为类型中进行选择：有些人继承传统的生活模式并保持她们老祖母的德行，有些人则在混乱中度日。同样，很多美国妻子依然遵照传统的模式留在家里，另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浪费她们的时间和精力而已。在法国，即使有世界上最为好心的丈夫，年轻妇女一旦做了母亲，也会被家务事淹没，与旧时代并无两样。

有人说，在现代家庭中，尤其是在美国家庭中，妇女把丈夫降低为奴隶，这种说法颇为普遍。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男人就一直在抱怨所谓“珍西皮”（苏格拉底之妻）式的泼妇的

凶悍。现代妇女进入了从前被列为禁区的男性的领域，也确是事实。比如，我知道有些大学生夫妻，妻子拼命要让丈夫成功，她安排他的时间及饮食，监督他的功课；她剥夺他的所有娱乐，几乎要把他锁起来。男人们对于这种专政，不象从前那样反感，也确是事实。他承认妇女在理论上的权利，并知道她只有通过他才能具体实现这些权利。为了取得表面上的平等，他必须付出更多，因为他拥有的也多。她接受他的给予，要求他付出，正因为她比较贫乏。主人和奴隶关系的辩证法在这里得到了最为具体的应用：在压迫别人之中，自己成为被压迫者。男人被他们的统治权所束缚：因为只有他们挣钱，所以妻子向他们要钱；因为只有他们有职业或专长，所以妻子要求他们一定要成功；因为只有他们能体现超越，所以妻子希望通过掌管他们的工作和成就，侵占他们的超越。

反过来，妇女的凶悍泼辣，正是她不能独立的表现：她知道，夫妻二人的成功、前途、幸福和生存意义，寄托在丈夫一个人的手中；如果她不顾一切地要他服从她的愿望，那是因为她是属于他的，那也就是说，她的个人利益就在他身上。她把她的弱点当作武器；但是，事实上她仍是弱者。夫妻的互相奴役，对丈夫来说主要只是些日常生活的麻烦，但对妻子来说，却是某种深层的、影响很大的东西；如果妻子因感到烦闷而要求丈夫坐在旁边陪她几个小时，她肯定使他心烦，并显得象个累赘；分析起来，他若没有她，日子还好

过，她若没有他，情况就大不一样；如果他离开她，她的生活将被毁掉。最大的区别在于妇女的依赖性是内化了的：即使她的行为外表上是自由的，她也仍是奴隶；同时，男人则基本上是独立的，他的束缚来自外部。如果他看起来象个牺牲品，那是因为他的负担是非常明显的：女人象寄生虫一样靠他供养；但是，寄生虫不是一个征服性的主人。事实上，按照生物学的说法，男性和女性都不是对方的牺牲品，他们双方都是种族延续需要的牺牲品，所以，男人和女人一起经受着一种不是他们创造的制度的压迫。如果断言男人压迫女人，丈夫会感到愤慨；他感到他也是一个被压迫的人，而且，他也确实如此；但是，事实上，正是男性的法规，以及男性根据他们的利益发展起来的社会，在一定形式中确立了妇女的处境；这种形式，正是导致男女两性共受磨难的根源。

为了男女双方的共同幸福，这种处境必须通过禁止把婚姻当作妇女的"事业"来改变。那些声称他们因为"女人恶习难移"而反对女权主义的男人，是不太合乎逻辑的；准确地说，正是因为婚姻使妇女成为"祷告的螳螂"、"蚂蝗"、"有毒动物"之类，所以，改良婚姻，并随之改良她们的一般状况，是非常必要的。妇女严重依赖男人，是由于她不被准许依赖她自己；给她自由，他也将自由——这就是说，让她在世界上做点事情。

已经有年轻的妇女致力于争取这种建设性的、行动的独立性；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在她们的研究或职业中坚持很

久。通常，她们很清楚她们的工作兴趣终将为丈夫的事业而牺牲；她们只是带回家来一些补贴家用的收入；她们只是表面性地投入了一些事业，这些事业不能使她摆脱婚姻的劳役。甚至连那些有正式职业的妇女，也未能因此得到和男人相同的社会利益：比如，法国律师的妻子，在丈夫死后可以领取一笔抚恤金；但是，女律师的丈夫，在妻子死后却得不到相同的待遇。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工作的妇女，未被当作和男人有相同意义的养家者。有些妇女在职业中得到了真正的独立；但对大量的妇女来说，外出工作只能增加疲劳。此外，孩子的出生也迫使她们局限于扮演母亲的角色；要解决工作和抚养子女之间的矛盾，在现在的条件下是很困难的。

按照传统，正是孩子确保了妇女真正的独立，并使她免除其他方面的奉献；如果说作为妻子她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人，作为母亲她却是的：孩子是她的幸福，是她的生存理由。由于有了孩子，她在性和社会两个方面得到了自我实现；通过生育，婚姻制度获得了它的意义并达到了它的目的。这些说法听起来不错，但却未必如此；所以，我们还要仔细研究母亲们的生活，研究这一女性生活史上的最高阶段。

第五章　母　　亲

从生理上来说，女人的任务是生儿育女。她最神圣的使命是做母亲。她的生理结构，就是为了人类的延续与永存而构建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人类从来就没有完全让自然来支配。特别是对生育问题，近百年来，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不再完全听从上帝的意志了。某些国家已经公开宣传科学的避孕方法；受天主教影响的民族，则秘密地采用一些避孕方法，如体外排精或性交后冲洗阴道等。这些避孕方法，往往会引起男女双方的相互抱怨。男方不喜欢在那片刻欢娱之际，为了防范怀孕而煞风景，女方则对冲洗感到麻烦。他讨厌她那过分富于生殖力的躯体，她抱怨他冒着风险将生命的种子送进她体内。尽管他们谨慎地采取避孕措施，到头来还是吃惊地发现女方怀了孕。在避孕方法落后的国家中，这种现象经常发生，于是只能求助于危险的补救方法——人工流产。避孕合法化程度越高，人工流产的需要性就越少。但在法国，不少妇女被迫做这种手术，使爱情生活涂

上黯淡的色彩。

资产阶级社会在某些问题上，显示出它是何等虚伪：人工流产被看做是叛逆性的犯罪，甚至连提到这个词都认为是伤风败俗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描绘妇女分娩时的欢乐和痛苦，但他如果描绘人工流产的情况，他就将被指责为淫秽作家，被指责为暴露人性的阴暗面。现在的法国，每年做人工流产的妇女，大约和正常生育的人数相同。因此，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现象，必须看作妇女隐含的危险境遇之一。但是法律不允许人工流产，因此，这种精细的手术只能在秘密中进行。关于反对人工流产的合法化的争论，是十分荒谬的。有些人坚持认为：人工流产是一种危险的手术。但是，已故的柏林性问题研究所所长玛格纳斯·海切法德说："如果在医院中由合格的专家来小心地进行人工流产手术，不会造成触犯刑法的重大事故。"诚实的医生都同意这种说法。与此相反，现在这种秘密进行人工流产的情况，对妇女造成严重的危险性。在有些手术中，由于技术欠佳，条件太差，造成许多意外事故，甚至危及生命。

被迫成为母亲的妇女把不幸的孩子带到人世间，这些孩子的双亲没有力量抚养他们，他们将成为社会的不幸者，有的还会夭折。必须指出，我们的社会在高呼要保护未出生婴儿的权利，但在他们出生以后却采取冷漠的态度。有些人指控做人工流产的妇女，但不肯采取措施去改善很糟糕的公立孤儿院。那些不顾孩子死活而将他们交托给别人去虐待的人，

没有受到干预。对于那些公立或私人举办的儿童收容所里可怕得象野兽般的暴虐行为，我们的社会闭上自己的眼睛不闻不问。他们一方面不承认胎儿属于怀孕的妇女，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已出生的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可以由父母来任意处理。不久以前，在一个星期内我们看到了两件事：一个外科医生由于为别人做人工流产手术，被宣告有罪而自杀；一个父亲把儿子打得几乎死亡，但只判刑三个月，而且还缓期执行。近来，有一个父亲，不关心患喉病的孩子，造成孩子死亡。有一个母亲，认为人的生死完全是上帝的意志，不肯为她的女儿请医生。在女儿的葬礼中，许多儿童出于气愤而向她扔石子，但当有一些记者对此表示愤慨时，不少有地位的人却出来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辩护，他们说，孩子属于父母所有，局外人不应该横加干涉。正是由于社会的这种态度，据报导，法国大约有一百万儿童，他们的身心正在受到折磨。住在北部非洲的阿拉伯妇女，因为不许进行人工流产，大多数婴儿都在出生以后夭折，但是，这种可怜而荒唐的多产扼杀了母亲，没有人为婴儿的死亡而感到烦恼。如果这就是所谓道德，那么，这种道德真是无理到极点。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再说明一下，那些最虔诚地尊重胎儿生命的人，也就是最热衷于把成年人送到战场上去死亡的人。

就现实的角度而言，反对人工流产的论点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从精神方面来说，则最后将归结到旧天主教的看法，即尚未出生的胎儿也有灵魂，如果没有经过洗礼就夭

折，这个灵魂就将难以进入天堂。值得注意的是，教会有时命令在战争中或在刑场上杀人，但他们却以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来对待还没有成为人的胎儿。不经过洗礼不能赎罪，但在圣战中，教会却大力鼓励将没有受过洗礼的非教徒加以屠杀。毫无疑问，以往宗教审判庭上的牺牲者并不都能受到恩典，同样的，今天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和死在战场上的士兵，也不能都受到恩典。在这些情况下，教会就会推托说这是上帝的事。他们认为人只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人的灵魂是否能够得救，完全决定于上帝的意志。那么，为什么要禁止上帝让胎儿的灵魂进入天堂呢？如果教会肯授权给上帝，上帝不见得会反对，正象在光辉的世纪中，上帝没有反对狂热屠杀非教徒一样。

事实上，对人工流产的障碍只是古老而顽固的传统习惯，和道德并没有关系。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我曾经提到过的男性虐待狂。一个特出的例子是罗伊医生在1943年献给佩丹的一本书。作者以慈父的心情，坚持人工流产是很危险的，而剖腹产却是合乎医学卫生的。他认为应该将人工流产看作是罪行而不仅仅是过失。即使怀孕危及妇女的健康或生命时，由于医学上的原因而需要进行人工流产，也应在禁止之列。他宣称，在两个生命中作出牺牲胎儿的选择是不道德的。他还强调这一种论点，劝告世人应该牺牲母亲。他断言胎儿是独立的生命，并不属于母亲。但是，当这些有名望的医生在高唱母亲的赞歌时，他们又说胎儿并不是母体中的寄

生物，而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不赞成男女平等的思潮现在仍然很严重，这可以从某些男人们竭力反对任何有利于妇女解放的事物得到判断。

此外，禁止人工流产的法律，使许多年轻妇女患慢性病、不妊症、甚至不幸死亡，而在保证生育数的增加方面却十分无力。无论是赞成或反对人工流产合法化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用压制性的法律是不可能杜绝人工流产的。按照权威性的报导，近来在法国每年做人工流产的平均数约为一百万人次，其中已婚妇女大约占三分之二。手术是秘密进行的，有些手术是不合格的，由此而造成数不清的伤亡事故。

人工流产有时被称为阶级性犯罪，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避孕知识在中产阶级中广为传播，他们家里有浴室，比较容易进行避孕，而工农的家庭却连自来水也没有。中产阶级的青年妇女比较谨慎；生一个孩子，对于较富裕的家庭也还算不上是沉重的负担。贫困、住房拥挤、妇女必须外出工作，这些都是人工流产最主要的原因。一对夫妻往往在有了两个孩子以后就决定要节育。正因为这样，一个受人厌恶的做过人工流产手术的妇女，她也是抚育着两个可爱的小天使的伟大的母亲。但对收入菲薄的人来说，流产和人工流产，不论多么迫切需要，对怀孕的妇女都往往意味着痛苦和绝望。

这种痛苦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环境的不同，正式结过婚的妇女，或者是受到某些男人供养、有钱并有众多亲戚的妇

女，在这方面有许多方便之处。她比别人容易得到为医疗而作人工流产的介绍信；必要时，她还可以到例如瑞士那些人工流产合法的国家中去旅行一次。按照目前妇科知识的水平，人工流产的手术如果由具有优良技术的专家来进行，必要时还可使用麻醉剂，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如果找不到公立医院，她可以请私人医生帮助，也同样安全，因为她有办法，能支付足够的钱来得到仔细的照料，她不会等到怀孕期太长才动手术。某些有这种特权的人甚至还认为，做这样一个小小的手术，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可以使肤色变得更为娇嫩。

但在另一方面，当一个贫穷而孤立的妇女，不得不用“犯罪”的方式去消除社会不能原谅的“错误”时，她的处境是悲惨到极点的。然而，这种处境正属于每年大约三十万名法国妇女，他们中有职员、秘书、学生、工人和农民等。没有结过婚就做母亲，至今仍然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因此许多人宁肯把婴儿弄死，宁可自杀，也不愿做未婚妈妈。还因为这样，任何刑罚都不能阻止她们设法弄掉未出生的胎儿。最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多少有点天真的少女被她不负责任的情人勾引，瞒着父母、朋友、雇主，终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怀了孕。人工流产自然是可怕的，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男方往往在诱奸了女方之后动员女方弄掉小孩。也可能是女方在发现怀孕时男方已经抛弃了她；或者是她为了免受他的责备而隐瞒真相；也许是她发现他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她。有时，她虽然拒绝生孩子，可思想上又很矛盾，觉得遗

懦。由于某些原因，例如，没有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找不到医生，缺少现款，吃了一些无效的药而耽误了时机，使她在做人工流产时，怀孕已经达到三、五个月。这时动手术，就要比早产手术更加痛苦和危险。怀孕的妇女对自己的情况当然很了解，所以在企图做手术时感到痛苦和失望。在农村，很少有人知道用探针来做人工流产。农妇故意从谷仓中的梯子上滑下来，但结果往往是伤害了身体而达不到目的。于是，被勒死的婴儿常常被丢弃在围墙下或阴沟里。

城里的情况要好一些，女人们常常互相帮助。但找到秘密做人工流产的医生往往不是一件容易事，更难的是还要弄到足够的钱。因此，她们往往求助于女友，或者就自己来做手术，她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往往难以胜任；运用探针或编织毛衣的针来做手术，很容易造成伤害。有一位医生对我讲过一个无知的厨师企图自己做人工流产的事，她想把醋注射进子宫，却灌到膀胱中去了，弄得痛苦不堪。粗心大意的开始，缺少照料，这种人工流产往往比正常生育要痛苦得多。这样的手术往往会带来神经错乱而造成癫痫症发作，也很可能会引起内部机能的失调或致命的出血过多。

科利特曾在《格丽别契》一书中描绘过一个在音乐厅中工作的舞蹈女郎的极大痛苦。她的无知的母亲认为，标准的人工流产方法是，先喝一碗浓浓的肥皂水，然后再跑步十五分钟。企图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人工流产，往往会使孕妇丧命。有人告诉我说，一个速记员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耽了四天，

身上都是血，没有水和食物，但却不敢找人帮助。

被人抛弃，受到羞耻、犯罪、死亡的威胁，这种环境的可怕程度是难以形容的。对于一个贫苦而结了婚的妇女来说，这种苦楚就要轻得多，因为她的行动会得到丈夫的同意，可以少受不必要的顾虑的折磨。关于这个问题，一位搞社会服务工作的人告诉我说，她那个地区的妇女，互相交换信息，借用工具，彼此帮助，做人工流产就象在脚上取掉鸡眼那样容易。医院有义务接受已经开始流产的妇女，但她们不得不受到肉体上的折磨，当她们疼痛的时候以及当医生进行最终的刮宫手术时，院方残酷地惩罚她们，不给她们使用任何止痛剂。吃惯了苦的妇女们对这种虐待似乎并不感到愤慨，但她们对于堆放在自己身上的那种耻辱却很敏感。手术的秘密性和犯法性，增加了手术的危险性，也给它以卑贱和痛苦的性质。病痛和死亡以惩罚的姿态出现，而我们知道，痛苦和受折磨，意外事故和被惩罚，它们之间有多么大的区别。冒了那么多危险，到头来她还觉得自己是该受惩罚的，这种对痛苦和犯罪的解释，真使人感到难堪。

这种精神方面的刺激，其感受程度因环境不同而变化。对于高度解放了的妇女来说，这不会成为问题，因为她们有办法，有社会地位，她们交往的人也比较大方和开明。对于那些鄙视资产阶级道德的贫苦妇女来说，问题也不大。对于上述两类人，人工流产只不过是或多或少有点不舒服而又不能不经历的过程罢了。但对很多妇女来说，即使她们的行动

不得不违背某一条道德准则，这条准则在她们的心灵中仍然是相当神圣的，对她们有很大的压力。她们从内心里尊重她们所触犯的法律，因此，她们为触犯法律而痛苦；而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同谋犯，她们的痛苦就将更为深重。

她们要忍受不得不向别人乞求和谄媚的耻辱，为的是要找到门路，找到医生和助产士来照料她们。她们要冒着被别人傲慢拒绝的危险，或者是把自己的秘密暴露给一个低级的同谋犯。大多数男人都没有这样的经验：通过深思熟虑以后邀请别人来共同犯罪；而一个女人，却不得不在害怕与羞愧的交织中采取这种行动。她正在设法做人工流产，但就她的内心世界来说，她往往并不愿意这样做。从她的天性来说，她是希望有小孩的，但她却不得不阻止孩子的出生。即使她并不想做母亲，她仍然会由于自己不正派的举动而感到不安。因为，人工流产尽管不等于谋杀，它也决不能被看作是避孕方法之一。一个新的生命确实已经开始，而这个生命的成长却被扼杀了。

有些妇女会让这个没有出生的孩子在自己的记忆中占有重要地位，时常怀念不已。海伦·多伊奇曾在《妇女心理学》上举出一个已婚妇女的例子，她在别的方面心理正常，由于健康关系而被迫做过两次人工流产手术，她觉得自己有义务为这两个仅有三个月生命的胎儿各立一块墓碑。虽然她后来生了几个孩子，她还是虔诚地出席纪念胎儿的仪式。如果人工流产是一位妇女主动要求的，她将更加怀有一种犯罪的感

觉。童年时代，由于嫉妒而产生过希望初生的弟弟死掉，对这种恶念的内疚，现在又复活了。而这次，她觉得自己有罪，因为真的杀死了胎儿。忧郁性的病理学状态也许会表现这种犯罪感。另一些妇女可能会觉得人工流产破坏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从而怨恨同意她们或动员她们做这种手术的男人。多伊奇夫人举出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热恋中的女孩子，为了情人的事业而坚决做人工流产手术，但事后她觉得牺牲太大，拒绝再和他见面。当然，这种明确的决裂是很少见的，但做过人工流产的妇女，往往对使她怀孕的那个男人或其他男人产生性冷感。

男人往往并不把人工流产看成一件大事，只认为它是大自然强加于女人的许多灾难之一，不能完全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一个做过人工流产的妇女不再具有女人的价值，与此同时，她从根本上违背了由男人建立起来的伦理观念。她的整个精神世界崩溃了。从出生开始，她听到过无数次教导，女人的天职是生孩子，对母亲的赞歌不绝于耳。她的种种困境，例如月经、疾病、繁琐的家务劳动等等，都因为她有为世界增添小天使的神秘特权而得到自我安慰。如今，男人为了他的自由，为了不妨碍他的将来，为了他事业上的利益，却要求她主动放弃女性最根本的欢乐与成功。

孩子不再是无价之宝，生育不再是神圣的使命，这种细胞的繁殖变成了偶然的不幸事件，成为属于女性的又一个缺点。相比之下，月经的来潮曾使少女时期的她觉得似乎很可

怕，也使她体会过有希望做母亲的那种滋味，而现在，它的来临是喜事，正是她所急切盼望的。即使她同意做人工流产，甚至是急切希望做这种手术，她会感到这是女性的一种牺牲。她被迫看到女性的痛苦、软弱和危险。有些妇女的这种逆反心理达到极端，她们往往在遭受过人工流产的创伤后，变成同性恋者。

此外，当男人为了自己的成就而要求女方牺牲生育能力时，他就把男性道德规范的虚伪性暴露无遗了。男人们总是说应该禁止人工流产，但涉及到他们自己时，却又认为这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这样，他们用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矛盾。但女人就大不相同了，她要用受伤的躯体来感觉这些矛盾。她总是胆小得不敢公开反对男人的错误信念。她把自己看成是不公平的牺牲品，这种不公平使她违反自己的意愿走向犯罪。与此同时，她感到自己被欺凌、被污辱。她把男人的错误以具体而直接的方式完全弄到自己身上。他犯了错误，把后果推到她的身上。他只不过用恳求和威胁、明智和愤怒的口气说一些话，然后很快就忘却了；而她却要在痛苦和鲜血中来回味这些话。有时他什么话也不说，就一走了之。但他的沉默与逃走，在由男性建立的整个道德规范上，形成了一个更为明显的裂口。

对于讨厌女人的人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女人的“道德败坏”。但实际上，女人的“道德败坏”并不是什么怪事。对于男人们公开拥护而私下又不承认的那些蛮横的

道德原则，她们怎么能不在内心中加以怀疑？她们已经学会了不再去相信男人们的话，无论他们是赞扬妇女或赞扬男人。她们唯一能确信的东西，就是被掠夺和正在流血的子宫，撕成深红色碎片的生命，已经被消灭的孩子。这就是她第一次做人工流产时所弄明白的一切。对许多妇女来说，世界变得再也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然而，由于还没有广泛使用有效的避孕工具，在今天的法国，对于那些不愿为世界增添注定要受苦或夭折的孩子的妇女来说，人工流产仍然是可以求助的唯一方法。

避孕与合法的人工流产，将使妇女有是否要做母亲的自由选择。象许多事物一样，女人的生育力，一方面决定于自愿，另一方面决定于机会。由于人工受胎还没有广为应用，一个希望做母亲的妇女未必一定能达到目的，因为她可能没有机会和男性接触，她的丈夫可能不育，她自己也可能不会怀孕。另一方面，有些妇女却往往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被迫生育。对于怀孕和做母亲，妇女有各种不同的感受，这取决于她们的真实态度：反抗、顺从、满足、热情盼望。必须知道，对一个年轻的母亲来说，心口未必一致，她公开承认的决心和感情，未必是她内心深处的要求。一个年轻的未婚母亲，可能会被突然强加在她身上的压力弄得不知所措，走投无路。然而，她可能会发现，在婴儿的身上隐藏着她神秘的梦想。另一方面，一个结了婚的年轻母亲，她以喜悦和骄傲的心情欢迎自己的怀孕。然而，由于童年时代许多不能公开承认的

幻想和记忆的影响，又使她在心底里对怀孕感到恐惧和厌恶。妇女为什么在怀孕问题上保守秘密，这是原因之一。她们的沉默不语，一方面是由于对完全属于她们的、被神秘包围的经验所感到喜悦，另方面也由于她们内心矛盾和斗争所引起的困惑。

在童年时代和青春期，如以前所述，女子对母性的态度经过了几个不同阶段。对于小女孩来说，做母亲是游戏和奇迹，布娃娃代表了将来的婴儿，归她所有，她可以盛气凌人地对待它。对于青春期的少女来说，做母亲似乎威胁了她高尚人格的完整性，她往往会愤慨地予以否定。带着怀孕的幻觉和各种忧虑，对于做母亲，她既害怕又盼望。有的女孩子喜欢对她所照料的儿童行使母性的权威，但又不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有些妇女终生保持这种态度，自己害怕怀孕，却当了助产士、护士、管家或忠心耿耿的姑母或姨妈。还有一些妇女，并非不愿做母亲，只是为了爱情生活或事业，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有些妇女则担心孩子会给自己或丈夫带来负担。

有些妇女采用避孕法或干脆避免一切性生活来保证不使自己怀孕。也有一些妇女并不承认自己害怕生孩子，但这种心理上的防御反应却使她们不能受孕。在医学检查中常常发现起源于神经系统的功能失调。一般说来，是否怀孕与对待怀孕的态度有关。在怀孕期中，生孩子的美梦和青春期的种种焦虑，重又出现了。怀孕期的感受是多种多样的，这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母亲、丈夫以及她本人对怀孕的态度如何。

轮到她做母亲了，她取得了她母亲的地位，这意味着她已获得了完全解放。她如果真心渴望这种完全解放，她就会对怀孕感到喜悦，而且会有勇气独自承受怀孕全过程的辛酸。但如果她仍愿继续接受母亲的抚育，一切都依赖母亲，那么，她新生的婴儿就会更象是她年幼的弟妹，而不象是她的子女了。如果她既希望解放自己，又不敢解放自己，那么，她会担心，生孩子不但不会对她有所帮忙，而且还会给他带上新的桎梏。这种顾虑，甚至会导致流产。如果她童年时代曾经怨恨过母亲，现在就有一种犯罪感，而这种感觉对怀孕会多少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妇女和她的孩子的父亲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位成熟而独立的妇女，很可能想要独自占有孩子。我认识过一位妇女，每当她看到一个英俊的男子时，她的眼睛就会出现异常的光辉，这并不是她对他有性欲，而是她认为他能给予她优秀的子女。这样的妇女是富于母性的巾帼英雄，她会热情对待用人工受精来创造奇迹的可能性。如果这种类型的妇女和她孩子的父亲结婚，她会不承认丈夫对子女的任何权利。她会象劳伦斯写的«儿子与情人»中保罗的母亲那样，尽一切努力与子女发展独特的关系，而子女本来是应该她和丈夫所共有的。但在一般情况下，妇女在接受新的责任时，需要男性的支持。也只有男人对她真诚相爱时，她才会乐于把

自己的爱倾注给新生的婴儿。

妻子越是幼稚和胆小，她就越需要得到丈夫的支持。有时年轻的妻子在生过一到两个孩子以后会感到惶恐，她会对丈夫提出过高的要求。她的心情焦躁不安，她要求丈夫老耽在家里，干涉他的工作，对一些小事，喋喋不休，经常差他做这做那，使他在家里耽不住。

如果她热爱丈夫，她就会按照丈夫的意图办事。她是愉快地接受怀孕和生育，还是加以拒绝，就要看她丈夫对此感到骄傲还是烦恼。有时，孩子被指望用来巩固她作为情妇或妻子的地位，那么，母亲对婴儿的热爱程度就要看她的计划是否成功而定。如果她对丈夫不满甚至有敌意，她可能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把婴儿夺过来完全归自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贡献给这个孩子；或者，相反地，她痛恨这个孩子，因为她痛恨孩子的父亲。新婚之夜丈夫的粗暴行为，可能使那个孩子在出生前和出生后都受到母亲的怀恨。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中写道，她的第一次怀孕使她身心都感到不舒服，这正反映出她对丈夫矛盾的感情。

总而言之，怀孕是在妇女内心世界中演出的一幕戏剧。她感到胎儿既使她富足，又使她亏损。胎儿是她躯体的一部分，又是她喂养的寄生虫。她占有它，又被它占有。它代表将来，有了它，她觉得自己象天地一样广阔，但这种高度的丰富感又湮没了她，她感到自己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新的生命即将出现，并将独立存在，她为此感到骄傲。但她同

时也有受人摆布的感觉，觉得自己在被模模糊糊的力量所玩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孕妇在她的身体非同寻常之时，会感觉到一股内在的力量。呕吐和不适是对怀孕的反抗，而肚子却一天天地大起来。对于画匠、雕塑匠等来说，他们的卓越之处都含有主观的因素。但对于将要成为母亲的妇女来说，并不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她和婴儿合成一体，同命运，共呼吸。孕妇落入大自然设下的陷阱，她既是植物又是动物，她是胶体的仓库，是孵卵器，是卵。她使年幼而腹部平坦的儿童害怕，她使年轻人在背地里轻蔑地嘲笑，因为她是人，是有意识的、有自由的人，却成为被动的生育工具。

生命通常只不过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对怀孕来说，生命以创造的姿态出现，但这是一类特殊的创造，它以偶然和被动的方式来完成。有些妇女认为怀孕和哺乳是非常快乐的，她们希望不断地重复这一过程。婴儿一断奶，她们就觉得不痛快。这种女人与其说是母亲，还不如说是一台生殖机器，象是一只勤于产蛋的母鸡。她们热切希望为肉体的功能而牺牲自己行动的自由。对她们来说，似乎肉体被动的繁殖能力，就是她们应该生存的最好证明。如果肉体完全只是静态和被动的，即使降格以求，它也不可能含有超越性。它是呆滞的，毫无生气的，疲惫不堪的。但当繁殖过程开始时，肉体变成了根和源，开出了花，这时，当前的全部现实，才证明了它的超越性，走向鼓舞人心的将来。由于上一个小孩断奶而与她分离，使她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在她再度怀孕时得

到补偿。她又一次投身于生命的主流，她和事物的整体重新联合起来，她成为传种接代、永无尽头的链条中的一环，她的肉体为另一个新的肉体而存在。她在男性怀抱中追求的融合，那是得到过而又很快失去的融合，当她腹中的胎儿日益长大时，当婴儿从她胀大的乳房中吮吸着乳汁时，那种融合重新得到了实现。她不再是一个屈从于主体的客体了。她不再是一个虽有自由但仍有各种焦虑而痛苦的受别人支配的人，已经有一个模糊的生命附着在她身上。她的身体为属于她的孩子而存在，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自已了。社会承认了她的所有权，而且还在授权时赋予这种权利以神圣的性质。她的乳房，本来只具有性爱的特征，现在变成生命的源泉，可以公开展露了。甚至连宗教图案中的圣母，在恳求她的圣子拯救人类时，也向我们露出了她的酥胸。母亲放弃自我，牺牲她的身体和社交地位，享受着幸福的幻影，她觉得她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但这仅仅是幻觉。她并没有真正创造胎儿，是胎儿在她腹中自我创造。她的肉体只能繁殖肉体，无法创造一个必须自我创造的存在。自由的创造活动，创造了有价值的成品，并给它规定了基本的性质。但在母腹中的孩子却不是这样的。它只不过是细胞的自然成长，是自然界的严酷规律，和死亡以及在哲学上与死亡有关的现象一样，是带有偶然性的，是无法自主的。母亲可以有许多理由要生一个孩子，但她不能给予这个不久即将独立存在的孩子的是：他应该存在

的理由。他只是她肉体的产品，但并不是她个人存在的产品。科利特的小说《输掉的人》中的女主角很懂得这个道理，她说道：

> 我从来不认为他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意义……他的生命是在我的身体内诞生的，不管会发生什么事，即使要我献出生命，我也要将他抚养成人。我生了他。他象是一件倾我毕生精力才能完成的作品……但他毕竟还不是这样的产品。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降生的神秘故事会在每一个母亲的身上重演。每一个新生儿都是神的化身，他一定要首先来到世上，才能象一个有知觉有自由的人那样去得到自我实现。母亲把自己的身体借给这种圣绩，但她却不能控制它。尽管他在她的子宫里成长，但他将来最终要变成怎样的人，她是无能为力的。她对这种不确定性给出两种形式互相矛盾的幻想：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会成为英雄，因此，她一想到生下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就会不胜惊异；但她也害怕生出来的是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或者甚至是怪物，因为她知道肉体的变化是难以逆料的，而这个在她腹中日益长大的胎儿，也只不过是肉体而已。她还可能对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神话所困惑，但更多的妇女会在上面提到过的两种互相矛盾的幻想间摇摆不定，模棱两可。另外她还有一些暧昧不明

的想法。献身于延续人类的事业，她不顾时间和死亡的威胁来创造新的生命，因为她看到了永生。但她在自己的肉体上又感到黑格尔的话是对的，“孩子的诞生就是双亲的死亡”。黑格尔还说，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但对父母而言，又是他们的身外之物”。另一方面，孩子将脱离母体而达到自己的存在，“在这种脱离以后，母体就将走向终点”。对母亲来说，她自身的分解，预示着她的死亡。她一想到分娩就害怕，害怕分娩会使她丧失自己的生命。

怀孕的意义具有这样的多重性，妇女对它自然就会采取矛盾的态度。此外，在胎儿发育的各个阶段，她的态度也会有所变化。应该强调指出，在怀孕的开始阶段，婴儿还没有形成，它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她能在沉思中想象将要在几个月后降生的孩子，并忙于准备摇篮、衣服、被褥和婴儿需要的一切杂物。她所具体感觉到的，只不过是发生在身体内部生理现象的紊乱而已。某些高度赞美生命和繁殖力的人神秘地宣称，妇女能从快感的程度上得知男人是否使她受了孕，但这只是一个缺少根据的神话。她在那种时刻决不会有可靠的直觉，只是在后来才按照不太确切的信号加以推断。月经停止了，身体肥大了，乳房更加丰满了，她还由于头晕和呕吐而难受。有时她简直以为自己是病了，而医生告诉她真实的情况。然后她知道她的身体已经注定要超越自身，日复一日，一个外来的、但又是从她的肉体上升起的生命，正在她腹内不断成长。神秘的自然规律强加在她身上，她为人类的

不断延续作出牺牲。按照惯例，她害怕早晨的不舒服和呕吐，外来的奇异力量使她感到恐慌。不舒服和呕吐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胃液的分泌变少。但如果这种反应对其他哺乳动物并没有发现，那么，发生在女人身上，就应该说是心理作用的原因了。由此可见，对于怀孕期的妇女来说，种族和个人间的矛盾冲突，是何等尖锐。即使妇女热烈希望有一个孩子，她的身体也会强烈反抗生育的过程。斯坦克尔曾说，在精神不安的状态下，孕妇的呕吐往往表示对胎儿的某种抗拒。如果怀孕的妇女因为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而本来就不愿怀孕，那么，消化系统的问题就将更为扩大了。

海伦·多伊奇曾说："心理分析告诉我们，孕妇的呕吐现象，往往在她感情上讨厌怀孕、敌视胎儿时发生。"

阿瑟博士在他的著作《婚姻》中描写了一个实例，我把它摘要简述如下：

T夫人怀了孕，严重不舒服和呕吐……她的情况相当危险，不得不劝她进行医疗性人工流产……病人一想到人工流产就十分恐慌……简单的分析表明，她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当作她以前在学校里极为要好的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在第一次怀孕时死去了。我们一旦把这个背景带到T夫人的意识中来，她的病症就消失了。两个星期以后，她虽然还有呕吐现象，但已经不严重了。

便秘，腹泻，往往交叉代表孕妇的期望和顾虑，有些会导致流产。几乎所有自动的流产都起源于心理作用。妇女越

自以为了不起，越自我中心，她在怀孕时的病症也越明显。特别是，孕妇有一些众所周知的特殊爱好，它们是幼稚无知和放纵自己的产物。由于在儿童时代就听说过食物会影响胎儿，所以她很注意要吃这吃那。身体感到不舒服的孕妇，心理失调，会将新奇的感觉表现为对某一种欲望的萦绕。而且，养成这种欲望是有传统性的，就象养成神经质也有传统一样。孕妇期待着、留心着、虚构着这些欲望。我曾听说过一位年轻的未婚孕妇，她忽然很想吃菠菜，就自己到菜场去买，在等待它煮熟的时候急得直跺脚。她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在孤独中的焦虑。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在愤恨中她忙于自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阿伯拉公爵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风趣地描述过一个例子。她认为，孕妇的某种爱好，是周围人坚持告诉她的。她觉得，在她怀孕的时候，别人对她的关心太过分了。

这些照顾和关心增加了我的不舒服、呕吐、神经质和其他许多第一次怀孕的痛苦。我觉得是这样的……那是我母亲开的头。有一天，我正和她一起用餐，她突然叫道："天哪！我竟然忘了问你，你想吃什么特别的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回答说。

我母亲感到惊奇了。"你不想吃什么特别的东西。什么也不想吃！我真没有听说过。你一定是反

常了。你自己太不注意了。我要去和你的婆婆谈一下这个问题。”

就这样，两个老人作了商量。我的丈夫也耽心了，他怕我会给他生一个有野猪头的孩子。每天早晨他总问我：“罗拉，你想吃什么？”他的妹妹也大声对我说，她看到过许多丑人，都是由于母亲怀孕时没有满足食欲。我后来也害怕了，就挖空心思去想我到底最喜欢吃什么，但毕竟没有想出来。有一天，我正在吃菠萝饼时，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菠萝就应该是我最爱吃的东西。一旦使自己相信菠萝是我爱吃的，我就渴望能吃到它。而当我发现那时恰好不是菠萝上市的季节时，我对它的渴望就更为强烈。啊，在那以后我就发现，疯狂的欲望会使你觉得：如果不能立刻得到满足，就会死去。他们终于为我弄到了菠萝，但我却把盘子推开。“可是，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不想吃菠萝了。”他们不仅被迫把菠萝拿走，而且还在我房间里洒香水，驱除掉残余的一点菠萝气息，那突然被我憎恨的气息。最奇怪的是，自从那次以后，如果不是强迫我的话，我再也不吃菠萝了。

受到关心最多或最能关心自己的妇女，她们会表现出最多的病态。把怀孕这种严酷的考验对付得最为轻松的，是把

生育看得非常神圣的太太们，还有那些具有男子气概的妇女。后一类妇女，她们对自己身体的微妙变化并不特别迷惑，对生孩子这回事也不愿小题大做。史达尔夫人就是这样，她把怀一次孕看作谈一次话那样从容。

随着怀孕时间的变长，母亲和胎儿的关系逐渐变化。胎儿稳定地耽在母亲的子宫里，两个有机体互相适应，发生生理上的交换，使母体重新得到平衡。她不再感觉到她为人类所占有，她只感到她占有了她身体的果实。在怀孕的最初几个月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但由于腹内的神秘活动使她还不如一个普通的人。后来，她被承认是一个将要做母亲的女人，她的虚弱反过来变成了她光辉的另一面。当她的虚弱愈益显著时，她的一切弱点就更加可以被谅解。很多妇女发现，在她们怀孕的后期非常安逸和宁静，他们生活得十分有意义。在这以前，她们时常想观察自己，仔细检查自己的身体，但碍于体面，不敢太随便。而现在，这成了她们的正当权利。她们做任何对自己有利的事，也就是做对婴儿有利的事。不再有人来差她们做事，她们不再一定要想到别人。怀抱着未来的美梦，给她们的目前时刻凭添了多少动人的色彩！她们正在假期中，她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一定要使自己活着。

孕妇的生存意义就在她的子宫里，这给她以完整而充分的丰裕感。海伦·多伊奇的一个病人说："它象冬天的火炉，永远为你一个人点着，完全由你支配。它也象是夏天倾泻的阵雨，使你凉爽。"她是这样的满足，她感到自己有出息，这

是她从青春期开始就一直最热切盼望着的。作为妻子，她曾为自己对丈夫的依赖性而苦恼。现在，她已经不再是为性爱服务的工具，而是人类的化身，代表着生命的希望，代表永恒。周围所有的人都尊敬她，连她的蛮不讲理都变得含有圣洁的意味。而所有这些，都象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样，鼓励她去虚构她的嗜好。海伦·多伊奇说："怀孕使妇女的行为合理化，即使这种行为在其他场合是十分荒谬的。"由于子宫里有另一个存在，她终于被证明可以完全享受人的权利。

科利特在《金星》一书中描写了自己怀孕的状态：

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怀着孩子的乐趣浸透了我全身。我再也不感到任何不舒服，任何痛苦。幸福，由于十分满足而发出的呻吟，我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科学的或普通的字眼来称呼这种免遭伤害的安全感。既然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可见当时的感觉一定是何等强烈。我现在真不想隐瞒我从未公开提起过的那种感觉，就是骄傲，是庸俗的壮观。当我的果实正在日益成熟的时候，我享受着这种愉快的状态。……每天晚上，我向我一生中美好的日子之一告别。我当时明知道将来回顾这些日子时我会感到遗憾的。但是，喜悦、满足、幸福，淹没了一切，淹没了统治我的温柔的动物性，淹没了来自体重增加的懒散，淹没了我腹内小生命无声的要求。

六个月，七个月……第一颗草莓，第一朵玫瑰。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怀孕称为一段漫长的假期？孩子出生时的阵痛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那漫长而美好的假期，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特别记得当时那种昏昏欲睡的美妙情景，好象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想要在广场上、草坪上或温暖的大地上小睡片刻。那是我当时唯一的爱好。到了怀孕后期，我象一只偷了鸡蛋而要想逃跑的老鼠。我感到不方便，由于我的体重而疲劳，由于过分疲劳而难以入睡。我的假期仍在继续。我享受许多特权，受到不少关切。

科利特告诉我们，她的一个朋友把这种欢乐的怀孕称为“男子汉的怀孕”。事实上，她似乎就是那一类妇女的典型。她勇敢地接受考验，并不全神贯注于此。就在那样的时刻，她仍然继续写作。她风趣地说：“婴儿表示他就要诞生了，于是，我搁下了钢笔。”

其它妇女的感受要沉重一些。她们无休止地沉思她们新的重要性。只要有一点微小的鼓励，她们就可以在自己的情况下重演男性的神话。她们以精神的光辉来对抗生活的晦暗；以意识的清晰来对抗心灵的神秘；以创造性的自由来对抗腹部违反意志地胀大。这个将要成为母亲的妇女，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带着土壤与草皮、树干与树根的女人。当她瞌睡时，就象母鸡孵蛋时那种带着激动的入眠。有些容易忘却自我的

妇女，对于腹中日益长大的宝物，欣喜若狂。这种欣喜曾表现在女诗人塞西尔·索娃的诗中：

你属于我就象曙光属于大地
我象温暖的绒毛包围着你
你娇嫩的肢体在温暖中悄悄成长

她又写道：

你幼小的灵魂就在我的花心
我撕下自己的一小块心做成你的心

她在给丈夫的信中说：

真奇怪，我感到我似乎在看管一个微型星球的形成，似乎在塑造着这个脆弱的天体。我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生命。我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感到我是大地的姊妹，象大地那样生气蓬勃。我走在大地上，它就象活的一样。我在大白天的梦中吹笛，看见忙碌的蜜蜂和露水，而他在我腹中骚动。这个花蕾般的灵魂，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春天的清新和青年的活力。那就是皮埃洛特的小灵魂。在我黑暗的腹中，这个灵魂正在完成一对象他那样无限深沉的眼

睛。

另一方面，有些妇女一味取悦于男人，把自己看作只是性爱的对象，热爱自己体形的美，她们会痛苦地看到怀孕使身体变形，破坏原来的曲线，丧失对异性的吸引力。对她们来说，怀孕不是愉快的假期，一点也不会有丰裕感，而只是一种自我萎缩。

在怀孕的最后阶段，母亲和胎儿有了分离的预兆。胎儿在母亲的子宫内折腾，他似乎是想踢开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妇女们对腹中胎儿的第一次运动，有各种不同的感受。宣告一个独立生命将要出现的信号，使有的妇女感到惊异而迷茫；另一些妇女则对腹中的陌生人感到厌恶。子宫下降，孕妇感到压力、紧张、呼吸困难，胎儿和母体的结合再次受到干扰。她现在怀着的，是一个即将出生的婴儿。在此以前，他一直是心理上的想象，是希望，现在，他变成了具体的现实，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每一个变化都充满了焦虑，分娩尤其显得令人可怕。当孕妇接近产期时，童年时的一切恐惧重又出现。犯罪感使她相信，她的母亲在诅咒她，她以为自己即将死去，或者是孩子将会死亡。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托尔斯泰描写了年轻的丽莎。她是一个幼稚的妇女，把生孩子看作上刑场，事实上，她也的确在分娩时死去。

分娩的意义在不同的情况下有很大差异。母亲希望能保留那宝贝的肉体，这是她自身中珍贵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希

望能摆脱这个侵入者。她盼望终于能实现她的美梦，但又耽心梦境的实现会给她带来种种新的责任。两种要求势均力敌。她往往感到左右为难而心情不安。对于即将来到的分娩时的痛苦，她往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她要向自己，向包括丈夫和母亲在内的所有亲人，证明自己有能力独自平安度过这场风暴而毋需别人的帮助。但同时她又感到世界对她不公平，生活对她不公平，家人对她不公平，痛苦是强加在她身上的，她不得不提出抗议。具有独立性格的妇女，例如年长而高贵的妇女，具有男子气息的妇女，在分娩前或分娩过程中会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态度。带有孩子气的孕妇比较被动，她们要依靠助产士或母亲。有时妇女以分娩时不哭不叫而感到自豪。还有些孕妇不听安排，拒绝任何指导。

总之，在这个带着危险性的关键时刻，每个妇女都会表现出她们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从中特别可以看出她们的母性如何。有些人能忍受痛苦而不怨天尤人；有些人能照顾大局，委曲求全；有些人会提出种种要求；有些人乘机作威作福；有些人不听从指挥；有些人被动和紧张。这许多心理上的倾向，会对分娩的持续时间和痛苦程度带来巨大影响。当然，纯粹的生理因素也是很有影响的。象某些雌性的驯化动物一样，妇女在进行大自然指派给她的任务时，是需要有人帮忙的。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农妇和因还未结婚而感到耻辱的母亲，她们分娩时无人在旁，这种情形往往会带来婴儿的死亡或给母亲留下不治的顽症。在妇女完成了她女性使命

的时刻，她仍然不是独立的。这再一次在人类中证明，自然和人为永远不可能完全分开。在自然环境中，在女性的个人利益与人类延续的使命之间，矛盾是如此尖锐，往往导致母亲或孩子的死亡。这个矛盾只有依靠人类自己来解决。现在，凭借医药或外科手术，已经减少或几乎消除了以往时常发生的悲剧。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你将在悲痛中生下孩子。"但麻醉技术正在使这句话黯然失色。麻醉技术的应用在美国已很普及，在法国也已开始传播。英国在一九四九年五月通过一项法律，批准麻醉剂的应用。当然，很难精确统计，麻醉技术究竟为妇女解除了多少痛苦。分娩过程长短不一，可以从两三小时到整整一天，难以一概而论。有的妇女认为分娩是很痛苦的。另一些妇女则相反，认为这场考验还比较容易忍受。少数人还觉得其中有快感。有些妇女说分娩给她们以创造感，她们真正自愿地完成了一项任务。但也有不少女人走向另一极端，她们感到被动，说自己是痛苦和受折磨的工具。

母亲和新生儿之间的最初关系，也各式各样。有些妇女由于腹中空虚而痛苦，她们似乎觉得自己的宝贝被偷走了。塞西尔·索娃在她的诗里表示了这种感觉："我是蜂巢，蜂群离我而去。"她又写道："他诞生了，我失去了我的小宝贝。他诞生了，而我却孤独了。"

然而，每一个年轻的母亲同时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心。能够看到和抱住在自己腹中形成后生出来的小生命，这的确是

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在为世界带来新的存在的不平凡的事件中，母亲究竟起了多少作用？她不知道。如果没有她，新生儿不可能存在，但他却离开了她。眼看着他离她而去，在她身外，她感到异常惆怅。她几何总是感到失望，她希望这个新生儿的确属于她，就象她的手属于她自己一样。但是，他对一切事物的感受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不透明的。他是独立的个体。她并不认识他，因为她的确没有见过他。她怀孕的时候他还没有出世，她和这个小陌生人以往还没有过共同生活的历史。她希望立刻能和他熟悉起来，但不可能，他是一个新的来客，她甚至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对他如此冷漠。在她怀孕时的幻想中，他有无数种可能的形象，她在想象中享受着将来做母亲的快慰。到如今，他是一个有限的小家伙，他已经变成了现实，他依赖，他脆弱，他要求很多。他的终于来临给她带来真正的欢乐，但欢乐中也混杂着遗憾，她遗憾的是他并不象想象中那样超凡。

小孩出生以后，许多母亲通过哺乳来重新恢复她和婴儿的关系。哺乳比怀孕还要辛苦，但母亲可以延长怀孕时愉快的假期，平静而充实。科利特·奥德利这样谈到她故事中的女主角：

当她给婴儿喂奶时，她自然没有别的事可做。喂奶可以延续几个小时，她甚至根本不想喂完奶以后再做些什么。她只是不得不等待着，直到他的小

嘴离开奶头。

但有些妇女不能哺乳，她对婴儿初生时的冷漠态度，可能要延续到和婴儿之间找到新的联系为止。科利特自己就属于这一种情况，她不能给她的女婴哺乳。在《金星》一书中，她以一贯的忠实态度描写了她第一次做母亲时的感觉：

我凝视着这个没有通过大门而来到这里的小客人……我问自己：我有没有给予她足够多的爱？恐怕没有。我的确惯于对事物具有好奇心，我现在也是这样。因此我对这个不平凡的新生儿的各个部分都感到惊异。她的指甲，透明得象虾的淡红色凸壳。她的脚掌，还没有碰过尘土就来到我身旁。她柔软而明亮的眼睫毛，下垂在双颊上。她的小眼睛里是大地的景色和浅蓝色的梦。她的小生殖器，象是带有浅纹的杏子，两瓣，唇对唇地闭合着。但是，对女儿的这种不断发生的仔细端详，究竟算是什么感情？我觉得，这并不就是爱。我细心观察，我等待着……从这些我一生中盼望已久的注视中，我并没有得到那些被蛊惑的母亲通常会有的复杂心情：小心翼翼的警觉和多少含有敌意的对立。我甚至怀疑，那个意味着我将来到一生中第二个更加困难的入口处的记号，也许不会再来临了。我不得不下这样的结

论：通过对孩子的训斥、隐藏在心底的嫉妒、错误和正确的叮咛，到头来总会使自己转变为一个平凡的母亲，骄傲地控制着由自己卑躬屈膝地创造出来的生命，并以多少有点不诚恳的心情向别人谦虚地讲授做母亲的经验。然而，当她甜蜜的小嘴吐出清晰的语句时，当知觉、淘气、感情使婴儿正常地变为女儿时，使女儿变为“我的”女儿时，我的内心将恢复宁静。

也有不少母亲对她们新的责任感到焦虑不安。这类妇女在怀孕期放纵自己，满不在乎，从不主动考虑问题。如今，她面前是一个有权利要她考虑的人。有些欢乐而责任心不强的妇女，在医院时还对婴儿高兴地抚爱，但回家以后，就把孩子看成沉重的负担。哺乳不会给她们以快感，相反地，她唯恐喂奶会破坏她胸部的曲线美。她抱怨奶头被咬破，乳房胀痛得厉害。她觉得婴儿的吸吮伤害了她，似乎还吸走她的元气、生命和幸福。她觉得婴儿好象是一个暴君，把严酷的苦役强加在她身上，他已经不再是她的一部分了。她对这个小陌生人充满敌意，因为他威胁着她的肉体，威胁着她的自由，威胁着她的整个自我。

还有不少其他因素也有影响。妇女和她自己母亲的关系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年轻的妈妈经常希望有人帮忙，但如果别人太关心她的婴儿，她又会由于妒忌而显出冷漠的态

度。她和孩子父亲的关系，以及父亲对孩子的态度，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她的情绪。从经济方面和感情方面综合起来一并考虑，孩子可能成为累赘，成为障碍物，也可能成为宝贝，成为自由和安全的保障。有时，敌意变成了公开的仇恨，母亲对小孩极不关心，并给予很差的物质待遇。通常，一个精神上具有责任感的母亲会和这种敌视心理作斗争，她的自我忏悔会使她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继续出现怀孕期的惶恐。心理分析家都认为，如果母亲心头萦绕着伤害婴儿的念头，并且幻想着会发生可怕的意外，她就会感到必须强迫自己去压制这种敌视感。

与其他人际关系不同，母亲和婴儿关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开始时婴儿并不主动来建立关系，他的微笑，他的牙牙学语，都只是母亲给他的意识；他究竟是否迷人，是否无与伦比，是否讨厌，是否平凡，是否可恨，完全决定于母亲，而不决定于婴儿。正因为这样，一个冷漠、不满足和悒郁的母亲，如果想从婴儿身上得到友谊、温暖和刺激，往往会完全失望。妇女如果寄希望于用肉体上发生的事来给自己的生活注入新的气息和意义，那么，如同青春期、初次性交和结婚等的变化一样，做母亲的这一变化带给她们的将只有悒郁的失望。索非亚·托尔斯泰说，九个月的怀孕期是她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至于第十个月，她说最好还是少谈。在日记中，她竭力表示出传统的乐趣，但说得比较空洞，使我们能感受到她的忧愁和对新任务的恐惧。尽管她自称有强烈的母

爱，并说她非常爱丈夫，因为孩子是属于他的，但她这样公开夸耀自己如何爱丈夫，显然是由于她实际上并不爱他。由此可知，她是在不愉快的拥抱中怀上孩子的。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描写过一个年轻妇女模糊不清的态度。琳达虽然爱丈夫，但却厌恶和他拥抱。她感到孩子对她亲热，但同时她自己却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忧郁地表现为十分冷漠。她和出生不久的孩子一起，斜躺在花园中的一把椅子上，她想着丈夫斯坦利：

> 她已经嫁给了他，她还爱他些什么呢？她爱的不是别人眼中的斯坦利，也并不是日常的他。而是胆怯，敏感，天真，每晚跪在地上祈祷的他……但不幸的是，她很难看到“她的”斯坦利。和他有过目光的交换，短暂的宁静，但其他的时间就象住在一间容易起火的屋子里，就象住在一条每天都在继续破坏的船上。而斯坦利总是处于困难中。她的全部时间都花费在解脱他的困难，恢复他的情绪，使他安静下来，倾听他的诉说。剩下的时光已经很少，而这很少的时光就在担心会怀上孩子中度过。……众所周知，生孩子是女人共同的命运，但这句话并不是真理，她的遭遇就可以证明那是一句错话。生孩子把她压垮，她身体衰弱，失去勇气。使她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她并不爱她的孩子。即使假装也毫无用

处……每当走过一回那种可怕的旅途，就好象有一股寒风吹得她冷澈全身，她实在再也没有余热可以用来给孩子们以温暖。至于这男孩，谢天谢地，她的母亲已经要了他。他是她母亲的，或是任何需要他的人的小孩。她几乎一次也没有抱过他。她对他太冷漠了……琳达向他望了一眼……

琳达独自微笑着，这微笑中包含着离奇的、难以想象的意味。但她抑制住自己，冷漠地对那小男孩说："我不喜欢婴儿。"

"你不喜欢婴儿吗？"小男孩不相信她的话。"你不喜欢我吗？"他傻乎乎地向着妈妈挥手。

琳达从椅子上滑下来，落到草地上。

"你为什么老是在笑？"她严肃地说。"你如果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你就不会笑了。"……琳达对这小家伙的自信心感到惊讶……啊，不，要真诚，这不是她的感觉，这是另一种大不相同的感觉，这是一种很新奇的感觉，很……她的眼睛里充满泪花，夺眶欲出。她对小男孩轻声地说："喂，我的小傻瓜！"

这些例子说明，并不存在母爱的"天性"。"天性"这两个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适用于人类。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取决于母亲总的处境以及她对此的反应。如上所述，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但下列判断自然是正确的：只要环境并非过分恶劣，孩子总会丰富母亲的生活。科利特·奥德利在谈到一位年轻的妈妈时说，她的孩子似乎是她自己存在的确切证明。通过孩子，她才掌握一些事物，而最重要的是掌握她自己。这位作者还通过另一个妇女说：

> 我用尽全力抱着他，给他喂奶，他好象是世界上最重的东西。他把我埋葬在寂寞和黑暗中。他突然把整个世界的重量压在我的肩上。其实，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我自己太轻了。

某些生育力强的妇女，在孩子出生或断奶以后，就对孩子失去了兴趣，而希望再次怀孕。但多数妇女与此相反，她们觉得母子分开以后，自己才真正拥有孩子。这时，孩子不再是自己不可分割的部分，而成为外部世界的一个人。他不再隐约地缠绕着她的身体，而变成可以看到和摸到的人。在经历了分娩的痛苦以后，塞西尔·索娃将母亲有了孩子后的喜悦，表现在她的一首诗中。她把婴儿称为她的“小情人”，她的“小化身”，她可以幸福而激动地抱他，吻他，和他打招呼；他是她“倾注了全部感情用自己的血肉塑造的雕像”。

时常有人说，妇女高兴地在婴儿身上得到了与男性生殖器等价的东西。但这决不是正确的说明。男性的成年人，不再象童年时代那样把自己的生殖器当作有趣的玩具，它的价

值在于能使他占有他想要的东西。与此类似。女人羡慕男人的是他所占有的战利品，而不是他用来取得战利品的工具。婴儿满足了母亲那种带有侵略意味的情欲，那是她在男性的怀抱里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对母亲来说，婴儿就相当男人的情妇。这样的对应性当然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每一种关系都有它的特殊性。但母亲在婴儿身上得到肉体上的满足，恰似男人在情妇身上得到的快感。这不是一种屈服型的快感，而是一种统治型的快感。她从孩子身上得到了男人在女人身上追求的东西，那是自然和精神结合的产物，既是战利品，又是自己的化身，小孩是自然总和的具体化。科利特·奥德利笔下的女主角告诉我们说，她在小孩身上发现，“他的皮肤在我手指的触摸下，象小猫，象花朵”。婴儿的身体，是那样的柔软，温暖，富有弹性，这是她童年时期所羡慕的母亲身上的东西，也是她成年后到处追求的东西。婴儿既是植物，又是动物。在他的眼睛里，是雨水和河流，是海洋和天空的蔚蓝色。他的指甲是珊瑚，他的头发软得象丝。他是一个活的布娃娃，是小鸟，是小猫，是“我的花朵，我的珍珠，我的鸡雏，我的羔羊”。母亲低声唱出了近似情人的诗句，象情人一样，热烈地利用这种占有局面，以占有性的姿态，做着拥抱、亲吻等动作。她把孩子紧紧地抱在胸前，她在睡觉时用自己的体温暖和着婴儿。有时，这些关系明显地含有性的意味。在斯坦克尔所举的病例中，那位母亲自己坦白承认说，她感到羞耻，因为她在对婴儿爱抚时，带有性的色彩，对婴儿

肉体的触摸，使她愉快地颤抖；婴儿两岁时，她情不自禁地象情人一样地爱抚他，她不得不竭力抵制想玩弄他阴茎的诱惑。

当小孩略为长大时，母亲开始出现新的面貌。起初，他以婴儿的共性存在，只是许多婴儿中的一个，与其他婴儿基本相似。后来，逐渐地，他有了自己的个性。这时，专制的或肉欲强的妇女，就逐渐对孩子冷淡。但有些妇女则正好相反，例如科利特，就在这时开始对子女产生真正的兴趣。母亲和孩子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孩子有了二重性。他是她的“另一个自我”，他的吸引力使她有时想把自己完全投注到他身上；但他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他会反叛。对于现在这个真实的他，在母亲的幻念中他是将来的少年和青年。他是她的主要财产，是宝贝，但也是沉重的负担，是她的暴君。她从他那里得到的幸福，是他慷慨的赐予。她必须要侍候他，给予他，使他快活，才能得到自己的乐趣，就象科利特·奥德丽笔下的母亲那样：

> 他享受过欢乐的童年，正如人们在书本上看到的快乐的童年一样。但他的童年胜于书本上的童年，就象真的玫瑰胜于明信片上的玫瑰。他的幸福从我身上流过去，就象我的奶水流到他身体里一样。

宛如热恋中的女性，母亲很高兴地感到被别人需要。通过她向别人提供的东西，证明了她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但是，母爱并不互惠，只是单方面的给予，这就给母爱带来困难，也使母爱更为伟大。母亲必须与之恋爱的，不是男人，不是英雄，不是神，而是一个幼小的、牙牙学语的灵魂，一个迷失在脆弱和不能独立的躯体中的灵魂。孩子一无所有，他给不出什么东西，妇女和他在一起，依然会有寂寞之感。她给予他的一切，她并不希望得到任何偿还。这一点，她自己也认为是非常合理的。这种慷慨赢得了男人们滔滔不绝的赞歌。但是，当母性的宗教宣称所有的母亲都神圣时，母爱就被歪曲了。母性的奉献虽然可能是绝对纯洁的，但事实上，这种绝对的纯洁毕竟少见。母性往往含有自我陶醉、利他主义、胡思乱想、忠诚老实、自欺欺人、献身精神和愤世嫉俗等因素，是一种奇特的混合物。

在我们的教育中，对婴儿最大的威胁，就在于把孤立无援的他几乎总是托付给一个感到不满足的母亲。在性爱方面，她或是冷感，或是不满足。在社会地位方面，她感到自己总是不如男人。在眼前的世界上，在将来，她都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命运。对这许多不幸，希望在孩子身上得到补偿。当人们已经了解到，妇女目前的处境难以使她们得到充分的自我实现，她们内心中暗藏着多少情欲、叛逆心和各种正当要求，就会想到，把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婴儿放心地交给她们去照管，是何等可怕！当她对布娃娃轮番地加以珍爱

和折磨时，她的行为只是象征性的，但当她把这些行为加到孩子身上时，象征性就变成了严酷的现实性。母亲打孩子，打的并不仅仅是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打的根本就不是孩子。她是在对某一个男人复仇，对世界复仇，对自己复仇。这样的母亲时常在事后悔恨。孩子也许不感到愤恨，但疼痛肯定是会感觉到的。

这种母性的残忍面，是众所周知的。但过去总错误地认为，这种残忍性只存在于凶恶的后母的形象中：一个“好”母亲死了，留下的子女遭受到后母的百般折磨。近来的文学作品中也时常描绘“坏”母亲。如果说这类典型似乎毕竟只是个别的例外，那也只是因为大多数妇女具有抑制她们自发冲动的端庄品德。尽管如此，当她们发怒时，惩罚孩子时，这种冲动仍会象闪电似地突然爆发，瞬息即逝。有些母亲有明显的虐待狂，有些母亲反复无常，有些母亲统治欲特别强。她们把孩子时而当宝贝，时而当布娃娃，时而当顺从的小奴隶。当她们自负时，就把孩子拿出来展览；当她们嫉妒时，就把孩子藏起来。关于她们对孩子的照管，她们时常要求过多的感恩。当卡内利亚把孩子们抱出来给别人看并说“这些是我的珍宝”时，她给后代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很多母亲希望重复这种骄傲的姿度，却毫不犹豫地牺牲了那些不能实现她们指望的平凡的小个体。她们希望他象父亲，或不象父亲而象一个被人崇拜的亲戚；她们要使他成为某一个想象中的英雄。这种暴行会伤害孩子，而且往往使母亲自己失望。这种

顽固的教育法往往是和反复无常的虐待狂结合在一起的。母亲往往用“管教”孩子作为借口，来开脱和原谅自己的发怒。而她在这方面的失败，更会增进她对孩子的敌意。

另一类常见的母亲，以被虐待为乐事，将自己奉献给子女，当子女的奴隶，以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惩罚自己蕴藏于内心深处的对子女的敌意。这种态度对孩子的害处也不小。这类母亲有病态的热心，不许孩子走出她们的视线之外。她放弃一切娱乐，放弃一切个人生活，心甘情愿地充当牺牲者的角色，她想从这种自我牺牲中，来取得否认孩子一切独立性的权利。母亲这种过分克己的态度，很容易与残暴的统治欲相一致。在一对伴侣中，受苦的一方可以用自己的痛苦锻炼出用于虐待对方的武器。她所表现的忍受与顺从，使孩子产生自疚感，这种自疚感甚至会使孩子终生难忘。这种对孩子的委曲万状，比对孩子的公然袭击，害处更大：折腾来，折腾去，一忽儿拳头，一忽儿眼泪，使处于没有防御余地的孩子，迷惑不解，无所适从，被塑造成一个“罪犯”。

母亲的主要借口是，孩子没有能给她那种快乐的自我完成，而这是她从自己的童年时代开始就一直被许诺的。她责怪他，是因为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在这个骗局中她是牺牲品，她现在要揭露这个骗局。以前她帮助姊妹或朋友照顾婴儿时，她把婴儿象布娃娃那样来对待，因为责任并不在她身上。但现在，社会，她的丈夫，她的母亲，还有她的好胜心，都驱使她对这个新的小生命负责，好象他只是她一个人的事

情。特别是丈夫由于孩子的过错而发脾气，就象她烧坏了菜或做了不检点的错事一样。丈夫的不合理的要求，时常会对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发生坏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妇女，或者是由于独立生活，无忧无虑，或者是由于在家中有较高地位，可以思想比较平静地迫使孩子同意自己的要求，而不象其他妇女那样屈服于孩子蛮横无理的要求，不管她愿意或不愿意，都必须允诺。

要对一种存在，那是象动物的存在那样神秘、象自然力和人类那样杂乱无章的存在，赋予一个预先设想好的模式，是很困难的。人在训练孩子时不能象训练狗那样不用对话，但也不能用成人的语言来和孩子说理。因此，孩子处于有利的地位，他可以带着动物般的哭泣和撒娇来回话，他也可以用含糊不清的语言来顶撞对他的管束。

这样提出的问题的确富有挑战的意味。有较多时间来带孩子的母亲，可以享受到她的教育效果。她宁静地坐在公园里，发现和怀孕期一样，孩子仍然为她提供得到安逸的借口。多少仍然有点天真的她，往往很喜欢和孩子一起逗乐，以便旧梦重温，再演习一次自己小时候的游戏、语言、兴趣和喜悦。但当母亲忙于洗衣服，做饭，给更小的婴儿喂奶，上市场买东西，款待客人，特别是当她忙于和丈夫周旋时，孩子就只是麻烦和累赘了。她没有时间去“训练”他，主要的事就是防止他闯祸。他时常打坏或撕破东西，把屋子弄脏。他对环境，对衣服，对他自己，都有威胁性。他跑来跑

去，他哭，他说话，他吵闹，他为自己而生活，但他的生活却扰乱了父母的生活。父母的兴趣和孩子的兴趣并不一致，因此就产生了不少麻烦。背着他这个沉重的包袱，父母不断强迫他作出种种他难以理解的牺牲。他在为父母的清静牺牲，他在为自己的将来牺牲。很自然地，他要反抗。孩子不能理解母亲所作出的种种解释，因为她不能真正懂得他的意识。母亲看不清孩子的世界，那是一个由他的梦、他的恐惧、他的眼泪、他的悒郁和他的欲望所组成的世界。母亲只能盲目地从外部来控制孩子，而他却觉得她所定下的那些强制性的规矩，都是无关紧要的或荒谬的。

当孩子长得更大一些时，这种相互缺少理解的状态依然保持。他走进了一个充满趣味和价值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包括他的母亲在内，因此，他时常藐视她。特别是男孩，他会为自己的男性特权骄傲，不屑于服从女人的命令。她坚持要他用功，但她却不懂怎样解习题或翻译拉丁文，她在学识上落后于他了，难以指导他做功课。有时，她做这不被感激的工作，累得直淌眼泪。她的这种困难，丈夫了解得很少。她企图控制一个和自己缺少沟通的人，她企图把自己强加给一个独立的陌生人，而他却只有在对她的反抗中才能说明和肯定自己。

情况因孩子的性别而有所不同。虽然涉及到男孩的情况总更为困难，但母亲通常还是能较好适应的。因为女人为男人建立了威望，实际上男人也确实得到许多好处，所以许多

妇女都愿意生个儿子。她们说："生个男人到世界上来多好啊！"我们在前面说过，她们盼望生产英雄，而英雄显然是男性的。儿子将来会成为士兵，成为领袖，成为创造者。他会征服全世界，他的母亲会分享他永垂不朽的英名。他将奉献给她：她没有建造过的房子，她没有探索过的土地，她没有看过的书。通过他，她将占有世界。但当然，她必须首先占有儿子。正因为这样，矛盾就来到了她的身上。

弗洛依德认为，和其他关系相比较，母子间感情的二重性是最为轻微的。但事实上，母爱如同在婚姻和恋爱中一样，对男性的超然存在，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她在婚姻或恋爱中的经验使她敌视男人，她就会以压制代表男人的儿子为满足。她会以反常和无礼的态度去对待这个骄傲的男性。例如，她有时威胁他说，除非他守规矩，不然的话，她就要割掉他的小生殖器。即使她谦卑而温柔地把儿子尊称为未来的英雄，她也要迫使自己把他还原为眼前实际的他，目的是为了使他真正地属于她。她对待丈夫象对待孩子，因此，她对待孩子就象对待婴儿。我们当然不至于相信她会阉割自己的儿子，但在她的梦想中确实是充满矛盾的。她指望他有无上的权力，但他应该掌握在她手中。她指望他统治全世界，但却要他跪倒在她身旁。她鼓励他温柔、贪婪、慷慨、胆小、安静，她不许他运动，不许他有游伴，使他缺乏自信心，因为她想独自占有他。然而，如果他不成为探险家，不成为体育竞赛的冠军，不成为一个值得她骄傲的天才，她又

会感到失望。毫无疑问，她的影响时常是有害的，正如蒙德兰特和其他一些作家曾经描述过的那样。所幸的是，男孩子还比较容易逃脱这种罗网，传统和社会也鼓励他这样做。到后来，母亲自己也弃权了，因为她很清楚，反对男人的斗争总是一场不平等的斗争。她安慰自己说，她是一对伴侣中受苦的一方，她感到骄傲的是，她生下了一个女性的征服者。

小女孩差不多总是把自己完全交给母亲，而母亲对她的要求也就更多些。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富有戏剧性。女儿不属于优越阶级，母亲没有为她而欢呼。母亲把女儿看作自己的化身。母亲把自我关系中的矛盾完全抛射在女儿身上，当这“另一个我”表明了独立存在时，母亲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于是，母女之间的矛盾，就走向恶化。

有些对生活非常满意的妇女，希望生一个女儿作为自己的再生，或至少对生个女儿不感到失望。她们要给女儿所有自己曾经有过的机会，还要给女儿所有自己曾经错失过的机会。她们要使女儿的青少年时代过得愉快。科利特曾为我们描绘过这类心理平衡、慷慨大方的母亲之一——西多。西多非常爱她的女儿，但并不侵犯女儿的自由。她使女儿的生活充满快乐，而不作种种要求，因为西多从自己的心底得到幸福。有的母亲在自己的化身上认识和超越自己，把自己奉献给这个化身，把自己完全投射在女儿身上。母亲完全放弃了自我，把女儿的幸福作为自己唯一关心的事物，甚至对世上其他的一切都采取自负和无情的态度。她会碰到的危险是，

她所爱的女儿可能会产生反感，就象德西维夫人和她的女儿葛丽南夫人那样。女儿会愤怒地反抗，力图摆脱这种残暴的奉献。女儿的反抗往往难以成功，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监护下，她终身在面对自己的责任时，都保持着幼稚和胆小的特点。对少女来说，这种被虐待狂式的母性，是威胁她的极不愉快的压迫。有些妇女感到做女人是一件活受罪的事，而她们却希望生个女儿或感到生个女儿也可以，那是因为她们以自己能生下另一个牺牲者而自赞，但在她们的快感中含有苦味，她们为把女儿带到人世而感到内疚。她的悔恨，她通过女儿才感到的对自己的怜悯，表现为数不清的焦虑不安。她几乎一步也不敢离开女儿，她和女儿在同一个房间睡上十五年或二十年，而这种无休止的热情的火焰却会把女儿烧毁。

大多数妇女要求得到女性的地位，但同时又厌恶这种地位，她们在愤恨中度过一生。她们对女性的厌恶可能会使她们让女儿受男子教育，但她们往往缺少宽宏大量的气派。由于生女儿而懊丧的母亲，会带着矛盾的心情诅咒说："你将来总还是个女人！"为了弥补自卑感，她希望把作为自己化身的女儿培养成出人头地的人。但她同时又想把自己受过的苦楚加在女儿身上。"我可以接受的，你也可以接受；我是这样长大的，你也应该和我一样。"有时她想把自己的命运，原封不动地强加给女儿。也有完全相反的情况，她严厉地防止女儿象她。她希望自己的经验还多少有点用，她要在女儿身上寻找自己的第二次机会。因此，娼妓把女儿送进修道院，母

亲是文盲，却让女儿受良好的教育。在特法尼的《窒息》中，那位母亲把女儿看作是自己年轻时荒唐的结果，愤怒地警告她说：

> 你要弄清楚，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我就把你赶出门。我当年真不懂事，糊里糊涂地做了错事。如果有男人来勾搭，你不要理他，继续走你的路，不要回头。你听懂我的话了吗？我已经预先警告过你了。你一定不许出事。要是出了事，我不会怜悯你的，我要让你一个人到阴沟里去挣扎。

母女之间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女儿长大以后。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女儿希望脱离母亲而独立，母亲则认为这是最可痛恨的忘恩负义的表现。她顽固地企图打消女儿逃避她的念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化身变成“另一个人”。绝对压倒对方的优越感，是男人可以从女人身上享受到的一种乐趣，而女人则只有从孩子身上、特别是女儿身上才能享受到这种乐趣。如果要她放弃这种特权和威信，她会觉得自己遭受了挫折。不管是内心中充满慈爱还是充满怨恨的母亲，子女的独立都意味着是对她的希望的冲击。她陷入双重的妒忌中，她恨世界夺走了她的女儿，她也恨女儿夺走了本来属于她的一部分世界。

这种妒忌首先涉及父女关系。母亲有时想利用女儿将丈

夫留在家里。如果不奏效，她自然不高兴。但如果成功了，她儿童时代的偏见就立刻以相反方向的形式复活：她向女儿发怒，就象她从前向母亲发怒一样。她满面怒容，她觉得自己被遗弃和误解了。有个法国妇女，嫁给了外国人，由于丈夫太爱女儿，她有一天怒气冲冲地叫喊："我和你们这些外国佬在一起，真是活够了！"

受到父亲宠爱的大女儿，时常成为母亲特别要迫害的对象。她要大女儿做不少乏味的事，要她表现出超过她年龄的端庄与稳重。母亲对她怀着敌意，因此，她小小年纪就被看作大人。"生活不是小说，不是玫瑰，你不能随心所欲，你到世上来不是光为玩的。"她不得不时常学习与此类似的许多训辞。母亲时常无缘无故地打她，嘴里还嘟嘟嚷嚷："这是教训你。"母亲要表示出她仍然比女儿优越，但使她烦恼的却是，她不见得真正优越于这个十一、二岁的女儿。这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已经能操劳家务，做得很象样；她充满生命力，富有好奇心，目光锐利。她已经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母亲。母亲喜欢独自统治女人的天地，她要成为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人物，但现在她却发现，年轻的助手已把她的地位大大降低，她成了普通的一员。如果她出门去两天后回来，发现家里不整洁，她就会严厉责备女儿；但如果她发现，她不在时家庭生活也过得有条不紊，她又会发怒并恐慌。她不能忍受女儿真正成为她的化身，不能忍受女儿对她的替代。

然而，使母亲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女儿竟然大胆宣称她

是“另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女儿为了反抗家庭的压迫，要寻求某些朋友的支持。母亲对女儿的这些朋友，以及可能对女儿有“不良”影响的朋友，都故意地表示嫌弃。她批评他们，借口“他们会给她坏影响”，不许女儿经常和他们见面，甚至干脆就禁止女儿和他们来往。她认为除了母亲的影响以外，其他的影响都是坏的。母亲特别憎恶年龄和自己相近的女人，如女教师，女儿朋友的母亲等，因为女儿和她们在一起时，就变得很可爱。这种感觉，连她自己也知道是荒谬或病态的。有时，女儿的快乐、轻率、游戏和欢笑，都会激怒她。如果是男孩子做这些举动，就很容易得到母亲的谅解，因为男孩子是天然应该享有这些特权的，更何况，母亲早已放弃和男性作毫无取胜希望的斗争了。但她的女儿也是一个女人，为什么能享受她自己没有享受过的权利呢？她自己陷入了重重家务，因此，妒忌任何能使女儿摆脱家庭烦恼的职业和娱乐。如果她精心培养的女儿真的走出了家门，那么，她的牺牲就将失去价值。

女儿的年龄越大，母亲心中的愤恨越深。年复一年，母亲日见衰老，女儿却逐渐发育和出落得楚楚动人。母亲认为，展现在女儿面前的无限前程，似乎都是从她身上夺取过去的。对有些母亲来说，女儿的第一次月经来潮，会成为她们烦恼的根源，因为她们会带着妒意认为，女儿从今以后成为真正的女人了。老年妇女的命运是做那些重复而乏味的家务，和她们相比，年轻姑娘被提供许多其他的机会，这也会

引起母亲的嫉妒和愤愤不平。母亲自己得不到这种机会，就总想减少或取消女儿的机会。她把女儿关在家里，监视她，压制她，故意给她穿难看的衣服，不给她空闲的时间。女儿如果自己打扮了，出门去了，她就会蛮不讲理地发怒。她把自己对生活的怨恨，全部转向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生命。她力图侮辱女儿，嘲笑她的出游，不断找她的岔子。她们之间时常爆发公开的对抗，多数是年轻的一方获胜，但这种胜利总带有肮脏的色彩。母亲的态度使女儿既反抗又后悔，只要母亲出现在她面前，她就感到自己是罪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沉重的内疚感会使她终生难以摆脱。不管是否愿意，母亲总以认输告终。当女儿成年以后，她们之间建立了不自然和不稳定的友谊。母亲总觉得失望和空虚，女儿则时常感到太倒霉。

我们将在以后再讨论年老的母亲与她成年子女的关系，但不满二十岁的子女显然要在母亲的一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从我们上面讲述过的母子或母女的早期关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流行偏见的严重错误。

第一种偏见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能生孩子，就足以使妇女的一生无上光荣。这是完全错误的。有很多母亲，她们不幸福，不满足，相当痛苦。托尔斯泰的夫人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她生育过十二次以上，但在日记里却不时写下体现着空虚的字句，她觉得，世上的一切，包括她自己在内，都是毫无价值的。她也谈到宁静和快乐，但这种感觉

只发生在儿女非常需要她的时刻，而这也是她唯一的武器，可以用来对付她丈夫的优越感。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使她那令人厌倦的存在产生意义。有时她想做点有意义的事，但除了照顾孩子的吃、喝、睡以外，什么也做不成。本来应该给她带来幸福的，却使她忧伤。她想全力以赴地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但数不清的矛盾斗争，使她烦躁和发怒。

母亲和子女的关系如何，决定于母亲的全部生活。她和丈夫的关系，她的过去，她的职业，她的一切，都能影响她和子女的关系。把孩子看作所有女人的灵丹妙药，是有害的、荒谬的误解。这也是海伦·多伊奇在她那本常被引证的书里得出的结论，在那本书里，她通过心理分析的经验来研究母性现象。她认为母性非常重要；她相信，通过母性妇女可以得到完全的自我实现；但这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妇女自愿承担和真诚希望来担负这一任务；年轻妇女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和物质条件，必须允许她能承担这种努力，否则，结果一定是一场灾难。特别要注意，劝妇女用生孩子来治疗忧郁症或神经衰弱，是一种罪过，那意味着母女俩都不会得到幸福。只有心理平衡、身体健康、认识自己责任的妇女，才能成为一个“好”妈妈。

我们曾说过，不幸的婚姻大多数是由于两个人以缺点相结合而不是以优点相结合，彼此都要求对方给予而不是以给予对方为乐。同理，要想从孩子身上得到自己不能为自己创造的充实、温暖和价值，只是更加不切实际的幻梦。能从孩

子身上得到幸福的，只有那些能无私地为别人寻求幸福、能设法超越自己的人。的确，子女是一项可以为之献身的事业，但抚育子女和从事其他工作一样，并没有现成的意义，妇女必须对子女本身感兴趣，而不是为了其他臆想的利益。斯坦克尔说得好：

> 孩子不能代替失落的爱情，不能代替生活中受挫的理想，不是填补空虚存在的材料。孩子是责任，是机会。在高等的爱情之树上，孩子是树顶上的花朵……他们不是玩物，不是用来满足父母需要或未遂野心的工具。孩子是义务，他们应该被抚养长大而成为幸福的人。

抚养子女的义务决不是"天生"的。作为自然，它永远不会命令任何人作出道德上的选择。抚养子女意味着从事一项工作，实行一项诺言。要求有一个孩子，就是许诺一项神圣的义务。母亲后来如果推卸这个责任，她就对一个存在的、独立的人犯下了罪行。但没有人能把这项工作强加在她身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和夫妻关系一样，应该是自愿的。有人甚至说，生孩子是妇女的特别成就，比其他任何成就都重要，这种话也是不对的。时常有人说，某个妇女因为没有小孩，她才卖弄风骚，自作多情，她才搞同性恋，她才野心勃勃。有人还说，这种妇女的性生活，她的生活目的，她所

追求的价值，都是为了代替她所缺少的孩子。但事实上，这都不见得正确。我们倒不如说，一个妇女因为得不到爱，没有职业，得不到满足同性恋倾向的机会，才需要孩子。说孩子是妇女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这句话其实只具有广告式标语的价值。

第二个错误的偏见，直接隐含在第一个偏见中，它认为，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中一定是幸福的。既然没有“天生的”母爱，当然也就不可能有“非天生的”母爱，正因为这样，才有坏的母亲。心理学家曾宣布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正常”的父母，可能对孩子有害处。父母在争吵或演出一幕悲剧时的冲突，对孩子的影响很坏。有些孩子长大后心境偏狭，充满悒郁感，神经衰弱，都起源于他们早年的家庭生活。早年家庭生活的创伤，使他们以偏见和想挫败对方的心情来对待自己的孩子。这根不幸的生活之链，正在一环套一环地无限伸展。特别是母亲的被虐待狂，造成了女儿的自疚感，使女儿日后也以同样的行为对待子女，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对妇女的轻视和对母亲的尊敬，把它们很容易地混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大骗局。这真是无与伦比的荒谬：不许妇女公开活动，把她关在男性事业的门外，断言她们在各个领域内的无能，但却很信任地委托她们去从事最细腻、最严肃的工作，要她们塑造人。送布娃娃给小女孩，是为了补偿她们比男孩子低劣的地位，而现在允许她们玩弄的，却是有血有肉的真娃娃。

一般说来，妇女很难抵抗滥用这种特权的诱惑，除非她的生活极为快乐，或竟是个圣人。孟德斯鸠的话也许是对的，他说：把国家交给妇女，也许要比把家事交给她们好得多，因为，如果给她们以同等的机会，她们会和男性一样地有理性，有效率；在抽象思考中，在有计划的行动中，她们最容易超越自己的性别。对妇女最困难的，是从女性过去的处境中逃脱出来，以取得感情上不偏不倚的平衡。男人也在工作中比在家里更理性化，心情更平衡。他以数学的精度来处理业务，但当他在家里面对妻子时，他却蛮不讲理，撒谎，反复无常，什么都做得出来。与此类似，妇女在孩子面前，也什么都做得出来。她的这种不顾体面，危害性更大，因为妻子可反抗丈夫保护自己，而孩子却不能反抗母亲。很明显，如果母亲身心健康，能在工作中和在社会联系中得到自我实现，她们的自我实现不需要粗暴地在孩子身上寻求，这样的母亲是对孩子大有好处的。还应指出，小孩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应大大减少，应该让他在对他持客观和纯正态度的成年人指导下，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和玩耍。

在平稳、快乐的生活中，即使孩子被当作宝贝，他也不能代表母亲视野的极限，他不能把她带出她的生活圈。她塑造他的肉体，她抚养他，她照顾他，但她充其量也只能为孩子创造一个环境，使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完成自我超越。如果她把赌注押在他的将来，她通过空间和时间的超越仍要依靠代理人，她将再一次成为命定的依赖者。不仅是儿

子的忘恩负义，还有儿子事业上的失败，都会使她的全部希望烟消云散，就象在婚姻或恋爱中，她唯一可靠的行为本来应该是自愿地承担责任，但她却想依靠另一个人来证明她生活的合理性，这种希望也往往会落空。

我们已经说过，妇女低人一等的地位，起初来源于她被局限于延续种族的日常琐碎工作，而男人则找到一些理由，让自己过着在他们自己看来比这种单纯为生存而不得已做的重复性工作更重要的生活。把女性限制在母性上，就可以把这种局面维持下去。现代妇女要求参加另一些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通过超越，通过走向新的目标和新的成就，人类继续企图找出生命的意义。除非生命有意义，否则她就不该同意将生命带到世界上来。除非她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上尽了一些力，否则她不能成为母亲。生产炮弹、奴隶、受苦者，与生产自由人相比，完全是两回事。在一个组织得好的社会里，孩子应主要由社会团体来养育，母亲也应得到照顾和帮助，做母亲和有职业，不应该是不相容的。从事职业劳动的妇女，如农民、化学家、作家等，怀孕时最不痛苦，因为她并不局限于全神贯注自己。妇女享受的个人生活越丰富，她们给予孩子的将越多，向孩子要求的将越少。努力于争取人类真正价值的妇女，最有能力将孩子很好地带大。今天的妇女，仍然不能兼顾孩子的利益和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的职业，那是因为妇女的职业多半都是奴隶性的，同时，社会也没有在家庭以外设立照顾小孩、保护小孩和教育小孩

的场所。这是社会的过错。如果用自然规律和上帝意志等假话，或用男人需要母亲和孩子相互独占等，来为社会的过错辩解，将是非常错误的。母亲和子女间的相互垄断，事实上只构成双重而有害的压迫。

认为妇女可以通过生育子女变得和男人真正平等，这是欺人之谈。有些心理分析家郑重其事地说，女人有了小孩，就等于有了阴茎。不过，这样的男性标志诚然可贵，却没有人会认为单单占有它就可以成为存在的高级部分。也有人说，做母亲是神圣的权利。但妇女并不是因为做母亲才获得选举权的，而且，没有结过婚的母亲仍然遭受到蔑视。只有正式结了婚的妇女，也就是说，只有受丈夫统治的妇女，做母亲才是光荣的。只要父亲在经济上是一家之主，孩子依赖父亲比依赖母亲要多，尽管母亲花更多的时间在孩子身上。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前面才说，母亲和子女的关系，受她和丈夫关系的密切影响。

因此，夫妻关系，家务劳动，生育子女，这三方面构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个因素互相影响。夫妻和睦，妻子可以愉快地操劳家务；喜欢孩子，对丈夫也就能多容忍。这种和谐是不容易达到的，因为指派给妇女的许多职责时常难以协调。妇女杂志中充满了对家庭主妇的忠告，诸如洗碗时如何保持女性的吸引力，怀孕时如何继续穿得漂亮，如何在打扮、做母亲和经济上互相协调。但即使她不折不扣地遵守这些忠告，家务劳动终将影响她的身心健康。要使经常洗

碗的手和由于生孩子而变形的身体，保持得动人，实在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倾向于爱情的妇女，对那个破坏她的诱惑力以致使她失去丈夫注意力的孩子，发生怨恨的缘故。对那些母性特别深的妇女，当丈夫声称他占有包括儿女在内的一切时，就会感到嫉妒。

“好”的主妇反对生命的活动，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她认为：孩子是打蜡地板的敌人。唯恐家中的整齐清洁被破坏，这种耽心往往引起对孩子的愤怒责骂，而母爱也就在这种气氛中逐渐消失。在这样一大堆矛盾中挣扎的妇女，日子一长，会变得神经质和性情暴烈，这是不足为怪的。她总要在某些方面受损失，她的获得是不可靠的，她不一定能在将来取得任何成功。她不可能从工作中拯救自己。她终日忙碌，但无法证实自己存在的意义，因为她的存在意义依赖于其他有自由人格的人。妇女被关在家里，她不能建立自己的存在，她缺少必要的方法象独立个体那样来自我肯定，因此，人们不承认她的独立存在。在印度、阿拉伯以及许多农村人口中，女人只是被驯服的雌性动物，人们按照她的劳动力来估计她的价值，如果她失踪了，人们也并无遗憾地另找一个女人来代替。在现代文明中，妇女在丈夫的眼睛里，或多或少地有些独立个性。但除非她完全放弃自我，象《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一样委屈自己，把自己热烈而执着地奉献给家庭，否则，她就会由于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妇女而痛苦。她是唯一的主妇，唯一的妻子，唯一的母亲。娜塔莎以这个

崇高的自贬为乐，她拒绝作任何比较，以此来否定别人的存在。现代妇女则相反，希望通过人们的比较，使自己以某家的主妇、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某一个女人而著称。这就是她要在社交生活中寻求的满足。

第六章 社交生活

家庭不是一个封闭的单位，由于和其他社会单位沟通，它的孤立性被缓和。家庭不仅是夫妻二人生活的小天地，它还显示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经济状况和鉴赏能力，于是，家庭必须陈列在别人眼前。引导社交生活，主要是妇女的事情。男人作为生产者和公民，通过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有组织的团体的契约，被结合进团体。夫妻是一个社交单位，由他们所属的家庭、阶级、生活圈子和种族所确定，被牢牢吸附于某个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应的团体中。妻子能够最单纯地体现这种关系。丈夫由于职业的关系，经常跳出他的社会地位与人来往，然而，妻子却没有职业上的需求，她们可以把自己局限于和自己同一等级的社会关系中。而且，她们有闲暇出门访客或在家会客，这种交际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对于那些意在保持等级社会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对那些认为自己优于他人的人来说，当然是很重要的。她们乐于显示她们的小天地，甚至乐于展览自己的外貌，而

这些都是她们的丈夫及子女因为过分熟悉而不再注意的。她的社交职能，是“装门面”，连带着表现自己的快乐。

她必须在她最为关心的场合“装门面”。在家里操作家务时，她穿得很随便，但出门作客或在家会客，她就要“打扮起来”。正式的盛装有双重功能：首先是标明妇女的社会地位，包括生活水平、财富、她所属的社交圈子等等；其次，这也是妇女自我陶醉的具体形式。衣服也是一种装饰，借助于此，被剥夺了做任何事情的权利的妇女感到能表现自己。注意美容，精心打扮，是一项女人使自己拥有自己的工作，正如她通过家务劳动来拥有家庭一样。这样，她的自我就好象被她自己重新选择、重新创造过了。社会习俗也加深了这种以衣貌取人的倾向。男人的服装，象他的身体一样，能够表明他的超越性，却并非要引人注目；男人既不要凭借衣着漂亮也不要依仗外表好看来把自己树立为某种东西；而且，他一般也并不认为外貌是自我的反映。

相反，社会要求妇女把自己塑造成为“性的对象”。时装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妇女表现她独立的个性，而是为了让她成为男人欲望的牺牲品。妇女们被时装征服和束缚。社会并不想促进她独立个性的发展，反而加以阻挠。裙子不如裤子方便，高跟鞋妨碍走路；最为考究的服装，是那些最不实用的袍子和女式鞋、最易坏的帽子和袜子；服装可以掩盖身体，歪曲身体，或者显露身体的曲线，总之，服装使身体展览出来。所以，“打扮起来”是那些喜欢注视自己的自恋的

小姑娘最为着迷的游戏。后来，她的幼稚的独立感，在反抗浅色薄纱织物和漆皮鞋强加的束缚中生长起来。在尴尬的少女时代，她对是否展露自己的身材犹豫不决。当她一旦接受充当“性的对象”的行业，她就喜欢装饰自己了。

正如我已指出过的，妇女通过装饰，与其本性相关联，并给本性带来一种非自然的需求。对男人来说，她是花，她是宝石，对她自己来说，也是一样。她在给予他温暖柔和之前，先要取得这些。她和她的小玩意儿、地毯、椅垫和花束的关系，远不及她和羽毛、珍珠、绫罗绸缎的关系亲昵密切，因为后者能和她的肉身混成一体。那些缤纷的颜色和柔软的质地，是对她在性爱世界中付出的辛苦的报偿。她的情欲满足程度越低，她对这些东西就看得越重。很多同性恋的女人装束男性化，不仅仅出于模仿男性并否定社会；她们没有抚弄丝绒绸缎的需要，因为她们从女性的身体上就可找到同样驯服消极的品质。异性恋的女人，投身于粗暴的男性怀抱，不管她喜欢还是不喜欢，除了她自己的身体之外，没有别的肉体可拥有，所以，她在身上洒香水，使她变成花朵，在脖子上挂起钻石项链，其光彩和她的肤色交相辉映；为了占有这些东西，她和世界上所有的有钱人认同。她不仅觊觎有钱人的感官享受，而且羡慕他们的思想情操和价值观念。这个宝石是纪念品，那一个又是某种象征。有些女人把自己打扮得象一朵香花、一只鸟笼，有些女人把自己打扮得象一座博物馆，还有一些女人把自己打扮成象形文字似的难以辨认理

解。乔其特·莱勃拉在她的《回忆录》上，写到她的青年时代：

我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象一幅画。有一个星期打扮得象梵约克的画，另一个星期打扮得象鲁本斯的讽喻画，另一个星期又打扮成梅姆林画上的圣母。我依然记得，一个冬日，我穿着一件紫石英色的丝绒衣服，衣服模仿神父作弥撒时穿的长袍镶了银边，穿过布鲁塞尔的马路。拖垂着长长的裙裾，我不屑提它，有意让它在地上扫动。黄色的毛皮帽子围绕着我的金发，最不寻常的是我前额中央那个环状饰物上的钻石。为什么要这样？很简单，因为我喜欢这样，这样使我感到我与众不同。越被嘲笑，我就越追求古怪。因为已经被嘲笑过了，我就羞于改变自己服饰中的任何细节。那似乎是一种退化性的投降……。在家里则又不同了。我的模特儿是葛若利和法拉·安吉利哥画中的天使，以及勃恩·钟丝和瓦兹画中的人物，我模仿她们。我总是穿天蓝色和金色的衣服；飘垂的罩衣重重叠叠地散落在我周围。

在精神病院的病人身上可以发现最为奇特古怪的例子。不能控制她对珍宝和象征性物品的热爱的妇女，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外貌，把自己打扮得过了头。小姑娘以为打扮起来就可以把自己变一个仙女，一个皇后，或者一朵花；她以

为她戴了花环和蝴蝶结就很美丽，因为她把自己和这些精美的东西等同起来了。天真的年青姑娘，被一些衣料的色彩所迷住，却没有注意到自己肤色的灰黄色泽。在成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身上也可发现这种花花哨哨的低级趣味，他们迷恋外部世界甚于自己的外貌。他们着迷于那些旧时的纺织品和古老的珠宝，兴致勃勃地对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神往不已，却不去瞥一眼镜子看看自己。人们常常惊讶于一些老年妇女的装饰：那些冠冕、花边、华丽而俗气的衣服、奇奇怪怪的项链，不幸都只能引起对她们衰老容颜的注意。失去魅力之后，很多这类妇女就把打扮自己当作了消磨时间的游戏，如同她们在青春早期时代一样。相反，一个漂亮的女人，可能也需要在梳妆中寻求感官享受和美学快感，但她会使这种梳妆适合于她的外貌；长袍的颜色要与她的肤色相宜，长袍的裁剪要强调或改善她的体形；她所珍惜的是被装饰的自己，而不是装饰她的那些东西。

打扮不仅只是为了装饰。我已经说过，打扮也标明妇女的社会地位。只有那些专门充当肉欲对象的娼妓，打扮只是为了装饰展览自己。染成桔红色的头发、撒花的古式袍子、高跟鞋、紧身绸衣、浓妆艳抹、强烈的流行香水气味，这都是为她的行业做广告用的。任何别的种类的妇女，如果“打扮得象个街头妓女”，一定会遭到非议。她的打扮必须合乎她的社会生活并且表明她的正经庄重。但是需要说明，正派并不一定意味着服装方面的严格节制。一个女人如果打扮成

明显谄媚男人的样子，固然是趣味恶俗，但反过来做也不被赞许。人们会认为她想要男性化或者可能是同性恋者，认为她想要独出心裁、惹人注目。女人拒绝充当“性的对象”的角色，她就是否定社会，也许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吧。如果她不想惹人注目，她必须保持女性的气质。习俗使炫耀和节制之间的折衷规则化。有一个时期，“正派的女人”必须把胸部盖没，另一个时期又必须把脚腕遮住。有时候年轻姑娘可以强化她的魅力以吸引求爱者，同时，已婚的妇女却必须放弃装饰，就象在很多乡土文化中那样。在另一些时代，年轻姑娘被迫穿式样保守、颜色晦暗的上衣，同时，年长的妇女却被允许穿紧身袍子以及衣料时髦、色彩丰富、风格富于刺激性的服装。对十六岁的姑娘来说，黑色显得太惹眼，因为那个年龄的人是不穿黑色衣服的。

这些规则当然不能忽视。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下，甚至在最严肃简朴的圈子里，妇女的“性”的一面也被强调。例如，一个教士的妻子，烫卷了头发，化了淡妆，谨慎地追随时尚，她关心身体的吸引力，说明她接受了女性的角色。这种性爱和社交生活的协调一致，明显表现在晚礼服上。为了表明那是一个以奢华和挥霍为标志的社交场合，这些晚礼服必须是值钱的、娇贵的；它们必须尽可能地不方便；裙子不是又长又宽，就是又长又紧，弄得人无法走路；在珠宝、荷叶边、亮晶晶的衣服小饰片、花朵、羽毛和假发下面，妇女变成了活的布娃娃。甚至肉体也陈列出来，好象纷纷开放的

花朵，妇女们展览她们的肩膀、背和胸。除了在狂欢节上，男人被假设成对这些不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他们仅仅限于因某种原因而瞥上几眼或相挽跳舞；但是在这个充满如此精致的珍宝的世界里充当国王是令人飘飘然的。对男人来说，宴会是交换礼物的典礼：每个人把他拥有的女人的身体公开展示，作为给其他人的礼物。身穿晚礼服的妻子被装扮成博取所有男人欢心的女人，同时满足她的拥有者的骄傲之心。

装饰的社会意义，是允许妇女通过她的穿着方式来表现她对社会的态度。如果她服从社会惯例，那么她肯定是一个谨慎周到而时髦漂亮的人。存在很多可能的细微差别：她可以把自己表现得或脆弱、或幼稚、或神秘、或坦率、或严肃、或快活、或娴静、或勇敢、或拘谨。反过来，如果她蔑视社会惯例，她也会通过她的服饰来表明这种蔑视。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小说中，“解放的女人”凭借大胆的服装使自己与众不同，这种服装突出了她作为性的对象的特性，所以也突出了她的依赖性。比如，在艾迪丝·霍顿的《天真的年龄》中，一个具有冒险经历和大胆作风的年轻的离婚女人，第一次出现时穿了一件特别袒露的衣服。这反映出她以倨傲态度对待社会成规，所以激起流言蜚语的波澜。同样道理，年轻姑娘会喜欢穿得象个成熟的妇女，老年妇女会喜欢弄得象个小姑娘，高等名妓喜欢打扮得象上流社会的妇女，而后者又会喜欢打扮得象个“荡妇”。

即使每个女人都打扮得合乎身份和惯例，象艺术一样属

于想象力范畴的种种人工技巧，仍然象游戏一样被玩耍着。伪装身体和脸的不仅仅是腹带、胸罩、染发水和化妆品。女人的幼稚，还在于她一旦“打扮起来”，并不是把真实的自身呈现给别人看。她好象一张画，一个石膏像，或者，象一个舞台上的演员，被设想成某种人而其实只是一种替身，也就是说，她只是代表了某种人物角色，实际上她却不是那种人。把自己和某些不真实的、不变的、完美的东西等同起来，把自己当作小说中的英雄，当作一幅肖像，或者当作一座雕像，使她感到满足。她努力和这些人物认同，才觉得自己是稳固的，确确实实富有光彩的。

正因如此，在玛丽·巴斯克赛夫的《心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一页接一页地不厌其烦地堆砌有关意象。她一件不漏地描写她的服装。她以为每一种新的装束，都会使她发生根本变化，于是，她再次更新她的装饰：

> 我拿了母亲的一块大披巾，在中间剪了一个洞，让头可以钻进去，然后，把边缝在一起。这块垂落下来形成古典式衣褶的大披巾，给我平添了一种东方的、圣经的、异国的情调。
>
> 我到拉芙瑞尔时装店去，加洛林用三个小时给我做了一件袍子，穿在身上，我好象被簇拥在云朵中。其实她只是把一块美国皱绸披在我身上，使我显得苗条、优雅、修长。

卷裹在一件温暖的羊毛花呢袍子里，我是李费理的人物，他很懂得怎样用朴素的衣料显现青春的矫健身材。

她天天重复这类句子，好象重唱歌曲中的迭句："我穿黑色很迷人……我穿灰色很迷人……我穿白色也很迷人……。"

诺艾尔夫人也很看重穿着，在她的《回忆录》中，她悲哀地说到那些不合身的袍子的故事：

我喜欢活泼、大胆、鲜明的色彩；一件袍子就象一张风景画，命运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一场奇遇的开始。当我穿上一件不合身的衣服时，我因缺点毕露而非常难受。

服装对很多女人来说显得如此重要，那是因为在她们的幻觉中，服装能够同时重塑她们的外面世界和内面世界。在德国小说《穿人造丝衣服的年轻姑娘》中，依·昆描写了一个年轻姑娘对一袭白色毛皮斗篷产生的热情。她喜欢它的温暖的感觉。穿上它，她体验到幸福和安全的感情；穿上它，她就拥有了一个美丽的世界以及超越现实的命运。

由于妇女只是一种客体，一种物品，她的内在价值被外部服饰所左右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她把真丝或尼龙丝袜子、手套、帽子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对她来说保持她的地位

是一种迫切需要完成的责任。在美国，做工的姑娘把大部分收人用于美容和服装。在法国，这种费用的程度轻些；然而情况依然是：女人打扮得越好，就越受尊敬；她越是显得优裕阔绰，就越容易找到工作。漂亮的外貌，是武器，是旗帜，是一种防御，也是一封推荐信。

讲究服饰也是一种束缚，而且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这代价如此之高，以致百货商店的侦探不时抓到偷香水、丝袜、内衣之类东西的有钱女人。许多妇女为了穿得好，沦为妓女或接受钱财方面的“帮助”；打扮使她们需要额外的金钱；穿得好还需要时间和心思；但有时也是一件带有建设性意味的任务。在这个领域里，也象在家用品市场上，可能发现一些隐秘的宝藏，可以讨价还价，施展计谋，组织配合，独出心裁。如果她聪明，可能给自己设计裁制服装。减价日是一种冒险有趣的经历。一件新衣服是一个庆典。化妆和做头发可以代替艺术品的创造。今天的妇女，远比从前更懂得通过运动、体操、沐浴、按摩和保健食品来发展身体的乐趣；她决定她的体重、体形和皮肤的颜色应该怎样。现代的美学观念，允许她把美丽和活动结合起来：她有权加强肌肉，防止变胖；在体育中她找到了作为主体的自我肯定并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她的肉体；但这种解放很容易又退落回依附性中。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战胜了自然本性，但是她又变成了制片人手中的被动物品。

除了这类女人引以为乐的胜利之外，保持吸引力，就象保持家庭一样，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因为她的身体

是随着时间衰退的东西。在《输了的人》中，科利特·奥德利描写了这种搏斗，这种搏斗可以比拟为家庭妇女和灰尘的战斗：

> 已经不再是坚实的青春之躯了；手臂和大腿的肌肉形状在松弛的皮肤覆盖着的脂肪层下显现出来。在烦恼中，她重新修改她的日程表：早晨做半个小时健身操，晚上睡觉前做十五分钟按摩。她开始查阅医学书籍和时装杂志，注意她的腰围。她制作果子汁喝，她不时吃些缓泻药，洗碗碟时戴上橡皮手套。她的两件大事——恢复身体的青春和刷新擦亮她的家——终于合而为一……世界仿佛停顿了，超越了衰老和腐败……在游泳池里，她认真上课以求改善体形，美容杂志里常常重提重讲的诀窍，也吸引她的注意。金格·罗吉吐露秘密说："每天早晨我用刷子抚捋头发一百次，这整整用掉我两分半钟的时间，于是我的头发象丝一样……"怎样使你的足踝清瘦呢：每天做三十次足尖站立动作；这个练习只用一分钟，但是一分钟对于一天来说算得了什么呢？另外还要用油洗指甲，用柠檬洗手，或者压碎草莓敷在面颊上。

这些常规程序使美容和维护服饰成为单调乏味的事情。

所有活的生长物都会有的贬值的恐惧，引起了某些冷感的、受挫的妇女的惶惑。她们竭力保养自己，就象保养家俱和保存罐头食品一样。这种反面的固执使她们成为自身存在的敌人，并且对其他一切怀有敌意：好吃的东西会破坏体形，酒会损害肤色，笑得太多会生皱纹，太阳会伤害皮肤，睡得太多使人迟钝，工作使人憔悴，性爱使眼睛下面生出黑圈，接吻使面颊发红，爱抚使胸部变形，拥抱使肉体凋零，生育改变了体形和面容。我们知道，小孩子被妈妈的舞会袍子吸引过来，年轻的母亲会气愤地把他赶开："别用你的脏手碰我，你弄脏了我的衣服！"卖弄风情的女人也同样会把急切的丈夫或情人推开。她要在男人、世界和时间面前保护自己，就象用家俱套来保护家俱。

但是，这些预防方法，都不能阻挡白发和鱼尾纹的出现。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女人就知道命运是无法避免的。不管她多么小心，意外事故总会发生：酒洒在衣服上，香烟烧坏了衣服；于是，舞厅里那个带着骄傲的笑容的华贵欢乐的人儿忽然消失了，因为她变得满脸是管家婆的严肃表情。她忽然明白了，她的服装不应该是一束只能短暂燃烧的烟火，只为了片刻的辉煌。它是一种财富，一种资本，一种投资；弄坏了是一种牺牲，丢失了是一种灾祸。污点、眼泪、拙劣的衣服做工、难看的发式，是比烤肉烧焦和花瓶打破更为严重的大灾祸，因为时髦的女人不仅把自己投射进物质中，而且愿意把自己也当作物质，于是，她感到受到了直接的威

胁。她和做衣服、做帽子的人的关系，她的烦躁和苛求，所有这些表明了她的严肃态度和不安全感。一件成功的袍子，使她成为她梦中的人物；但是，穿一件旧衣服或一件不得体的衣服，她感到自己成了被放逐的人。玛丽·巴斯克赛夫告诉我们，她的幽默感、举止和面部表情，全都取决于她的袍子。当她穿得不得体时，她感到尴尬、平庸、丢脸。许多女人宁可失去机会，也不肯穿得不好而赴宴，虽然可能并没有人注意到她。

然而，有些妇女声言她们是"为她们自己打扮"，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自我陶醉之中，也隐隐含有被人观赏的希望。喜欢打扮的女人，如果不被人瞧见，她是很难感到满足的，除非她是精神病人。她们通常需要见证人。结婚十年之后，托尔斯泰夫人依然希望被人赞美，而且希望让她的丈夫看到她被人赞美。她喜欢蝴蝶结和小装饰品，喜欢卷头发；如果没有人注意，怎么办？她觉得自己要哭起来了。

丈夫并不能很好充当见证人的角色。在这方面，他的要求是暧昧的。如果他的妻子太迷人，他会嫉妒；每个丈夫或多或少有点象甘大略王；他要他的妻子为他增光，要优雅，要漂亮，至少也要"过得去"；不然，他会在朋友辈中遭到嘲笑并自惭形秽。我们已经知道，在婚姻中，性爱和社会价值是难以调和的，这种冲突在这里也反映出来。妻子过分强调她的性的吸引力，在丈夫看来，是一种低级趣味。但他不准许的这种大胆作风，如果发生在别的妇女身上，他却可能觉

得很有魅力。他的这种不准许，损害了他在其他方面的感受欲望。如果他的妻子打扮得朴素节制，他虽赞成，却也对她失去热情，他觉得她缺乏吸引力，而且责备她太呆板。因为他几乎不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她；他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看她。“人家会说她些什么？”他的猜测往往并不正确，因为他也用丈夫的观点来揣度别人。

最使妻子愤怒的，是看到丈夫赞美别的女人的服装举止并对自己加以批评。也可以说，他对她过于接近，以致熟视无睹，对他来说，她的脸总是一个样子；他不会注意到她的新衣服或新发式。甚至连满怀爱意的丈夫或热烈的情人，也常常对妇女的服装漠不关心。如果他强烈喜欢她的裸体，那么最合适的衣服也只不过用来遮蔽身体而已；并且，即使她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她对他来说也依然可爱，一如她穿得光彩夺目之时。如果他不再爱她，再讨人喜欢的衣服也将毫无作用。衣服可能是征服的武器，但不是防御的武器；服装的艺术是为了创造海市蜃楼，为眼睛提供一种假想的东西；但是在肉体的拥抱中，如同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海市蜃楼都淡化消失了；夫妻感情好象肉体之爱，存在于现实的阶段中。女人不为她爱的男人打扮。在一部小说中，多萝西·帕克描写一个年轻妻子焦急不安地等待丈夫归来，她决定要为这件事打扮得漂漂亮亮：

她买了一件新衣服，黑色的——因为他喜欢黑

色——式样简单的——他喜欢朴素的式样——真贵，贵得她不愿意想它的价格……

“你真的喜欢我的衣服吗？”

“哦，是的，”他说，“我向来喜欢你穿的这件衣服。”

她呆若木鸡。“这件衣服，”她咬牙切齿地说，“是新的，商标都还在，我以前从来没有穿过。如果你想知道，我是特地为你回来才买的。”

“对不起，亲爱的，”他说，“哦，对了，现在我知道了，它根本不是另外那件。我认为它很好。我喜欢你穿黑的。”

“这时候，”她说，“我真希望我是为别的原因穿这件衣服的。”

常有人说，妇女打扮是为了引起别的妇女的妒忌，并且，这种妒忌被当作成功的实际标志，但是，并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获得艳羡或赞美，她得到了对她的美貌、优雅和趣味，也就是对她自身的绝对肯定；她以表现自己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这样，她甘受痛苦的依赖；家务工作的贡献，即使不被承认，总有些实际的用处；卖弄风情的努力，如果引不起别人的注意，岂不全然白费力气。她寻求一种确实的自身价值，但这种对“绝对”的需求，使得她的探索充满烦恼；一句批评就可以判定一顶帽子肯定是丑陋的，一声赞美就使她沾

沾自喜，一次故障就使她颓然若失；当这种“绝对”只能通过无穷无尽的场合来体现的时候，她将从来得不到终极的成功。这就是时髦妇女及卖弄风骚者总是战战兢兢的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漂亮而备受赞美的妇女，也可能悲伤地认为她们既不美丽也不优雅；她们缺乏一个未知的法官的明确的终极认可；因为她们追求的那种永恒存在状况是无法实现的。那种超等的时髦妇女确实少有，她们自身是优雅美丽法则的具体体现，谁也不能说她们有错，因为规定成功和失败标准的是她们自己；如果她们的法则能够持久，她们就会被看作成功的模特儿。不幸的是，这种成功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

打扮也表示要外出作客，这是打扮的初始目的。一个女人会从一家客厅转到另一家客厅炫耀她的新衣服，或者邀请别的妇女吃茶点看她的衣服。在某些特别正式的场合中，她的丈夫由于她的要求陪着她。但通常她履行“社交职责”时，他在工作。这种折磨人的职责无聊得要死，这种无聊已经被一千次地描写过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为了社会“义务”而聚到一起时，没有任何值得谈论的事情可说。没有共同的兴趣把律师的妻子和医生的妻子，或者把多依医生的妻子和罗依医生的妻子联系起来。在一般的谈话中讲些孩子们的打扮和家庭的困难又不合适，所以妇女们只好归并到评论天气和最近的流行书籍，或者说些从她们的丈夫那里转借来的一般性想法。在法国，妇女在家请客的习俗已经渐渐淘汰了，但各种不同形式的拜访约会，令人厌烦，却依然存在。在美

国，常常用桥牌代替谈话，但是这对喜欢打牌的妇女才有意义。

然而，社交生活虽然是一种令人厌烦的常规职责的实行，却也有更具吸引力的另一面。接待客人，不仅包括把客人迎入自己家中，还包括把寓所改变为一个迷人的领地。社交的功能，既是聚会，又是仪式。女主人展览她的珍藏：银器、亚麻织物、玻璃制品。她安排插花。短暂而无用的花儿，是这种以昂贵和奢华为标志的聚会的毫无必要的浪费的典型代表。在花瓶中开过就谢的花朵，代替了为庆祝而烧的篝火、熏香和没药、祭酒和祭品。桌子上摆满了精致的食品和昂贵的葡萄酒。这在满足宾客需要的同时，表现了慷慨的热情；就餐变成了一种神秘的仪式。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韦夫人》中强调了问题的这一方面：

> 戴白帽系围裙的女仆，以及那些虽不必需，但却深谙伦敦西区贵夫人惯于进行的制造神秘豪华气氛之道的侍女，开始无声地灵敏地在摆动的门中进进出出，从一点半忙到两点。有人一挥手，交通停止了。首先，期盼幻想中的食物出现了——这些都不必付钱，然后，桌子上摆开了玻璃杯、银餐具、小垫子和红果酱。奶油比目鱼，肉桂鸡汤。明亮的炉火燃烧着；喝过酒和咖啡(不付钱)，那些若有所思、文雅深沉的眼睛变得活泼愉快了。

主持这些奇迹似的宴会的女人，骄傲地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完美时刻的创造者，幸福和快乐的赐予者。正是她把客人们聚会在一起。她是欢乐与和谐的免费的源泉。

这是达洛韦太太感觉到的：

> 如果彼得对她说："是的，是的，但是，你的宴会，你的那些宴会有什么意义呢？"她能说的全部话也就是（她也不指望能被理解）：这就是请客嘛……大家聚一聚……。她能长久不断地感觉到请客的意义。她也感到浪费，她也感到遗憾，但是她感到只有这种方式能使人们聚拢来，所以，她请客。请客是一种聚会，是一种创造，但是为谁呢？
>
> 也许就是为请客而请客吧。无论如何，这是她的一种才能，而她又没有别的事可做……
>
> 每个人都可以请客。但是她总有点钦佩请客的人。她情不自禁地感到，这次毕竟是她办成了这件事。

如果纯粹只是一种向别人提供服务的慷慨行为，这种宴会就是一个真正的宴会。但是，社交惯例很快就使庆典变成制度，礼赠变成职责，宴会变成仪式。享受宴会之际，客人被迫提醒自己必须回请主人；她不时抱怨她被款待得太过份

了。“某某就是想向我们炫耀”，她酸溜溜地跟丈夫说。例如，我被告知，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葡萄牙的一个小镇里，茶会变成了非常昂贵的聚会，因为每次聚会，女主人都感到自己有义务让茶点的质量和数量都超过上一次；茶会代价越来越高，以致有一天妇女们一致同意以后除了茶水，茶会上不吃其他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宴会失去了它的慷慨高尚，成为一种负担。节日宴会用品只会带来麻烦：玻璃器皿和桌布必须小心照料，香槟酒和糖要准备充足；一只杯子打破了，椅垫烧坏了，都意味着灾难；第二天还得打扫清理，物归原位。妻子害怕这些额外的工作。家庭主妇的命运注定了她要经受无数服从。她服从于奶蛋酥和烤肉，她服从于卖肉者和厨师，她服从于为某些小故障皱着眉头的丈夫，她布置家具、准备美酒，判定宴会成功与否，也表明她服从于她的客人。

只有那些慷慨而自信的妇女，才能安详地经受这种考验。成功能给她们带来极大的满足。但是很多妇女，象达洛韦夫人一样，喜爱由宴会的辉煌和兴奋而带来的那些胜利，那些表面的东西，同时，也感觉到其中的空虚。一个女人，如果把宴会看得太重，就不能真正享受到它的乐趣；另外，她将受到永远满足不了的虚荣心的折磨。而且，也只有极少数的妇女能以社交活动消磨生命。那些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社交的女人，通常不仅把宴会当作自我崇拜的祭礼，而且超越了宴会生活走向更高的目标。真正的沙龙具有一种文学性质

或政治性质。妇女通过这种方式努力超过男人并且发挥个人的作用。她们逃离了一般已婚妇女的境况。已婚妇女即使在时而被赐予的短暂的欢乐之中，也得不到自我实现，那种欢乐对她来说，常常只意味着变相的疲劳。社交生活要求她“装门面”，她就把自己展览出来，而不能建立她和他人之间的真正交往。社交活动没有把她带出孤立的境况。

“想来令人伤心，”米什莱写道，“女人，相对的人，只能以配偶的身份生活着，经常比男人更为孤独。男人可以到处交朋友，接触新人，她却除家以外，一无所有。家庭是一个压倒性的负担，所有的重量都压在她身上。”事实上，处于隔绝孤立中的女人，不能了解友谊所包含的共同追求某种目标的快乐；她的工作不费脑筋，她所受的教育既未给她追求独立性的愿望，也未给她使用脑筋的经验，她就在寂寞中过日子。结婚可能使她远离娘家及青年时代的朋友，借助新的朋友或家信来修补这种连根拔的惆怅是困难的。即使住得很近，年轻的妻子和她的娘家之间也可能常常并不存在真正的亲密：母亲和姐妹都不是她真正的朋友。在当代，很多年轻夫妇因为缺乏住房，和他们的父母兄弟等住在一起；但是这种出于无奈的联合对新娘子来说并不总是真正的友情来源。

女人若能建立和保持她与其他女性的友谊，对她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但是，这种友谊和男人之间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男人通过观念和个人兴趣进行交往，女人之间的交往却只是因为她们共同的命运，她们被固有的同谋关系约束到

一起。她最先在她们中间寻找的，是对她们共同拥有的宇宙的肯定。她们并不讨论各自的意见和总体思想，她们交换秘密和食谱，她们结盟创造出一种“反宇宙”，这个“反宇宙”的价值判断将要压倒男性的价值判断。联合起来，她们找到了动摇锁链的力量；她们通过向别人承认她们的冷感来否定男人的性优势，同时，嘲笑男人的情欲和愚笨；她们讽刺性地对她们的丈夫和一般的男人在道德和智力方面的优越表示疑问。

她们比较各种经验：怀孕，分娩，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的病。家常的烦恼变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她们的工作是非技术性的；在传授烹调食谱之类的时候，她们赋予它一种口传秘方的庄严。有时候她们也讨论道德问题。妇女杂志上的通讯专栏，提供了她们所讨论的东西的典型例子。人们简直不能想象单为男人开一个“孤独的心”的专栏；男人们在世界上相识，这世界是他们的世界，而女人们却不得不定义、测量、并且探索她们的特殊领域；她们的通讯，偏重于美容顾问、烹调食谱、编织指导之类；她们征求忠告；由于饶舌和自我炫耀的嗜好，有时候真正的焦虑产生了。

妇女知道男人的规范不是她的，男人想当然地认为她不会遵守这些规范，因为男人催逼她做人工流产、私通、犯错误、背叛、说谎等等，这些都是他在正式场合予以谴责的。所以，她约请别的妇女一起制订一套“地方法”，也就是说，一套女性专用的道德规范。女人没完没了地评论或批评她们的朋友的行为，并不只是出于恶意，她们通过评判别人来调

整自己的举止，女人比男人更需要道德的创造力。

女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所包含的真诚性，给予这种关系以价值。在男人面前，女人总是在做戏；她半真半假，自欺欺人，接受了她的次等角色地位，通过摹拟、服装和台词为男人扮演一个假想的人物。这种戏剧表演，需要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女人和丈夫或情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多多少少觉察到："我不是我自己了。"男性的世界是粗鲁的，锋利的，声音太响，眼光太野，触觉毛糙。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好象是在剧场的后台；她正在擦亮刀枪，但还未登战斗的舞台；她整理服装，涂脂抹粉，布置战术；登台之前，她穿着便服和拖鞋，在边幕外拖延时光；她喜欢这种温暖的、轻松的气氛。在《军帽》中，科来特描写了两个朋友安宁地在一起缝制衣服，讨论衣服的小细节，交换一些小秘密，学习新的化妆方法。和这种安宁成为对照的，是帮一个朋友准备会见男朋友的情景。那种气氛要严肃得多；不能流眼泪，以免弄坏脸上的化妆，后悔没买一件衣服，必须去借一双好丝袜，必须决定戴不戴一朵花，有如此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们讨论问题，互相帮助；她们的所作所说，都出自真心。

对一些妇女说来，这种温暖和琐碎的亲昵，比较她们和男人关系的严重虚饰，显得更加可贵。自我崇拜、孤芳自赏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就从别的女人那里寻找自己的影像，就象水仙花迷恋其水中倒影。通过别人的赞美的眼光，她可以赞美她自己的裁剪合身的袍子，她自己的精美的小天地。

结婚以后，她最好的朋友继续充当讨人喜欢的见证人；于是，她似乎可能总是一个值得喜爱的对象和被喜爱的对象。我已经说过，几乎每个年轻姑娘都有同性恋的倾向，丈夫笨拙的拥抱，也往往不能消除这种倾向；妇女们从知心密友那里获得的甜蜜感觉，即源起于这种倾向。而男人中一般是没有这类感觉的。两个女人之间的这种亲密感，可以升华为崇高的情操，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打打闹闹。她们的嬉戏，可能只是闲暇时候的娱乐，比如那些帝王后宫中的女人，她们最关心的只是怎样打发时间，但这种嬉戏，也可能具有更为微妙的原因。

妇女的伙伴感情，很少能上升为真正的友谊。妇女觉得她们的团结比男人的团结更具自发性。在这种团结中，每个人的超越并不表现为指向其他人，因为她们共同面对一个男性的世界，个个都希望为她自己独占他们的价值。她们的关系并不立足于她们的个性，而是立足于她们暂时的共同经验；由此产生了一种彼此敌对的因素。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和家里的妇女都很亲密，因为她需要她们成为她生儿育女的见证人，然而因为她们对彼埃尔来说总是女人，她仍免不了嫉妒她们。女人互相认同，所以她们能互相了解；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她们彼此对立。家庭主妇和女仆之间的亲密关系，超过男人和男仆及司机之间的关系，除非他们是同性恋者；她们交谈私房话，有时候合伙做坏事，但她们之间也存在敌意。女主人既不想做事，又要管头管脚并处处居

功；她要被人认为是不可取代、不可缺少的人物。"如果我不在，事情就出问题。"她挑剔女仆的缺点。如果女仆把事情做得太好，女主人又觉得失去了自己举世无双的满足感。同样，她也和教师、女管家、护士、看孩子的保姆以及给她帮忙的亲戚朋友不断发生争执；她的借口是他们不尊重她的"愿望"，不听从她的"想法"。其实，她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愿望或想法，相反，使她烦恼的正是别人做好了她想做的事情。这是所有毒化家庭生活的家庭争执发生的主要根源：妇女越是缺乏使她的独特资格为人所知的方式，就越要坚持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尤其是在打扮和爱情这两个领域里，女人把别的女人视为敌人。我曾提及年轻姑娘中的竞争类型；这种竞争常常持续终生。我们知道，那些时髦女人，"社交名流"，她们的理想是获得一种绝对的价值；如果失去光彩，她感到非常痛苦；她怕看到别人头上的一点光辉，她想夺取别人得到的任何赞美；如果"绝对"并不意味着独一无二，它是什么？一个处于真诚的恋爱之中的妇女，因为控制了爱人的心而心满意足；她不会嫉妒女友的更大成功，但是她感到自己的爱情受到威胁。事实上，女人被她最好的女友出卖，并不仅仅只是文学中的老套子；两个女人越是亲密，她们的双重性就变得越加危险。要好的女友被邀了解种种恋爱的情况；女友也被那个已经迷住了她的朋友的男人所吸引；于是她不想再仅仅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虽然不久以前她还同意充当顾问。

很多妇女一旦开始恋爱，就深谋远虑地避开她的亲密女友。这种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使得妇女之间难以建立坦率真诚的共同感情。男人的阴影总是罩在她们头上。即使男人不被提及，也象圣约翰·帕西所说："我们虽不提及太阳，太阳总在我们头上。"

女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们想报复男人，给他设置陷阱，讥咒他，辱骂他——但是她们同时等待他。只要她们滞留于没有男人的地方，她们就感到茫然，感到乏味厌倦。没有男人的地方对她们来说就是地狱，这个地狱依然保存着一点点母亲胸中的温暖，然而它毕竟是地狱。只有在妇女预先知道快能出狱的情况下，她们会高高兴兴地在这里嬉戏玩耍。她熏熏然于浴室的潮湿温暖之中，只是因为她想象着她马上就要进入灯火辉煌的客厅。妇女是监禁中的伙伴，她们互相帮助忍受监禁，甚至互相帮助逃离监禁；但是，她们的解放者仍将来自男人世界。

对多数妇女来说，男性的世界在她们婚后依然保持它的魅力，只是丈夫失去了他的威望；妻子发现纯粹的男人本质降了级。但男人依然是宇宙的真理，是超级权威，是奇迹，是主人，是眼睛，是俘获物，是欢乐，是冒险，是救世主；他依然是超越的化身，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最忠实的妻子，也决不会同意放弃这个奇迹并且把自己关进一个偶然的、有限的个人所组成的迟钝沉闷的结合之中。从童年时代开始，她就一直迫切需要一只指引她的手。当她的丈夫不能承担这

种角色时，她就转向别的男人。有时候，她的父亲、兄弟、叔叔，或者别的亲戚，某个老朋友，能够保持他的威望；她将依靠他。

有两种男人，神父和医生，由于职业的原因，成为顾问和可以向之吐露秘密的人。前者由于不收费而更具优越性；他们听忏悔时，无法防止信徒们东拉西扯闲谈；他们尽量避开那些令人讨厌的人，但是引导这些迷途羔羊走上道德之路是他们的职责；由于妇女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由于教会努力利用她们，这种职责就越来越迫切。这些“良心指导者”们指定悔罪者们的政治意见并控制她们的投票。很多丈夫对他们干涉婚姻生活非常愤怒，因为听忏悔的神父对卧室里的事情说长道短。神父对孩子的教育也感兴趣；他对妻子如何与丈夫相处提出忠告。总是把男人当作神仙崇拜的女人，心醉神迷地跪在这个作为上帝在尘世中的代理人的男人面前。

医生因为是收费的，所以较少受干扰，而且可以对那些硬性闯来的顾客闭门拒纳。但是他受到更加特别更加顽固的干扰；被那些高情欲的女人追逐的男人，四分之三是医生；显露身体于男人面前，对不少妇女来说，产生了一种显露的快感。斯坦克尔报告了很多这一类的情况；特别是一些老处女，为一点微小的理由就到医生那里要求做“一次彻底的检查”，或者，离开一个妇科医生又找另一个，要求“按摩”或“治疗”；有些冷感的妻子，在医学检查中才体验了性高潮。

妇女容易以为，她曾显露自己于其前的男人，会对她迷人的肉体和美丽的灵魂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在病态的情况下，她使自己相信医生或神父爱上她了。即使她是正常的女人，也会感到一种微妙的关系存在于这种男人和她之间；她乐意听从他的命令；有时候，更进一层，她得到了一种帮助她接受她不得不过的生活的安全感。

然而，有些妻子，对于把道德权威作为存在支柱的情况不能满足；她们深感需要一种浪漫主义的提升。如果她们既不想欺骗丈夫，也不想离开丈夫，她们就象年轻姑娘惧怕有血有肉的男人那样，让自己沉浸在想象的激情中。斯坦克尔给出一些例子："一个受尊敬的上流社会的已婚妇女，爱上了一个歌剧院的男高音。她送花和短笺给他，买他的照片，梦见他。但是当她有机会会见他时，她没有去；她不想要他这个人；仅仅只想爱着他，同时，继续做一个忠实的妻子。另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著名男演员，在房间里挂满了他的照片和有关资料，他死了，她为他悲伤了一年。

我们忘不了电影演员鲁道夫·凡洛提诺死时的纷纷泪雨。已婚妇女和年轻姑娘崇拜电影上的英雄。在独处的快乐和夫妻生活的奇幻境地中她们想起了他们，他们复活了她们某些童年的记忆，扮演着祖父、兄弟、教师之类的角色。

但是，妻子周围也确有一些活生生的男人；不管她在性方面是满足的、冷感的、还是受挫的，除了少数爱得彻底并绝对排外者，她对那些男人的赞许看得很重。丈夫习以为常

的目光，已不再具有激发她对自己产生想象的力量；她需要依然充满神秘的眼睛把她当作神秘来发现。她必须在至高至贵的意识中获取自信心，才能翻新她的退了色的照片，才能带回她那举世无双的嘴角的酒涡和睫毛的颤动。被追求，被爱，她就是值得追求的，就是可爱的。如果她的婚姻美满和顺，她从其他男人身上寻找的不过是虚荣心的满足；她邀请他们参加她的自我崇拜；她情不自禁、心甘情愿地梦想着不合法的爱情，想着：“只要我愿意……。”她宁可使很多崇拜者着迷，却不愿和其中的一个人过于接近；她比年轻姑娘少了羞涩，多了热情，她向男性卖弄风情，要求男性证实她确有价值和魅力；她常常非常大胆，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停泊地——家，并且已经成功地征服了一个男人。她进行这种游戏，没有什么大的期望，却也不冒大的风险。

在一段或长或短时期的忠诚之后，妻子可能不再把自己的行为限于调笑取乐和卖弄风情。她决定欺骗丈夫往往出于愤恨。阿德勒认为妇女的不忠实永远是一种报复的手段。这话说得太过，但是，毋庸置疑，妇女常常较少屈从于情人的诱惑，较多折服于反抗丈夫的愿望：“他又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男人——别人也会发现我的吸引力——我不是他的奴隶；他自认为聪明，但是他也可被愚弄。”被侮慢的丈夫可能在妻子眼中仍然保持其重要性；正象年轻姑娘有时用找男朋友的方法来找父母的麻烦，目的是违抗父母，维护自己。于是，一个心怀怨恨的妻子找一个情夫，把他当作知己，当作她自命

为牺牲品的见证人，当作贬抑丈夫的共犯。她不断和他谈论她的丈夫，鼓励情人对丈夫的轻蔑；除非情人能很好扮演他的角色，否则她可能发脾气掉头而去回到丈夫那里或另找安慰。但是，对丈夫的失望，常常比对丈夫的愤恨更能使妇女投入情人怀中；她在婚姻中找不到爱情，而放弃青年时代期望的种种欢乐又极其困难。由于被剥夺了情欲的满足而灰心的妇女，被否定了感情的自由和个性的妇女，婚姻以不可避免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辩证关系，把她们引向通奸。在《论维吉尔的一些诗》中，蒙田说：

从童年时代开始，我们就对她们进行爱的教育。她们的魅力，她们的服装，她们的知识，她们的语言，她们接受的全部训练，都没有别的目的。她们的家庭女教师，除了爱的观念，什么也没让她们记住，即使厌恶她们，也是出于爱心……

试图约束女人如此炽热、如此自然的欲望，多么愚蠢！

恩格斯说：

随着个体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是桂

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杂婚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了。

如果夫妻的性爱激发了妻子的好奇心而又未能满足她，她可能在别人的床上完成她的性教育。如果丈夫成功地唤醒了她的性欲，她也可能想和别人一起享受同样的快乐，因为她没有只依附于他的专一感情。

道德家哀叹对情夫的偏袒。我已经描述了资产阶级文学恢复丈夫形象的地位的意图；他们宣扬，在社会的眼睛里，也就是在别的男人的眼睛里，丈夫比情夫优越。以此维护丈夫的地位，是十分可笑的。问题在于他在妻子眼里怎么样。有两个特点使丈夫被妻子厌恶。第一，他担任了不被感激的“第一个”的角色。传统的处女的要求是矛盾的，她梦想既被侵犯又被尊重，这种矛盾几乎使他注定了要失败。因此她在他的怀里往往是冷漠的。但是和情夫在一起，她已不会再次经验那种恐惧和屈辱。她已不会再因突然袭击而受伤：她知道她期待的是什么；多了坦率，少了反感，她比新婚之夜大方多了，她不再混淆精神的爱和肉体的欲望，不再混淆情操和性感。如果她有了情夫，这个情夫可能正是她真正想要的那个男人。

很清楚，这是她作出自由选择的一个方面。第二个使丈夫处于不利地位的令人生厌的特点是：丈夫往往是被迫接受

的，而不是被选择的。他的妻子接受他，把他作为最后的出路，或者被她的家庭转交给他；无论什么情况，即使她为了爱情嫁给他，她使他成了她的主人；他们的关系成为一种义务，并且，他常常变得象个暴君。当然，在选择情夫的时候，也受环境的限制，但这种关系中毕竟含有自由选择的成份；结婚是一种职责，找情夫是一种奢侈。妻子的同意是因为情夫的乞求，即使他没有爱情，她也至少可以确知他有欲望；他们要的就是这种不按法律的行动。情夫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的魅力和威望不会被日常生活的摩擦变钝；他是分离的，是另一个人。于是，她在他们相会时特别感到她摆脱了平常的自我，发现了生活的新鲜和丰富：她感到自己成为另一个人，一个新的女人。这就是妇女在私通中寻求的：全神贯注，出人意外，通过别人进行自我发泄。关系破裂后，她们感到空虚绝望。珍妮特报告的一些精神病学病例，介绍了在情夫身上寻找精神支柱的女人失去情夫后的情况：

一个三十九岁的女人，被一个作家抛弃，这个作家曾让她分担他的工作达五年之久。她绝望地写道，他是那么丰富，那么专横，以致她可以什么也不想地让他占据她的全部注意力。另一个妇女，三十一岁，和情夫破裂后得了相思病；她希望她是他桌上的墨水瓶，可以正对着看他。她辩解说她从前一直感到无聊；她的丈夫傻头傻脑，缺乏精神消遣，

什么都不懂，不会使她惊奇；他沉闷麻木。但是她的情夫是个令人惊奇的男人，决不在感情上冷冰冰地使人委屈得要命。他大胆机智，镇定沉着，头脑敏捷，使她心向神往。

有的女人只有在刚开始那种不合法关系时才能得到愉悦兴奋的感觉；如果情夫不能立即给她这种欢乐——由于先期的胆怯和互不适应，这是经常可能发生的——她就感到愤恨和厌恶；她可能变得走马灯似的更换情夫，离开一个又找一个。但是，也有一些妇女，婚姻的失败启发她知道了哪一类男人适合于她，她被这种人所吸引，他们之间会维持长久的情爱。她常常发现他的动人之处恰恰在于他属于和她夫丈相反的一种类型。

这也许正象年轻姑娘梦想有一个解救者把她带出家庭，妻子等待着情人带她逃离婚姻的牛轭。情妇一开始说到离婚和结婚，热烈的情夫立即变得冰冷，并且离她而去，这是一个作家经常利用的主题；她经常被他在这方面的小心谨慎伤害，他们已有的关系由于怨恨和敌意而变坏。如果这一私通关系变成稳定的，夫妻关系的种种特征同样将会发生；婚姻的全部缺点将重被发现：厌倦、嫉妒、算计、欺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女人将梦想还有另一个男人能把她从这种固定剧目中营救出去。

由于环境和习俗不同，人们对私通的看法也很不同。在

我们的文明里，宗法的传统依然存在，同是对夫妻关系的不忠实，女人要比男人罪大恶极得多。蒙田评论说：

> 对罪错的评价多么不公正！……我们估量我们的罪错，不是根据罪错的性质，而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因此，把事情弄成了如此不平等的样子。我们的法令的严厉，使得沉溺于此道的女子的罪错，重于其原来的性质，从而陷入了比她们的动机更坏的结果。

我们已经考虑过这种严厉的初始理由：妇女私通可能把别人的儿子带进家里，冒充合法的继承人；丈夫是主人，妻子是他的财产。社会的变迁，生育控制的实行，减少了这种因素的力量。但是惯性使妇女依然处于依附地位，永远存在的禁令依然包围着她。这些东西已深入她的内心；她对丈夫的不轨行为，闭眼不看；她的宗教、道德和她的“妇德”，禁止她做出相同的行为。环境形成的压制，对她比对她的丈夫要严厉得多，特别是在那些小镇上，无论在新大陆还是旧大陆，全都一样。他外出越多，她反抗防范的机会就越多；她冒着丧失名誉和已婚妇女身份的风险。常有人写到妇女逃避监视的计谋。据我所知，在一个旧式的、严厉的葡萄牙小镇上，妇女没有婆婆或小姑子的陪同，是不能出门的，但是理发师出借房间，让情人们进行短暂的会见。在大城市里，妻

子们没有了监视者；但是新近相识的朋友的小圈子，并不利于不合法感情的产生。仓促而秘密的私通，不能创造出人道的、自由的关系；与私通夹缠在一起的种种欺骗，往往以毁灭掉婚姻的全部尊严而告终。

必须承认，直至今天，那种令人恼怒的老话，“事情对女人来说是不同的”，依然保持着几分真实。这里提到的区别不是天然形成的。女人比男人较少需要性的活动的情况长期延续，但并非必然如此。被压抑的女人，变成泼辣的妻子，虐待狂的母亲，狂热的女管家，不幸而危险的人物。但是无论如何，即使女人的欲望已经减少，认为她们的满足纯属多余，也是毫无理由的。

男女性地位的区别，是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确定的假象或谎言。对女人来说，爱的行动仍然被看作她们为男人提供的一种“服务”，男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她的主人。正如我们所知，他永远可以“搞”一个低等的女人；但是一个女人假如把自己“给”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于她的男人，就是一种“跌价”；她的同意是屈服，是堕落。一个妻子常常欣然接受丈夫还有其他女人的事实；她甚至可能感到荣幸；一些女人还代为牵线。另一方面，妇女在情夫的怀里成了物品，成了战利品，对她的丈夫来说似乎她已被外来的超自然力量占有，她停止属于他，他的她被抢走了。事实上，在床上女人常常感觉到自己希望被支配。由于男性的权威，她趋向于赞同并模仿那完全占有她的、在她看来是男性化身的另一个男

人。丈夫见她成了一个陌生人的传声筒，感到恼怒，也不是无理取闹；他几乎感到他自己也被占有了，也被亵渎了。至于查利尔夫人和年轻的本杰明·科斯坦破裂（据我们所知，他在与两位男子气十足的妇女的关系中充任女性角色），就是由于她不能忍受史达尔夫人对他的可恶影响。只要妇女把自己当作奴隶和她所委身的男人的影子，她就必须承认，她的不忠实较之她丈夫的更具破坏性。

即使她确实维护了她的完整，她也依然要承担在她的情人心里使丈夫遭到损害的风险。一个妻子很可能会感到，屈从于另一个男人，哪怕仅仅只是一次，匆匆忙忙，在沙发上，她也获得了压过她的合法配偶的某种优越感。一个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对情妇的占有权的男人，更有理由认为，他愚弄了她的丈夫。下面是作家常常描写他的女主角审慎地选择一个社会地位低的情夫的原因：她从他那里寻求性的满足，但是她不希望给他压过尊贵的丈夫的优越感。在«男人的命运»中，马拉克思表现了一对夫妻，他们订有协约，各自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当M告诉K她和一个朋友睡觉时，K痛苦地想到那个男人将以为自己已经占有了M；K决定尊重她的独立性，因为他深知没有一个人能够占有任何人；但是，当他想到另一个男人因占有了M而自鸣得意，他感到屈辱，他受到伤害。人们混淆了自由的女人和放荡的女人。情夫自己也易于把自由错当作他可以从中得利的东西；他宁愿相信他的情妇已经屈服，已经身不由己，他已经征服了她，

诱惑了她。一个骄傲的女人可能屈从于她的配偶的虚荣心，但是，她将发现，不得不忍受其尊贵的丈夫的傲慢是一件可憎的事。确实，对一个女人来说，和男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行动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平等没有被广泛承认并具体实现。

无论如何，私通，友谊，社交，都只是婚姻生活中的插曲；这些可能有助于忍耐婚姻生活的约束，却不能打破这些约束。它们都是不健全的逃避，都不能使妇女把她的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七章 由成年到老年

妇女的个人生活史，由于和她的女性功能密切相联，所以比男人更大程度地依赖于她的生理特征；并且，这种特征的曲线，也比男人的更为不规则、不连续。妇女生活的各个时期是破碎的、单调的；但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转折又是急剧陡峭的。她们的危机——发育、停经等等，对她们有很大的决定意义。男人逐渐变老，女人却突然就丧失了女性特点；她比男人较早失去性的吸引力和生育能力。按社会的观点和她自己的观点，正是那些失去了的东西，当初提供了她的存在的合理证据和追求幸福的机会。前途渺茫，她却还有成年人生活的一半左右要过。

“危险的年龄”的标志是某些器官的失调，但是，给予这种生理变化以重要性的，是它们的象征性意义。那些并不把所有一切都押在她们的女性特点上的妇女，对于生理转变期的危机较少敏感；那些在家里或外面从事繁重工作的妇女，还欢迎这种每月一次的负担的消失；乡村妇女，工人的

妻子，一直处于再次怀孕的威胁之下，终于不必再耽这种心了，当然高兴。在这种时候，妇女的不舒适，较少出自身体的变化，较多出自她对身体变化感觉到的焦虑和忧思。这出心理的戏剧，在生理变化还未登场时就开始，并且直到生理变化下场后很久才闭幕。

远在身体发生变故之前，妇女就由于耽心变老而提心吊胆。成年男人专注于事业，他把事业看得比爱情重要；他对性爱的热情已不象年轻时那样急切；面貌和体形的变化不会破坏他的吸引力。相反，妇女通常到三十五岁左右，才最终克服了种种禁忌，情欲达到了充分发展。那时她的欲望最强。她比男人更注重她所拥有的性的价值；为了把握住丈夫并确保他对自己的保护，她必须是富于吸引力的，讨人喜欢的；她只能通过男人的中介来把握这个世界。当她不再能把握住他了，怎么办呢？当她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衰老下去，她这样焦灼地问她自己。她发动了一场战斗。她和衰老斗争。但是，染头发，抹护肤膏，外科整容，都只能稍稍延长她那正在逝去的青春。也许，她至少可以骗骗她的镜子。但是，当那命中注定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袭来，摧毁了青春发育期中建立起来的整个大厦，她感到了死神手指的触摸。

人们可能认为，那些曾经最最热衷于她的青春美丽的女性，这时将是最为紊乱失调的。其实不然：自我崇拜者，太关注自己了，不会不预见到自己不可避免的衰落，并且做好了退隐的准备。她肯定会为身体的变化而痛苦，但是她至少

不会感到意外，于是她很快就将适应自己的新状况。那些一直奉献自己、忘掉自己、自我牺牲的女人，倒会由于这种突然的变故而心慌意乱："我只有一次生命；想想我过去的命运，看看我现在这副样子！"在她身上发生了令人惊奇的激烈变化：她以往的职务虽然忙忙碌碌，但也是她的一种避难所，离开这种庇护，她的计划被搅乱了。她突然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地直接面对自己。在那块把她出乎意料绊倒了的里程碑之外，除了安度余生，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她的身体再不能给她什么；她的未实现的梦想和渴望，也永远不会完成。她从这一角度回首过去；这一时刻在她的生活记录簿上画出一条分界线，结算帐本，她为以往生活的狭窄局限感到心寒。

面对她那短暂而又令人失望的过去，她在通往依然难以达到的未来的门槛上，重新采取了少年时代的态度：她拒绝"这就是一切了"的想法；她把生活的贫乏和自己个性的模糊的富有拿来比较。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多多少少经受了生命的痛苦，她似乎觉得她的机会被抢走了，她受了愚弄，糊里糊涂地从青春滑入衰老。她发现她的丈夫，她的环境，她的职务，对她都无价值；她感到她不被欣赏。她从她感到优越的环境中撤退出来；她把她不幸命运的神秘解释，秘密地藏在心里。她努力尝试她未能尝试过的各种可能性。她开始写热切的日记；如果她发现知音，就无休无止地和她谈论自己；她日夜反省她的错失，她的遗憾。正象年轻姑娘梦想

她“将”有的未来，她回想她“也许有过”的过去；她想象着失去的机会，并且编造出过去的浪漫的故事。

儿童时期和发育时期的种种关心都复活了，妇女一遍又一遍地复述她年青时的故事，沉睡已久的对父母、对兄弟姐妹的感情又重新升起。她有时沉溺于梦幻和忧伤。她常常突然着手弥补自己过去所失落的一切。她显示出她通过和自己命运的对照而发现的个性。她指出命运的是非曲直，她迫切要求公正。她因有经验而成熟，她感到她有能力作出影响；她愿意再次行动。首当其冲，她急切地试图拉回飞走的时间。良母型的妇女会断言她依然还能生一个孩子，她激情洋溢地试图再次创造生命。风流的妇女，竭力再诱捕一个情人。卖弄风情的妇女比以往更急于讨人喜欢。异口同声，她们宣称她们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如此年青。她们想要说服别人，时光的流逝从未真正影响她们；她们开始“穿得年轻”，她们装出幼稚的样子。上了年纪的妇女清楚地知道，如果她不再是性爱的对象，那么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身体失去吸引力，也因为她的过去、她的经历使她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不管她愿不愿意。在她自己的记录中，她斗争过，爱过，向往过，痛苦过，享受过。这种独立性是使人害怕的，她试图否认自己有这种独立性；她夸大自己的女性气质，她修饰自己，她用香水，她使自己非常迷人，非常文雅，非常纯真。她在男人面前象小孩子一样地说话，向男人投送天真的、崇拜的眼光，她滔滔不绝地谈论她是小姑娘时候的事情；她喊

喊喳喳地说话，她拍手，她突然笑出声来；并且，她带着某种真诚表演这出喜剧。她觉得她正在又一次开始生活。

但是，重新开始生活纯属空想；她看不到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让她以自由并有效的方法去追求。她的行动古怪、不连贯、无结果，因为她只能以象征性的方式弥补过去的错误和失败。在事情还没有变得太晚之前，这个年龄的妇女试图实现她们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愿望：她可能回到钢琴旁，可能开始进行雕塑、写作、旅行，她可能学习滑雪或研究外国语。趁着时犹未迟，她张开双臂欢迎她先前反对的各种东西。她承认了对以前尚能容忍的丈夫的厌恶，并且对他冷漠；或者，正好相反，她让从前压抑了的热情自由发挥，并且以她的要求压倒丈夫。普遍存在的同性恋倾向现在变得明显了。她把这种倾向投向女儿；但是有时也投向某个女友。在«性、生活和信仰»中，罗姆·兰道讲了下面的事情，这是当事人吐露给他的：

X夫人，年近五十，结婚已二十五年，有三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她是社交和慈善事业中的出名人物。她在伦敦遇到比她小十岁并和她有共同兴趣的Y夫人。Y夫人邀请她去作客。作客的第二天晚上，X夫人忽然发现自己满怀激情地拥抱了女主人；她诉说了她的惊恐之情并又在Y夫人家过了一夜，然后心惊胆战地回家去。在此之前，她对同性

恋一无所知，不晓得还有“这种事情”。她强烈想念Y夫人，并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丈夫的亲吻和拥抱令人讨厌。她决定再去看她的女友，“把事情弄清楚”，但是她的热情有增无减；她们之间的关系比她经验过的所有事情都令人愉快。她被犯罪感折磨，于是去找医生，希望对她的情况作出“科学的解释”或道德方面的辩护。

在这个病例中，受治疗者屈从于自然的冲动，并且深受烦扰。但是经常还有妇女有意寻找机会体验她没有体验过的浪漫故事，以免她很快就要老去，也就无从体验了。她离家出走，有时是因为感到家庭对她没有价值，因为她想单独生活，有时则是为了寻找奇遇。如果她找到了，就热烈地投身其中。这是斯坦克尔的病例之一：

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结婚已二十年并有成年子女，开始感到她不被领情并且虚掷了她的生命。她开始从事新的活动，其中之一是到山里滑雪。她在那里遇到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并成为他的情妇。

在关于名誉和体面的强大传统影响下的妇女，一般不会作出激烈明确的行动。但是她的梦境中却往往布满性爱的幽灵，即使在她清醒的时候，这些幽灵也缠着她；她对她的子

女表现出一种狂热的、肉麻的爱；她对儿子怀有乱伦的念头；她落入情网，偷偷地爱上一个又一个年轻男人；象少女一样，被强奸的念头在她头脑中作祟；她也知道她有当妓女的疯狂欲望。既盼又怕的矛盾心理造成了可能导致精神病的焦虑；她以古怪的行为使亲属们愤慨震惊，那些行为实际上只是她想象中生活的表现。

在这混乱失调的时期，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分界，比在青春发育时期更不清楚。上了年纪的妇女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感觉到个性的失落。这种失落感使她全然丧失了客观的态度。那种完全健康却又濒临死亡的人说，他们经历了一种奇特的双重感。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意识的、活动的、自由的人时，那个被命运操纵的被动对象仿佛成了另一个人；那个被汽车撞倒的人不是我。"这不可能是我，我不是这个镜子里映照出来的老太婆！"那些"从来没感到自己如此年轻"，又从来没看到自己如此衰老的妇女，不能成功地调和她自己的两个方面。时间流逝，人事变迁，如在梦中。现实淡化隐退，和幻觉模糊成一片。她宁愿相信她心里的幻景而不愿相信那个背叛了她的陌生世界。由于这时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爱情，她产生自己被爱的幻觉是自然的事情。患相思病的人中，十之八九是妇女，而且大多是四、五十岁的妇女。

然而，不能证明所有的人都会如此大胆地跳越现实的藩篱。很多妇女，甚至否定她们梦想的全部人类之爱，向上帝

求助；确实有些风骚的女人，放荡的女人，在停经之后做了修女；正值人生之秋的妇女沉迷于命运不测、无人感恩的模糊想法，开始在宗教中寻找一种理性的统一。这些信徒把她搞糟了的生活当作上帝对她的考验。她的灵魂从不幸之中获得罕见的美德，使她配得上仁慈的上帝的恩遇。她容易相信她从天国取得灵感，甚至相信她受天国派遣承担紧急使命。

由于几乎完全丧失了现实感，这种危机期间的妇女听得进各类建议，因此神父或牧师可以对她的灵魂作出强有力的影响。她热心接受最成问题的权威；她是各种教派、教士、预言家、巫医、以及各种各样骗子的预先注定的俘获品。这不仅仅因为她由于和现实世界脱节而丧失了全部批判能力，而且因为她急于获得终极真理：她需要一下子就能拯救她并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她比从前更加蔑视显然对她不适用的逻辑推理；只有那些意义特别的东西使她信服：天启、神示、预言、奇迹之类。她的发现常常引导她行动，她投身于商业、企业或冒险事业，那是由于某些顾问或她的内心声音的建议。在另一些情况下，她满足于把自己当作绝对真理和智慧的贮藏器。

不论行动还是沉思，她都情绪高昂。停经危机把她的生活一断为二；这种断裂给了妇女一种“新生活”的幻觉；“另一个”时代在她面前展开了，于是，她带着皈依宗教的热情投入其中；她皈依于爱、上帝、艺术和人道精神；在这些存在中她失去了自己，也扩大了自己。她死了，又活了，她以看透彼岸世界秘密的眼睛看待现实世界，她相信她已升

上一个梦想不到的高度。

但是，世界并未发生变化，顶峰依然高不可及；她接到的神示，光彩夺目，却无法破译；内心的光辉黯淡了；站在镜子前的女人一天老似一天。沮丧悲哀的岁月接替了兴高采烈的时刻。器官组织表现出的变化节奏，是因为女性激素分泌衰退并以脑垂体腺的过分活跃作为补偿；但是最重要的是支配情绪变化的心理状态。作为女人的焦虑，她的幻觉和狂热，都是一种防御性的反应，用以反抗高高在上统治着她的命运。梗在妇女喉咙口的最大痛苦是她还未死掉，她的生活却已过完了。她不再和绝望搏斗，她选择了麻醉自己。她没完没了地唠叨她的错误，她的遗憾，她的耻辱；她假想出她的亲戚和邻居设置阴谋诡计反对她；如果有个姐妹或同龄朋友和她非常接近，她们就一起编造被迫害的妄想。尤其是她会病态地猜疑她的丈夫，或者把这种嫉妒指向他的朋友们，她的姐妹们，他的事业；真真假假地，她认为一些对手对她的所有灾难负有责任。这种由病态心理引起的猜疑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的妇女身上最为显著。

对那些不肯承认她已变老的妇女来说，停经带来的苦恼，常常会延续到老死为止。如果她除了利用容貌迷人外一无所能，她将步步为营地为保存容貌而战斗。如果她情欲仍旺，这也并非少见，她将进行疯狂的斗争。被问及什么年纪的女人才不为容颜体形苦恼时，梅特妮公主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才六十五岁。"按照蒙太尼的说法，婚姻给予妇女

的只是“小补充”，随着她变老，婚姻变得越来越少治疗效力；人到中年，她往往要为青年时代的禁忌和冷漠付出代价；当她终于知道欲望的热度时，她的丈夫却已对她的长期冷漠有所适应。习以为常和时间流逝使她失去了吸引力，妻子已经少有机会重燃婚姻的火焰。饱受磨难之后，她决定要“过自己的生活”，她减少了由于道德原因引起的顾忌——如果她曾经有过的话——开始寻找情夫；但是情夫依然得靠她自己去找。她施展谋略，乔妆打扮，她把礼貌、友情和感激，都变成陷阱。她向青年男人进攻，不只因为喜欢清新的肉体；她只能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种没有利害关系的热情，年轻人对母亲似的情妇产生的那种热情。她变得富于侵犯性，年轻人的驯顺也象他们的俊美外貌一样常常博得老年妇女的欢心；史达尔夫人年过四十，选中的是那些没有经验、仰慕她的名声的年轻人。无论如何，胆怯的新手总是容易被捕获的。

当诱惑和计谋都无效时，不屈不挠的女人还有一手：给钱。有一个大家知道的关于“坎宁维”小刀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说明了这种贪得无厌的女妖魔的命运：一个年轻女人，向她的每个情夫索取一把“坎宁维”小刀，作为对她的回报。她把小刀收藏在碗橱里。有一天，碗橱装满了。于是，从这天开始，每一次情夫们从她那里得意洋洋地拿走一把小刀作为礼物。很快碗橱又空了；所有的小刀都被拿完后，她不得不去买了一些放在橱中。有些妇女对这种情况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她们有过索取小刀的时候，现在转向“给出坎

宁维"了。在她们眼里，金钱正好扮演了和妓女索取的嫖帐相对的角色，并且同样具有净化作用。金钱把男人转变为一种工具并使女人得到她年轻时一度骄傲地拒绝过的性爱自由。

这种贴钱的情妇，经常试图收买的，是被爱慕、被崇拜、被尊敬的幻景，她看重罗曼蒂克甚于明晰可见的东西。她甚至使自己相信，她给钱是因为她高兴给，并不是因为她想要什么东西。年轻男人被选为情人，因为她可以为她给他的母性的慷慨感到骄傲。并且，他也有一点"神秘性"，正如在另一种情况下，男人也要受他"帮助"的女人带点那种性质，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赤裸裸的交易就被伪装得暧昧不明了。但是，不真诚的宽容是鲜能长久保持的；两性之间的冲突，变成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决斗。被欺骗被愚弄的女人，担着遭到残酷失败的风险。如果她还聪明，她将及时缴械隐退，即使她的火焰还未完全熄灭。

从妇女承认自己的老迈那天开始，她的处境就变了。在此之前，她依然是个年轻妇女，一心想要和那神秘莫测地毁损她的容貌的噩运斗争；现在她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但是性别却依然完全：一个老女人。那个"危险的年龄"可能已经过去，但是，此后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当她放弃了和时间的斗争时，另一场战役开始了：她必须在地球上保存一席之地。

进入生命的秋天和冬天，妇女摆脱了她的锁链；她凭借年龄优势逃避负担；她已相当了解她的丈夫，以致不再会被他唬住，她巧妙地避开他的拥抱，在他旁边组织她自己的生

活，怀着友善或冷漠，也可能怀着敌意。她可能也准许自己反抗时尚，不再顾忌“人家会说什么”；她摆脱了社交义务，不须照料日常饭食，不须顾及她的容颜。孩子们已经长大，不需要她来照顾，他们将要结婚，将要离开家庭。摆脱了她的种种职责，她终于找到了自由。非常不幸，每一个女人的故事中都重现了我们通过整部妇女历史证实的事实：每一次她找到自由之时，正是她不能使用自由之日。这种重现绝不是偶然的：宗族社会规定的女性功能是服务，于是，只有当她们失去效用时，妇女才能逃脱被奴役状况。年近五十，她依然精力充沛，感到自己有丰富的经验；那正是男人们取得最高、最重要地位的年龄；然而她正被迫退休。她被教会的只是把自己奉献给别人，现在却再也没人想要她的奉献了。没有用处，没有理由，展望她还不得不过的漫长而渺茫的晚年，她抱怨：“没有人需要我！”

她并不马上就落入这种境况。有时候她死乞白赖地缠住丈夫；她用前所未有的过分精心的照顾弄得他透不过气来；但是，婚姻生活已经成为例行公事式的了；不是她知道她对丈夫来说早已不是不可或缺的，就是他已不再值得她为他效力。在老而孤单、不为人需的时候要维护这种共同生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她把希望转向子女；他们的生活还未定型；他们前程广阔；她愿意全心全意地追随他们。有机会迟生孩子的妇女有个好处：当别人已成了老祖母时，她依然是个年轻的母亲。但是，一般来说，妇女在四十和五十岁之间

时，她们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当子女们要离她而去时，也正是她热心致力于借助他们自救的时候。

她的态度变化取决于她是否指望儿子或女儿有助于她实现灵魂的拯救；她通常把殷切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在这里，终于从历史的深处向她走来，她翘首遥望远方的地平线等待这个男人的光荣归来。当新生儿发出第一声啼哭，她就期待着总有一天，他会把他父亲未能给她的珍宝统统倾泻在她面前。以前她打过他罚过他，但这些现在都已忘记。这个她捧在心尖上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了半个上帝，统御世界并支配女人的命运；他是母亲的光荣。他保护她不受丈夫的支配，替她报复了她有过而失去了的情人；他是她的解放者，她的救世主。她重新采用那种注视着迷人的王子的年轻姑娘的炫耀卖弄对待他；当她走在他的旁边，优雅，迷人，她以为自己仿佛是他的姐姐；如果他模仿美国电影里的男主角，跟她开开玩笑，又不失对她的尊敬，她会十分喜悦。怀着既骄傲又谦卑的心情，她承认这个曾是她的婴儿的男子汉的男性优越性。

这种感情到什么程度就将被看作乱伦呢？无疑，当她带着自我满足想象她躺在儿子怀里的时候，“姐姐”一词只是一种对暧昧可疑的胡思乱想的羞怯的遮掩；当她熟睡时，当她心不在焉时，当她做着白日梦时，她有时会想入非非。但是我已经说过，梦和幻想，并不总是意味着对实际行动的隐秘渴求。她们常常自己满足自己，想象的满足就已足够了。

当母亲或多或少把自己假装成儿子的情人似的，这仅仅只是一种游戏。真正意义上的性爱，在这种关系中几乎不存在。

但是母与子也确实形成了一对：母亲从女性意识深处发出对儿子的男性力量的赞美；她怀着恋爱似的热情把自己交托给他，作为回报，她期望自己将升上天去坐在上帝的右边。为了获得这种“圣母升天”感，她给他行动的自由；她以骑士风度承担风险，并且，他对她的需要，就是她得到的酬报。另一方面，母亲感到她因生育而取得不可侵犯的权利；她毫不耽搁地使儿子知道他对她的义务，她把他当作自己的创造，自己的财富。她不象恋爱的女人那样挑剔，她平静多了，虽然这种平静不见得发自真心。她的自动弃权也较少含有被抢劫的忧愤；她生产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儿子，她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个部分：她赞赏儿子的行为，儿子的作品，儿子的优点。她炫耀夸张她的子宫的果实，她把她自己的那个人抬上天去。

由别人代为生活，永远只是不保险的权宜之计。事与愿违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儿子可能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个无赖，是个失败者，是个笨蛋，或者，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母亲却希望他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儿子还是个孩子时就真诚地尊重儿子的人格，在失败中也承认他的自由权，和他一起经受人生的种种危险，这样的母亲很难见到。我们常常遇到的母亲，竭力模仿那些被过分称赞的斯巴达人——兴高采烈地把儿子交付给胜利或者死亡；儿子在这世界上的职

责，似乎只是获得那些她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来为母亲的存在提供理由。母亲要求按照自己的理想设计神童，并要求他确保成功。每一个母亲都想要生出一个英雄，或者天才；但是所有真正的英雄和天才的母亲们，一开始都抱怨儿子伤了她们的心。事实上，反对母亲意愿的儿子倒常常赢得她梦想得到作为个人装饰品的胜利奖杯，当他把奖杯放在她脚边的时候，她甚至不承认它。即使她在原则上赞成儿子的事业，她也象恋爱中的女人一样受到矛盾心理的折磨。为了给他和母亲的生活提供理由，他必须上进，必须出类拔萃，为某个目标奋斗；为了达到目的，他可能弄坏身体或遭受危险。当他提出带有超越性的某种目标时，他向母亲给予的价值观念提出了疑问。她为此感到震惊；她对那个由她生养而特别出色的骨肉至亲具有无上权力；她在剧痛中分娩了他，他无权自毁。“你瘦了，你要病了，要出问题了。”她不断在他耳边叮咛。

她清楚地知道，仅仅要子女活着是不够的，否则生育本身将是不必要的。如果她的子女成为懒汉或懦夫，她第一个表示反对。她从不停止操心。儿子出去打仗，她要他活着回来，并且戴着勋章。她要他在事业上成功，又怕他工作太累。无论他做什么，她都关心，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的事业，自己却帮不上忙。她怕他迷路，怕他失败，怕他虽然成功却毁了健康。即使她对他充满信心，年龄和性别的区别也使母子之间不能进行真正的合作；她对他的工作不熟悉，她也没

有被邀请合作。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妇女总是不满意，即使她特别为儿子骄傲。相信她不但生育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且创立了一个绝对必要的存在，使她回溯往事时感到了生活的意义；然而这些还不够，她需要继续她的善行以度晚年；她想要感到她对儿子的不可或缺。一个无情的结局是：她儿子的妻子将取代她的职能。她对那个“夺走”她的孩子的陌生女人怀有敌意，这种故事常被描写。母亲把兽性的、不自觉的生育过程提升到神性的高度，而且她拒绝承认人的决定作用可能更加重要。在她眼里，价值观念早已确立，它们产生于自然中，产生于历史中：她误解了自由地履行义务的价值。她给了儿子生命，儿子蒙受了她的恩惠，欠了她的债；但是儿子欠那个昨天还素不相识的女人什么呢？一定是某种巫术，使这个女人能迷住了他。这个女人诡计多端，自私自利，居心叵测。母亲不耐烦地等待着这个女人的骗局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古老的神话鼓舞了她的勇气，这个神话说，母亲的手能治得好被坏女人折磨而留下的创伤。她在儿子脸上寻找不愉快的迹象，不管儿子如何否认，她也找得到它们。他若没有怨言，她怜悯他。她批评媳妇，暗中监视媳妇；母亲反对媳妇改变过去的习惯，谴责她侵占了他人权利。

女人按自己的样式来理解她所爱的人的幸福：妻子想要丈夫征服社会；母亲想把儿子拉回童年保护起来。妻子盼望丈夫致富或成名，母亲反对媳妇的计划，认为儿子是娇贵

的，不能过度工作。媳妇怀孕时，这种过去和未来的冲突升级了。“子女的诞生是父母的死亡”——父母变成了祖父母，在这种时候，这一真理显示出它无情的力量：希望依仗儿子生活的母亲认识到他正在宣告她的死亡。她给了他生命；没有她生命也照样延续；她不再是母亲，而仅仅成为生命链条中的一环。她从永恒的偶像的天国中落下来；她只是一个过了时的人了。在这种时候，她的敌意可能病态地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使她精神失常或者使她犯罪。

一般来说，祖母们能克服自己的敌意；但有时候她会固执地认为小孙孙只属于她的儿子，她对小孙孙胡加溺爱；但是年轻的媳妇也坚持孩子是属于她自己的；祖母怀着嫉妒，对婴孩抱着一种典型的意义不明确的爱情，敌意被掩盖在焦灼之下了。

母亲对已经长大的女儿，怀着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她把儿子视为神；她把女儿视为自己的化身。这个化身是可疑的人物，往往损害原体。我们可以在爱伦·坡的故事和王尔德的《格林的画像》中，看到这类例子。对于变化过程中的妇女来说，女儿长大意味着母亲的死去，但母亲让女儿活着。她把鲜花盛开似的女儿理解为自己的毁灭还是复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母亲对女儿的态度。

不少母亲对女儿怀有敌意；她不能接受被那个欠她一条生命的忘恩负义者所取代。风骚的女人嫉妒青春少女，因为后者反衬出她的矫揉造作。这种嫉妒常被注意：她把所有的

女人都看作可恶的竞争者，包括自己的女儿；她把女儿送走，眼不见心不烦，或者设法剥夺她的社交机会。她为自己身为模范妻子和举世无双的母亲而骄傲，不惜为免于废黜而激烈斗争。她总说她的女儿还仅仅是个孩子，她把女儿从事的事业说成是青少年的游戏；女儿太年轻，不宜结婚，太娇弱，不宜生育。如果女儿坚持想要丈夫、家庭和孩子，从来被认为是假装的。母亲无休无止地批评，嘲讽，或者预言女儿将会倒霉。如果可能，她要女儿永远停留在孩子阶段，如果女儿大胆宣称她已长大成人，她就设法破坏这种成人生活。我们看到她在这方面常常成功：很多年轻妇女保持不育，流产，不会看护喂养孩子或料理家务，就因为受了这种有害的影响。夫妻生活破裂了，不幸，孤独，女儿将在母亲权力无上的怀抱里找到避难所。如果女儿反抗，她们将长久对立冲突；受挫折的母亲，常把因女儿的傲慢独立而生的怨气，转嫁到女婿头上。

热衷于把自己等同于女儿的母亲，也并不因此减少了专制味道；她想要凭借她的成熟的经验重度一次青春，挽救过去并且拯救现在。她想要女儿找一个她曾梦想却未得到的如意郎君；在心灵的隐秘的角落里，她会以为自己依然妩媚风流，这位如意郎君娶的是她自己；通过女儿，她将满足她对财富、成就和名声的老愿望。在电影或戏剧中，这种女人被描绘为热烈推动她的子女走上风流骑士的道路；在照看子女的借口下，她们分享子女的生活。我曾经听说，有些人甚至把年

轻姑娘的求婚者带到她自己的床上。但是，女儿很少能长期忍受这种监护；一找到丈夫或可靠的保护人，她就造反了。起初珍爱女婿的岳母变得敌对起来；她以蒙难者自居，叹息人类的忘恩负义；她变成了一个满腹牢骚的母亲。

预见到这种失望，很多妇女对女儿的长大采取冷漠旁观的态度；然而如果真是这样，她们也就从女儿那里得不到任何快乐。一个母亲需要罕见的慷慨和超然的结合，才能在子女的生活中找到能充实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变成他们的暴君或折磨他们。

外祖母对她的外孙子女的感情，是她对女儿的感情的延伸，并且，她往往也会把对女儿的敌意转移到外孙子女身上。一些妇女逼迫被诱奸的女儿堕胎，或者抛弃婴儿，或者杀害婴儿，并不仅仅只为防止出现丑闻，她们也为了剥夺女儿做母亲的权利，顽固地指望保护她们自己的特权。她们甚至准备劝告结了婚的女儿也去堕胎，劝告女儿不给婴儿吃母乳，把婴儿送给别人。她们用冷漠的态度来抹煞这些冒失的小家伙的存在，或者更进一步，她们会不断地骂孩子，惩罚孩子，甚至虐待孩子。

相反，把自己等同于女儿的母亲，常常比女儿还急于得到外孙子女。女儿因未知的小生命的到来而心烦意乱，外祖母却觉得这不过是旧事重演；她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她又是个儿童小床边的年轻少妇了；她重新获得了她的子女已经不再能给予她的支配及占有的愉快。她因停经而放弃了的母性

愿望又奇迹似的实现了；她是真正的母亲，她是看护婴儿的权威；如果把孩子交给她，她会全心全意地照看孩子。然而不幸的是，年轻的妈妈多半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利，权威的外祖母只有屈居助手的位置，那是她当年生孩子时，她的长辈扮演的角色；她感到自己象是被推翻的君主，另外，她还必须考虑女婿的母亲，她对亲家母自然是猜疑的。恶意常常败坏了她对孩子自发的爱心。许多外祖母身上出现的焦虑表明了她们具有矛盾感情：她们喜欢这个属于她们的新生儿，但是她们又对这个小小的陌生人怀着敌意；于是，她们为这种敌意感到惭愧。如果外祖母能对外孙子女保持温暖慈祥而又不要求完全占有他们，她会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特别角色，一个守护神。既无权利也无义务，她对他们的爱纯粹出于仁慈；她不会通过他们耽溺于自我崇拜的梦想，她对他们无所要求，她不用为他们作牺牲，她也不会看得见他们的将来。她爱的只是这个有血有肉的小生命，这些小生命现在正需要保护和照料。她不是他们的教育者；她不必成为正义和法律的化身。这一点，往往是她和外孙子女的父母发生冲突的根源。

可能有些女人没有后代并且对传宗接代缺乏兴趣，由于不必履行和子辈或孙辈之间的天然契约，她常常致力于创造一些人工的关系纽带。她给予年轻人母爱；不管她的爱是否是纯精神的，当她说她的一个被保护者“象儿子”时，她并非全然出于伪善。在那种情况下，母亲的感情，多多少少是

有些爱情色彩的。确实有些人会模仿卢梭《忏悔录》里的华伦夫人，从慷慨资助一个男人、塑造一个男人中取得快乐。她们希望自己成为一种源泉，一种不可或缺的条件，超越他们的生存基础；她们使自己成为她们情人的母亲，也把自己看作他们的母亲，而不是他们的情妇。而那些良母型的女人常常认领一个女孩。这样形成的种种关系分明多多少少带有性的色彩；不论这种关系是纯精神的还是非精神的，从被保护者那里索求的，都是自己的重生和不可思议的返老还童。

女演员、舞蹈家、歌唱家成为教练，塑造学生；女知识分子向她们的门徒灌输思想和学说；虔诚的宗教徒在她周围聚集起一群精神的女儿；卖笑的女人变成了老鸨。她们热衷于这类改变，决非纯粹出于对她们从事的专业的兴趣；她们激情洋溢地寻求的，是使她们的被保护者们成为自己的化身。她们专横的慷慨引起的冲突，几乎就和用血缘纽带联结的母女关系中的冲突一样。有的女人收养孙儿孙女；教母往往扮演了和祖母一样的角色。但是，无论如何，妇女很少能从她们亲生的或抱养的后代身上为晚年找到生活意义：她无法把年轻人的事业真正变为她的。不管她怎样努力不懈、坚持斗争，到头来只能是精疲力尽、大失所望；通常她激流勇退，成为一个谦卑的参与者。年老的母亲和祖母克制她们的统治欲，隐藏她们的愤慨；不管孩子们最终给了她们什么，她们都能满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从孩子那里只得到了微

乎其微的帮助。她们被遗留下来面对着沙漠似的未来，无所事事，形单影只，悔恨，厌倦。

现在我们讨论老龄妇女的悲惨之事，她知道她没用了。中产阶级的妇女，她的全部生活长久以来经常不得不用于解决一个可笑的问题：怎样消磨时间。当孩子们长大成人，丈夫也功成名就的时候，时间还得找个办法才能打发。刺绣编织之类，就是为掩盖她们的空虚懒散而发明的；手拿钩针或毛衣针，她编织，但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生产的东西是无目的的；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无关重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也是个问题。也许她乐于此道，也许可以把这些东西送给朋友，送给慈善机构，或者乱放在壁炉上，或者堆积在桌子上。这不是一种能在无实用目的中表达生活兴趣的游戏；它也难以产生逃避作用，因为她的头脑依然空空如也。这是巴斯卡描写过的“荒谬的娱乐”；妇女们用这些毛衣针和钩针，编织着她空虚的生活。水彩画，音乐，阅读，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无事可做的妇女，专心于这些事情，不是试图拓展她对世界的把握，而是为了消除她的无聊。这种活动，不能开拓未来，只能落回无结果的固有性中；懒散惯了的妇女，打开一本书又把它丢到一边，打开钢琴又把它合上，重新拿起她的手工活计又哈欠连天，最后拿起了电话筒找人闲聊。

事实上，她最喜欢在社交生活中寻找慰藉；她出门去，她访问朋友；象达洛韦夫人一样，把社交看得非常重要。每

一次婚礼，每一次丧礼，她都必到；失去了自己的存在意义，她就和别人作伴。如果她曾是卖弄风情的人，她可能成为长舌妇；她窥视别人，评论别人的行为；她用散布批评和忠告来补偿她的无所事事；未被问及，她就向一个或所有的人提供她的有用经验。她若有钱，她开始举办沙龙，希望以此分享别人的事业和成就。有时她以这种方式树立一套驾御别人的专横法则。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中心、一种启示和感召，创立一个十字路口、一种“格调”，她以为这些就能替代真正的作为。

还有另一些更直接地干预世俗事务的方式。在法国，有慈善机构和几个“协会”；在美国，妇女尤其热衷于组织俱乐部，她们在那里玩桥牌，读书评，颁发文学奖，并且促进社会改革等等。在欧美两洲，这种组织的最大特点是，它们都为组织而组织，为存在而存在。她们的目标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事情的这种状态，正象卡夫卡的寓言所描述的：建筑巴比塔这件事本身无人为之操心；在准备建塔的场地四周，耸立起一个巨大的城镇，为行政事务、附加工程和内部纠纷，就把建塔的经费都用完了。同样，这些协会的妇女，把最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组织她们的机构的这事那事上；她们选举负责人，制定协会章程，进行内部争论，和别的组织争夺声望地位。其实，根本没有人要抢走她们的贫民、病人、伤员或孤儿，但是她们宁肯看着这些人死掉，也不愿把这些人给别的组织。这些女士们甚至不想要一个能够消除社会弊端和种

种不公正的政治制度，以免使她们的努力显得没有用处；她们庆幸战争和灾荒把她们变成了人类的女施主、女恩人。很清楚，在她们眼里，那些编织品和包裹并非为了战士和饥民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让他们收到编织的飞行帽或救济包裹。

尽管如此，某些这类组合还是取得了正面的结果。在美国，那些庄严可敬的“妈妈们”的影响是强有力的。她们寄附性的生活模式使她们有闲暇时间施展影响，由此就产生了致命的毒素。在«毒蛇的一代»中，菲利浦·怀利这样说到美国的“妈妈们”：“不懂医学，不懂艺术，不懂科学，不懂宗教，不懂法律，不懂卫生……她对什么也没有特别兴趣，她总是充当那些各式各样的团体的成员，只要它是个团体。”她们的努力并不符合于一个合乎逻辑的、建设性的计划之中，也缺乏客观的目标；她们的努力只趋向于形成偏见并保护她们的利益。例如，由于她们购买大量书籍，她们在文化领域扮演了值得重视的角色；但是她们读起书来却象玩单人纸牌。当文学能帮助人们投入生活、向远大目标前进的时候，文学才有意义和尊严；它必须和人类的超越联系在一起。但是，妇女滥用书籍和艺术作品，把它们陷入她的固有性的泥沼；图画成了小摆设，音乐成了令人讨厌的陈腔滥调，小说除了编织滑稽剧外没有别的价值。美国妇女应对美国畅销书的低劣负责；这类书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仅仅是一种娱乐而在于它为那些寻求逃避的懒惰的女人提供消遣。对

于这种“妈妈们”的活动的一般情况，菲利浦·怀利写道：

> 她们把政客吓得假装可怜，她们让牧师害怕，她们打扰银行经理，她们到学校董事会捣乱。“妈妈们”拥有很多这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的真正目的，是强迫她的环境乖乖服从她的愿望……如果可能，她们要把全城以至全州的年轻妓女统统驱逐出去……她们要公共汽车按照对她们方便而不是对有正经工作的人方便的线路行驶……她们为慈善事业召开盛大的展览会和聚会，又把所得的钱交给看门的工友，叫他给委员会买些啤酒以解除次日早晨的头痛……这些俱乐部给“妈妈们”提供了无数机会干预别人的事情。

这段攻击性的讽刺文章，含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既不是政治、经济方面，也不是技术部门的专家，老太太们没有具体的手段可把握社会；她们对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无所知；她们没有能力制订建设性的计划。她们的道德观念象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是抽象的，形式的。她们提出种种禁令，以此代替寻求进步的途径；她们不去尝试正面地创造新的局面。她们为剔除邪恶而攻击现存的东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某些事物：反对酗酒，反对娼妓，反对色情文学。她们认识不到，纯粹否定性的努力，

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有些禁令的失败就是证明，在法国，马尔泰·里夏尔提交众议院通过了关闭妓院的法令，也失败了。只要妇女继续保持依附性的生活，她就不可能真正有影响地参与改善世界的工作。

但是，确实有某些妇女全身心地从事某项事业并真正作出贡献；这些妇女不再是仅仅设法消磨时间，她们眼里有目标；她们中的生产者拥有权利，她们已不属我们讨论的依附生活范围。但是，这种"反常"是罕见的。大多数妇女，在她们的私人或公共活动中，头脑里没有一个打算取得的结果，仅仅只是为消磨时间找些事情来做，如果做事只是为了消磨时间，那么也就没有价值了。很多人受到这种情况的不利影响。生活了大半辈子之后，她们却象未经世事的少年一样惶惑迷惘；在这两种情况中，他们都感到无所依傍，似乎四周都是荒原。意欲行动，她们又自言自语："这有什么用呢？"但是，不管愿不愿意，男少年总得被拉入表明了责任、目标和价值的男性生活方式；他被抛进这个世界，他作出决定，他献身于某些事业。如果建议一个老年妇女向新的目标进发，她会悲伤地回答，这太晚了。这并非因为她的时间有限了，因为妇女退休很早，其时她并不很老；但是她缺少奋斗精神，缺少信心，缺少希望和愤怒，缺少这些能使她环顾四周找到新的目标的东西。她把她过惯了的日常生活当作避难所，她的生活变得单调而又重复。她变成了吝啬鬼；她越来越虔诚；她成为坚定的禁欲主义者；她失去了创造

力，变得冷漠而自负。

追近生命的尽头，老年妇女普遍变得安祥宁静了，其时她已经放弃了拼搏，死亡的逼近使她不必再为将来操心。她的丈夫往往比她更老，她象见证人似的看着他默默无声地衰老下去，这就是她的报复。如果他先死，她平静地承受这一损失；据观察，男人晚年丧偶，比女人更烦恼痛苦；他们从婚姻中所得到的要比妇女多，尤其在晚年。因为在那时，世界被缩小到家的限制中了；“现在”也不再以“将来”为边界，他们已经没有“将来”了。在这种时候，妻子主管日常生活并维持他们的固定节奏。当男人放弃了他的公共职能，他成了不折不扣的废物；他的妻子至少还可以继续操持家务；她对她的丈夫来说不可或缺，而他却只是一个讨厌的人。

老年妇女为她们的独立性感到骄傲；她们终于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来看这世界了；她们注意到自己已经被欺骗、被愚弄了一生；现在她头脑清楚，不再轻信，她们常常变成尖酸刻薄、愤世嫉俗的人。特别是那些“生活过”的女人，比男人还了解男人，因为她看到的男人，不是公众眼中的形象，而是那个偶然的个人、环境的创造物，每一个男人在她的凝视中出现了他的本相。她也了解女人，因为她们只对别的女人无保留地显露她们自己，好象她是在剧院的后台上。即使她的经验能使她揭露谎言和骗局，却不足以向她显示真理。不论是有趣的还是苦涩的，老年妇女的智慧依旧全然是否定

性的：反对、控告和拒绝，不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在她的思想中，如同在她的行动中，实际上助长妇女寄生状况的、虚无主义的否定和嘲讽，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终其一生，她在有所作为和独立自主方面从来未曾成功过。

第八章　妇女的处境和特性

现在我们可以懂了，为什么从古希腊到现在，对妇女的指控中会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的特征。除了一些表面上的变化，妇女的地位一直未有根本的改变，而正是这种地位决定了所谓妇女的“特性”：她“沉迷于固有性”，她是忤逆的，她审慎而偏狭，她没有事实感和精确度，她缺乏道德意识，她是卑劣的功利主义者，她是虚伪的、装腔作势的、自私自利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指控中，确有事实的因素。但是，我们终将注意到，这里报告的种种行为，既不是由女性的荷尔蒙决定的，也不是由女性的头脑结构决定的。她们是被她们的处境塑造出来的。我们将从这一角度，努力对妇女的处境进行广博的观察。这将会带来某种程度的重复，但是，它也将使我们理解在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制约下的不变的女性气质。

有时候，“女性世界”常被用来和男性世界作对照，但是我们必须再次坚持，妇女从来没能构成一个封闭而独立的社

会；她们只是男人统治下的集团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个集团中，她们处于次要的地位。她们仅仅由于地位相近而形成一种机械的团结，她们仅仅在这种机械的团结中联合起来，但是，她们缺乏那种有机的团结，那是每一个统一的团体的基础。她们总是被迫联合起来建立一种反抗机制，比如古代的神秘仪式和现代的俱乐部、沙龙等等，但是她们建立的种种东西依然包含在男性世界的框架内。因此她们的处境是矛盾的：她们全部属于男性世界，那个男性世界正面临挑战；她们被封闭在女性的世界中，这个女性世界又被男性世界所包围，所以，不可能有她们的安生地方。她们必须有时顺从，有时拒绝，有时接受，配合运用。在这方面她们的态度和年轻姑娘相近，然而保持这种态度却更困难，因为对成年妇女来说，生活不只是梦境，而是现实。

妇女自己承认这个世界就整体来说是属于男性的；建造世界，统治世界，直到今天依然支配世界的，是男人。至于她，她不认为自己要对这个世界承担责任；她的依赖性是可以理解的；她从未学习使用激烈手段，也从未作为一个自主的人站在团体的其他成员面前。封闭于她的身体、她的家庭中，她在那些确立目标和价值的男性人面神前，被动地看待自己。在这种意义上，她被称为“永恒的儿童”也有几分符合事实。工人、黑奴、殖民地的土著，只要他们不使人畏惧，也常常被叫做“成年儿童”，这意思是说他们必须驯服接受别人给他们制定的真理和法律。妇女的命运是谦恭地服从。甚

至在思想中，她也不能把握周围的现实。她的眼前一片昏暗。

妇女缺乏能使她们支配事物的技术训练，也是事实。她所把握的，不是物质，而是生命。而生命是不可能通过工具来掌握的，生命只服从于自身的秘密法则。世界对于妇女来说，仿佛并不象海德格尔解释的那样，是居于愿望和目标之间的"工具的集合"；恰恰相反，世界对她来说是顽固不化的，是不可征服的。世界被天命所支配，反复无常，神秘莫测。母亲体内的一团血肉转化成一个人，这种奇迹既不能由数学方程式表达，也不能由机器来催促或延缓；她感觉到的持续不断的力量，最灵敏的仪器也难测知；她感到这种力量在她体内随着月亮的圆缺韵律摆动，随着岁月流逝而成熟、腐败。每一天的厨房工作也教会她忍耐和顺从；做饭也象炼金术，必须服从于火和水，她得等待糖熔化，等待生面团发酵，等待洗好的东西晾干，等待橱柜上的水果变熟。家务劳动虽然近似技术操作，但是它们实在太初级太单调了，不能向妇女证实机械的因果法则。除此以外，甚至在家务劳动中也有很多东西出没无常：有的衣料能洗而有的不能，有的污点能去掉而有的去不掉，有的物品不动自破，灰尘象植物似的生长起来。

妇女的心理状态中，保留了农业文明对土地魔力的崇拜：她相信魔力。她的被动态度使她显得似乎既无意愿，又无进取心，她们吸引男性，好象土地一样对种子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她相信心电感应，占星术，催眠术，通神学，扶

卍，千里眼，信念治疗法；她的宗教信仰充满原始迷信，比如蜡烛供奉和咒语等等；她们相信古代的自然界的精灵化成了天使，其中有一个保佑旅行者，有一个保佑分娩的妇女，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找回遗失的东西；于是，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怪事能使她惊讶。她的生活态度，不是恳求，就是祷告；为了取得某种结果，她会举行某种预测凶吉的仪式。

了解妇女为什么僵化刻板是容易的；时间从来没有带给她新鲜的东西，时间对她来说不是创造之流；因为她命中注定过着重复性的生活，她看到的将来也只是过去的重现。每一次怀孕，每一次行经，都和先前的并无二致。在这种循环现象的运行中，时间的唯一影响是慢慢衰老；时间使家俱和衣服慢慢变旧，也使她的面容渐渐苍老；生育能力随着岁月流逝逐渐消退。在这种无情力量的摧毁下，妇女失去了信心。

她不仅不知道什么能构成真正的行动，什么能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她在这世界的中心迷了路，她似乎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朦胧模糊的星云之中。她不熟悉逻辑的使用。司汤达认为，如果被需要所迫，她也会象男性一样机敏地掌握推理的方法。但是，逻辑是她很少有机会运用的工具。三段论法对她成功地制作生菜调味汁没有用处，也不能帮助她使哭闹的孩子安静下来；对于她要对付的现实来说，男性的理论是远远不够用的。在这男性的世界中，因为她做不了什么，她的思想，不能专注于任何计划，和白日梦难以区分。她缺少对事实真相的判断能力。除了表面的字句和心理的想象，她

从来未能抓住事情的本质；明显矛盾的主张，也并不使她感到不安；她信口开河地解释越出她接触范围的神秘事物；为了她的目的，她心安理得地使用一些极端含混的概念，把参与者、意见、地点、人物、事件全都弄乱；她的头脑里塞了一大团希奇古怪的东西。

但是，清楚地观察事物毕竟不属她的职责，因为她一直被教导的是接受男性的权威。所以，她放弃了批评、调查和判断，并且把这些都留给高等性别——男性去做。男性世界对她来说似乎是超越的现实，有绝对的价值。弗朗之说："男人造神，女人拜神。"男人不可能信以为真地跪倒在他们造好的偶像面前；但是，当妇女看到立在路边的强有力的塑像时，她们不以为这是手造的，她们驯服地弯下腰去。她们尤其希望领导人成为"秩序"和"权利"的化身。在奥林匹斯山上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奇妙的男性精华必定凝聚成一个原型，父亲、丈夫和情人，都只是原型的模糊影像。说她们对这些伟大图腾的崇拜含有性的成份，是相当挖苦的；但是，她们通过这种崇拜满足童年的梦想——顺从地跪倒于英雄脚下，却也是事实。法国的将军们，比如布兰格、佩丹和戴高乐，总是受到妇女的拥戴；人们还可以回忆起当年在《人道报》上，女记者以多么潇洒的文笔赞颂铁托和他的辉煌的军装。将军，鹰眼方额的独裁者，正是所有并非开玩笑的保守思想家希求的神圣的父亲，所有价值的绝对保证人。妇女的无能和无知，助长了她们对男性世界的法律和英雄的顺从。

她们接受这些法律和英雄，不是经过头脑清晰的判断，而是凭着一种信仰——信仰从未知的事实中得到狂热的力量，它是盲目的，情绪化的，顽固的，愚蠢的；它无条件地宣称反对讲理、反对历史、反对所有的克制。

这种固执的崇拜，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定，可能表现为下列两种情况之一：妇女们热情坚持的，或是法律的内容，或是法律的空洞形式。如果她属于具有特权的精英阶层，受惠于已经确立的社会秩序，那么她希望这个秩序永不动摇，并且相当固执地坚持这一愿望。男人知道他可以发明不同的习俗制度，另一套伦理观念，新的法律经典；意识到自己有超越现实的能力，他把历史看作变化的。最保守的男人也知道某些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认识到他的行动和思想必须适应这种演变；但是，由于妇女不介入历史，她不了解历史的必然性。她对未来满腹狐疑，于是想要阻挡时光流逝。如果她的父亲、兄弟或丈夫树立的偶像被摧垮了，她不会想去供奉重居天际的新神；而会愤怒地冲去保卫旧神。

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人并不比妇女更热衷于维护奴隶制度。在波尔战争期间的英国，在巴黎公社时代的法国，最为激动好战的是妇女。她们企图用她们展露的强烈热情，弥补她们行动方面的怠惰。如果赢得了胜利，她们象猎狗一样冲向倒地的敌人；如果失败，她们怨恨地拒绝任何和解的努力。她们的思想只是个空样子，她们毫无顾虑地支持最为过时的理想；比如她们可能在一九一四年成为主张王位

继承的正统主义者，在一九五三年支持沙皇分子。有时候男人会微笑着鼓励她们这样做，因为看到她们对他用较有分寸的词汇表达的思想作出如此狂热的反应，使他觉得很有趣；但是，当他发现他的思想被弄成了如此愚蠢刚愎的样子，他可能大为光火。

只有那些处于完整和谐的文明及社会阶级中的妇女，会采取不屈不挠的态度。就最一般的情况而言，妇女尊重法律仅仅由于那是法律，因为她的信念是盲目的；如果法律改变了，它仍然保持魔力。在妇女眼中，强权就是公理，因为她从男人那里看到的都是依仗强力的公理。也正因此，当社会崩溃时，妇女最先拜倒在征服者脚下。就整体而言，她们接受存在的一切。她们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服从。当埋藏在火山灰下的庞培城被挖掘出来时，有人注意到，那些焚烧过的男人的身体，保持着反叛的、向天抗议的、企图逃跑的姿势，同时，那些妇女，则是脸朝土地，缩作一团。妇女们觉得她们无力反抗很多东西，比如火山、警察、监护者和男人。“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她们说，“这就是生活，能有什么办法！”

这种退让的态度，使妇女产生了常被夸奖的耐性。她们比男人更能经受肉体的痛苦；当环境需要时，她们能具备苦行者的勇气；尽管缺乏男性的进取意识，很多妇女以她们在被动的抵抗中的镇静倔强而闻名。面对危机、贫困和不幸，她们往往比她们的丈夫更有活力；她们做起事来不慌不忙。当

她们以坚韧的意志从事某一事业时，她们有时取得令人惊讶的成功。“不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在一个豁达的女人身上，服从表现为忍耐：她忍耐所有的东西，她不怨恨任何东西，因为她认为无论人还是物，都只能顺乎自然，保持原来的样子。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可能使服从成为向上的美德，如象某些坚忍进取的妇女所作。但是服从也往往酿成一种没有结果的谨慎；妇女总是在设法保全、适应或周旋，而不是破坏和重建；她们宁可妥协或调整，不愿革命。

在十九世纪，妇女是工人解放运动中最大的阻碍之一。有多少胆小的家庭主妇，恳求她们的丈夫千万别去冒风险！她们不单单害怕罢工、解雇和贫困，她们还怕造反是一种罪过。这是容易理解的：假如她们不得不受苦，她们宁可忍受那些受惯了的痛苦，而不愿忍受新的，因为在家里苦巴巴地过活比上街闹事容易些。

妇女的命运，同一些易于毁灭的东西密切联系在一起；失去这些东西，她们也就失去了一切。只有自由的主体，确信自己超越于这些东西的延续存在，才可能制止一切衰颓；但妇女不可能拥有这种至高无上的资源。她之所以不相信争取自由的解放运动，真正的原因是她从未试验过运用自由的力量；对她们来说，世界似乎被一种晦涩朦胧的天命所统治，起来反抗这种天命实在是太冒失了。要求她追随的那些危险的道路，并不是她自己选择拟定的，所以她不能全力以赴地投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让未来在她们面前展开吧，

这样，她将不会再因无望而死守着过去。当妇女们被召唤起来投入具体的行动，当她们认识到她们的利益存在于指定的目标之中，她们会象男人一样大胆和勇敢。

妇女为之广受责备的许多缺点，比如平庸、懒散、轻浮、奴性等等，也表明了她们的思想、经验、兴趣、观察力范围非常狭小的事实。可以说妇女是情绪性的，沉陷于内在的固有性的泥沼中；但是，首先是她自己被封闭起来了。后宫侍妾狂热嗜好玫瑰蜜饯和香水浴也并非病态，因为她不得不打发时间。当妇女被窒息于沉闷的闺房中，无论在妓院还是中产阶级的家里，她都只好从舒适和安逸之中寻找慰藉；此外，即使她确实失之检点，也常常是因为她被剥夺了有关的权利。她命中注定不可能从粗野的丈夫那里得到满足，于是在调味汁、烈性酒、天鹅绒、阳光和水、闺中女友和年轻的情人身上寻找安慰。如果在男人看来她似乎是非常"动物化"的人，那是因为她的处境导致她把她的动物性看得特别重要。她的动物性要求并不强于男人，但是她常为此低声抱怨或夸大其辞。在性爱中她获得片刻的胜利。在被尊奉为神的短暂时间里，女人不再感受到受损害或受挫折。但是，这不过是又一次说明，她珍惜那些固有性的胜利，只是因为固有性是她的命运。

女人的轻浮和她的"太实际"产生于相同的原因，她把小事情看得很重，是因为她很少参与大事情。而且，可以进一步说，充塞于她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对她来说就是最

为严肃的活动。她把她的魅力和机遇，都归功于她的服装和美貌。她常常显得懒洋洋的、有气无力的。种种消遣使她变得空虚无聊。如果她唠唠叨叨、喊喊喳喳，那是为了排遣她无事可做的时光；因为行动已不可能，她就用说话来替代。事实上，当妇女从事一项对人类有意义的事业时，她是能够象男人一样表现出积极肯干、讲求效率、沉默寡言、吃苦耐劳的。

女人被指责为有奴性；有人说，她随时准备倒在主子脚边吻那打过她的手。一般来说，女人确实缺少真正的自尊心。在报纸或杂志的"失恋者顾问"专栏里，给予被欺骗的妻子和被遗弃的恋人的劝告，充满了奴颜婢膝、可怜巴巴的味道。妇女在矜持和傲慢的情况中弄得精疲力尽，到头来只拾得些男人作为恩赐而扔给她的面包屑。但是，那些把男人当作生活的唯一意义和唯一理由的女人，离了男人的支持，又能做什么呢？她只能忍受各种屈辱；奴隶不可能具有人的尊严感；一个奴隶只要没被摧残得体无完肤，就算过得去了。

最后，如果说妇女是世俗的、平凡的、信奉功利主义的，那是因为她们被迫献身于做饭和洗濯尿布，无法求得伟大和崇高！负担所有不被留心却又切实存在的生活的单调重复，就是她的义务。无怪乎妇女只能重复做着相同的事，无所发明创造，因为对她来说时间只是一圈一圈地在原地打转，却不能把她引向别处。她忙来忙去却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于是，她把自己等同于她占有的东西。这种对物的依赖

性，是她对男人的依赖性的随之而来的结果，也可以解释她的吝啬和贪婪。她的生活并不指向任何目的：她全身心地进行生育后代及照料一些没有更多意义的东西，比如食品、衣服和住所。这些东西是动物生活和自由存在之间的非本质的媒介。属于非本质的方法或手段的唯一价值是功利；家庭主妇就生活在这种功利的水平上。她不过是个对家中亲属有用处的人，在这方面，她没有更高的妄想。

但是，人不应满足于充当非本质的角色，因为那种情况就等于使手段变成了目标——比如在政治家身上可能看到的情况——并且使手段的价值似乎变成了绝对的价值。于是，功利在家庭主妇的天堂里占了优势，压过了真理、美和自由；她正是从这种功利的透视角度来观看整个宇宙的。也正因为这样，她采纳奉行亚里斯多德道德理论里的中庸之道，那也就是说，要平凡、普通。我们怎么可能期望她表现得大胆进取、生气勃勃、公正无私、高贵庄严呢？这些优良品质，只有当自由的人们走向广阔的未来、远远超越了所有给定的现实之时，才可能显现出来。妇女们被封闭在厨房和卧室里，人们却惊异于她的视野如此狭小。她的翅膀被剪了，人们却叹息她不会飞。让未来展开在她的面前吧，她将不再被链条拴在现存的状况里。

类似的不一致及前后矛盾，也体现在以下的情况中：妇女被封闭限制在自我或家庭的范围内，人们又指责她自我崇拜，指责她以自我为中心，指责她虚荣、恶毒、心理不正常，

等等。她被剥夺了和其他人交流来往的具体的可能性；她从来不曾经验过团结一致的吸引力和益处，因为她被整个儿供献给她的家庭了，她处在孤独中。人们也不指望她能朝向普遍性的福利超越自己。她固执地停留在一个她所熟悉的王国里，在那里，她能够控制各种事物，并且从中享受一种视他人脸色而定的、靠不住的统治权。

然而，即使她闭紧门窗，妇女在家里也依然找不到充分的安全感。被男性的宇宙所包围，她只能对这个宇宙作远远的膜拜，却不敢有所冒犯。也正因为她没有能力通过工艺技术、逻辑推理和明确的认识去把握这个男性宇宙，她象儿童或野人那样，被危险可怕的神秘东西所包围。她把关于现实的魔术性概念投射进男性世界；对她来说，事件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她分辨不清楚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情愿相信任何事情，不论是什么事情。她听信谣言，传播谣言，并且开始为谣言恐慌。甚至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她也焦虑不安；夜里半睡半醒地躺着，她也会被与现实相关的恶梦搅扰；因为妇女处于被动状态，不可测知的未来笼罩着战争、革命、灾荒和贫困的幻影；没有能力去行动，她常常苦恼。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当他们从事某项事业或面临紧急情况时，冒着他们自己的风险；他们的计划，他们遵循的规则，指示出一条穿越黑暗的正确道路。但是，妇女们在混乱和黑暗中辗转挣扎，一筹莫展；她惯于如此，因为她什么都不能做；在她的想象中，所有的可能性都有同等的

现实性；火车可能出轨，手术可能出错，生意可能失败。在晦暗混乱的思绪中，她的软弱无力的状态，幽灵似的萦扰出没。

她的焦虑表现了她对现存世界的不信任。如果这个世界看起来充满威胁、随时可能崩溃，这是因为她生活在其中并不幸福。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她并不顺从于她的顺从状态；她清楚地知道，她遭受的，如同她做的，都违背她的意愿。她是一个无人请教的女人。她不敢造反；她无可奈何地屈服；她怨天尤人。所有女人与之谈心的人，医生，牧师，或社会工作者，都知道她们惯常的腔调就是抱怨。在朋友中，妇女反复诉说她的烦恼，她们象合唱队似的，一齐抱怨命运的不公平，抱怨世界，抱怨所有的男人。

一个自由人，对于他的失败，往往只责备他自己，他承担失败的责任；但是，对妇女来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通过别人代理的，所以别人要对她的灾难负责。她的疯狂的绝望状态，使她拒绝所有的补救方法；向那些一味怨天尤人的妇女建议解决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她什么也不接受。她坚持生活在她的现存状况中，也就是生活在一种无行动能力的愤懑状况中，如她平时所为。如果有人向她建议某些改变，她把手一摊说："这有什么用！"她知道她的困难实际上比她在托词中所说的还要严重，她也知道仅靠权宜之计不能真正解救她。她坚持认为整个世界都应为她的不幸负责，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她的份，并且反对她，她从少年时代开始，甚至从童

年时代开始，就一直不满于自己的境遇。人们许诺给她种种补偿，保证她只要把自己的运气交人男人手中，就可以得到一百倍的回报——她感到她受骗了。她向整个男性宇宙提出公诉。怨恨是依赖的反面：当一个人给出了一切，他总觉得收到的回报不足不够。

然而，妇女不得不怀着某种尊敬对待男性宇宙。如果她从整体上反对男人，她会觉得失去了头上的屋顶似的身陷险境；所以，她采纳了摩尼教徒的见解——把善和恶截然分开，这也是受她当家庭主妇的经验启发而生的。一个自主行动的人，认为自己和别人一样，对善和恶二者都应负责，他知道是他制订了目标，并将使之实现；在行动中，他领悟到所有解决办法可能都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意义：正义和非正义，得与失，都错综复杂地混在一起。但是，那些被动服从的人置身事外，并且拒绝思考伦理学的问题。好的就“应该”被实现，如果没有被实现，那么一定是有人做错了，这些人应该受责备，应该被惩罚。象小孩子一样，妇女把善和恶想成两个简单的形象，看成并存而又分立的实体；她的这种善恶二分的摩尼教思想，使她摆脱了进行艰难的选择时所生的焦虑而心安理得。要在大恶和小恶之间、在现存的善和将来的更大的善之间作出决定，要确切定义对她自己来说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胜利，所有这些都过于繁难。对于摩尼教徒来说，只须除去毒草，和毒草明显不同的就是好麦子；彻底除去污垢就是清洁；把房子弄干净就是扫除灰尘和垃圾。

所以，妇女会有“这都是犹太人在捣乱”或别的什么人在捣乱的想法；她们总是反感一些人或一些事。她们从来不知道恶的原则可能位于何处，但是她们一心盼望有个“好政府”把邪恶扫除干净，就象她们把灰尘从房子里扫出去。

但是，这类希望总只能是对某种无法确定的未来而言的；眼下，恶继续不断地侵蚀着善；由于她管不上犹太人或别的她认为有问题的人，她就在周围寻找应负责的人，给她的愤慨找到具体的发泄对象。她的丈夫就是最合适的牺牲品。他是男性宇宙的化身，男性社会通过他来管制她、欺骗她。他似乎能承当世界重任，什么事情出了问题，都是他的错误。夜里他回到家里，她向他抱怨孩子、商店售货员、生活费用、她的风湿病、天气……，想要他感到他应为之负责。她经常向他发牢骚；他有罪，首先因为他是男人。他可能也疾病缠身或心事重重——“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他拥有她时时感到不公正的男性特权。令人注目的是，她虽然对丈夫或情人怀有敌意，却不离开他，反而贴近他。男人一旦开始厌恶妻子或情人，就想离开她；但妇女却想要她所痛恨的男人留在手边，这样她可以使他付出代价。反唇相讥不能解除她的痛苦，反而使她更加沉陷其中不能自拔。妻子的超级精神安慰是自命为壮烈牺牲的烈士。生活和男人征服了她，她要把这种失败转化成胜利。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她会痛痛快快地放纵自己嚎啕大哭或乱发脾气，如同她小时候所作。

可以肯定，妇女动不动就哭的癖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一

个事实，即她的生活建立在一个无力反抗的基础上。无疑，从生理学的角度说，她不如男性善于控制神经，同时，她所受的教育也使她放纵自己，随随便便。说这是教育或习惯影响的结果，是确有证据的，比如，在从前，象本杰明·科斯坦和狄德罗这样的男人，也常常泪如雨下，后来，时代风尚变了，男人们也就停止哭泣了。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妇女们永远准备采取受挫折、受委屈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因为她从来没有慷慨地对这个世界承担责任。男人是对世界承担责任的；即使遭到不幸，他也并不改变态度，他正视人生的苦难，他不会自暴自弃；然而，女人们碰到一点点麻烦事，就认为世界和她作对，命运对她不公。于是，她急忙退回她最可靠的避难所里：她自己。那些热泪纵横的面颊，那些哭红肿了的眼睛，不是她的充满忧伤的灵魂的视觉表达方式吗？冰凉地淌过皮肤，略带咸味地落在舌上，眼泪是一种虽然苦涩却犹文雅的抚慰；她的脸在慈悲的泪水下发光。眼泪是哀伤，也是慰藉，是狂热，也是一帖平息事态的清凉剂。眼泪是妇女的超级辩护词；它突然而来，突然而去，象狂风，象四月的阵雨。流泪的妇女好象忧伤的喷泉，风雨的天空。她的眼睛朦胧迷茫，它们浸没在泪水中，她什么也看不见，她回到了自然物的被动状态。有人想要征服她，但是她自己先就崩溃于失败中；她象石头一样沉没，她落下去了，她使那些注视着她的男人困惑，他象站在大瀑布面前似的束手无策。他认为这种表演不公平；但是她认为这种斗争从一开始就

不公平，因为除了眼泪，她手里没有别的有效武器可以使用。她一次一次地使用这种魔术符咒。她的哭泣能激怒男人，使男人生气，这也是她要哭泣的又一个原因。

不论何时，如果眼泪不足以表达她的反抗，她就大吵大闹发脾气，弄得男人更感困窘。在某些文化圈子里，丈夫可能就会动手打妻子；在另一些文化圈子里，他可能拒绝使用暴力，正因为他是强者，他的拳头是一种有效力的武器。但是，妇女却象小孩子一样，纵情于象征性的胡闹：她可能扑到男人身上，打他，抓他，但是这仅仅是表示了一种姿态而已。归根到底，她是在通过这种神经质的闹剧，表达她事实上无法实行的不服从。她的种种胡闹并不只是出于生理性的原因。胡闹是一种内部能量的发散，但对任何东西都不起作用。这是一种因处境刺激而生的否定性力量的无目的的宣泄。母亲很少对她的年幼的子女发脾气，因为她可以责罚他们，打他们。只有对她的成年儿子，她的丈夫，或她的情人，那些她没有真正力量控制的人，她才会大发脾气，大光其火。托尔斯泰夫人歇斯底里的吵闹是意味深长的。她从未设法真正理解她的丈夫，这无疑是她的错误。从她的日记来看，她似乎显得小器量、无感情、不诚恳，远非一个讨人喜欢的人物。但是，不管她是对是错，都决不会改变她的可怕的处境。她的一生，除了忍受无休止的指责、怀孕、孤独和丈夫强加给她的生活方式，什么都没做。每当托尔斯泰发出新的命令加剧冲突，她手无寸铁地反对他的敌意，她以缺乏力量

的愿望来对抗他的不友好的愿望。她爆发了戏剧性的抗议——假装自杀，假装逃亡，假装生病，等等。这些使她周围的人不快，也使她自己精疲力尽。很难看出她还可能有另一种出路，因为她没有积极的方式来隐藏她的反抗感情，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表达这种感情。

对于那些走到了反抗的尽头的女人来说，只有一条路还向她们开放，那就是自杀。但是，以自杀作为最后手段的，妇女少于男人。从统计资料看，自杀致死的，在男人中比在女人中常见，但是，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后者多于前者。这可能是由于妇女较喜欢从演戏行为中得到满足，她们假装自我毁灭的成份，常常多于她们真心想要自杀的成份。这也可能是因为使用残酷的方法使她们感到厌恶：妇女几乎从来不用冰冷的铁器或火器自杀。她们比较可能投水自杀，象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莪非利亚一样。这证明了女人和水的密切关系，在水里，在寂静的黑暗中，仿佛生命可能自然而然地溶化。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矛盾的情况：妇女厌恶的东西，她并不真心想要放弃。她假装要和给他带来灾难的男人决裂，但最后又还和他在一起；她假装要摆脱使她伤心的生活，但她在自杀方面的致死率相对来说很低。她不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她向男人抗议，向生活抗议，向她的处境抗议，但是，她并不努力从中逃脱。

妇女行为的很多方面，都可被解释成是一种抗议的形式。我们知道，女人欺骗丈夫，常常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

是为了违抗丈夫或蔑视丈夫；她可能故意粗枝大叶并挥霍浪费，因为他是有条不紊并精打细算的。厌恶女人的人，指责女人总是迟到，认为她缺乏守时的观念；但是，就我们所知，事实上她能使她适应时间的要求。她迟到，是有意的。有些爱卖弄风情的女人，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吊男人的胃口，使她们的出现得到更高的赞赏；但是，归根结底，妇女要让男人等上几分钟，主要是为了向她终身都处在等待之中表示抗议。

在某种意义上说，女人的整个生命就是等待；因为她被监禁在固有性和随意性的囚牢里，因为她的生存意义永远掌握在别人手中。她等待男人的尊崇和赞许，她等待爱情，她等待丈夫或情人的感激和夸奖。她等待来自男人的供养。不论她掌管支票簿，还是仅仅按周或按月从丈夫那里拿零用钱，如果她想要能付钱给杂货商或买一件新衣服，都必须由丈夫去领取工薪或争取加薪。她等待男人露面，她在经济上的依赖性使她听命于他；她只是男人生活中的一个因素，而男人却是她的整个存在。丈夫有职业，成天不在家，妻子不得不容忍他的离开；情人，尽管他非常热情，还得由他决定是否见面或分手。她等待男人的欲望，她等待自己的快乐。

她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在和情人约会时迟到，在丈夫指定的时间还未准备完毕；她用这种方式来维护她自己的重要性，她用这种方式来坚持她的独立性；在这种时候，她成了本质性的主体，别的人只能被动地服从。但是，这些只

是一种怯懦的报复尝试；不论她能让男人等候多久，都不能补偿她在观察和期望、在等待男人的好兴致中耗费掉的无休无止的时光。

虽然妇女承认男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但是，一般来说，她喜欢和男人的统治斤斤计较。由此就产生了她那常遭指责的、著名的"爱闹别扭"的特性。妇女没有独立的领域，她不可能用她自己的建设性的信仰和价值观念，来对抗男人主张并拥护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她仅仅只能否定它们。她的否定是多是少，其彻底性取决于她性格中尊敬和怨恨的搭配比例。但是，事实上她知道男性体系中的所有缺陷，她毫不犹豫地揭露它们。

妇女不能把握男性的世界，因为她们的经验从未教会她们使用逻辑和技术；反过来说，男性的武器在女性王国的战线上，也失去它的威力。男人从不考虑妇女的生活经验，于是，人类经验的整整一个区域被他有意忽视了。当工程师设计图纸的时候，他是那么严密而精确，但是在家里，他活象一个小神祇：只消一句话，看呀，饭 端 上 来 了，衬衣熨平了，孩子们安静下来了；生育是象先知的魔杖那样一挥而就的动作；他对这些奇迹，并不感到惊异。奇迹的概念是和魔术的概念有区别的。在理性的、讲求因果关系的世界中，奇迹代表了一种无原因的、极端不连续的事件，这种无原因的情况，破碎了作为思想武器的理性方法；然而，魔术现象统一于一种隐藏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连续性，是驯良听话

的头脑虽不理解却可能接受的。新出生的孩子，对其小神祇父亲来说是个奇迹，对其经历了怀孕时期的母亲来说是个魔术。男人的经验是明晰的，但其中被空白隔断；女人的经验，虽被局限于一个神秘的、晦暗的范围内，却是完整的。这种晦暗，使她感到沉重；在他和她的关系中，男人似乎显得轻松；他有那种独裁者、将军、法官、官僚、法律典籍和抽象原则的轻松。当一个家庭主妇耸耸肩膀，说，“男人呀，他们什么也不想！”似乎这是毫无疑问的。女人们还说：“男人什么也不懂，他们根本不懂生活！”这种异想天开的神话，使妇女和那些靠别人劳动过活而又十分轻浮的雄蜂成为象征性的对比。

从这一透视角度看，妇女对男性的逻辑采取反对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种逻辑不仅不能应用于她的经验中，而且，如她所知，男人的逻辑在他手里是一种并不正大光明的力量形式；男人的不准争辩的宣言，目的就是要使她思想混乱举止失当。他们把她放在左右为难的处境中：你或者同意，或者不同意。出于对她所接受的男性体制原则的尊重，她必须同意；如果她拒绝，她也就是拒绝了整个体制。但是她不敢冒险走那么远，她缺乏以不同的形式来重新建造社会的手段。但是，她不能就这样接受了现存的一切。她半反抗半服从地，勉勉强强地臣服于男性的权威。在各种场合中，他不得不强迫她接受她半心半意的顺从的后果。男人追求这种狮头羊身蛇尾式的怪物，一个半是奴隶半是自由人的伴侣。他

使她信服一个论点，也使她服从他，但是她知道，他据以进行严密的推理的前提，是他自己选好的。只要她不对这些前提提出质疑，他很容易使她陷于无话可说；但他不能使她心服口服，因为她觉出了他的武断和专横。于是，他恼羞成怒，指责她是顽固的、非逻辑的；但是她拒绝玩这种游戏，因为她知道，骰子里已经填了铅，怎么扔都是他赢，她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上。

妇女也并不积极地相信真理并不象男人所声称的那样。她们宁可认为，世界上没有固定不变的真理。不仅仅是由于生活的变化多端，使她怀疑永恒的同一的原则，也不是包围着她的魔术现象破坏了因果关系的观念。她从属于男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她遇到的所有原则，所有价值观念，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意义暧昧的。她知道，与她有关的男性道德，都是大骗局。男人们装模作样，大喊大叫，高唱他们的仁义道德之论，但是，私底下却引诱她违背这些东西，他甚至暗中期待她不服从。如果没有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他用绚烂华丽的虚伪表面加以掩盖的一切，就将崩溃了。

按照黑格尔的思想，公民在指向普遍原则的超越自身中获得道德上的尊严，但是，作为一个个人，他有权利寻找快乐。男人们很高兴接受这种权威思想。这样，他和妇女的关系，正好放进一个随意性的区域，在那里，道德原则不再适用，在那里，持身行为变得无关宏旨。他和其他男人的关系，总会牵涉到价值观念的问题；他是一个自由行动者，

在他们共同承认的法律下，他和另一个自由行动者对抗。但是，在他和女人的关系中——她就是为这种目的才被制造出来的——他抛开了存在的责任，他沉陷于他的劣根性的泥沼中，他使自己投人假象之中。他表现出他的专横、虐待狂、粗暴，或表现出他的孩子气、被虐待狂、吹毛求疵；他试图满足那些念念不忘的欲望和一时兴起的奇想；由于在公共生活中得到的那种权利，他“消除疲劳”，他“解闷儿取乐”。

他的妻子常常惊讶于他在公开发言时的高尚腔调和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惊讶于他暗中不断杜撰理由为自己寻方便的能力。他一方面倡导提高生育率，另一方面却为了适应他的便利而使用技术不多要孩子。他一方面高声赞美那些忠实而贞洁的妻子；一方面又要求邻居的妻子和他私通。当法国每年有一百万妇女被男人置于必须做人工流产的状况中时，我们可以明白男人们宣告人工流产是一种犯罪有多么虚伪。几乎常常是丈夫或情人要求采取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更经常地，他们心照不宣地认为只要有必要，人工流产也是可以的。他们公然要求妇女自觉自愿地使自己陷于犯罪之中。女人的“不道德”，作为一种反衬，正是男人所尊敬的那个道德社会保持统一和谐所必须的。

这种言行不一情况的最为显著的例子，是男性对待娼妓制度的态度，因为正是由于男性的需求，才创造了娼妓这种供给。妓女们用厌恶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平素谴责邪恶、私下耽于淫欲的道貌岸然的绅士们。正是这些绅士们，认为堕

落和放荡的，是那些靠出卖身体过活的女人，而不是那些利用了她们的男人。一件历史轶事将有助于说明这种心理状态。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年代，警察在一个妓院里发现了两个小姑娘，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三岁。在法庭审讯取证时，两个姑娘说出了她们的顾客，他们是些显贵人物。当一个姑娘正要说到一个名字时，法官立即制止了她："不准你玷污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的名字！"一个佩戴着荣誉勋章的绅士，当他蹂躏一个小姑娘的时候，他依然是受人尊敬的；他有他的弱点，但是谁又没有弱点呢？而这些姑娘是没有希望进入道德王国的，她不是法官，不是将军，也不是一个法国大男人，她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小姑娘，她把她的道德价值抵押在这个随意性的性感王国里，于是，她就是堕落的、邪恶的、道德败坏的，只配送进感化院。

在很多情况下，只要不损害男人的崇高形象，他会和女人一起做坏事，而这对女人来说是有失名誉的。她不明白其中的微妙之处；她理解了的，只是男人并不按照他们公开明言的原则行动，并且要求她也违背这些原则；他心里所希望的，并非他嘴里说他所希望的。所以，她也并不真给他她假装给他的东西。她要做一个忠实而贞洁的妻子，但同时也暗暗地顺从他的欲望；她要做一个受人爱戴的母亲，但同时却小心翼翼地避孕，如果需要，她也去做人工流产。男人公事公办地对这些行为表示不赞成，但这不过是一种装样子的游戏而已，他心里暗暗感激她的"风流"，感激她没有怀孕，没

有给他带来麻烦。

妇女好象扮演着秘密间谍的角色：如果被抓，就被枪毙，如果成功，就被给予大量报酬。所有的男人的不道德，都由女人的肩膀承担；这不仅仅单指娼妓，也包括在那些可敬的男士们居住的闪闪发亮而又合乎卫生的殿堂里，所有充当污水沟的女人。因此，当有人向这些妇女说及崇高的男性美德如尊严、荣誉、忠诚之类的时候，如果她们拒绝附和，那并不令人奇怪。当那些以美德自命的男人以“漠不关心”、“装腔作势”和“说谎成癖”来指责妇女时，妇女尤其感到好笑。她们很清楚没有别的道路向她们开放。男人确实对金钱和成功决不“漠不关心”，但是他有办法通过他的工作来得到它们。妇女则被指派担任寄生者的角色，而每一个寄生者都是一个剥削者。妇女需要男人，是为了得到体面，为了吃饭，为了享受生活，为了生育；通过性的服务她获得了这些利益；因为她被局限于这种职能，她整个儿是一个剥削的傀儡。

至于说谎，除了妓女，在她和她的保护人之间并不存在坦率交易的问题。男人甚至要求女人装腔作势。他想要使她成为“二等性别”；但是，所有的人，当他们被否定的时候，也还保存着主体性。男人想要使女人成为客体，她也使自己成为客体；但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也正在进行自由的活动。这就是她最初的叛逆；最听话、最被动的人，也依然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她把自己给了他的同时，也观察他、

审判他，这一事实足以使他感到被欺骗了。她仅仅被当作一种被奉送的物品，一种被捕食的小动物。然而，他又要求这种“物品”出于她自己的自由愿望献身于他。在床上，他要她也显得高兴；在家里，她必须真心诚意地承认他的优越和他的功绩。并且，在服从的时候，她必须假装独立，但在别的时候，她必须主动积极地表演服从的喜剧。她撒谎，是为守住能每天供给她面包的男人；吵闹和眼泪，移情别爱，神经崩溃，种种假戏真做，都是一种逃避，她为自己的利益而接受了男人的专制，又用撒谎来逃避这种专制的暴虐。他鼓励她装假，以此奉迎他的傲慢和虚荣心；于是，她用她的异化了的力量作为报答反对他。这样，她进行的报复是双倍令人开心的，因为通过欺骗他，她满足了她自己的欲望，并享受了愚弄他的乐趣。妻子和娼妓，在男人面前假装出她们并未感觉到的强烈感情；事后，和情人或女友在一起，她们嘲笑那些被她们捉弄的人如何幼稚虚荣。“他们不光把事情弄糟，还想让我们弄得精疲力尽。”她们恨恨地说。

这种谈话，很象仆人们在仆人房间里的说长道短。妇女也有同样的毛病，因为她是同样的宗法社会压迫下的牺牲品；她抱有同样的犬儒主义态度，因为她把男人从头到脚看透了，就象贴身仆人看他的主子。但是，很清楚，妇女的种种特征并不表明她们的本性或愿望是坏的，这些特征是她们的处境的反映。“强权之下，必有欺瞒，”傅立叶说，“有禁令就有走私，在爱情中如同在商业中一样。”并且，男人也很

清楚女人的缺点表明了她的处境。由于热切希望保持性别的等级制度，他们鼓励他们的女随从们保持那些他们蔑视的缺点。无疑丈夫或情人也会为某个和他共同生活的女人的缺点而大光其火，但是，当他们极口称赞一般的女性的魅力时，他们相信女性的魅力是和女性的缺点分离不开的。如果妇女不再水性杨花，不再庸庸碌碌，不再胆怯，不再慵懒，她就失去了她的诱惑力。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男主角海尔马解释说，当男人原谅意志薄弱的女人的孩子气的缺点时，他感到自己是多么强大、公正、体贴和宽容啊。同样，在伯恩斯坦的戏剧里，丈夫们——作者和他们串通好的——把偷偷摸摸、心怀鬼胎、与人私通的妻子感动得热泪滚滚；细心地安慰她，对比之下，他们显示了自己的男性的仁慈。我们知道，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和法国的殖民地居民，同样希望黑人偷窃、懒惰和说谎，这样可以证明黑人是没有价值的人。于是，真理便落到了黑人的对立方面；如果黑人保持诚实和忠诚，他会被看成一个“坏角色”。妇女不但不去尝试改正自己的缺点，而且，恰恰相反，她们使缺点成为一种装饰，于是，妇女的缺点就越来越扩大了。

由于不接受逻辑原理和道德规则，特别是不接受自然法则，妇女缺乏普遍原则感。在她看来，世界仿佛是一团由许多特殊情况组成的乱七八糟的大杂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宁愿相信某个邻居散布的谣言，却不相信科学的说明。她无

疑很尊敬印刷好了的书本，但是她阅读时走马看花，不求甚解；相反，对于在排队时或在客厅里听一些不认识的人说的奇闻轶事，她却信以为真，奉为权威。在她的生活领域里，一切都是魔术；在她的生活领域内，一切都是奇迹。她不熟悉鉴别事物真伪的标准；只有直接的经验，包括她自己的经验，以及再三向她强调说明过的别人的经验，才能使她信服。对于她自己，她感到她是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她被隔绝在她的家里，并且因此未能和别的妇女进行积极的接触；她总是希望命运和男人将给她例外的优待。她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直觉，远甚于相信普遍具有确实根据的推理过程；她愿意承认她的直觉来自上帝或某些模糊朦胧的世界精神；对于某些不幸和意外事故，她冷静地认为：“那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另一方面，对于利益，她却想象着“我将得到例外的优待”。她喜欢得到特别的、例外的甜头，比如，售货员将给她一个折扣，警察将让她没有通行证也能通过，她学会了过高估计自己的微笑的价值，然而没有人告诉她，所有的女人都会微笑。她并不认为自己比她的邻居更为出类拔萃，她不作这种比较。出于相同的原因，经验很少能使她明白她错在哪里：她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但是她没有总结教训，从中得出一个确有根据的结论来。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妇女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反宇宙”，使她们得以向男性挑战；她们时时嘲骂男人，她们谈论卧室里的事情和孩子的出生，她们交换美容秘方。

但是，她们缺乏必须改变这个她们怨恨的悲惨世界的信念；她们对男人的态度实在太矛盾、太暧昧了。她们把他看成一个小孩子，一个单薄的、易受伤害的身体，他是一个傻瓜，是讨厌的雄蜂，是卑鄙的暴君，是空虚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但是，他也是一个解放她的英雄，赋与了价值的神祇。他的欲望是粗鄙的，他的拥抱是堕落的；但是，他的如火热情和男性气概，使他看起来仿佛拥有造物主的神力。当她欣喜若狂地说出“他是个男子汉”的时候，她立即想起了她所崇拜的那个男人的性的活力及社会影响。在性和社会这两个领域里，他都表现出优越的创造力。如果她不能想象出他是一个大艺术家、一个大商人、一个将军或领导人，他就不会是强有力的情人，因为他的社会成就总是增加他的性吸引力；反过来，她很快就认为那个满足了她的欲望的男人是个天才。

我们必须附带说明，妇女正在恢复一个男性的神话。对劳伦斯来说，如同对很多别的人来说，男性生殖器代表了生命活力和人类的超越。于是，妇女可能在床笫之乐中看到和世界精神的交流。在神秘的男性崇拜中，她失去了然而也找回了她的光荣。有些人是人类卑微的化身，另一些人使男性的高贵臻于顶峰。但是妇女却想使这两种人物混同为一。“如果我变得出名，”一个堕入情网的年轻姑娘提到那个她认为超群出众的男人时写道，“他肯定会娶我，因为他的虚荣心将被满足；他会自豪地挽着我去散步。”她正疯狂地爱慕他。在一个女人的眼睛里，同一个人，可能极其吝啬、卑

鄙、空虚、可笑，但又是一个神祇；因为毕竟神祇也总会有弱点。一个被当作自由人来爱的人，也会被严格地批评或要求，这些也是一种慷慨的爱和尊敬。但是，驯顺地跪倒在男人面前的女人，却很可能以懂得如何“管住”男人，如何“控制”男人而洋洋自得。她殷勤地迎合他的弱点，维护他的名声；这证明她并不关心他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个人品性。她盲目崇拜那些她的偶像也列身其中的广义的精华人物。男性气概是一股神圣的气息，是一种天赋的、指定的价值，尽管掌握这种价值的个人是不重要的，这种价值依然被感知。他并不斤斤计较。但是，妇女嫉妒他的特权地位，于是，就通过假想如何在各方面不怀好意地压他一头，来寻找乐趣。

妇女对男人感情的矛盾和暧昧，又是建立在她对自己和世界的一般态度上的。妇女被禁闭其中的那个天地，被男性的宇宙所包围，但是，男性的宇宙也被某种隐秘的力量萦绕，男性本身是这种力量的玩物；如果她能联合这种魔术性的力量，她也必然会有力量。社会奴役自然；但是，自然也支配着社会。精神的火焰超越了生命；但是，当生命不再能支持它时，它就停止燃烧了。妇女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来为自己辩护，她认为在一座花园中比在一个城市里找得到更多的真理，在一场疾病中比在一种思想学说中找得到更多的真理，在一次生育中比在一场革命中找得到更多的真理；她努力重新建立土地的统治，母亲的统治，从而使自己由非本质

的又重新成为本质的。但是，当她仍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存在时，她可以通过改造那个把她禁闭在内的领域，从而赋予这一领域以价值，她为这一领域提供超越的幅度。男人们生活在一个前后一贯、无逻辑矛盾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一种思考过的现实。女人则抓住了魔术性的现实，魔术性是蔑视思考的，并且，女人还通过毫无内容的空想逃避思考。她不承担她的存在，只在关于她的天命的纯粹观念的云雾中胡思乱想；她不行动，只在假想的世界中树立她自己的形象。这也就是，她用做梦代替了理性。因此，她是自然的，同时又是人为的，她是世俗的，同时又是灵性的。她的生命在涮锅洗碗中耗尽，她却以为这是璀灿闪光的小说；她是男人的奴仆，她却以为她是男人的偶像；蒙受着肉体的屈辱，她却以为一切全是为了爱情。因为她处于一种仅仅知道一些生活的偶然事件的情况中，她使自己看起来象个空想的女祭司。

这种矛盾而暧昧的态度，也明显体现于妇女看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中。她的身体是一种负担：因服务于传种接代而衰老，月月流血，被动地进行细胞增殖；它不是能使她把握这个世界的完美工具，而只是一个不透明的肉体形象；它并不含有快乐的源泉，它造成钻心刺骨的疼痛；它含有威胁性：妇女常为她的身体的内部情况感到不安。它是歇斯底里的，因为内分泌和控制肌肉、内脏的神经及交感系统有紧密的联系。妇女拒绝对其身体表现出来的反应负责。抽泣、呕吐和痉挛，是对身体控制的逃脱，是对身体的背叛。她的身体是

她的最熟悉的真实，但又是一种她得隐藏起来的令人羞赧的真实。它是她的光荣的化身；她为镜子里的她而目眩神迷；它是幸福的许诺，是艺术品，是活的雕象；她打扮它，装饰它，炫耀它。当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时，她忘却了她的肉体的暂时性；在爱情的拥抱中，在为母之道中，她感到自己的形象破碎了。但是，每当她仔细端详她自己的时候，她常常惊讶于一个人能在同一时刻既是女英雄，又是凡胎肉身。

自然同样向她表现出两种面孔，给了她厨房苦役，也激发了灵感的迸发。当她成为家庭主妇，成为一个母亲，她放弃了漫游于森林田野之间的自由。她甘愿把厨房当作园地，她在这块园地上默默地耕作。她采下花朵插入花瓶，她依然为月光和日落而惊奇喜悦。在地球上的动物和植物中，她首先看到了食品和装饰品；她看到在食品和装饰品中有一种崇高的魔术性的生命元气在循环流动。生活并不仅仅是固定的、重复的，它还拥有耀眼的光芒；在鲜花盛开的草原上，生命作为美的化身出现。她的生育力与大自然协调和谐，她身上掠过生机勃勃的精神的微风。她总是不满足，这在某种程度上很象年轻姑娘总是怀着无边无际的希望。她的灵魂，迷失在向地平线无限延伸的道路尽头。平素被丈夫、孩子和家庭所拖累的妇女，发现自己独自立于山边，宛如至高无上的君王，自然不胜惊喜。此时她已不再是母亲、妻子和家庭主妇，而是一个“人”。面对山水沉思，她想起自己在根本

上是个有意识的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的个人。在神秘的流水和起伏的山峰面前，男性的优越褪色了。她走过丛林，把手浸人溪流，这时候，她不再为别的什么人，而是为她自己生活着。所有在劳役之余仍保持着独立性的女人，都非常喜爱并珍视自己在大自然中得到的自由。别的女人，在大自然中却只找到了一种惊讶狂喜的借口或托词；在朦胧的晨曦中，她们在感冒的危险和灵魂的愉悦之间犹豫不决。

妇女或多或少固守着对“肉”的世界和“灵”的世界的双重义务。她尽力把生活和超越联系起来，这就是说，她拒绝接受笛卡尔主义，连同它的形式逻辑和有关理论。妇女习惯于一种类似古希腊的斯多噶哲学或十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自然主义。所以，她们会接受某种既非常唯物又非常唯心的哲学。妇女特别需要一种非逻辑的乐观看法，她必须相信就整体而言事物的本性是趋向于善的。行动的道德法则不适用于妇女，因为她不被允许行动；所以她服从于现存的事物，并且认为，现存的必然也就是“好”的；但是，所谓“好”，按照斯宾诺莎的看法，是要经过推论来认识的，或者，按照莱布尼兹的说法，是要经过计算来认识的，都与她无关。

她所渴望得到的“好”，是一种她因生存而被安插其中的生活的和谐。和谐概念是理解女性宇宙的关键之一；它暗示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完美无缺，每一个元素依赖于整体及对立面直接证明了它的生存意义。在一个这样的和谐的世界中，妇女因此能得到男人通过行动寻求的东西：她啮合于这个世

界，她是不可缺少的，她配合着“好”的凯旋。在她们发现她们和静态的、自足的现实和谐一致的时刻，她们把这种时刻当作一种天启。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韦夫人》和《到灯塔去》中）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全部作品中）把这种辉煌的幸福时刻，给予她们作品中的女主角，作为一种最高的奖赏。自由地投身于解放的波涛之中的豪兴，是专门只为男人保留的，妇女懂得的只是轻颦浅笑中的平静感觉。在她眼里，只有月亮上的“宁静海”那样的情况才具有高的价值。由于妇女通常生活在否定、怨恨、榨取的紧张状态中，她对平静的爱好是容易理解的。不能责备她对晴明的午后或清凉的夜晚的喜爱之情。但是，试图寻找这个世界的隐秘的灵魂，却是一种妄想。这种“好”未考虑到的东西是：世界不是和谐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具有本质的位置。

有一种辩护的理由，一种高级的补偿，是社会素来惯于给予妇女的，那就是宗教。必须有一个给妇女的宗教，如同必须有一个给普通人的宗教，并且前者和后者均出于同一理由。当一个性别或一个阶级被限定于固有性中，提供给她们某些形式的超越幻想是必要的。男人有由男人自己写成、又用上帝的名义签发的经典，因此得到很大的好处。男人在妇女之上实行至高无上的统治，这一统治由上帝特别授权于幸运的男人。对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来说，男人是握有神圣权力的主人；所以，对上帝或真主的畏惧，抑制

了被压迫妇女的任何反抗冲动。男人利用了她们的轻信，妇女对男性宇宙采取尊敬和信任的态度。对她来说，天国中的上帝比内阁大臣还远，上帝创造宇宙的神秘性，与发电站的神秘性相仿。但是，如果妇女非常愿意接受宗教，归根结底是因为宗教满足了一种深深的需要。

在现代文明中，甚至妇女也分享到正在增长的自由，看起来宗教的压抑作用，已大大小于其欺骗作用。人们不再那么强硬地以上帝的名义要求妇女接受她的低下地位；感谢上帝，她是和那些傲慢的男人平等的；甚至，有人宣称，不公正已被克服，这种宣称平息了反抗的意图。妇女的超越不再被否认，因为她将把她的固有性供奉给上帝；灵魂的价值，并不视他们的世俗成就而定，只有在天国里才被称量。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在现今世界上，擦皮鞋或造桥梁，只是职业的区别，都是空的。超越社会歧视，性别的平等被恢复。由于下面原因，许多小姑娘和女少年成为比她们的兄弟们狂热得多的宗教信徒。上帝的眼睛抹煞了男孩子的优越感，委屈了他，在这种仁慈的监护下，他将永远是个孩子；男孩子下意识地怕有权威者将会伤害自己，这种下意识里的怨惧，比对他父亲的恐惧更为强烈。但是，这个“永远的孩子”如果是女性，她会在上帝的眼睛里找到她的拯救，这种拯救将把她变成天使的姐妹。这将消除男性的优越。一个真心诚意的信仰，对于小姑娘避免那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很有帮助：这样一来，她相信自己既非男人也非女人，只是上帝的创造

物。

虽然妇女在男人假借上帝意愿制订出来的法律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她们还是从上帝那里找到了有力的庇护。在她看来，神赐的奇迹驳倒了男人的逻辑，男人的骄傲成为一种罪过，男人为这为那而激动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她们责问：为什么要重塑上帝亲手创造的这个世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被动性被神圣化了。她在炉火边默默地做着祈祷，她认为，她比她那在政治性集会中闲逛的丈夫离上帝更近。她认为，为拯救灵魂不必再做任何事情，顺从地生活就足够了。她认为，生活和精神的合成已经完成：一个母亲不仅仅养育了一个肉体，而且为上帝生产了一个灵魂；并且，这是比探索原子的无用的秘密更伟大的工作。由于得到天国中上帝父亲的默许，妇女们能够在男人的挑战中，大胆要求得到她女性的光荣。

于是，上帝不单一般性地使女性恢复了尊严，而且每个妇女将从这个天国里并不存在的人那里找到特殊的支持。她作为一个没有什么影响的无名之辈，顿时可以借圣灵的名义行动，她的希望也变得神圣了。居荣夫人是法国十八世纪早期的神秘主义者，她鼓吹纯洁的对上帝的爱可以使人获得拯救，她说，由于一个修女生病，她学到一句话：听上帝的话，照上帝的指示办事。女宗教徒把她的权威藏匿于谦卑的服从之中。当她抚养她的孩子，管理一个修道院，组织一个慈善机构时，她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工具；但如果

你不想触犯上帝，你就不能违抗她。男人肯定也不轻视上帝的支持；但是当他对付别的男人的时候，这种支持没有太大作用，因为别人也同样可以声称他是得到上帝支持的，有关冲突最终只能按人与人的矛盾来解决。妇女求助于神，是为了在那些天然下属的眼里，在她自己的眼里，使她的绝对权威合法化。如果她能找到这种有用的神人合作，那是因为她特别注重她的内心矛盾。因为神虽无言，但在一个人内心的搏斗中可能具有法律力量。

事实上，妇女把宗教当作一种满足自己欲望的托词和借口。她是冷感的、被虐待狂、虐待狂吗？她以放弃肉欲、扮演烈士、压抑她周围所有的生命冲动，寻找到神圣。通过损伤摧残自己，她简直成了得道的高僧。她否定丈夫和孩子们的世俗幸福，想使他们也成为殉道者。同时，她准备在天堂里为他们选择一块福地。我们知道，怨恨不想要的孩子是常见的事，在这些母亲看来，粗暴对待这些被称为“天赐之物”的孩子是正当的。这些轻率的妇女按照上帝的意旨做了轻率的事，明天她的罪孽就可得到赦免的保证，鼓励了虔信的妇女在今天放纵自己。

不论她选择的是禁欲还是纵欲，是骄傲还是谦卑，她对拯救自己的关心，使她屈服于一种快乐，她喜爱这种快乐甚于喜爱别的东西，也就是说，她专心致志于她自身。她倾听她的心脏搏动，她注意她身体的震颤。上帝仁慈的形象，给了她生存的理由，就象胎儿给了孕妇生存的理由一样。她不

单单自怜自爱地仔细观察自己，而且向听忏悔的神父倾诉自己的情况；当她向神父忏悔时，她甚至品味到一种当众坦白的喜悦之情。宗教批准了妇女的自爱自恋，宗教给了她梦寐以求的导师、父亲、情人、神一般的监护人。宗教提供给她白日梦，宗教填补了她空虚的时间，但是，更重要的是，宗教给她一个美好的希望，将来在天国里是没有性别差异的，为她的忍受找到了理由，从而确认了社会的等级次序。正因为这样，直到今天，妇女依然是教会手中一张有力的王牌。也正因为这样，教会对一切有助于妇女解放的措施都怀有敌意。必须要有一个给妇女的宗教，也必须要有一些妇女，一些"真正的妇女"，才能使宗教永存。

显然，所谓"妇女的特性"，包括她的罪过，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趣味，她的行为等等，都可以由她的处境得到解释。超越性被否定的情况，使她通常达不到那些最为崇高的人类精神境界，比如英雄主义、叛逆精神、大公无私、想象力、创造性等等；但是，即使在男性中，能达到这些境界的人也只是凤毛麟角，并不多见。有很多男人，象妇女一样，被限制在充当中间媒介和工具的范围内，仅仅是一种非本质的手段。工人们通过政治行动表达革命的愿望，从这种限制中挣脱出来；但是，中产阶级的男人，却有意使他们自己置身于这种限制中。他们象女人一样命中注定似的做着单调重复的日常工作，他们和现成的价值观念认同，他们尊重公众舆论，除了安乐，他们在世俗事务中什么

都不追求，这些男性的雇员们、商人们、办公室职员们，比他们的女性伙伴无甚高明之处。烹调、洗涤、管理家庭、教育孩子，妇女比那些照章办事的男人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漫长的白天里，他都必须服从他的上司，必须穿着白领衬衣，以保持他的社会地位；她却可以穿着宽松的便袍，悠哉悠哉地绕着房子走走，哼哼歌曲，和邻居开开玩笑；她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承担一点点风险，也不去努力得到某种结果。与她的丈夫相比，她较少生活在必须为外表担忧的正规场合中。

卡夫卡曾经描写过，在一切事物中，办公室是一个公式化的、充满荒谬表情和无目的行为的宇宙。这个宇宙基本上是男性的。妇女和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她们和现实唇齿相依。当办公室职员们结算数目，或者把成箱的沙丁鱼折算为钱的时候，除了抽象的数字以外，他手中一无所有。喂饱了后睡在摇篮里的婴儿，洗干净的桌布，做好的食品，都是由更为实实在在、触摸得到的有用的东西构成的；但是，也正因为这些追求目标是具体的，她感觉到了这些目标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于是，经常有妇女不把自己等同于这些目标，这样她还可以为自己留下一些东西。男人的事业，既是一种事业，同时又是一种逃避，他使自己窒息于他的事业和他的奋斗中；他常常变得自视过高，故作矜持。由于反对男人的逻辑和道德观念，妇女不会落入这种陷阱，司汤达对妇女的这一特点颇感兴趣；妇女不会以怀才不遇自傲；她不会躲藏在

冠冕堂皇的假面具背后；她更为坦率地表露她那无条理的想法，表露她的热情和内心反应。当她自己选择话题时，她的谈话不象她丈夫的那样令人生厌。丈夫讨论的所谓总体思想，其实就是些从报纸专栏或技术书里学来的套话成语，而她表达的却是虽然有限但却具体的经验。

著名的“女性善感多愁”的说法，有几分来源于神话，有几分来源于轻信。但是，女人对自己和世界，比男人更为关注，也确是事实。女人生活在狂暴的男性气候中，于是以“和风细雨”式的东西作为一种心理的补偿，这可能助长矫揉造作和过分讲究的风气，但也产生了一些真正精致的东西。因为她所接触、思考的范围有限，她得到的实物似乎更显得珍贵；她不把这些实物与抽象的概念或设计过程联系起来，她只是简直地把它们的灿烂光华展示出来。她对宴会的喜爱表现了她的逃避意图。她可能为一束花、一块蛋糕或一张安排就绪的桌子销魂不已；她乐于把她空虚的闲暇，转变为慷慨的供奉。她爱笑，爱唱，爱装饰物和小摆设，她随时准备领略周围种种激动人心的事物，例如街市风光，例如天空的景致。一份请帖，一次晚会，都为她展开了新的视野。但是，男人常常拒绝参加这种快乐；当他回到家里，家庭主妇的欢笑之声沉默了，她假装出一副他所期待的忍耐而得体的模样。

从孤独与寂寞的深处，妇女感知了她的生活的个人意义。对于过去、死亡和时间的流逝，她比男人有更为切身的

经验。对于她的心灵、肉体和精神的奇异历程，她怀着很深的兴趣，因为她知道，这些就是她在世界上拥有的全部东西。于是，由于她是被动的，是被埋没于现实之中的，她比那些专心致力于抱负或职业的人，对现实有更为热情、更为动人的体验；她有闲暇，也有激发放纵自己感情的爱好，来研究她的感触并阐明这些感触的意义。当她的想象不曾迷失于空洞的梦幻时，她变得富有同情心：她努力理解别人，并且和别人打成一片；对于她的丈夫或情人，她能使这种认同更加彻底，她把他的计划和关切，都当作她自己的，这种方式，是他不可能效法的。

她把热切的关注投向整个世界；世界仿佛是个谜，而每个人，每件物，都可能是一个谜底；她急切地询问谜底。当她进入老年的时候，她那破灭了的希望被转化为冷嘲热讽和愤世嫉俗；她拒绝再被男性愚弄，她看透了那个男性建筑的堂皇大厦是多么荒谬无常、颠三倒四。她的依赖性使她难以超然物外，但是，从她被人利用的自我牺牲中，她有时也提取出真正的宽容。为她的丈夫、她的情人、她的子女的利益，她忘记了自己；她不为自己考虑，她是纯粹的礼物，她是纯粹的贡品。由于难以适应于男性的社会，她常常被迫随机应变发明出一套她的行为模式；她对现成的形式和各种老套子不满意；怀着世上最好的愿望，她对那套东西怀有疑惧；这种疑惧感，比起她丈夫的自以为重要的保证，更加切近真实。

但是，只有在拒绝男人提供的骗局的条件下，妇女才能具备那些超过男人的优点。上层阶级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热心同谋，因为她从其供养中得益非浅。我们知道，贵族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妇女总是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比她们的丈夫更为顽固。她们毫不犹豫地牺牲她们作为人类一员的独立性。她们压抑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批评性判断，所有的发自真情的冲动；她们鹦鹉学舌似的重复别人的看法，她们把理想和男性法典强加给她们的东西混为一谈；她们的心灵失去了真诚，甚至连她们的表情也如此；家庭主妇在她的家务劳动中，重新得到了某些独立性，并从劳动中得到了虽然有限但却具体的经验；但是，那些靠仆人侍候的女人是不可能把握住这个世界的。她生活在梦幻和抽象中，生活在空虚中。她不理解她口中声称的观念的真正涵义。她在讨论中使用的词汇已失尽了它们的真正意义。金融家、工业巨头、有时甚至包括军界领袖，也能了解生活的艰难和辛苦，因为他们承担着种种风险；虽然他们在不公平的市场上买得了他们的特权，但至少他们还亲自付出了代价。但是，他们的妻子，对于她们在交易中获得的全部好处，却什么都没付，什么都没做。正因如此，她们怀着如此盲目的信念，相信她们的权利是不可废除的。她们空虚而傲慢，她们激烈而低能，她们顽固而无知，这些使她们成为人类曾经产生过的最为无用的废物。

一般性地论及“妇女”，就如一般性地论及“永远的”男

人一样，是很可笑的。我们知道，旨在说明妇女是优等的、或低等的、或与男人平等的种种比较，之所以都无作用，就因为男女的处境是深有区别的。如果我们比较男女的处境，而不是仅仅比较处境中的人，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男人的处境好得多；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有较多的机会来运用他的自由。必然发生的结果是，男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女性，实际上，妇女甚至被禁止真正去做任何事情。此外，比较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环境的限制中对自由的使用，也是一种无意义的尝试，因为准确地说，他们使用自由的条件不同。形形色色的错误观念的陷阱和居心不良的骗局，正等待着两个不同的性别。心灵的自由只有通过双方的努力才会臻于完整。但是，对妇女来说，自由至今仍是一个抽象而空泛的概念；由于这一事实，妇女只可能通过反叛来运用自由；反叛，是那些没有机会做任何建设性工作的人的唯一出路。她们必须抵制处境对她们的限制，她们必须寻找通往未来的道路。听天由命，仅仅是一种放弃责任和逃避责任的行为。对妇女来说，除了为自身的解放而工作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中外人名对照

Abraham	亚伯拉罕
Abrantes	阿伯拉
Adele	阿黛尔
Alcoh.Louisa	阿尔柯特，路易莎
Arthus	阿瑟
Aristophanes	阿里斯多非尼斯
Audry,Collette	奥德利，科利特
Bachelard	巴奇拉
Bashkirtsev,Marie	巴斯克赛夫，玛丽
Benda	贝达
Bernstein	伯恩斯坦
Blanc,Georgette	勃兰克，乔其特
Bonald	邦纳
Bordeawx,Henry	鲍多，亨利
Boulanger	布兰格
Bourdouxhe,Madeleine	布度斯，马德琳
Breton,Andre	白瑞德，安德
Charrière	查利尔
Comte	孔德
Constant,Benjamin	科斯坦，本杰明
Cornelia	卡内利亚
Dane,Clemence	戴恩，克莱门斯
Deutsch,Helene	多伊奇，海伦
Dickinson,Emily	狄更森，艾米莉
Diderot	狄德罗
Dumezil	杜美济尔
Duncan,Isadora	邓肯，伊莎多拉

Eliot, George	艾略特，乔治
Ellis, Havelock	埃利斯，哈夫洛克
Evard	爱华德
Frazer	弗朗之
Gide	纪德
Granet	格拉耐特
Grasset	葛来塞
Grignan	葛丽南
Guyon	居荣
Hardouin, Marie	哈多因，玛利
Hirschfeld, Magnus	海切法德，玛格纳斯
Horney, Karen	哈尼，凯伦
Hughes, Richard	休斯，理查德
Jelliffe, S.E	詹利弗，*S.E*
Jammes, Francis	詹姆斯，佛朗西斯
Janet	珍妮特
Kennedy, Margaret	肯尼迪，玛格丽特
Kafka	卡夫卡
Kierkegard	基克加德
Kinsey	金赛
Landau Rom	罗姆，兰道
Lawrence	劳伦斯
Leblanc, Georgette	莱勃拉，乔其特
Liepmann	利普曼
Lehmann	莱曼，罗莎蒙德
Leibniz	莱布尼兹
Lenèru	莱尼如
Leplae, Claire	利普拉，克来尔
Luguet	卢威特
Maeterlinck	梅特林克

Mecullers,Carson	麦卡勒斯，卡森
Malraux	马拉克思
Mansfield,Katherine	曼斯菲尔德，凯瑟琳
Mauriac,Claude	莫里亚克，克洛德
Maurras	莫若
Mendousse	曼杜斯
Mentaigne	蒙太尼
Metternich	梅特尼
Meung,Jean	缪，金
Michaux	米休
Michelet	米什莱
Mill,John Stuart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
Monnier,Thyde	莫妮尔，迪德
Montaigne	蒙田
Montherlant	蒙德兰特
Noaille	诺艾尔
Palissy,Bernard	帕里斯，伯纳德
Parker,Dorothy	帕克，多萝西
Pascal	巴斯卡
Paul	保罗
Pètain	佩丹
Petipa	蓓蒂巴
Phryne	弗绿恩
Piaget	皮亚杰
Pipal,Karl	皮帕尔，卡尔
Pompadour	庞巴杜
Porter,C.A.	波特
Prevost,Marcel	普雷伏斯特，马塞
Proudhon	普鲁德霍
Rabelais	拉伯雷

Rachilde	拉契德
Racine	莱辛
Ramon, Don	拉蒙，多
Reweliot, Irène	雷魏恩特，艾琳
Richard, Marthe	里夏尔·马尔泰
Roy	罗伊
Sabine	萨比尼
Sachs, Maurice	莫里斯·塞克思
Sartre	萨特
Saussure	索绪尔
Sauvage, Cècile	索娃，塞西尔
Sèvign'e	德·西维
Se'gur	赛古
Sido	西多
Sisphus	西西弗斯
Staël	史达尔
Stanley	斯坦利
S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
Perse, John	帕西，约翰
Steinbeck	斯坦贝克
Stekel	斯坦克尔
St Thomas	圣托马斯
Vinien, Renée	魏斐安，雷妮
Webb, Mary	韦布，玛丽
Wharton, Edith	霍顿，艾迪丝
Woolf, Virginia	沃尔芙，弗吉尼亚
Wright, Richard	赖特，理查德
Xanthippe	珍西皮
Zenia	曾尼尔
Zuylen, Belle	瑞兰，贝勒

译 后 记

有人说，女性是喜欢"赶时髦"的，因为几乎连续不断地，总有新式样的服装、饰物及发型出现，并且在妇女们中"流行"起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妇女研究"是否也会成为一种"时髦"，渐渐流行呢？

然而，如果真是一种"研究"，那么就意味着要持一种疑问的态度来审视种种现象，意味着要进行事实的归纳和因果的分析。比如对妇女喜欢"赶时髦"这样的说法，如果跳过真实性和因果性考察而直接作出"好"或"坏"的结论，是容易因简单化而导致谬误的。女性到底是怎样生活着的？女性为什么会成为她们现存的样子？在本书中，通过一连串的描述和分析，作者对此作出了学术性的、机敏而清楚的说明。作者强调女性应当不懈地追求超越、追求自由，但是她也强调这需要基于对女性境遇及生存状态的深切理解之上。

本书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女，法国人，生于1908年，1986年去世，是著名作家、哲学家。她的著作很多。她于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别》一书，在许多国家有译本，广被

人知，现已成为“妇女研究”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篇幅很长，本书是其中的一部分，除序言外，为原书第四分部的一、二节和第五分部的一、二、三、四、六节。这几节正好组成了女性的一生，回答了“女人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换用了现在的书名。

在这里，波伏瓦所分析的，主要是欧美妇女的生活，这种生活和中国妇女的生活肯定是不相同的。但是，洋溢于本书中的女性反省意识，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种意识体现于对女性人生的真切的揭示和深刻的批评之中。这种反省意识似乎和女性进步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女性的理想，如果离开了对女性自身的了解，是可能变得空洞玄虚并无从实现的。因此，我们要说，反省是进步的前提，妇女研究是妇女解放的前提。译者希望本书能在女性的反省意识方面提供某种借鉴。

本书根据“企鹅”现代经典著作丛书所收1983年版本译出。本书的序言及第六、七、八章为王友琴所译，第一、三章为邱希淳所译，第四、五章为丁文涓所译，第二章为于迎春所译。

译者 1987.2